



# 昆仑山与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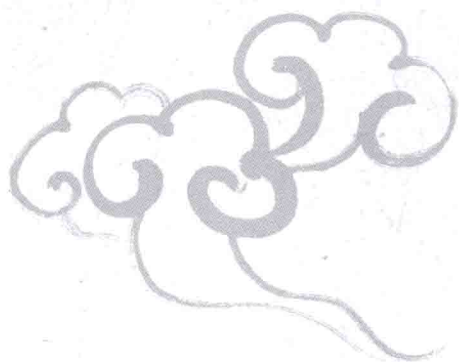
KUNLUNSHANYUXIWANGMU



李晓伟 编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 昆仑山与西王母

KUNLUNSHANYUXIWANGMU

昆仑山与西王母

李晓伟 编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仑山与西王母 / 李晓伟编著. — 西宁 :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20-1818-2

I. ①昆… II. ①李… III. ①传统文化-青海省-文集 IV. ①K29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342 号

## 昆仑山与西王母

李晓伟 编著

---

出版 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0971)6138933

发行 发行部(0971)6123221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西宁时代彩印 (0971) 4927008

印刷: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册

---

书号: ISBN978-7-5420-1818-2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柴达木历史与文化丛书

## 《昆仑山与西王母》编辑委员会

总 编 辑:牛 军

编 著:李晓伟

执行主编:杨东亮

副 主 编:朱 玮 麻严排

成 员:张 倩 李明新 汪生花

图 片:姜 仲 杨 林 陈生贵 马 云 罗文俊



# 序

写这么一部《昆仑山与西王母》的书，缘于我的人生命运轨迹。当然也缘于我的治学宿命。佛经中的缘起缘灭，是在因果关系中诠释某种个体生命与客体世界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感和前定意味。仔细想来，我在小学与中学的地理课本中就特别钟情于昆仑山。我明白那是一道中国西部的宏大山脉，潜意识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与膜拜。渴望有朝一日能走近她，零距离地仰望并触摸她。上世纪70年代我参军入伍，服役的营盘恰好就在昆仑山下。所谓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恰好就位于这“昆仑之丘”的腹心地位。现在回忆，我献身社会的第一步，分明是昆仑山对我的召唤与拥抱。这注定是命运之安排。由于部队换防与工作的调动需要，我竟在10年的前期军旅生涯中，走遍了昆仑山与祁连山的每一处山峦与河谷。应该说，我用双脚丈量了这一方雄奇壮阔而又不乏神圣感的地域。那一种生命与大山的对应与感悟，无疑成就了我后来深究昆仑山地理与历史内涵的深刻动因。我隐约意识到，这一方高峻、绵长而又雄阔的山脉对于华夏古中国的决定性意义。这意义具有多重性，集地理、气象、历史、文化、哲学的全方位复合，不可等闲视之。简言之，昆仑山之于古中国，明确具有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母体安排与人文精神形成的双重意义。而这重合意义的深层结构，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真正认识。

地球地质地理史与地球气象演变史的研究已经证明，大约在350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地球造山运动中隆起了昆仑山脉，从此改变了亚洲的地理板块格局。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至西藏北缘，跨越青海全境，连接起甘肃的岷山，直达陕西秦岭。全长约5500余公里。其南缘的唐古拉山，北缘的祁连山，则是由昆仑山自然延伸的南北支脉。昆仑山平均海拔约为5500~6000公尺，其最高峰布格达坂峰高耸在青海境内，海拔6860公尺，是整个昆仑山脉的峰巅。而全长五千余公里的昆仑山





脉,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横亘于青海境内。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澜沧江、黄河三条大河便发源于青海境内昆仑山的南北两侧。地质地理史的研究考察表明,昆仑山在 350 万年前的形成,既造就了华夏版图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又形成了亚洲季风的循环规律。而由于西北部沙漠尘粒在昆仑山东北部的堆积,在 100 万年间形成了黄土高原。又由于黄河长江由西往东的冲刷,在 100 万年的时间内,又制造了华北大平原、江汉平原等东部农业区。可以说,正是昆仑山与黄河长江的自然力,造就了华夏大地的基本面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 5000 年的自然与人文基础。

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最早的古籍《山海经》和《禹贡》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河出昆仑”“河出昆仑东北隅”。这方位也就是现今的青海省西南一隅。就昆仑二字的造字本义而言,古籍中的昆仑二字为“崑崙”,其中累积了 4 个山字,这显然说明昆仑二字是专为表述某一特别宏大绵长的山脉而存在的,且这一大山脉在后人的心中是特别神圣并受到膜拜的。只是到了汉代以后,昆仑被望文生义地与“混沌”“天形”“葫芦”等联系在一起。至唐代又冒出了“浑黑”的引申义,竟把明确的昆仑山说成是某种虚幻的存在。到了后世以至到现代的某些学者,不以“崑崙”二字最早出现的《山海经》《禹贡》入手,而从汉代唐代时出现的“昆仑”引申义出发,这便把昆仑的本义妄加扭曲,结果是愈说愈乱,玄而又玄。如今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还昆仑以它大山脉的初始意义,并把昆仑山的地理方位彻底廓清,还历史记载以本来的面目。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又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也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记载和现今青海境内黄河的流向延伸完全一致。包括了东昆仑的巴彦喀拉山、扎陵湖、鄂陵湖、大积石山、小积石山等。此处的“昆仑之墟”即指东昆仑山脉。而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对照现今青海全境南昆仑、北祁连、东日月山、西阿尔金山的地貌特征,此处的“昆仑之丘”显然是指整个柴达木盆地。因为丘字的本义为“四面高,中间低,意为山间盆地。”这一“墟”一“丘”把东昆仑山脉和它北面的柴达木盆地区隔得非常明确、清楚,而无歧义。





有了昆仑山,才有了西王母。因为西王母既是昆仑山的主神,又是昆仑山的主人。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意识形态中,人神原为一体,故西王母可以作为居于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的最早羌人族群来加以解释更为合理、恰当。《大荒西经》载:“……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纹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请注意,这一记述将神与人分得很清楚:“有神,人面虎身”——显然是部落时代图腾崇拜的标致图像。“有人戴胜……名曰西王母。”蓬发戴胜,是对西王母的形象比喻。至于虎齿豹尾,当然是对西王母作为部落女首领其服饰面具的一种印象记录罢了。

青海是古羌人部落聚居区,而西王母“居昆仑,都昆仑”说明其所处时代为母系时代。“西王母”作为一个在古籍中屡屡出现的名词,因语境的不同而显示出既有的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含义,或指女王,或指女神,或指族群,或指方位、方国。如此,我们才能回归“西王母”的本义。

至于说到“西王母,穴处”,与其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完全吻合。青海境内天峻关角沟里的石室,海北夏格日山上的诸多洞窟,还有湟源宗家沟里众多的山洞,皆有可能称为西王母石室。因为“西王母”作为一个族群,其所需要的天然石窟当然很多。大可不必确指某一个石窟为准,因为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确凿的字据,何必较真呢?

编者

2011年11月于西宁

# 目 录



## 西王母故地

圣山有色 // 3
洞穿历史 // 16
咀嚼废墟 // 25
昆仑解谜 // 34
王母情结 // 44
女王考秘 // 51
炎黄溯源 // 60
西王母族属考 // 67
女王影子 // 70
关于古史 // 73
《山海经》辩 // 77
圣母偶像 // 81
图腾时代 // 86
女神时代 // 93
生殖崇拜 // 96
“於菟”寻根 // 100
以诗证史 // 105
鸟兽人师 // 111
女王之山 // 117
复活远古 // 122
正史歪读 // 130





王母遗韵 // 140  
仰望昆仑 // 144  
残篇缀语 // 150

## 河出昆仑行

昆仑龙脉地 // 155  
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 // 161  
华夏文明顺天地之运 // 165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 169  
大洪水下的文明再生 // 174  
黄河流域的演变与王朝更迭 // 180  
河首之“谜” // 185  
黄河文明荟萃古都长安 // 189  
生态变化与黄河变奏 // 194  
星宿海——柏海——西海 // 199  
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 204  
再塑昆仑 // 212

## 触摸大昆仑

神域魔境 // 221  
“弱水”西流 // 232  
羽族王国 // 234  
巴颜喀拉 // 240  
公主庙记 // 243  
拥抱昆仑 // 246  
迷失古林 // 252  
同此凉热 // 256  
文化宏脉 // 264

西王母故地







## 圣山有色



### 吐蕃王国、吐谷浑王国、西王母国，历史之谜层层洞开

现今的青海湖(古称西海)周围,南抵昆仑山,北抵祁连山,即是古籍中所说的“昆仑之丘”。在古代,这一片广袤的区域绝非如现代人所想象的蛮荒之地。此地域既是公元7世纪时唐蕃交战的战场,亦是曾立国300余年的吐谷浑王国故地,更是距今3000至5000年前的西王母古国旧地。在现今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一带发现的西王母石室,有汉代建于其对面70余米处的西王母寺作证。

探访揭秘就从这里开始——

任何荒僻的土地,哪怕是现代文明的触角不曾抚摸的地方,只要一经文化的观照,立即就灵动起来,绚烂起来,赋予一种鲜活的味道和立体的动态。不仅使人愿意走进,而且还要沉思徜徉那样一种魔力的牵引,比一切世俗的诱惑都要深刻得多,也坦荡强烈得多。

这一刻,用神魔之惑牵引着我走近她的是地球上的哪一座山呢?是昆仑山,是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大地中心、世界之巅的昆仑山。即使用现代中国人,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眼光来看,昆仑山依然是遥远、荒寒、神秘而不可测的,它使人联想到天之涯和地之角。

可是此刻,我的的确确是要去这座大山了。

别忘了,那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咖啡、没有冰淇淋、没有摇滚乐和流行曲。当然,更没有涂着口红烫着波浪发的时髦女郎了。

可是,那里却的确是我乐意要去的地方。

没有了时髦,没有了时尚,同时也少了嘈杂和喧嚣。在一个钢筋水泥组成的错错落落的建筑森林里住惯了、住久了,人的生命意识、生命本体、生命机能是要退化的,悄无声息地不知不觉地退化——那是一种普



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病。当然,城市自有城市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去昆仑山。我知道,那是一个充满着原始野性的山莽与山莽挤压重叠的荒芜之地,是一个激荡着乱云也肆虐着风沙的苍凉所在。但同时,那里却散落着史前的传说,流传着美丽的神话,还有许许多多难以确认却又发人幽思的远古遗迹。那里是一部深藏了千万年的人类遗书,每一页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和命运而言,是和浩莽阔大的昆仑山有缘有份的。屈指算来,我已有 30 年时间,把生命交付于这片旷莽之野了。那连绵不绝的昆仑山脊上的白雪;那流过山脚下草滩上的蛇一样的溪流;那突窜过沙丘弧线上的三三两两的黄羊;那屹立在沙原中央的像武士一样的沙枣树;那抖动在晨风中的无名河岸上的丛丛细草,是那么深切具体地迭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只要一有闲暇,它们就会在我大脑的荧屏上生动地显现,交替着浮游,挥也挥不去,切近而可意,我明白,那一切一切的记忆,早已变成我生命与灵魂的一部分了。

可是,时间和知识告诉我,那一切记忆的讯息只是表层的、浮泛的,那是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被时间的风雨剥食过的昆仑山留给现代人们的第一面的印象,也是最后一面的印象。那印象真实而缺乏纵深,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妇人,把她少女和少妇的溢彩时代留给时间的密匣去保存了,却把最后的老态龙钟的形象定格在今天。于是,有缘造访她的人们才会凄然长叹说“噢,这就是昆仑山,苍老而荒蛮!”

事实的确如此。昆仑山常常被现代人肤浅地、表面地误读着,包括我。

可是,我终于警觉起来了,我发现,误读昆仑,其实就是在误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误读昆仑,其实也是在误读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史。

21 世纪已经开始,新时代的脚步清越而急促。对昆仑山的误读理所当然地应该结束。如果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人类必须善待它的话,那么,中国的版图上也只有一座昆仑山,我们更应该加倍地善待她,珍爱她。

善待和珍爱,首先要理解,要摒弃误读。



我为自己能不再误读昆仑而如释重负。

我完成了一次认识论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屋内与屋外,其实就一墙之隔,打开窗户,天边的星星就在眼前闪耀;推开门,就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智慧、知识、科学思维,包括诗情与激情,这才是我们现代人能逼近真实昆仑的锐利之器。就像是一个懵懂的牧夫,当他站在不毛之地的沙原上时,他只能快快地叹气说:“这地方真是一钱不值。走吧!”而当另一位地质学家站到同样的位置,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却会喜从心来,并近乎癫狂地跳将起来,大呼道:“地下有石油,有一条石油的河啊!”

我发现不了石油的河,我也没有能耐发现其他可资利用的物质的矿藏。但我却确凿无误地发现了深藏在昆仑山脉中的古代奇书——一部中国正史以外的传说史或考古史。

这历史似乎有点古怪,有点神秘,但却无疑是真实的。

传说也罢,神话也罢,众说纷纭也罢,只要是我们愿意走近,就会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好在,征服有时候是互相的。互相征服的理由就在于今人与古人的对话,现代与古代的对话,往昔与未来的对话,存在与超越的对话。

对话,与默然屹立的昆仑对话。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更让人神思飞扬,浮想联翩的呢?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可以使一个现代人洞穿历史,从而更理智地把握现实与未来的呢?

终于,我坚定地出发了。轻装行囊,向着莽莽昆仑,义无反顾。在那一刹那,我竟然想起了唐代的高僧玄奘,那一幅古道西风瘦马,为信仰而艰辛跋涉的影像,何其寂寞悲壮!我知道,类比总是可笑的,而使命和目标也完全不同。我惟一的奢望,便是能将《大唐西域记》转换成现代版的“今古昆仑游”。我相信,我是在听命于一种现代人类生存理性的导引,也是在听命于一种远古历史的彻悟的呼唤。灵魂如风,形体似箭,我的生命的激情是被彻底地调动起了。走吧,走吧!去品读这一脉被千千万万世俗旅游者冷落了的真正的大山,去叩问这一脉让中外登山勇士们为之神往的大山,我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的同路人,至少是精神取向上的同路人,我为我的选择感到崇高。









◇ 圣山有色





崇高归崇高,可我同时也感到了茫然。以昆仑方圆 4000 余公里的纵横延伸,我该从哪里下脚呢?我得求助于地图、历史书,包括传说。我明白,我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之旅,而文化的遗迹是有其特定的散射点的。文化散射点——这就是我昆仑之旅的行动坐标。

我首先选择了大非川。这是唐代史书上留下的古地名,现在则属于塘格木农场与大河坝之间的上百平方公里的切吉原野。这片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市约 260 余公里的地方,在公元 7 世纪时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恶战。据《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七月戊子,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败绩。”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吐蕃军队以突袭方式灭掉了已立国 300 年而与唐帝国有邦属关系的吐谷浑。于是,唐王朝派遣薛仁贵为元帅,统兵 10 万问罪于吐蕃。一场恶战的活剧就突现在大非川草原之上。

那一场战争到底怎么个打法,史书录之极简略,而民间传说却极详。总之是吐蕃以 40 万大军以逸待劳,相形之下只有 10 万之众的唐军千里跋涉,且指挥失控,其败绩从一开始似乎已命中注定了。

在风鸣萧萧的秋日的黄昏里,在血红的残阳已无力地沉向西山之背的那一刻,当我站在这古战场的大非川中央凭吊那历史的一幕时,遍野的纤细的衰草竟一齐在风声抖动,像无数的乱箭正从已逝去的时空射来。我想象着吐蕃的 40 万兵士手执刀矛纵马冲杀的场面,无疑,仅有 10 万人马的唐军是被团团包围了。展开在大非川草原上的厮杀是一场典型的冷兵器的白刃格斗。刀枪翻飞,乱箭如雨,血肉迸溅,狂吼震天,尸横遍野,腥秽狼藉。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当年的吐蕃大军如何布阵,也不是唐军副将如何置薛仁贵的再三劝告不听,轻敌冒进一步步钻入敌军的口袋。我一开始就在深思的是:吐蕃方何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啸聚起 40 万大军? 40 万大军,其中的骑兵至少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这么庞大的军队当然不是吐蕃全国兵力的全部,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还有三四处需要重兵防守的边境要塞。一是四川的松潘,二是河西走廊一线,三是与中亚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当然了,藏王的都城拉萨(唐时名逻些)也必驻守有重兵。如此算来,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握有雄兵百万。百万军队是一个什么概念?百万军队首先和数百万的战马相辅相成,然后是支撑这支庞大军队的国力、财力、民力,还有必须成龙配套的武器



库、辘重车辆等等。想想看,当时的吐蕃国力是如何的强盛,而且这种强盛还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军队曾两次攻陷长安,差点儿没当了中原的皇帝。

我要郑重指出的是,以现在的青藏高原如此高寒贫瘠,何以能在吐蕃时代称雄一时?这里透露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吐蕃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绝对要比现在好得多。而作为青藏脊梁的昆仑山脉,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是一个植被葱绿,乔灌葳蕤的所在。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一方地球上的高地何以有那么旺盛的力量,何以有那么蓬勃的生命力。我们确信,公元12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的崛起和空前强大,只能从“草原孕育铁骑,而铁骑征服世界”这一法则中得到解释。而公元7世纪时吐蕃的强大也只能遵循这一法则。这应该没有疑问的,冷兵器时代的决胜力量必然青睐铁骑集团军,就像二战时决胜力量必然青睐坦克集团军一样。

无独有偶,昆仑腹地的昔日繁盛同样在现今的都兰县境内的古墓群挖掘中得到证明。都兰县现属青海省海西州管辖,其墓葬群规模宏大,遗物丰富,许多文物堪称国家级的绝品。这片墓葬的发掘不但有助于揭开一个立国300余年的古国之谜,而且对青藏腹地的地理地貌变迁提供了明确的佐证。

两脉青山夹着一道河谷,两边遥远处陡立着昆仑余脉布尔汗布达山终年不化的雪峰——这就是沿青藏公路向西约400余公里处的吐谷浑古墓群了。我去的时候古墓的发掘已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令人感到惊骇的是,古墓的抢救性发掘竟是在愈演愈烈的盗墓毁坏基础上进行的。盗墓带有一定的集团性,采用的工具竟然是推土机之类,其疯狂性与毁灭性让人发指。

可是,一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还是保存下来了:器皿、钱币、丝绸之类。钱币既有隋唐通币,更有古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遗物。特别令人思绪为之一震的是:一方三尺余的丝绸彩幅上绘有异国风物、珍禽异兽、器皿居室、人物形态等,精美绝伦。经考证,这遗物属波斯织品无疑。

一个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终于有了结论。那就是,在从东晋以迄隋唐之际,数百年间的北中国动乱时代,





确有一条丝绸之路的南线线路。这条线路经兰州到西宁再到柴达木盆地后越过当金山口直达西方,避开了河西走廊一线因战乱割据等因素造成的隔阻。历史文化的交流脚步虽有过迟疑或迟缓,但从来没有停顿过,对吐谷浑古墓葬研究的现代诠释意义大概就在于此了。

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立国 300 余年,拥有青海湖周围西跨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王国,它的整体基业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实力之上的呢?而它的突然的灭亡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呢?

吐谷浑原属辽东鲜卑族的一支。据《晋书·四夷传》载:“吐谷浑,慕容隗之庶长兄也……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从辽东西迁,一路上过华北,绕漠南,度陇西,涉湟水,其间举族携众,马牛毡帐,艰涉之苦,可想而知。幸好,中原的隋王朝还未建立,西南的吐蕃还未崛起,西海至柴达木盆地的大片草原之上,古羌人的聚合力已逐渐消解零落,于是,西迁的吐谷浑终于找到了新的繁衍生存之地。一晃就是 300 年,吐谷浑王国的名字竟重重地镌刻在了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史书之上。岂止见于史书,就是在传为名篇的唐诗绝句中,亦有如此美好传神的句子: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  
已报生擒吐谷浑。

诗名在表层意义上传达的是对于唐军战役胜利的欣喜,骨子里的另一层意思却是对于吐谷浑兵强马壮不断寇边的担忧。因为诗中第三句已明确点到此役的位置是在洮河北,属唐朝之地,距吐谷浑的地盘少说也在千里之外。以唐帝国的赫赫威名,竟要受到这么一个邦属小国的欺负,足见当时的吐谷浑绝对具有轻骑数万,且常能远途奔袭威胁唐朝安全的能力。好在此时坐在大唐皇位位置上的是一代明主李世民,他以赫赫国威作后盾,对边远少数民族王国采取了联姻和亲的怀柔政策,弘化公主的出嫁吐谷浑王诺曷钵,大约就是在双方几次军事摩擦之后的产物。就连大名远播古今传为佳话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也是唐朝无暇顾及西部边陲的产物。当时的松赞干布打到唐朝边境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你



大唐皇室能将弘化公主嫁于吐谷浑王,为什么就不能把另一位更优秀的公主嫁给我吐蕃王呢?你不答应远嫁公主,我就寻衅开战,看你咋办?结果是,双方在几次战斗中各损失了不少人马,文成公主的赴藏才终于成行。

吐谷浑亡国的表层原因是吐蕃王朝的铁骑突袭,其深层原因却是国势在陡涨之后的陡落。在这里,我们撇开地理变迁的自然因素不谈,而人为的频繁战争,过度的载畜滥牧,超负荷的私欲获取,无疑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自毁作用。试想想看,以一个驻牧于柴达木盆地东及青海湖的千里小国,却经年累月地要支撑近10万之众的庞大军队,其国力民力自然力的消耗必然是每况愈下。到头来,西南面的强敌吐蕃稍纵铁骑,一个立国300余年的小国立刻就土崩瓦解了。即使有如前文提到的唐大将薛仁贵的西征复吐谷浑国之举,吐谷浑王和弘化公主还是被赶到了湟水流域,一段文明史终于消逝在柴达木茫茫的沙原之中。

但吐谷浑故地的前期富庶却是无疑的。据《隋书·炀帝记》载:“五年





三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隋炀帝的西巡也是对着吐谷浑的,其主要的方式是耀武扬威,而他的数万大军却在与吐谷浑临界的拔延山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围猎,其直接目的当然是集资军需。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围猎,竟得珍禽异兽无数。接下来便是犒劳三军,便是对吐谷浑的追击作战,显然,吐谷浑被打败了,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南山深处(即现在的果洛阿尼玛卿雪山一线)。值得我们现代人反复玩味的是,现在的西宁东西地区,哪里还能找到一个数万人围猎得禽兽无数的所在呢?自然的退化如此剧烈迅疾,生为后来人的我们将作何感想呢?

依旧是吐谷浑的故地,再上溯 2000 年,却卓然存在着一个羌人部落王国——西王母国。而与西王母国当时的繁盛遥相对应的中原王朝,便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 800 年辉煌的周王朝。在史籍中,周王朝如日月经天,而西陲边的西王母却鲜为人知,这到底是史家的不经意呢?还是以中原王朝为正宗的历史观的偏见所致呢?总之是一段曾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竟被神话与传说搅扰得扑朔迷离,常常让后来者越想走近,便愈会陷入五里雾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史实与神话的争论便一直依托着这块高地在此彼此打架,究竟谁胜谁负,似乎直到今天还未能有一个公认的结论。这倒好,越是朦胧不清的,便越能诱惑人,越是朦胧迷幻的美,便越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好吧,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昆仑,走近西海,走近西王母国。我相信,这一次的溯古造访,是会在事实上修正中国先秦古籍的诸多记载的。

我索性直奔主题。

把纷乱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单纯化,或许是我们走进历史、层层逼近真实的最佳选择。当然了,大胆的假设是和细心的求证相辅相成的,但如果摒弃了大胆的假设,一切的小心求证都只能是在历史的迷雾里左顾右盼而无法抓住主要的目标和方向。

这一次,我径直驱车驰向被称为古昆仑的天峻县关角日吉沟。我们由被称为青藏公路咽喉的茶卡折而北上。在长约 40 余公里两山夹道的长沟里曲折穿行。沟左旋右绕,宽狭不定,两边青山雪岭,天风荡荡。一种神异的感悟突然袭上我的思维之弦:此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若无人导



引,主沟两边不断分叉的小沟真像是迷魂阵,谁也保不准哪个沟内会突窜出一彪人马。要厮杀布阵,这地方真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了!

思考间,沟势渐见开阔,视野豁然开朗,开阔处的尽头却又是两山收拢只留一缺口。妙极了!这一圈长沟中央形成的天然大草滩,是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处绝妙所在,而更为绝妙的是,在这状近葫芦肚的草滩中间,竟兀兀然突出一座石山,石山高约 25 米左右,嶙嶙峋峋恰像是从天外飞来的仙山。当地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

“这就是西王母石室,你信不信?”

前半句是肯定的。后半句却含有与我商榷的意思。我笑了,我知道许多古籍中都有“西王母居昆仑,穴处”的记载,但“穴处”到底是何种含义,实在让人迷惑。

绕山一圈,目测一番,沉思一遍,我总算心中有数了。石室的确存在,且天造地设,让人神往,但是否曾为西王母居所,实难定论。

石山嶙峋却浑然,整体姿态坐东向西。西壁洞开一门,全无人工痕迹,高约 3 米,宽约 2 米许。沿洞而入,洞内空间陡然延伸扩大,呈椭圆不甚规则状。使人不得不出生出敬畏的是该洞竟由主洞、前主洞和后主洞,左右两侧偏洞配套组成,石灰岩石壁虽不甚平整,反而衬出一种天然野趣。粗略算来,主洞偏洞的总面积大约在 130 平米左右。试想想看,内主洞为王居室,外主洞为客厅,左右偏洞为侍卫侍从室,加以古代适宜的兽皮香木花草装饰,一个女王的天然府第不是庄重华美且天谐受用吗?

出洞口再绕山观看,见小山背后正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流韵含情,似在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和传闻。再登高远望,权衡脚下,但见平地起石峰,峰下有奇洞,鬼斧神工,天下绝境。西王母选择在这一方妙土而居,她的神秘力量能不让臣民们俯首而崇拜,崇拜而拥戴吗?

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拥戴方式,而崇拜到极致,便会产生神化。无疑,西王母是中国古籍中最早被神化了的一个真实人物。

结论似乎下得太匆忙太草率,但当地人赌咒发誓:“西王母就是住在这石洞中!”

我拿出《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怪异形象来反驳他们:“虎齿豹尾,蓬发戴胜——这能说西王母是一个真人吗?”





马上有人反驳我说：“虎齿豹尾只不过是西王母的面具图腾。就像中华民族至今还崇拜龙一样。西王母是古羌族首领，羌人崇拜虎豹，这是民间公认的事实。”

真是迷雾重重难分辨，却被他一语道破！于是，我想起了另一部同样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古籍《穆天子传》。其中说：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在这里，颇有神异色彩的西王母还原成她的本来面目：天生丽质，雍容华贵，风雅唱和，气韵迷人。而与她合唱的周天子，其言其调，也不失为一个有帝王风范的可信形象。难怪在传为信史的《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断言：“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让周穆王乐而忘返的原因是西王母的热情周到和美丽可人。试想，以周天子之尊，姬妾中美女如云，但他却被远在镐京以西两千里之外的邦国女王迷住了，西王母的风度才情该是何等样的超群卓然！由此可以断言，西王母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是一个集歌舞绝技于一身的年轻女王。由她治理的西王母之邦，无疑是一个山川秀美、物产丰饶、民众安乐、且仁义亲和的友好王国。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山海经》颇多神怪，有一定神话色彩。而《穆天子传》叙事真切，极富人情味，所以后世有许多学者疑其为小说一类。但中国古代文学史表明，直到唐代才有传奇出现，先秦时代是断不可产生以杜撰创作为主体的小说作品的。对于《穆天子传》，我们尽可以把它当作史实记录来解读，大致是不虚的。

自然而然地，西王母的美丽存在使我们联想到西方美神维纳斯。而维纳斯只是一尊断臂雕塑，西王母却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她立国于昆仑山下，青海湖畔，其部落女王的尊号也就是她的部落国家的名字。她代代相传，历久而弥新，由于时代的久远和传说的纷纭，她真善美慧的形象愈到后世便愈包裹在奇诡的神话当中，让人只可仰视而难以亲睹。现在，就让我们一步步地走近她，走近她的时代，还神于人，鉴古知今。让东方美神以她永恒的魅力，匡正迷乱矫情的世风，回归率真纯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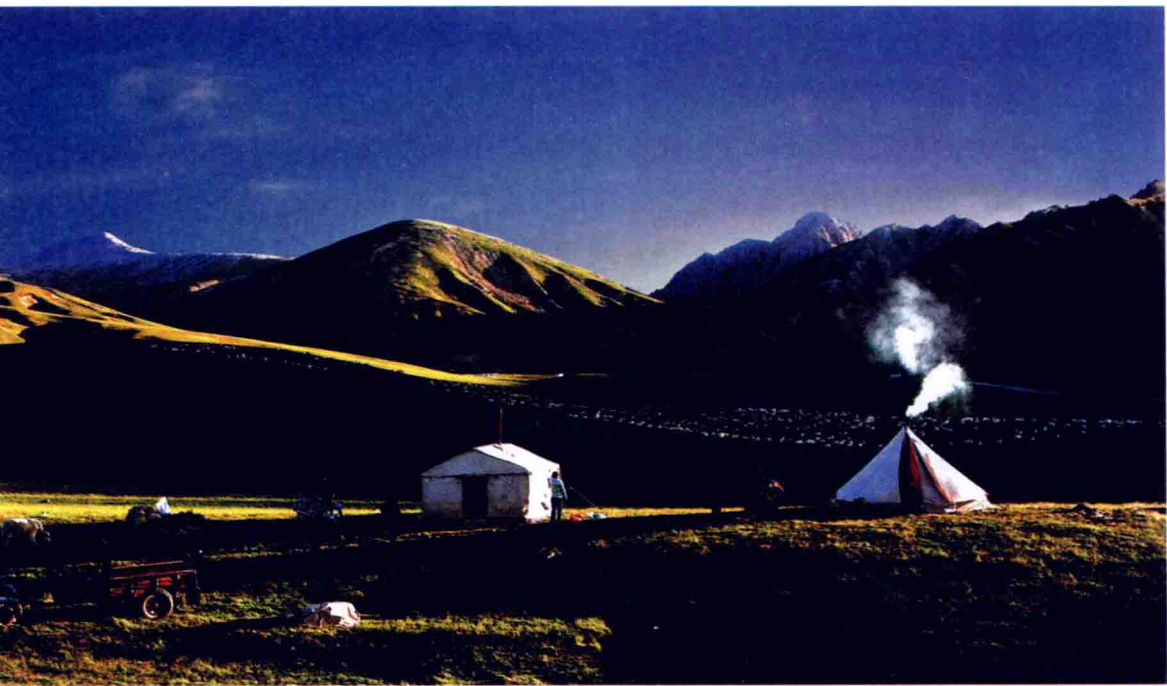
人性。

诚哉此行！

西王母石室发现了，还有其他佐证吗？

幸运的是，就在石室对面 70 余米处的地方，挖掘出了一个占地约 8 亩见方的古寺遗址。古寺前后约 80 米，左右为 66 米，从散布的大量瓦砾石块格局判断，寺院有山门、前殿、后殿，具一定规模。碎瓦片中分板瓦、筒瓦两种，表里均有花纹，颜色为红、青、黑三种，质地坚硬，制作精美。更有确证意义的是，在一块红色带铭瓦当上，有篆书“常乐万亿”字样，而在另一青色带铭瓦当上，有篆书“常乐未央”字样。对照古籍《恢国篇·论衡》所言：“金城塞外，羌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考古工作者认定其为西王母寺无疑。先有石室，后有寺，顺理成章。这说明，早在汉代，人们就公认此地为西王母石室，且建寺以纪念了。

两块带铭瓦当现保存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



## 洞穿历史

### 西王母和轩辕黄帝有不解之缘

沿着昆仑山一路向北,我一边思考着上古历史,一边实地探寻——

作为当代人要撰写新的历史著作,一定要运用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一定要具备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否则,历史将会变成一堆僵死的东西,与我们的现实完全隔开,那样的话,就不仅仅会封闭历史,也会封闭现实。其实,真正的历史是和现实血肉相连的,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人,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直到老年,生命的自然流程是不能分割的一样。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为一句外国人的未必含有恶意的诘难而愤然不平的时候,我却分明看见昆仑深处那一位光彩照人的女王,正微笑着,用她和治邦国的雍容气度向着我们这些后来者招手。她步态从容地巡视在她的部落山野间,不经意间弯腰折一蓬野花,顺手插在了她美丽的发际。她微微张了张口,仿佛是在说:

“我的王国从轩辕时代一直延续到周秦,请问这,算不算中国的历史?”

问得爽快,问得彻底。女王到底是女王,一举手一启唇,就透出了她的朗朗本色。

于是,我由西王母的历史真实想到了轩辕黄帝。无疑,黄帝是古今中国人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的名号本身就具有神圣性。然而,对于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从古到今的争论似乎也没有中断过。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是把他作为真实人物立传的,但《山海经》却是把他作为神来演绎的。至于在中国的老百姓中间世代代都把他作为真实的老祖宗来祭祀。陕西黄陵县的桥山上,至今在苍松翠柏中簇拥着一座巨大的陵墓,那就是







每年都要接待无数祭拜者的黄帝陵。然而,据说那陵墓中并不存在黄帝的遗骨,守陵者说是衣冠冢。既是衣冠冢,那就生出了一个问题:黄帝的遗骨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或者说,黄帝作为历史人物,到底存在不存在?

近代兴起的实证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坐标,一大堆史书上的疑难问题或众说纷纭的事实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证明和澄清。但是,考古发掘不能够也不可能解决一切历史难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地下的历史遗迹不可能都被我们幸运地找到;另一个更为要命的前提是,文明早期时段的许多重要史实并没有遗迹可寻,也当然没有精当准确的文字记载。而传说与神话的产生时代,正好是那个将要产生文字,但仍然未能产生出文字的时代。如果说,仅仅因为考古发掘不能证明黄帝的存在而彻底否定《史记》的记载,那我们就会在苍茫的云空里看见我们所景仰的西王母那藐视的眼神,她会不无善意地嘲笑我们说:

“我的部落王国可是与轩辕打过交道的。如果因为你们没有看到就







否认,那你们该否认的可真是太多了!是不是应该先怀疑一下自己的智力和视力,怀疑一下自己的方法论?”

问题又回到该怎样看待神话与传说了。

2500 多年前那位以治学严谨,“不语怪力乱神”著称的文化大师孔子,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对中国古代神话作出科学的定位并作出系统的研究,但他在涉及到黄帝的传说掌故时,却能够采取一种至今看来仍不失理智谨慎的态度,他的判断也充满了智慧。当时一位名叫宰我的学徒曾求教于孔子,他说:“我曾听人说过,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以至于他竟能存在三百年吗?”

孔子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便手捋银髯从容回答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巧的是,孔子得意门生子贡也同样请教关于黄帝的问题,他说:“古人传言黄帝有四张脸,这话可信吗?”

孔子回答说:“黄帝任用了四个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意见的辅臣,让他们分别治理四方。这样,不必等黄帝考虑问题,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事情办好了,所以古人便以此传说黄帝有四张脸。”《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孔子到底是孔子,大师毕竟是大师,两个颇为怪异的难题竟被他稍为剖析便迎刃而解,且回答得入情在理,让人佩服。不妨可以认为这回答含有明确的唯物主义成份,实在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后来者汗颜愧怍。

遗憾的是,孔子对同样传闻于民间的西王母未作任何评断,这大约与西王母偏处一隅,并不是正宗的华夏人文始祖有关吧!或者说,孔子因为在观念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的歧视,所以他就不屑于对那个远在天边的部落女王加以关注。无论如何,孔子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把这个牵动着中国历史神经的西王母给疏忽了,后人只能摇头唏嘘而已。

就像地球人类的出现只能从地球生命的发展史中去探寻,而不能用天外来客去解释一样,生活在昆仑山中的西王母以及她的古羌人部落也只能从遗失在山野中的史前废墟去获得理解。

好在,我们毕竟有了洞穿历史的诸多利器,那就是:现代考古学、生



物遗传学、现代神话学等等。

人猿相揖别,约在 200 万年以前或许更远一些。无疑,在人与猿告别的漫长岁月里,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人类的强迫性前提,而为生存强化了的必要劳动使最初的人类手脚分家,接下来便是石器的打磨与火的运用。渐渐地,人类实现了从猿人到智人的进化。现代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就人的生物遗传本能讲,20 万年前的智人跟我们今天的人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存欲望、求偶欲望、征服欲望、毁坏欲望和创造欲望这几种最基本的欲望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人去推断古代人。我确信,在我们周围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稚气未脱的孩童身上,更能准确地推测和想象我们远古先民的喜怒哀乐与音容步态。一句话,除了生活的舒适程度和知识的积累程度跟我们无法类比外,其他方面大约是一个样子了。

这种类比当然会让习惯于藐视古人的我们感到些许扫兴,但同时,它却为我们去理解古人提供了最切近的参照。

昆仑山是我国两条最著名的大河——长江与黄河的发源地,也是古代羌人最主要的活动地区。诞生于先秦时期甚至更早许多年代的昆仑文化、昆仑神话,其孕育生成演变的主要载体无疑就在昆仑山。在昆仑南侧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一线,发现了 10 万年前的人类遗物——多种形状的旧石器。在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地区,同样发现了更为先进的打磨石器。人类跨昆仑南北的活动脚步,10 万年以前就在踢踏作响了。那声音空阔而清亮,带给远古的昆仑以一种最初的生命激情。

沿着莽昆仑漫长的脊线信步向北,穿越柴达木盆地的平坦旷野,再到青海湖碧草如茵的环湖草原,再到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两岸,古羌人的脚步由稀疏到密集,由稍见蹒跚到日显坚强,终于,他们完成了一次辉煌的文化跨越——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一次又一次把古羌人推向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前台。特别是出土于马家窑的舞蹈纹彩陶盆一下子就把我们与西王母时代的距离拉近了。

这是一个研究青海历史有巨大价值的彩陶盆具,其质地和造型倒也平常,浑似一个粗糙的放大的农家大碗,且圆弧度不甚规范。

奇的却是它那密布于盆内壁的彩纹图像：三组五个拉手同舞的女子，姿态真朴、动感悠然，且每人的服饰下摆均呈一逼真的尾巴状，这给舞女的生动姿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内容。人们会问，舞女有尾，且以为美，这是一种更遥远的猿尾情结呢？还是 5000 年前古羌人的民俗文化依恋呢？抑或是另有深意呢？无论如何，这一特殊的舞女饰尾而舞，传递给我们今人的是一种明确真实的远古信息。

答案似乎就藏在《山海经》里对西王母形象的描述上。《大荒西经》里说：“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在《西次三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细加推敲，我们便会从引文中明确如下几点：

（一）西王母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兽。

（二）西王母蓬发飘飘，善于打扮，精通歌唱和舞蹈，很受尊敬与崇拜。

（三）西王母用虎齿豹尾的装饰强化自己的威严，带有某种图腾示范的性质，其目的是威慑镇服，显示权威。且有秉上天旨意为人间降妖灭灾的象征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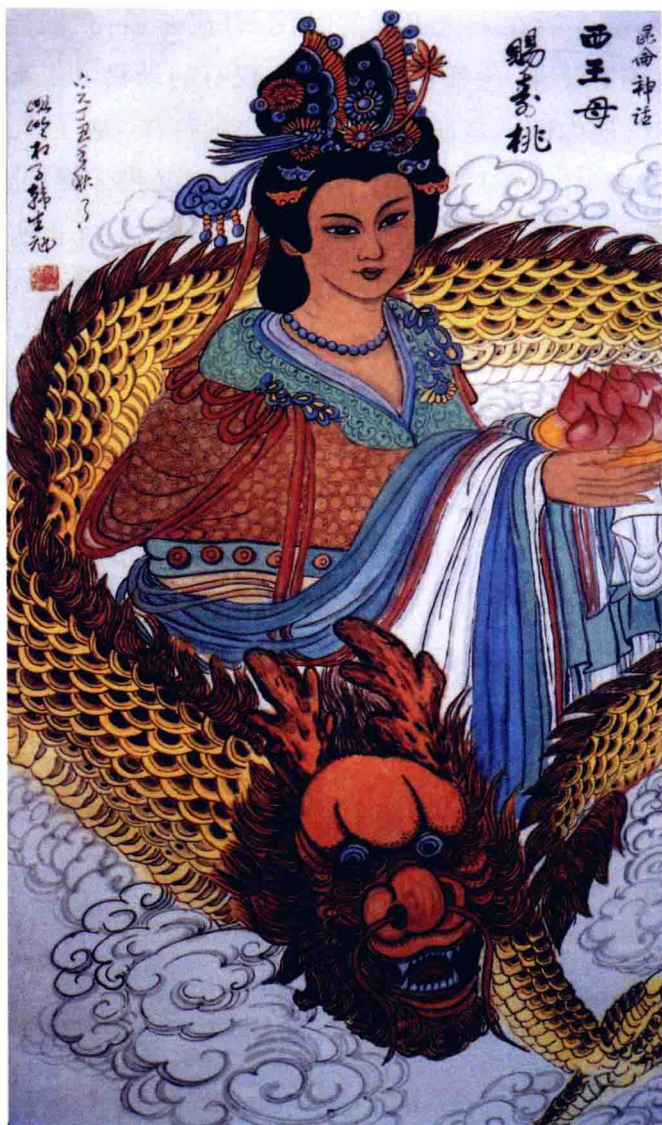
在这四条里，最能传达西王母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当然莫过于“虎齿豹尾”了。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虎齿豹尾”的传说，使从古到今的许多学者疑窦丛生：西王母者，人耶？神耶？兽耶？抑或半人半兽耶？

幸好，马家窑发掘的这一舞蹈纹彩陶盆终于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西王母的那个时代，的确存在着一种渗透于生活各方面的对于虎豹的崇拜与模仿——而崇拜到极致，就产生了对西王母“虎齿豹尾”的代代相传。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当他知道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他当然就明白何以会发生的原因。马家窑舞蹈纹彩陶盆既已被认定为 5000 年前的文物，这正好与初始的西王母时代吻合，也正好与虎豹崇拜的原始社会相吻合。

试想，在西王母那样的母系氏族时代，狩猎与畜牧自然是生产的主要方式，而虎与豹则无疑是最凶猛的动物界王者，它们既是强与猛的代表，亦是美与力的统一，用这样两种动物之王构成图腾崇拜，岂不是顺理





成章且寓意深刻吗？别忘了，与同是猛兽的熊、黑、狼、豺相比，老虎与豹子实在是太美丽了——一种矜厉勇猛的美。

据此，我们实在应该佩服西王母——她以虎豹之饰打扮自己，无疑地显示了一种崇尚丽美华贵的不凡眼光。作为西王母后裔的现代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把已濒危的虎豹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会为地球上某一天突然绝迹了这两种色彩斑斓的动物而忧心忡忡。对于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远古时代的西王母怕是作梦也不曾

想到的吧！

到此为止，如果还有哪一位当代人对西王母时代的虎豹图腾表示费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苍茫昆仑的旷野上看见那一位远古女王，她正卸下做大典仪式才使用的虎豹饰具，这会儿，她一身便装，体态毕现，美艳绝伦，只是稍显倦意。她本打算在草滩上静坐片刻，却不想从时空隧道里听到来自后辈的质疑。于是，她美丽的眉宇间轻轻一皱，可人的嘴角浮现出少见的嘲弄意味，她不得不说话了，那口气却带着她特有的睿智与宽厚：





“别忘了,我和我的部落生活在人比兽稀的时代,时代使然,我们能不崇拜虎豹吗?而你们远隔五千年,生活在电子时代,仅有的动物之王都被你们关进了囚笼,可笑的是你们不是还在崇拜着那个被称作‘龙’的怪物吗?那个龙,头像狮子和麒麟,身像鳄又似蛇,凌空飞动却又张牙舞爪。那样一个非此非彼的怪物,你们不是照样要把自己的崇拜情结演绎得头头是道吗?何况我西王母的虎豹情结,比起你们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诚哉斯言。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它最早出发的地方,即作为历史人物的西王母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有什么真确可信的遗骨或遗址可供证明?无庸讳言,截止目前对西王母的推断,似乎仍停留在传说或神话阶段。如果硬要把神话传说中的某些部分解释为历史,那么,实证性的考古不就显得多余了吗?反过来,如果把一切历史都须用考古来验证,那么,对于那





一段神话时代就该统统视之为虚无吗？

看来，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铜钱的两面。

我要大声质问的是，既然我们无法准确地找到轩辕黄帝的遗骨，那为什么一定要以确定无疑的历史遗存来验证西王母的存在呢？

还是让我们来求助于理论的推断吧！

我们都承认，原始社会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氏族部落，由部落战争到部落联盟，渐渐地，部落联盟发展到了国家的阶段。而国家，这个集管理、服务、强迫为一体的政权制度形式的出现，无疑宣告了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终结。

中国的文明史是从形成国家政权的夏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则被称为传说史。就这一点而言，世界各国的情形大致不差。

国家的出现，既造成了一种成熟的文明的集体推进，也造就了一大批脱离劳动的统治者、剥削者，而原始公社时代的低层次大同秩序一去





不复返了。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出现既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又以人群的不平等为前提。

最早的国家政权形式的出现,即奴隶制、封建制的王权与皇权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人可以找到夏商周的都城遗址,找到秦皇汉武的陵墓的原因。巨大的王权陵墓既表现着文明,也包含着血腥,陪葬品中既有宝物财富,更有殉葬奴隶。

但作为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轩辕黄帝呢,他是民选的服务者、管理者,他的子女也没有世袭特权。当然了,他死后也无须修建陵墓。

作为父系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作为偏处昆仑一隅的母系部落首领西王母呢?需要郑重指出的是,陕西桥山上的黄帝陵显然只是华夏子孙们为纪念其功绩而堆聚的一个象征物。至于西王母呢,她的遗迹就只有几个传说中的天然山洞了。然而,还是这两个传说中的人物,却渐渐地由人变为神,再由神变为仙。一个成了玉皇,另一个成了王母,一个被尊为人文始祖,另一个被尊为华夏母亲,5000年的赞誉和崇拜使他们名垂宇宙,功昭日月。这和自建了集奢华与罪恶为一体的巨大陵墓的秦皇汉武相比,和他们的毁誉两极的历史评价相比,不是值得人们去深长思之么?

有一句话说的好:公者万年,私者一时。对中华文明源头上的这两位人物,我们当作如是观。

有一个黄帝和西王母由最初原型到最后演变定位的履历公式:

黄帝=部落联盟首领<黄帝<天帝<玉皇大帝

西王母=部落女首领<西王母<圣母<王母娘娘

两个简单的人物履历的公式,都包含了太多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容。也包含了更多更深内涵的关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生命观和人文精神观。

这是一本刚刚翻开的大书,需要我们去细细品读。在这里,需要的是兼收并蓄;是放射性的思维;是宽容和包容的气度;是今与古的对话;是过去与未来的认知与沟通;是不拘一格的内容和形式;是天地人神的终极和谐。

当然了,这一切都需要清新智慧的命意。



## 咀嚼废墟

旧石器、新石器、裸体人像彩陶，耐人咀嚼

从江河源头到湟水谷地，层层废墟中闪跳出上古文明——

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吹牛大王”的逗笑节目，当有人询问他最近要准备做什么大生意时，他说：“我的生意都是独家生意，我要给长城贴瓷砖，给月球镀银，给原子弹抛光！”

真是一个超级幽默。

其实，吹牛大王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做不到或根本就无须做的事情。于是，我想到了废墟，想到了长城。我可以大胆地说，就长城存在的初始意义而言，它现在当然可以算作“废墟”。

承认长城作为“废墟”的存在，这并不贬低它的文物价值，相反地，这恰恰在更大的层面上提升与扩大了它的文化内涵。

试想想看，如果把绵延 5000 公里的长城废墟全部修复，甚至再给它加固一些现代的材料，那还能叫它为长城么？

事实上，作为古迹遗存保留下来的几个点，山海关、居庸关、金山岭、嘉峪关，都因为旅游与赚钱的需要而弄得花哨喧闹起来，一些附加的设施异常碍眼，就像是在给古典美人配上蛤蟆镜，戴上镀金表一样让人感到别扭和不真实。或多或少的，长城废墟所固有的庄重感、威严感连同它同时具备的沧桑感被减弱了、淡化了——我非常怀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长城了，就像是在公园动物栅栏里看到的老虎豹子一样，它们也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野性家族了，变成了游客的把玩品。

真正的长城是和闹市氛围绝缘的；真正的长城拒绝游人如织，拒绝嬉笑狎昵，拒绝轻浮与放浪；真正的长城属于守卫它的士兵，属于战鼓和



烽烟,属于猎猎的大旗,属于厮杀与呐喊。一句话,长城是战争场面的定格。

正是从这种观照里,我更欣赏也更喜欢咀嚼嘉峪关西面沙原上正残卧在夕阳下的古阳关遗址。

古阳关早已被岁月剥蚀得只剩下一个城墙骷髅——它是战死了的昨天,默默地向我们诉说着在它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关于战争、关于历史、关于沧桑变化、王朝更迭。其实,它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却是:除了文化,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永存的事物。

文化的伟大在于她能包容一切,包括废墟。

因为废墟也是一种文化。

说起来也真是让人伤情,一部人类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同时也是文明的创造史与毁灭史。也正是站在这个观点上我们可以说,地球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古战场,而每一个角落也都是留有历史废墟——这废墟,迭迭层层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大部分被忘记了,只有很少的被人们回忆起来。不管回忆与否,新生活的绿荫总要一年一年地变换色彩——而习惯于新色彩却总是人类的天性。

厚今薄古,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喜新厌旧,这也无可厚非。

希望那些古代的辉煌万世永存,就好比希望人体的长寿不老一样迂腐可笑。

史书上既然有那么多叫不醒的名字,地球上就该有更多寻不到踪迹的废墟。

废墟是对昨天的完成。

废墟是对明天的启示。

没有废墟的历史是虚无的历史。

没有废墟的历史是无味的历史。

是的,我欣赏废墟,我对埋藏在昆仑山中的废墟更是存有一种命定的欣赏。而这种欣赏使我一次次地走进荒原,走进大漠,走进雪域峡谷和环湖草原。

在长江上源的沱沱河沿,在可可西里荒野上,劲烈的漠风从遥远的





◇ 咀  
嚼  
廢  
墟





雪山脊线上吹过来,年复一年地扫荡和切割着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巨大的灰褐色的背景上,偶尔跑过来几只喝水的黄羊。更远的崖岸上,一只狼发出凄厉的长啸——它是在为捕食不到猎物而悲鸣吗?抑或是大自然空旷极致中的一声律动或悸动。总之,这是一块近似月球表面的地方,无边的荒凉,无边的灰色,无边的寂寥,死一般的“绝望之地”。

然而,就在这海拔 4300 米的荒原上,我们竟然采集到十余件远古先民的打制石器。质地坚硬的石核,两端匀挺的石棒,锋刃分明的石片。考古学家推断说,这些先民遗物属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在三万年以上。

一幅遥远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了:荒野衰草,秋风凄厉,数十个青壮原始人正在围猎一群闯入他们包围圈的黄羊和野狐。一阵阵呐喊声中,石核石棒石片纷纷砸向猎物,黄羊惊窜奔突,野狐腾挪闪跳,原始人穷追不舍,打磨得颇具杀伤力的石器不断地从他们挥动的手臂间掷出。终于,十余只黄羊野狐被击中了,原始人一拥而上,狩猎的胜利激起一阵阵震撼云天的大笑。更远处的河岸岩洞里,女人们已燃起柴火,可人的肉香将弥漫这一片属于他们的河谷。

有理由相信,这一群生活在青藏腹地昆仑山中的原始人类,他们的遗物存留只是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个点。在更大的范围内,三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到处都在活动着,他们以狩猎为生,那些随处可遇的野生动物为他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食物来源——当然了,他们的武器就是那些经过打磨的石头。他们的居住地也只能是天然的洞窟。然而,三万年以前的昆仑山就已有了一类的活动,这一点却是让我们现代人感到诧异和惊喜的。

我的脚步沿昆仑向北。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我们又有了一次惊喜地发现:在高出小柴旦湖面十余米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这真是一个原始石器的宝库,先后挖掘出的 100 余件保存完好的石器,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原始人类的生活场景。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锤打器、雕刻器——石头被赋予了多种人为的形状,而每一种形状都明显地带有智慧人的主观意图。石器的制造因目的不同有了更高层次的分类,其用途指向具备了战略与战术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铁器时代的犁和耙、矛和盾、剑和戟、甚



至锤和钻的运用思想,远在三万年以前就孕育在旧石器与新石器的转生代了。而柴达木盆地的原始人类,则和华北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古人类,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共同地弹奏了一曲音韵相近的人类技术进化曲。

谁说古昆仑属无人区呢?

我们曾无数次地陷入过主观臆断的误区。

且行且走。

我要去寻找古昆仑人的定居遗存——因为定居意味着原始文明的新跨越,一种脱离了野兽般漫野奔逐的自为阶段。

在黄河上游的拉乙亥,即现今的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其出土文物之丰富,其表现古人类生存状态之详具,均让人感慨不已。其中最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一套颇具工艺水平的谷物加工研磨石器——石器为石槽和石饼两个部分,石槽呈长方形凹面,石饼呈半球状,皆结实、玲珑、实用。古代先民用此具研磨谷物,至少说明了采集性农业的出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河上游地区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古籍传说中的神农氏,说到底只是对于古先民在各地发现并种植谷物的一种神话式的概括——就像中国的文字决不是仓颉一个人发明的一样,中国的农业创造也决不会是一个神农氏的功劳。

令人惊异的是,拉乙亥遗址不仅发现了谷物研磨器,还发现了加工精细的骨锥和骨针。而 30 多座灶坑的遗迹以及相伴的大量动物骨骼,无疑证明这一地区已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的定居时期——就人类聚居生存的规模方式而言,拉乙亥和黄河中游的西安半坡遗址,统领了六千年前古人类生存状态的习俗风情。

就地球的经纬度而言,人类到底起源于何处?人类是不是只具有一个族源,多少年来似乎难以定论。先是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近几年被亚洲之说猛烈冲击,过几年或许又会冒出拉美说或北美说。其实,这种以一概全式的经验之谈,就和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值得人们警惕。鉴古知今,以今推古,我们不妨可以大胆地认为,凡是在古大陆任何一处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都有可能是最初地球人类的诞生地——人类决不会只

有一个族源。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昆仑山吧！

昆仑山中的历史废墟，层层叠叠，叠化出一幅从上古到近代的文明进化史和消亡史。

我的脚步终于移到了柳湾。

这是一个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遗址。

这是一个被著名作家兼考古学者称为“彩陶流成了河”的地方。

在这块位于湟水谷地黄金地段的台地上，一次性就出土了各种陶器13000余件。而尤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陶器中的大部分竟是绘有各种美丽图案的彩陶，以致于有专家惊呼说，中国的美术史，其上古时期的辉煌部分，非青海的柳湾莫属了！

柳湾的彩陶当然是震撼人心的，其古朴、其典雅、其斑斓、其众多，都足以让每一个造访它的人心魄驰动，无限向往——五千多年前的柳湾人是多么勤劳、智慧且崇尚幸福和艺术啊！那时候，湟水谷地柳绿桃红，万树吐芳，北山南山，青黛如画。湟水清澈而急湍，柳湾的男男女女们或上山狩猎，或下田稼穡，或进作坊制造陶器，或下河去捕捉鱼鲜。天蓝如洗，水碧如带，间或地几声歌谣从风中飘来，直引得鸟鹊驻足枝头不再鸣叫。那歌谣高亢且婉转，像湟水蜿蜒湍急的啸音，一声声，激荡着男女的心跳，牵引着彼此的流盼——我相信，那就是河湟“花儿”的最早起源。

绘画和音乐是同时起步的，它们都源于人类的艺术天性和聚居中生存的成熟。

野兽是无法创造艺术的，它们与绘画音乐无缘——因为它们没有能力造就聚居社会，为果腹奔逐是它们惟一的自然需要。

柳湾人无疑是远古人类中优秀的一支。

柳湾人的聚居创造和艺术创造同等辉煌。

幸好，柳湾废墟向我们证明着五千年前的柳湾人生存信息。

废墟文化既是历史的实证，更是我们的想象力借以飞扬纵横的载体。

柳湾遗址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远古先民村落。他们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简洁而实用。房内有煮饭的灶，





房屋周围有储藏必备食物的窖穴——这种在窖穴之上构筑盖顶的居屋形式,追根溯源可以说是土木结构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始祖。应该认为,一切中国式的后来民居,甚至包括北京西安的四合院,它们的最早蓝图都能够到柳湾五千年前的废墟中去寻找。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远古的民居结构方式,竟在五千年后 20 世纪的 60 年代,被大大地派上了当代人的生活用场——柴达木石油人的地窝子,大庆石油人的干打垒,它们成千累万地出现,实实在在的就是对柳湾古民居的现代克隆。

柳湾古民居的实用生命力如此之强,这也许是古柳湾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吧?

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彩陶上。

无疑,柳湾彩陶的文化意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破译。

一个让现代人困惑不解的难题是,在这些彩陶的底部或腹部绘制的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 这些符号多达 139 种之多,其中最常见的有“+”、“-”、“×”、“|”、“○”、“≠”、“ ”等等。

这些符号是为了区别彩陶的作者吗?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远古的符号竟然还以它形式的完美而活在中国的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系统中,当然,它们的意义却不大可能等同。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符号具备记事的功能,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种。

文字的起源曾经被说得玄而又玄,究其实大约很简单:古人记事的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诞生,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由含混到明晰,其间包含了无数人的创造和劳动,也记录着数不清的故事和传说。

至少,柳湾彩陶上的文字符号为研究文字的发生提供了最为珍贵的资料,因为它的存在比殷墟甲骨文早了 1500 年以上。

历史是由劳动群众集体创造的——这一经典结论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

在柳湾彩陶中,除了美术图案、文字符号以外,最能引起当代人的兴趣,并发人深思的是一尊绘有完整裸体人像图案的彩陶。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尊彩绘大约是我国已知年代最为久远的裸体彩塑。



在这尊彩塑中,人的裸体轮廓分明,而性器官特别突出。

是古人的生殖崇拜吗?

是古人的性知识启蒙吗?

无疑,这种性崇拜的图形在更早的阴山岩画中已有表现。在昆仑

山,柴达木盆地的古岩画中亦有发现——性崇拜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然而,这一尊出土于柳湾的彩绘裸体人像,她的特别之处却是:性器官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是一个阴阳合璧的亦男亦女的裸体彩塑。

真正的难题出现了!

古人用这尊裸像要说明什么或昭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少岩画中的性崇拜既有男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亦有女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就一般意义而言,女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而男性性器官的展示则无疑是父系氏族时代的产物。当然,交叉展现的情况也存在,但性器官的分别展现都是明白无误的。

那么,这一尊阴阳合璧的性器官展示到底昭示着什么意义呢?

是一种特例的阴阳人的真实记录?

是一种古人艺术观中的男女合一的表达?

是一种古人对配偶婚的实践性艺术再现?

似乎都有可能,却又难以确定。

从年代上推算,再由柳湾墓坑中不少一男一女的墓葬格局来考察,





我们有理由认为,柳湾人的时代正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那么,一夫一妻的配偶制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了。

男女成双,阴阳合璧。

这应当是一个重要时代出现的标志。

裸体阴阳合一彩绘在有意无意间向后人表达了它的文化分野,即父系社会的出现。

然而,真正的难题又出现了,假如地处湟水谷地的柳湾人这时候已过渡到父系社会,那何以解释西王母的存在呢?西王母无疑是母系社会的明确代表,她立国于昆仑山中,从最初的西王母到最后的西王母,她的部落国家至少存在二千余年。

或许我们会说,五千年前的初始西王母国只存在于青海湖以西的昆仑山中,而柳湾却在湟水谷地,它们原本还不在于一个范畴之内。

或许我们会重新认定,柳湾的裸体人像彩塑并不能说明父系社会的确立,它的意义大约是另有所指,我们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或许我们应当说,创造柳湾文化的群体和创造昆仑文化的西王母群体原本就是两回事,混淆完全是人为的误区。

或许,我们会说……

看来,废墟文化中的谜团太多,假设也更多,它的确定与不确定性让人时而兴奋、时而困惑、时而清醒又时而茫然,这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话又说回来,对于人类历史的万丈长卷而言,我们翻开的部分最多只有万分之一。而废墟文化中的最耐读部分,常常就在这些还一时理不清头绪的地方。

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进昆仑废墟吧,我相信,只要慢慢咀嚼,细细咀嚼,才能品咂出它特别的味道。

咀嚼是一种深度的领会和体验。



## “昆仑”解谜

### 古今中外学者纷纷猜谜,猜中者寥寥

众所周知,古今认同——中华版图西高东低,而横贯于中华版图西部的昆仑山脉,则无疑撑起了中华山川的脊梁。昆仑山同时也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是黄河无可置疑的发源地。古籍中所谓“河出昆仑”绝非想象或杜撰。当然,昆仑山也是我国先秦时代昆仑神话的地缘载体。鲁迅先生在谈到昆仑神话时,明确指出:“其最为世人所知并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在这里,鲁迅把昆仑山与西王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认同了其常被引为“故实”的观念。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似乎已经明确定位的昆仑山,却被古今的许多猜测和求证搞得纷纭聚讼、疑团丛生,连一些大学者大学问家也身陷迷雾难以确指,以致这个问题竟成了中国学术界 2000 年来的一个公案。理其头绪、究其原因、剖其根底,我以为造成此种情状大约是缘于以下几种研究误区:

1. 望文生义,把一个需要实证考察,实地考察的问题弄成了纯粹的书面文字猜谜,结果是越猜越玄,愈猜愈远。
2. 从古籍到古籍,剪刀加浆糊,陷入了古卷迷障,失足于考证怪圈。
3. 在神话昆仑、地理昆仑、人格昆仑的立体研究中,未能理出一条清晰的理性线索。
4. 割裂历史连贯性,忽视民俗活化石,结果导致各执一端的武断。

查对“昆仑”一词作字义诠释的各种说法,古今中外皆有,然以近代和现代的学者居多,尤以汉语文化圈的海外学者居多。再查考这些学者,很少有亲临青海境内考察者。综合这类说法,虽五花八门,各有奇论,细加梳理,大约有如下几种:





“混沌”说。持此种看法的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在注《周礼》时,认为昆仑亦可写作混沦或混沌,混沌是形容旋转的水势。由此证明传说中的昆仑山也是能旋转的。此说实际上认为昆仑山只是一种象征的物事,其现实的山脉实体并不存在。

“天形”说。持天形说法的有古代的学者杨雄和现代的学者朱芳圃和萧兵。杨雄在《太玄经》中认为“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又云“昆仑天形。”从这种昆仑即天形的观点出发,朱芳圃先生认为“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萧兵先生发挥了这种思路,他认为,神话中昆仑山的形制(圆)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宇宙模式的翻版。

“葫芦”说。持此说的有闻一多等现代著名学者,他们认为,葫芦与昆仑为音转关系,因为葫芦是圆的,昆仑也是圆的。其考证中国远古的创世者伏羲女娲的本义应为葫芦或瓜,大洪水袭来时,兄妹二人避难于葫芦之中亦即避难于昆仑山。应该说,此种考证有其说文解字方面的意义,但仍然只是在昆仑的字义上进行着经院式的推测。

“蛤蟆”说。持此说的仍以闻一多为代表,他们认为,瓜和蛙都是女娲的外部形象体现,都和圆形相近,其圆大的腹部具明确的象征意义,那么,蛙亦可称作昆仑。刘夫德先生更认为,昆仑之丘意即蛤蟆之丘,其地为华夏上古蛙族居所。这一说法仍没有超出葫芦说的框架,虽有别义,但还是在字义上兜圈子。

“窟窿”说。此说亦源自闻一多,他认为窟窿亦是昆仑的音转。并推测认为,《山海经》说西王母“穴处”,穴即洞也,可见与窟窿同。照这种推测,昆仑山和洞穴同为一义了,实在有些奇思妙想。

“浑黑”说。持此说的有杨献益、何新等先生,他们考证唐宋时代多将肤黑的域外人称为黑山。应该说,这样一种就字义的古今印证推测,似乎是与昆仑的原义愈走愈远了。

“母体”说。此说以现代学者蔡大成和吕薇为代表。他们认为昆仑是母体象征,亦是天的象征。古时洪水,伏羲女娲躲至昆仑亦是躲至母体。而洪水泛滥亦是母体破而胎儿出的隐喻,以此证明“河出昆仑”意为混沌初开人类降生的形象说法。应该说,此种观点就昆仑神话而言有其道理,但若就地理昆仑而言,则难以辩通。



以笔者对昆仑的研究,以上七种说法,虽有文字考据或文字释义的意义,但转来转去,似乎距昆仑的本义愈走愈远。且迂回道来,虽不乏风趣,却是歧义横生,疑障迷茫。就中国文字的发生衍变来看,其转音转义互借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其最初的意义应是比较明确的,指向也较为固定。所以说,若要离开昆仑一词在中国古籍中的出处,并专以研究字义为能事,则真正的昆仑研究必然会变成一种玄学,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也。这就像再好的战术必须服从正确的战略要求一样,若战术虽精到而战略错误,则全盘必败。

中国古籍《山海经》里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禹本纪》中认为“河出昆仑”。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两部古籍当为出现昆仑一词的最早记载,那么,我们就该承认,要真正弄清昆仑的意义,一定得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说到昆仑,那就必须把昆仑和大山联系在一起谈。二是若说到昆仑山,就必须把西王母和昆仑山联系起来谈。三是若说到昆仑山就必须联系到“河出昆仑”这一事实。否则,就昆仑而言昆仑,必会陷入望文生义的文字考证游戏。

就现实地理学与古籍印证而言,“河出昆仑”——黄河的确发源于昆仑东段的巴颜喀拉山。再印证古籍中“禹导河积石”,积石峡谷乃现今青海循化县的积石峡,也确系昆仑东段的余脉。至于西王母,据现代民俗民族学与考古文物的印证,她原系昆仑山区包括今日的祁连山南脉一隅的古羌人部落女王,并非子虚乌有的人物。查《山海经》中说到的西王母邦所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大致情况与青海境内的现实地理相当吻合。西海当指青海湖,流沙在柴达木盆地随处可见,赤水当指今共和县境内的恰卜恰河,黑水无疑是发源于祁连南脉后又流入河西走廊的黑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山海经》的撰写者对昆仑山周围的地理环境描述,是相当明晰并相当准确的。再说到昆仑丘,按“丘”字的原义当是四面高中间低,而今日的青海腹地包括青海湖在内,恰是夹在南昆仑北祁连东日月山西当金山之间——把这块地方称为昆仑之丘,不是恰切而符合古今实际吗?

在《山海经》、《禹本纪》之后,另外有两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即西汉的





司马迁和东汉的王充都对昆仑山作过自己的考证与推断。王充在其《论衡·谈天篇》中有如下议论：“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 3500 余里，日月所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古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山经》、《禹纪》，虚妄之言。’”

这一段话同时表明了司马迁和王充对“河出昆仑”的看法，其局限性与明显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张骞出使大夏，主要路线当是由河西走廊到新疆再到中亚西亚，这一条线路恰是在丝绸之路，怎么可能“穷河源，见昆仑”呢？当今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昆仑山黄河源头在南，而河西走廊一线在北，其间距离少说也有 1000 公里。应该说，张骞未能看见昆仑山与黄河源头，在当时的地理视野与财力人力的局限之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直到六七百年以后的唐代，唐河南郡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境时，仍只是把星宿海当作河源。再往后推七百余年，元朝的都实奉旨勘河源，也只是把河源定在扎陵湖与鄂陵湖附近，距真正意义的河源卡日曲尚远。如此一个黄河源之迷，竟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28 年之后的专门考察中才得以确认。如此看来，对于张骞的没有找到河源与司马迁、王充的错误，我们都是可以予以谅解的。二是司马迁和王充把《禹本纪》所载昆仑的玉泉、华池等带有神话色彩的物象当作实际之体加以考察，更把《山经》中的怪异之物也进行了实证考察，应该说，这种把史学与神话学混为一谈的研究误区，为后世许多学者各执一端埋下了伏笔，助长并衍生了后来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两错误倾向，即以神话否定历史的极端怀疑主义和以历史否定神话的极端的考证主义。实际上，在中国上古史中，史实与神话的杂糅是常有的现象，在研究中需要细加鉴别，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互证揣摸、区别对待。任何把它们混为一谈或以此否彼的方法都是有害和违背科学精神的。据我所接触的有关资料来看，一些现代大学者如胡适之、郭沫若、闻一多等，就曾用极端的治学方法怀疑并否定过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真实存在。胡适之用的是极端的实证考古学认为史前史是杜撰，认为“中国历史时自商周始，禹是一条虫。”郭沫若则认为三皇五帝的史迹为乌托邦。说“我







◇ 『昆仑』解谜





们纵疑伏羲神农的存在”。闻一多则用大量文字解义推断出伏羲女娲只是蛙和瓜的隐喻化身。胡适之甚至还妄断被司马迁写进《史记》的屈原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全部考证依据就是因为《离骚》《九歌》《九章》《国殇》等屈赋的体例格式有歧异。如此一来,“五四”前后便刮起了一股异常猛烈的先秦历史怀疑风。如此,连司马迁的《史记》几乎都变成了史实与杜撰的混合体了。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孔子,囿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治学风范而忽视研究《山海经》,两汉时代的司马迁、王充则囿于考察局限而对“昆仑”采取“余不敢言”的谨慎态度,那么,到了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则对“昆仑”及上古史采取了大胆假设、繁琐求证、随意揣测、妄加议论的猜谜式方法,导致了老谜底未能指破,新谜壳又重新设置,愈猜愈远,愈猜愈乱的学术局面。客观地检索起来,倒是古今的一些名声并不算太大而治学求实的学者颇有一些接近事实真相的有益见解。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张骞奏明汉武帝的河源介绍:“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底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当代人会看得很明白,张骞考察黄河源时所处的立足位置在现今的帕米尔高原,即大范围的昆仑山西段,所以他看到的绝非河源,河源应在昆仑山东段的青海境内。然而从大昆仑的概念出发,汉武帝最终还是按秦以前传下来的图示,将河源地点定名为昆仑。应该说,这个定点就大地形而言勉强可通,就具体小地形而言确有误差,其误差当在 1300 公里以上。

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家班固在著撰《汉书·地理志》时,竟没有采用张骞的河源在于田以南的说法,而是按照《禹贡》中“织皮昆仑”的指向和《山海经》中昆仑之丘的方位,明确地把昆仑置于金城郡临羌县以西:“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晋代学者郭璞在《汉书·地理志》临羌县条目下加一注释云:临羌县“西有西王母石窟、仙海、盐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到大唐而大昆仑出焉。”这两段记述相互印证,方位清晰,点面交合,可以说把昆仑的地理位置指得明明白白,并将小昆仑与大昆仑的来龙去脉也表述得清清楚楚。查汉代的金城郡治当指现今的青海民和县下川口,当时称允吾。临羌县系指现今的青海湟源县。仙海亦称鲜海,为



今日之青海湖。盐池当指今日之茶卡盐湖。湟水发源于青海湖西北的海晏县,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东流至民和县入黄河。至于弱水其意为水涣散无力不能负芥,当指青海湖东岸日月山向西注入青海湖的倒淌河,其河似小溪,类季节河,水量浅且狭,无以载舟,故称弱水。而西王母石窟,昆仑山祠,均在青海湖西北的夏格日山和青海湖西南的希里沟一带有所发现。如此看来,这里所点明的昆仑恰指环湖地区的夏格日山、托来山、大通山、祁连南山、天峻山等,此为古昆仑,亦称小昆仑。而郭璞所说的“至大唐,则大昆仑出焉”,当是指昆仑东段巴颜喀拉山,那里确系黄河源之域。若比照《禹本纪》中河出昆仑,其高 3500 里,今日之巴颜喀拉山海拔当在 5800 米,环湖诸山亦在 3800 米以上,以古人对海拔高度的测量局限性,应该说已经差不多了。

另据东汉时《恢国篇·论衡》载:“金城塞外,羌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窟,因为西海郡。”这里有两点史实需要重视,一是王莽时将原属羌人的青海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二是羌人当时的居地明确属于上古时代的西王母之邦,不然就无法解释其地何以有西王母石室了。

又据酈道元的《水经注》湟水条:“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南有湟水出塞外,东迳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与前引文相比,此处又多了一个石釜,可见西王母在该地的历史遗存甚多,也极著名。《水经注》是公认的地理信史,其对昆仑地望与西王母之邦的记述当为可信。

看来,从先秦、两汉,一直到唐代,昆仑山的地望称谓及地域所指基本是清晰明确的。只是到了后世,因为西王母从人到神再到仙,神仙化的附会之作汗牛充栋,其原居处的昆仑山也就被指认得忽而天上、忽而海上、忽而海内、忽而域外,终至把西王母说成是来自两河流域的神,把昆仑山说成是译自古巴比伦的神庙神塔。种种猜想,腾于文坛,奇文妙语,尽凑热闹。而使真正的昆仑山与西王母,备受寂寞与尴尬,此亦算是学术争鸣中的不平之事吧!

台湾学者苏雪林在其所著《昆仑之谜》一书中云:“考巴比伦远古传说,即谓有一仙山其义犹云大地惟一之山,或曰世界之山,为诸神聚居之处,亦即诸神之诞生地。巴比伦若干庙宇与七星坛之建筑,皆此山之缩





形。而中国之昆仑,希腊之奥林匹斯,印度之苏迷庐,天方之天园,亦为此山之翻版。”另一位学者徐高阮在其《昆仑丘和禹神话》文中云:“中国古籍所载之昆仑丘应为古代两河流域各城通有一种多层庙塔”。又有学者刘师培在《穆天子传补释》文中云云:“由今后藏西北行,沿印度河西北及阿母河上游,又东北以至帕米尔,即此文所谓至群玉之山,戴春山之北也。更西沿阿母河北行,经咸海而至波斯东北,即西王母之邦也。嗣复北至里海附近,东沿阿母河北折而入今新疆北境,又东南入甘肃,又沿陕西边境入山西,以归河南周都,此穆王西征所行之道也。”

对于苏雪林氏与徐高阮氏的考证见解,虽指向有异而实质略同,都认为中国的昆仑源于域外的庙塔或神主,作者实不敢苟同。试问,华夏各族包括古羌人,皆属黄肤黑发,而古巴比伦人及两河流域人种皆白色种族,就华夏文明自远古迄今的历史风俗考察,哪朝哪代都没有过尊崇并祭祀白种神或庙塔的习惯。须知,中华各民族历来只有祭拜祖宗的传统,而庙宇中永久供奉的,也只有公德昭世并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黄帝、伏羲、西王母、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等。舍此难求其二。

至于刘师培对穆天子西征所画的线路,则更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试想想看,以穆王率军征行的脚力财力,何以能辗转数万里而在当年回归镐京?《周本纪》里司马迁讲的明白:“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这说明周穆王巡狩之地只能在现今青海境内的昆仑山下、青海湖边,其距镐京最多1100公里,返回时间一月足够。若远在两河流域,则返回时间少说也需七八个月,试问,果真那样的话,徐偃王的造反作乱不是星火燎原难以扑灭了吗?

查现代学者中,顾颉刚先生力排众说,求实考证,终于将昆仑地望与西王母之邦拽回中国西北一隅,也就是现今的青海祁连南麓与昆仑之间,可以说,这是正确梳理的结果,也符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只是由于顾颉刚先生未能作更多的民族民俗学的调查,比如青海民间的“於菟”舞(古羌人崇虎活化石)、性器崇拜仪式等,所以未能就西王母之邦的真实存在提供更为创造性的发现。应该说,受制于诸多条件,我们是不可苛求于顾先生了。





此处顺便说及昆仑神话波及到山东半岛、江浙沿海、东南亚、南洋诸岛以及中亚西亚一线的原因。明白此,自然也就明白了何以这些地区的民间传说都尊奉西王母为女神了。

地下考古和民族演变史证明,从上古的黄帝尧舜时代一直到秦汉时期,再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在中国西部创造过灿烂的羌戎文化的一支经山西河南蔓延至山东江浙沿海。向西的一支延至波斯两河流域。向南的一支达四川云南直抵缅甸东南亚。很显然,这些迁徙的部落逐渐地融合到当地的民族之中,但他们信守的昆仑文化及西王母传说却永久地保存了,岂止是保存而是蔓延生发广大。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半岛便衍化了蓬莱、方丈、瀛洲为载体的仙人文化,亦可称作亚昆仑文化。西亚一带也流传着关于昆仑山与西王母的一些传说。而云南缅甸东南亚,乃至南洋诸岛,由于华人移民的面传口播,昆仑神话自然就四面辐射并更添附会借光之语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昆仑者域外别有”、“海外亦有昆仑”、“昆仑到处皆有”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证明了,昆仑山作为华夏文明载体,西王母作为华夏民族共尊的美神,其影响已是贯通古今,连襟海外,化作民族精神的魂魄与思絮了。

## 王母情结

西王母是一个千古之谜,让华夏子孙为之梦绕魂牵

检索一下古今学者对西王母的判断,必然有助于我们的实证考察。

我相信,就像《圣经》的考证破译已牵动了西方人的神经一样,西王母的研究与破译必将牵动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神经。《圣经》的破译使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史前文明,而西王母研究无疑会使东方人获得更多的远古历史认同与理性思考。

当我发表了《昆仑山探寻西王母古国》的文章后,竟鬼使神差地接到了一个又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在国内,有南京、云南、内蒙、东北、北京、天津、香港、台湾的电话;在国外,有日本、新加坡甚至旅美华侨的越洋电话。他们有的向我索取资料,有的向我提供信息,还有的干脆就在电话里与我“抬杠”。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些素昧平生的人竟都能拐弯抹角地得到我的电话号码,且能在电话通话中显得那么“一见如故”。我想,这种现象只能用西王母情结的思维共振来解释了。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被一种幻象牵引着,西王母的影子若隐若现,忽近忽远,在我的眼前浮游迭现,挥之不去。有时在夜间竟迟迟难以入眠。我想,一种神秘的前定出现了,神谕告诉我,对西王母的走近,必定是照引我今后写作与研究的主题灵光之一。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翻阅了大量的有关西王母的文史资料,从古到今,凡是能找到的,我都不妨去浏览一番。我发现,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学者都对西王母现象有过自己的见解或表述,远至老子、屈原、司马迁、郭璞、纪晓岚,近至鲁迅、闻一多、顾颉刚、范文澜等。其文章虽往往只是片言只语,且见解歧异,但关注的态度却是虔诚认真的。特别是一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通史简编》中有如下表述:“汉哀帝时,社会又一次大骚



动,民间无故惊扰,号呼狂奔,路上聚集数千人,口称要祭西王母,又称有直眼人快来。惊扰地区很广,经历二十六个郡国。京师居民,也会聚祭西王母,或夜间拿着火炬上屋,击鼓号呼,互相惊恐,三个月才平静下去。”在这里,西王母的民间色彩和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可以说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民俗信息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反复玩味的。

日本学者古田武彦确信历史上西王母的存在,他曾来青海实地考察,对于周穆王乘八骏西巡昆仑见西王母的故事深信不疑。他甚至对古书中从镐京到西海的里数用现在的里数长度做了折算,认为《穆天子传》的记载不虚。

另外,近几年还有许多文史专家对西王母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时有片断的文章在有关报刊上登出。读者群亦在成倍地扩大。虽然是思路迥异,聚讼纷纭,但毕竟都讨论着与西王母有关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这种种现时代的讨论,仍然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同一个问题的符合逻辑的延续。

由此,我意识到:西王母研究或许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早期神经中枢;她还是研究华夏民族在早期融合过程中何以能滚雪球般强大的一把钥匙。

由此,我觉得有必要检索一下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对西王母的看法。

春秋时代的老子在感叹他看到的群众膜拜西王母场面时这样说:“万民皆附西王母。”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十三》中记述:“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东汉王充在《论衡·恢国篇》中说:“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王充在这里认定了西王母是一个国家。

东晋大学士郭璞首先认为:西王母“盖荒裔之国也”;又点题说:“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他认同了西王母首先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女王尊号的史实。可见西王母是代代相传的。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在给由他编定的四库全书《穆天子传》写提要时认定,周穆王在位时曾两次西征:一次是“十二年冬,王北巡狩,遂惩犬





戎”；第二次是“十七年，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

唐末史学家段成式在考证西王母国晚期时的女王时认为：“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名婉女今。”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现今青海湖西北的海晏县金银滩的山梁上，有一古塔被称为神物，当地人叫做“杨家塔儿”。显然，这古塔与纪念西王母有关。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在介绍先秦古籍《山海经》时说：“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鲁迅认同了其“故实”的说法。

一代文史大师顾颉刚先生在谈到《穆天子传》一书时认为：“西王母可能是一个国家……”





对西北史地研究颇有建树的李文实教授在他的《西王母考》一文中认为：“汉文记载中的西王母，乃氐羌最早的女首领的称号，汉文音译为王母，便也被理会成神话中女神，传说中的女王了。”

对汉藏两种文字都能贯通运用的谢佐教授经考证认为：青海湖在古羌语里称为“赤雪甲姆”，“甲姆”即王母的意思。“赤雪甲姆”可以意译为主宰万顶毡帐的女王或万翼王母。

应该说，以上的史家或学者都是言之有据的。可见西王母的话题是一个从古到今的民族心理神经敏感区。笔者以为，西王母研究的谜团虽然太多，但只要开拓思路，多元思维，相互印证，全方位探讨，其终极的谜底是会捕捉到的，即使有不同的观点，其指向都仍然围绕着西王母话题，





这本身就证明了该命题的无穷魅力和深邃意境。

在笔者看来,西王母研究,不能仅仅只局限在历史层面或神话层面,那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求得一种科学实证的答案,深层的分析起来却会大大地缩小或贬低西王母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叫做自设樊篱。我们知道孔子囿于“不语怪、力、乱、神”,致使在整理古籍中删掉了许多其他内容。表面上他是在尊重真实可信的社会人生层面,客观上却造成了古文化的大量散佚。应该说,经他整理而留给我们的是一些纯而又纯但血肉缺失的东西。而用这些东西观照远古时代,其真实性和包容性反倒是大大地打了折扣。

笔者以为,既然西王母属远古之事,古籍中的记载零星而又散乱,且史实与神话传说杂糅,附会夸张曲解之处难以避免,甚至互相矛盾常见其间,那就不妨把这一切现象统统作为大文化来加以研究更有意义。同时还必须运用实证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民俗学、基因遗传学,包括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理出一条比较有说服力的线索,分清其不同的层面,诠释其不同的内涵,得出其相对应的结论。那样的话,历史归历史,神话归神话,文化归文化,互为主层面却又包容一体,西王母研究才算是有了真正的理性目标。

在笔者看来,历史,特别是上古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复原的过去时空,所谓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只是我们应该抓住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以检索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所谓历史,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层面,也就是说有三个历史:一个是已过去的时空中人们生活于其间的历史;一个是被后代人写进书中的历史;一个是被现代人争论不休、诠释不尽的历史。这三个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叠,但却能相互印证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立体的活的精神史。如此而已!

我之所以有兴趣研究西王母,是因为她代表着一种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上古人文精神,她具有更多的民间色彩和平民精神。她是被民间大众供奉的母系始祖,代表了真善美慧的终极价值。不像孔夫子,孔夫子大约是被统治者抬起来的,含有更多的为统治者治世的作用。而西王母却不是,她是至善至美的东方女神,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人性观照,历经 5000 年而时淡时新,让人神追魂牵而永恒感动。





美国学者摩尔根因为深入到印地安人的氏族部落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才终于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价值的巨著《古代社会》,他使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了远古时代的社会图景。我想,对于现居于青海湖周围,居于南昆仑北祁连之域的藏族部落的研究,将会使我们能够涉源访古,逐步看清楚西王母时代的社会真形。西王母属古代羌人女首领,而史学界公认羌藏有渊源关系,那么,弄明白了环湖地区藏族的语言、民俗以及生存状态、历史地理等,西王母时代的诠释亦就自在其中了。至少,这种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西王母时代最重要的参照系。再加之吃透古籍,实证考古地下文物,一切的迷障都会渐次廓清的。

以我多年的研究,有必要对涉及到西王母的几个最主要的疑点作出自己的判断:

#### 1. 西王母是神王还是人王?

在《山海经》中,西王母很像神,在《穆天子传》中,她又完全变成了人。事实上,在上古时代,人王即神王,是合二为一的事情。当时社会意识



形态需要一个能与上天或天帝对话的人物作为管理者,那么,“巫”这一特别的身份就会出现。“巫”是大智慧大先知的角色。西王母作为最大女巫,即是神王与人王的统一,在部族民众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2.西王母何故历 3000 年而不死?

在中国古籍记载中,西王母不但与黄帝、尧、舜、大禹、周穆王有过交往,而且在《汉武帝内传》中竟与汉武帝有来往。让人疑心她为何能活 3000 岁。真实的情况是,历代的西王母人选在不断更替,而西王母国的存在和西王母女王的尊号却保持不变。所以黄帝、尧、舜、大禹以及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当为可信。至于汉武帝见到西王母,则是神话衍变为仙话以后的附会,是不足当真的。当然,《汉武帝内传》所反映的某种民族文化心理,倒是可以作为问题来研究的。

## 3.《山海经》为何记载西王母“虎齿豹尾?”

“虎齿豹尾”只是一种图腾装具,与其神王女巫的身份一致。上古时代是普遍意义上的图腾时代,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国就有蚕图腾和鱼图腾。而崇拜哪一种动物图腾,是与其部族的生活来源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西王母部族长于狩猎,其崇拜猛虎豹子当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现代人研究汉族人何以龙为图腾?那显然是在黄帝时代及其后融合了其他诸如鳄鱼崇拜、蛇崇拜、麒麟崇拜以及马崇拜等部族以后的混合产物。这些在现代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理,在古代是很自然的产物。

## 女王考秘

西王母不是神，也不是兽，她的原型是古羌人部落女王



我们说，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西王母即王母娘娘，其原型出自昆仑山下上古时代的一位部落女首领或女国王——这一论断，究竟有什么历史的，民俗的，包括文化人类学的根据呢？

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也有踪可寻。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除了孔子曾删定的先秦六经外，其他许多历史著作，包括地理志怪著作中，都约略地记述了与西王母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演变过程，恰好反映了西王母从人到神到仙再还原为人的微妙轨迹，它也是中国人文化心理演变的绝妙诠释。

首先，我们检索一下先秦奇书《山海经》中有关西王母的记载。《西次三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王残。”《大荒西经》说：“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

在这里，西王母被定位为人，且喜欢戴胜，美发蓬乱而善于歌唱。奇怪的却是她竟虎齿豹尾，颇有一些唬人的异象，并且竟有三青鸟为其飞翔取食。无疑，这位神秘的人物兼具怪异的色彩——这也正是后世学人怀疑西王母只是神话人物的依据。

然而，有一点却是被点明了的，那就是，西王母穴处，即居于山洞之中，而这山洞的方位在昆仑墟北，即昆仑山的北麓——恰好在青海省的境内。

试想想看，以先秦时代的交通、地理以及文化视野的局限，《山海经》





的作者无论如何也难以把一个远在西陲的西王母描述得真确切近。遥远的传闻必然挟带一些夸张与想象,于是,西王母明明是人,却虎齿豹尾,变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应该说,一定程度的渲染、误传或不明底里的推演都是情理中的事,但作者毕竟点明了西王母的居处昆仑山,这一明确的方位指向实在省却了后来者的无谓的猜断。至于虎齿豹尾的误传,在后面的引文中自会豁然释疑,这里暂且放下。

在《竹书纪年》古卷中,有如下记载:“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舜帝是继黄帝、尧帝之后的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以治国安邦夸耀于后世的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历史上对他有很多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约略记述。但是到了“五四”以后,一些现代学者竟颇多怀疑,甚至武断中国历史上盛传的“三皇五帝”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他们的根据便是三皇五帝无法用考古资料特别是地下实物资料来证明。苍天有眼,华夏有幸,2000年春夏时节在山西南部地区挖掘出一个上古城址,其城池规模、布局规格以及设施的政治文化定位都足以证明该城作为都城的无可置疑性。经检测,该城属4000年以前的产物,其年代正好与舜帝的时代吻合。那么,既然舜帝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那西王母的来朝献白环玉琨就大致是可以相信的了。

至于周穆王,其生卒年可考,其世系表也明晰,他的西征昆仑丘在史书上也确有记载,虽是寥寥几笔,但那事实却毋庸置疑。倒是在颇有争议的《穆天子传》一书中,他与西王母的会面场面常要让后来人感怀神往,猜断不已。

据《穆天子传》载: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玉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白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龠山,乃纪其迹于龠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在这段描写中,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甚至情节,一应俱全,几乎涵盖了后世小说文体的一切要素。甚至连双方的威仪神态、言谈举止皆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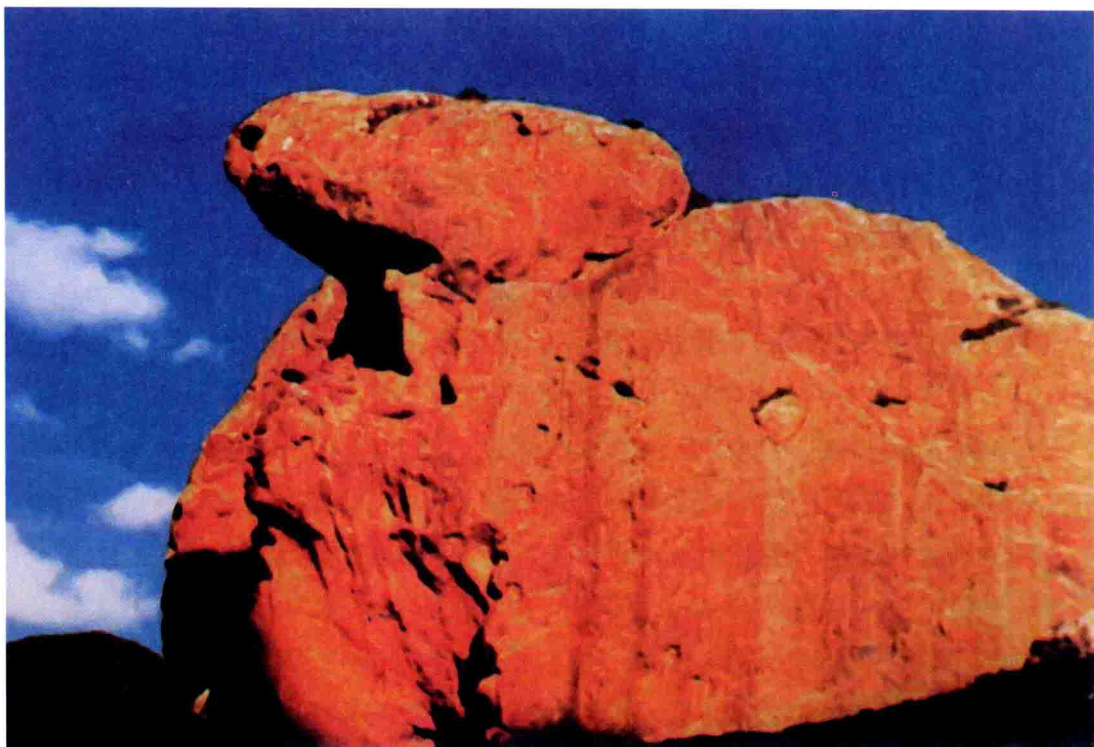


一一传神，栩栩然跃于纸上，难怪有后世学者疑其为杜撰之作而并非史实。但是且慢，《穆天子传》一书的发现过程可以证明其成书时间极早，且常作为一些古学人及官宦的收藏品。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晋太康二年间，汲县一个专以掘墓为营生的人名曰不准，他纠集几个恶徒盗挖了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在陪葬物中竟发现了一部用竹片写的书，名曰《穆天子传》。这个盗墓贼不准毕竟还算胸有点墨，没有把竹书付之一炬，于是，这本珍贵的古籍便得到了保护和流传。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这部书至少诞生于战国之前，甚至更远的春秋之前；二是这部书能为王候一类统治者收藏，表明了其被珍视的程度。后世虽有一些学者怀疑其虚构的成份，但对于周穆王曾西征昆仑丘的史实却无法否认。那么，既然周穆王确曾西征，对于邦属之国的西王母岂有不见之礼？在这一问题上，倒是一些治学通融的大学者出言凿凿，让人折服。晋朝时颇受尊崇的大学士郭璞就曾在认真注释《穆天子传》时认为：“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另一位《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清朝最负盛名的大学者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为《穆天子传》写的要点中认定，周穆王曾两次西巡昆仑丘，一次是：“十二年冬，西北巡狩，遂惩犬戎”；第二次是：“十七年，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我们不妨可以说，在尊重历史事实不轻易妄谈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学人其治学是相当审慎与严肃的。

有意思的是，钟情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学者古田武彦倒是对西王母与周穆王的会面颇感兴趣，他们曾于1992年专门组团来到青海，实地考察了周穆王的西征路线和与西王母的会面地点，他们认为，当年周穆王与西王母会面就在今天的省会西宁，这一点我们持有异议。但他们经考察确认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属史实，这一点倒是让我们颇受启发，也深为之感动的。

现在是该到了求教于大历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时候了。一部煌煌巨著《史记》，上下3000年，洋洋50万言，不但开了中国历史著作中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信史，而且以人物带史实，把近乎僵硬的过去复活成有血有肉的真切故事，难怪乎《史记》一出，后世百代史家著作难出其右。鲁迅先生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竟能把史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魂融为一炉，集文史哲为





一体,极尽一种东方式的大智慧大写意,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击节赞叹,不胜服膺。且看他在《史记》中有关西王母的记述:

“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返。”《史记·赵世家》。

这一简短的记述真是妙极了,特别是“乐而忘返”4个字,活脱脱地画出了周穆王见到了西王母时的愉悦忘情之态。一个是西周的天子,一个是西陲的女王,一个威仪万般,一个风情万种,国事与私情,戎马伴风韵,一幅千古妙画就投影在青海湖畔绿草铺翠的大草原之上。难怪兼具勇武与风流为一身的周天子要忘乎所以,以至于乐而忘返了。司马迁虽没有记述二人对歌唱和的场面,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出书于《史记》之前的《穆天子传》中的白云对歌,无论如何是会在那样一种规定情境中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先秦古籍还有《淮南子·览冥》其中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

无疑,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嫦娥因为偷吃了西王母送给





她丈夫后羿的长生药而飞上明月。故事真是太神奇浪漫太不可思议了。似乎只能用“神话”的概念加以界定,但是,这里仍然可以捕捉到极为真实的信息。我们知道,西王母曾在黄帝与蚩尤恶战负伤的情况下委派九天玄女向黄帝赠送良药,并最终协助黄帝打败了蚩尤,那么,西王母之邦到底有什么如此灵验的良药呢?

问题又回到了西王母之邦的真实地域,《淮南子·地形训》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濒。《汉书·地理志》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水经·河水篇二》注云:有湟水出塞外,东迳西王母石室。以上这些公认的地理著作均点明了西王母之邦的确切位置,特别是提到湟水、流沙,西王母石室等,很显然,现今的青海省大部分地区,包括昆仑山、祁连山,湟水谷地,柴达木盆地,都被覆盖了。而这一地区,恰恰属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盛产人参果、灵芝草、大黄、麻黄、藏红花、鹿茸、麝香等名贵药材而闻名,特别是独具品位的冬虫夏草,更是一种近乎神效的奇药。试想想看,西王母之邦如此物华天宝,奇珍遍地,远在中原一带的达官士人们能不遥望垂涎么?无奈道路阻长,在神往与想象中便自然衍生出了美丽的神话故事,西王母被说成了身藏长生不老之药的神人。但无论如何,西王母之邦的奇草珍药之真实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是确凿无疑的神话,那么,在《博物志》的描述中,西王母与汉武帝的会面则无疑变成仙话了。其中说:汉武帝好仙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这种蟠桃盛会式的民间传说在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里被推衍到了极致,上至玉皇大帝,下至各路神仙,都以能参加一次西王母的蟠桃宴会而荣幸。西王母的仙道品位,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这至少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反映了西王母的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扬名之盛。后世在中国各地名山名池得名的王母祠、娘娘庙、瑶池、王母池等等,无不是中国民间万众膜拜西王母并祈福西王母的一种明证。

由此上溯,就在孔子删定诗书,对“怪、力、乱、神”一概排斥的时候,



与他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圣哲思想家老子,却表现了对西王母现象的确切关注。据《博物志》载:老子云:“万民皆附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

在这里,老子的态度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第一,老子对当时在民间盛行的敬服崇拜西王母的盛况采取了观念和心理上的认同,他并没有贬低或否认这种现象,而是很达观地赞同说:“万民皆附西王母。”接下来,老子对西王母的品格定位作了如下逐级推演:“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在老子的推演中,西王母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女王,其次是圣洁至诚的人,最后是天地合一的精灵。在这里,没有任何怪异的推衍,没有任何半兽半人的附会,更没有任何一厢情愿的质疑和妄断。老子毕竟是老子,他的终极理想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他最鄙视和痛恶的是人欲横流与物欲膨胀。应当认为,老子是把西王母作为至善至真至美至慧的人格与社会的最高化身来看待的,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老子心目中的西王母便是凝聚了中国精神的东方美神,而真善美慧则是这女神的永恒光辉。这样一来,盛行于民间的对于西王母的爱戴与景仰在老子看来,当然是一种值得赞赏并加以肯定的民俗文化现象了。

无独有偶,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残片中,也有“燎祭西王母”的字样,据有关学者考证,“西母”即“西王母”,是见诸于文字以后最初的表达形态。可以想见,在殷商王朝时代,燃火祭祀西王母就成了一种仪式,那西王母的真正影响恐怕还要一直往前代推演才符合实际。我们知道,甲骨文大都是表现王室卜卦的卜辞,而殷人除了敬服他们心目中的“天”外,惟一敬服的就是他们的先祖了。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西王母仍然是作为天地人的化身而受到祭祀的。其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老子距离殷商的时代,毕竟比我们要近得多。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中的“燎祭西王母”中的“燎”字,多多少少地透露了西王母祠或庙的建筑已经出现,而庙或祠的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则是另具有值得探讨的要义了。

据《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西王母祠,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另据《隋书·诚节传》载：京兆张季旬父祥，开皇中迁并州司马。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建略地燕赵，至井，祥勒兵拒守。建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城侧有西王母庙，祥登城望之再拜，号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云起，须臾骤雨，其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

这些引自史书上的记载，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西王母祠或西王母庙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从商、周、秦、汉，一直到近代都广泛存在的事实。在中国，祠或庙，包括陵，基本都是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是为民间口碑极佳的著名人物修建的。从古到今，卓异人物成千累万，而真能让老百姓为其立祠修庙的人物却是屈指可数：黄帝陵，炎帝陵，众望所归。姜太公庙，夫子庙，诸葛武侯祠，包公祠，百代传诵。而岳飞庙，文天祥祠，则更是香火不断。在这里，祠和庙的存在与人民的认可崇拜是高度统一的。就一般意义而言，祠或庙的主人公无疑都是历史人物，这和印度传过来的佛教寺庙中的佛经故事人物完全是两码事。也正是站在这个观点上，







我们必须承认,西王母祠或庙的广泛而持久的存在,恰恰是从民间民俗的角度上证明了西王母的最初原型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不可争辩性。

问题又回到西王母的所谓“虎首豹尾”之上。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有如下记述,不妨全文引证:

于时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阴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头,戴胜颡然,白首善啸,石成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山海经》亦云。然不知此形貌乃西方白虎之神,西王母使者,非王母真形也。王母真形天姿掩霭,端正美丽,如三十许姣好妇人。岂有天真灵人而虎首豹尾者乎?此万古传说之过也,《汉武帝外传》状西王母,得之矣。

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在情在理。倒是需要引述一下《汉武帝外传》一书对西王母的描写:

王母至也,群仙数千,光耀庭宇。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绡之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褙裙,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缨之冠,履玄橘凤文之。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母呼帝共坐。

在这里,西王母成了上界仙主,汉武帝则是人间之帝。虽然这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文字叙述让人觉得虚幻而飘渺,但字里行间状西王母之姿之态,却是源自于生动切实的真人,其灵与体的美的辐射,不是让人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的美妙感染吗?须知,血肉丰满的生命气息,这才是我们要真正了解和探寻西王母存在的价值所在。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西王母的时代无疑是西部昆仑山地区母系社会的盛期。学术界公认,西王母属羌族部落,而羌人风俗为:“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引自《太平御览》庄子佚文)羌人作战被俘,不忧死而“忧其不焚”(《荀子·大略》)。民族民俗学的研究证明,遍布于今日中国西北、西南的诸多少数民族,如藏、彝、白、哈尼、摩梭、土家等民族皆与羌人有族源关系。而汉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与羌人的血缘联系,只是汉人的生发演变更为宏大复杂罢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在现今与羌人族源最切近的彝族人中,仍盛行“酋长死,以虎皮裹尸而焚,其骨葬于山中”的传统习俗。而这种对虎的崇拜情结,恰和他们的先祖——



西王母时代的“虎齿豹尾”的图腾崇拜一脉相承。

云南的纳西族无疑也是出自氐羌,其传统的成婚新装,最高的规格却也是“身穿虎皮衣,头戴虎皮帽,腰挎虎皮箭袋,座下虎皮垫褥”,他们视这种装束为神圣——这和他们的远祖西王母时代的虎豹崇拜又何其相似。

再说,西王母的时代是母系社会,而在云南摩梭人那里现在还盛行不衰的以女方为主的“男到女家”的走婚制,不是明明白白地让我们看到西王母时代的影子吗?



还有,在隋唐时代的史书中,多处记载了青藏一带多女王之国,这种现象,即明清之际,亦有延续。即使在刚解放之初,现今的青海省果洛、玉树一带,亦有为数不少的女千户、女百户——她们不正是遥远先祖西王母作为女酋长的后世影子吗?

一句话,西王母作为中国历史上昆仑山地区的部落女王,她的最初原型是人而不是神。至于她成名以后,从人到神再到仙的过程,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过程,而这个演变过程,恰恰给了我们一把打开民族心理结构,打开民族民俗学的沿革通道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一点,我们理应倍加珍惜才是。



## 炎黄溯源

炎帝、黄帝、大禹，均出自西羌，与西王母同源

中华文明常常被称作炎黄文化，炎黄者，炎帝黄帝之谓也。用炎黄文化来总括中华文化，一般地说说也无妨，但要较起真来，似乎确有不完备之嫌。

其实，就初始意义的炎黄文化而言，其文化之根甚至其族源之根都与江河上游的羌戎文明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甚至可以这样说，后来繁盛于黄河中下游的炎黄文明，是脱胎于黄河上游的羌戎文明的。

这样说来可能会让一些具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们惑然不解甚或大为反感。其实，就民族史的发生源头与后来的分合脉络来观察，很难说哪一个民族截止现代仍然是一个纯种民族——就种族的进化而言，融合反倒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必然现象，任何抱残守缺的民族观注定是一种偏狭和短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炎黄文明脱胎于羌戎文明，从而超越了羌戎文明，其嫁接与更新的能力恰恰保证了她生生不息的活跃生机。

现今的甘肃天水一带，包括陕西西部，即渭河的上游地区，相传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三皇即伏羲、炎帝、黄帝的出生成长之地。现今的天水保存有伏羲庙，陕西桥山保存有黄帝陵，似乎也不能说是附会之所。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的羌戎诸部落曾广泛活动于黄河上游、渭水上游、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等广大地区。那么，诞生于此地的伏羲、炎帝、黄帝，就不可能不与羌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伏羲是八卦的最早发明者，而八卦无疑是《易经》的雏形——这个中国最早的哲学奇书，其作者却是生于成纪，即今日的甘肃天水。先秦古籍《淮南子·览冥训》称伏羲为“虑戏”，《礼记·王制》说“西方曰戎”，《风俗通





义·四夷》说“西戎有六……五曰鼻息，”查“鼻息”即“虑戏”的转写，而虑字从虎，虎乃羌族的图腾，这说明，“虑戏”当是诸羌中的某一支，结论是，伏羲其实原属羌族，甚或是某一居于先进文化地位的羌族首领。由伏羲所作的八卦，后来竟成了汉文化的鼻祖之作，这很使我疑心，中国汉字的最初源渊，大约也与羌戎的文字有关。

至于稍晚一些的黄帝与炎帝究其源仍为一族。古籍中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又说：“昔少典娶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姬水成，炎帝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考姬水为今日的甘肃夏河，姜水为今日陕西宝鸡以北的渭河支流。史学家们公认在古文中，姜通羌，那么，炎黄二帝均出自羌戎之地或部落，且经受过当时居于先进文明的羌戎文化陶冶，当是可以认定的史实了。

当然，炎黄二部落后来都沿着渭水、黄河一线向东发展了，这也就产生了《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据太史公司马迁的推断：“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嫫





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盛德焉。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器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接着又推断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尧。”其所以要详细地引用原文，是为了说明，从唐尧、帝喾、颛顼以至炎黄二帝，其血缘关系皆一脉相承，其根系无论如何可追溯到羌戎诸族。至于虞舜帝，司马迁认为：“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瑞项，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另一位声贯日月的人物大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推断说：“禹兴于西羌。”荀子更认为“禹学于西王国。”学什么呢，当然是政治经济之策，包括最重要的治水经验。我们知道，大禹曾“导河于积石”。所谓积石山，就是现今青海境内循化县的积石峡谷，那里黄河骤然转弯，其峡如削，传说是大禹凿山导河处。查此处乃东昆仑的余脉，其地域无疑属古代的西王母国，所以“禹学于西王国”无疑是学于西王母国，可见当时的中原王朝与西王母国有着何等亲密的关系。显然，这种亲密关系是基于一种久远的血缘联系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断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说到底都是当时西羌文明的继承更新发扬广大者。而他们与当时西王母之邦的联系，也在史书被记载得简洁而明白。

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二三载：

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变幻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行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披元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

这一段记载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其神秘性无疑具有神话色彩。但若





抛开那些虚妄难解的神异部分,剪纷然枝叶而留其主干主枝,我们不妨可以看出以下三点:一是西王母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家风范,她在黄帝讨蚩尤的正义战争中全力支持了黄帝。二是西王母之邦不乏将才,九天玄女即是西王母派往黄帝军营的军事顾问。三是西王母向黄帝提供了独有价值的战术策略,并提供了相应的军事情报。也就是说,西王母是黄帝战胜蚩尤的同盟者之一。

我不否认,这一记载中有难以确认或后人附会的成份,但在另一些古籍中,中原五帝与西王母交往的频繁记载,却就不能不引起注意和研究了。

据《新书修政语上》载:

尧身涉流沙封独山,见西王母。

尧帝既然是跋涉过大片流沙,才见到西王母,可见西王母之邦远在西陲。查今日青海湖周遭,有沙漠处不下两地。而再往西的柴达木盆地,无疑全为戈壁沙漠包围。那么,尧帝亲自去见西王母,可见有国家大事需要沟通或商量。西王母之邦的威望影响可见一斑。

《竹书纪年》载:

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琨。

这一次不是舜西去,而是西王母东来,且向舜帝献上了白环玉琨。查现今的青海格尔木市以南昆仑山,盛产昆仑玉,其工艺品远销国内外。而小昆仑的夏格日山一带,则产墨玉、翠玉等。可见西王母向舜帝献玉,绝非杜撰之辞。

另据《论衡别通篇》载:

禹,益见西王母。

我们知道,大禹治水前,曾“学于西王母国”。可见,学技术、学管理经验、学山川地理知识,那求学者就该是一群人。然后,西王母之邦显然是调动了大批民工,协助大禹导河于积石峡。如此看来,西王母之邦是有恩于大禹的,那么,大禹为帝后,西去见西王母,亦是情理中事。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人物,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们与西王母之邦的交往则必然是可靠的。难道能说中国古代包括太史公在内的史学家们都在撒谎或杜撰,硬要把一





个子虚乌有的西王母非抄进史书不可?很显然,那样推测是说不通的,除非认为古代的史学家们都是些神经有毛病的人。

近代和现代的一些学者,囿于现代实证考古学的绝对理念,对三皇五帝统统表示了怀疑,说这些人全为神话人物,甚至认为“禹是一条虫。”但他们无法彻底推翻中国古籍中的诸多记载,于是就妄言连《史记》都不可靠。我相信,随着地下文物的逐渐发现,假以时日,一切根据不足的怀疑最终都会烟消云散的。

如果说,记载于中国古籍中的诸多史前文明,包括炎黄文化与羌戎文化的承继关系有难以避免的错讹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在青海境内发掘出的各个时期的史前文物,则确凿无误地向我们提供一部实证史书。我们不妨把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理一条清晰的脉络出来:

1956年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发现了第一批打制石器,其用于狩猎、击砸或切割的痕迹非常明显。

1982年在柴达木中部柴旦湖南岸发现各种制磨更为精致的石器约



100件,其中包括削刮器、雕刻器、钻器和砍斫器。经测定,当属23000年到30000年前的遗物。

另有距今约6754年左右的贵南县拉乙亥遗址,期间发掘骨器、石器、麻布片等遗物共计1489件。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多个灶坑的红烧土遗迹,显然是一处群居之地。

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可以说是遍布青海的湟水、大通河以及黄河“三河间”各处。其出土彩陶之多,造型之精美,制作之精细,纹饰之华丽,应该说是全球罕见,中国之最。其中的大通舞蹈图案陶盆,民和县的陶鼓和鸭壶,乐都的裸体人像彩塑壶和人面彩陶壶,还有柳湾的纹饰符号彩陶,无疑均为顶极珍品。研究表明,这些遗物反映了母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

青铜器的发现,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震动的当属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青铜镜,根据现有发现,该镜属我国最早的一面青铜镜,其对研究青海地区的古羌戎文化,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综上所述,黄河上游三河间包括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其青铜器时代文化类型,主要包括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特别是诺木洪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铜制斧、刀、钺、镞以及车毂、毛布、麦粒等,距今竟在2700年之前。这些古羌人留下的古代文明,有力地说明了古代的青海地区,其文明程度居当时的亚欧各民族之上。甚至有人推测,古羌人可能是麦类作物的发现者,其在中原地区的推广播种大约是后来的事。

纵向来看,青海广袤的土地上,完整地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的全景式文化遗址。其文化链条如此完备,其文化脉络如此完整,其文化辐射如此广泛,均让人信服并惊叹。可以说,这些完整的文化遗存,只有陕西关中的遗存才可与之比肩。如此说来,炎黄文化的脱胎或受益于羌戎文化,自然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了。









## 西王母族属考

### 西王母属古羌人,与汉族等均有渊源

我们认定西王母属上古时代居于西海周围、南昆仑北祁连之广大地域的羌人部落女首领,那么,对于从古到今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演变史作一次理性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民族的流变与迁徙是一个从古到今不断发生的过程,但作为民族主体的民间载体部分,必然会在相关的地域内保留较多的血肉与精神,就像一棵历经几千年的大树,虽枝叶稀疏失色但仍能说明它的根系存在一样。

我们知道,民族属于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即使是一个遗传基因完全贯通的民族,其不同历史时段的称谓也不完全相同。

据《后汉书·西羌传》认定:“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按羌字是一个象形字解义,从人、从羊,其义为:西方牧羊人也,这说明了羌人依其生产方式为族号特征。那么,当今的藏族人仍是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方式,其与先祖羌人的生存特征完全一致。

另据《西羌传》载:“及秦始皇时,吞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这一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强大的秦王朝以劲猛的军事力量筑长城阻隔了北方匈奴与西方羌戎的联系;二是说明了秦王朝时其主要注意力在东方疆域的巩固与内政修持,而暂时中断了与西方羌戎的民族交往与融合。当然,这种状态为时甚短。

再往前说到周王朝,为姬姓,由于地缘与西羌相连,便发生了世代与羌人通婚的史实。周人的始祖弃就是由羌人女子姜女原所生。《诗经》上说:“赫赫姜女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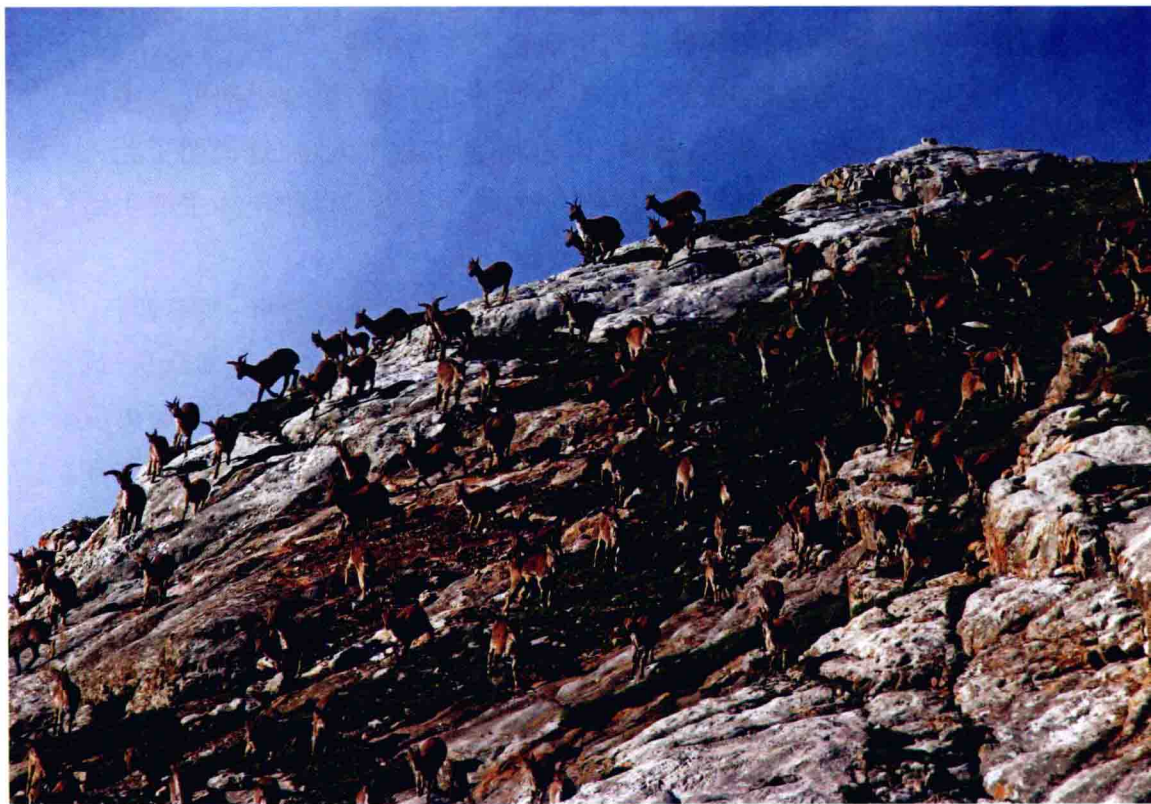


后稷即弃,因长于农耕稼穡,被帝尧举为农师,因事功遍及天下,被民间尊为农神,号称后稷。而后稷的十二代子孙即是周族中赫赫有名的古公亶父,《诗经》上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里是说古公亶父率众南迁至现今关中西部的岐山以后,又与羌人女子婚配了。周人尊称这位女祖宗为太姜。

在中国史书中曾被大书特书的武王伐纣,乃是因为联合了羌、庸、蜀等部落力量才大功告成的。这在《尚书·牧誓》中有明确的记载:“逖矣,西土之人。”可见,周武王是一个很善于搞统一战线,特别是很倚重羌戎势力的大政治家。当然,他的母系血统里确凿有着羌人的遗传。

至于商代成汤时,因国势强大,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昔日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但是,追根溯源,殷商与西羌仍有婚姻关系。《史记·殷本纪》上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尝次妃。”有女戎部落居昆仑之北,当属羌人无疑。

上推到大禹,按《史记·夏本纪》的说法,他曾:“浮于积石,至于龙门







西河。”积石山乃昆仑山东段，是羌戎世居之地。大禹治水，显然是得到了羌人的大力支持，这样，夏人与羌人便同时尊夏禹为祖先。现今的藏区人称汉人为“嘉”，据有关学者考证，嘉与夏乃一音之转，可见羌族与华夏事实上是同出一源的，或者至少说是相互融合了的。

《史记·五帝本纪》上认为，舜帝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亟鯀于羽山，以变东夷。”按照李文实教授的考证，三危既现在青海、藏北的广大地区，这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羌戎与华夏的民族大融合就开始了。

至于说到炎、黄二帝时代，与羌戎的联系则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的血肉与文化联系已是无法分割的了。古书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据考证既现今的大夏河；而姜水无疑指渭河或湟水，因为姜即羌，姜水即羌水，渭河上游与湟水均属古羌人之地。这样看来，炎、黄二帝都是不断融合了羌戎族后不断向东发展壮大起来的。也就是说，羌戎族在华夏族的早期演变过程中，占有很大的成份，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李文实教授在他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书中认定：“周秦间所称的‘华’是以商末周初入于中原的羌人，因他们入中原后改以农耕，便改称为戎，古时联称羌戎。”

从历史的演变角度看，汉族当是融合了夷、戎、蛮、狄等诸多民族以后的合成体。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西部的历史轨迹来判断，西王母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当是天同此心、地同此意、人同此情的了。



## 女王影子

### 青海雪域自古多女王,演变着母系时代的影子

从史书中得悉,青海的玉树、果洛甚至环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有部落女王的传说。上古时代的西王母自不待言,即使晚至南北朝,以至到了隋唐时代,这方土地上亦有女王出现,隋唐史书上称其为“女国”,如苏毗,被称为东女国。另外,还有多弥国、唐旄国,都有女王当政,大约可算是西女国或南女国了。

近又翻检《后汉书》及其他资料,获悉在汉光武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居于现今青海甘肃交界一线的羌人女首领名叫铜钳的女王,因遭受强邻卢水胡压迫逼侵,便主动向东汉王朝求助,并亲率其部落万众,依附于汉王朝边郡,求得平安。这些史料都确凿证明了,西部羌人部落中世代有女王出现。

近由藏族朋友导引,我特地去了一趟青海南部的果洛、玉树地区,且在玉树地区逗留较长。其间访民俗,查历史,辗转于帐篷部落之间,颇有收获。在囊谦县,朋友为我找到了一位名叫措措玛的藏族老阿妈,据她说自己的祖母在清末民国时期一直为女千户,不但势力强大,且威望极高,在囊谦县境与四川藏区交界一线,备受尊崇与拥戴。措措玛说她的祖母于1946年去世后,由她的母亲继位千户,一直到解放前后,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女千户的名份才逐渐淡去。我查阅了当地的资料,玉树在解放前共有24族,也就是24个大的部落,各部落人数不等,多者逾万人,少者数千人,大抵都是由氏族自然繁衍形成。当时的地方政府沿袭了明清以降的土司、千户、百户制度,在承认氏族部落自成势力的前提下,委任其部落首领为某一相应的职务,且此职务可代代相袭。就一般意义而言,各部落均有自立的草山边界,平时各自管辖界内的事宜,但争夺草山的





部落争斗也时有发生。

经查对资料,确有女千户、女百户存在,只是其确凿姓名不甚了然。考其俗,大约凡为女千户的部落,其部众皆由此部落中德高望重女性主人统领,且政权与教权一致。

我随朋友骑马转了几个帐篷群,河谷地带草绿羊肥,牧羊女大都活泼好动,脸色红润微黑,露齿一笑时,天真且淳朴,其牙齿分外白亮,像排开的两列细玉。间或有野性的歌声从她们的喉间荡出,高亢且悠扬,恰与这阔大粗犷的群山融成了一体。我私下想,生活脚步虽到了新的世纪,但她们的生存环境及生存方式似乎仍在沿袭着她们的远祖。我们可以想象几千年以前的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图景,大致和眼前的差不了多少吧!

回程时故意只走小路,避开大道。看那山,座座相连,千嶂万峦,看那水或溪或湖,散落沟内。心想,如此偏僻去处,才保留了这一特殊族群的生存方式和民俗流变,端的是研究考察上古史的绝佳所在。

回来后又细细翻阅史书,明白了苏毗女国在南北朝时就存在,为羌人所立。其地域约居现今玉树全境,南迄藏北那曲一线,东西约五百公里,南北跨一千公里,有小城 80,有民众 4 万户,有兵勇万人,算是一个不小的女国了。细考《隋书》称其为“西羌之别种”,为“女国”。并言其国民“风俗宽缓、人性驯良,其主及诸官皆奕叶相传”。也就是说,她们是以母系为主杆的部落女王国,以母系为世袭。

据《隋书》载:隋文帝开皇六年,即 586 年,当时的苏毗女王曾派遣女官到





长安,与隋朝通好,建立了联系。她们向隋朝进贡玉器、猗猗等方物,隋朝亦有回赠。此后,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互有往来。

初唐时,女国西南方向的吐蕃迅速崛起,松赞干布以武力扩张版图,相继灭掉了周围几十个小国。苏毗国也在此时被征服,成了向吐蕃献纳铁器的“铁王”。

到了公元630年以后,仍然存在的苏毗女国仍遣使与唐王朝联系,唐以浩荡威仪对女国以礼相待,并封授名叫孙波的女王为“右监门中郎将”。660年,女国王子悉罗诺摆脱吐蕃控制,率部东向降唐,被封为怀义王,并被赐姓李。以上史实,说明了苏毗女国在现今的青藏中部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其影响见于史籍。可谓让人惊叹。

细察苏毗女国,其内部社会结构大约有以下特征:一是王位承袭母系,女王崩,女儿继位;二是子女即从母姓,部落管理以女性为中心;三是权力中心设有大女王、小女王,皆以氏族为中心。设有女官,管理政务、军事与生产;四是其女王有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凡部落军政大事,悉由女王定;五是小女王为大女王辅佐;六是氏族内禁止通婚,男子外嫁别部落,女子则娶别部落男子。限于史料,我们对苏毗女国当时的自然地理、社会风貌以及典章制度难以有更详尽的了解。但就史籍中已经提供的几点来看,可以说已为我们后代人画出了最基本的考察参照图了,并为我们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我们不能够臆测说苏毗女国就等同于西王母国,但我们却可以相信,苏毗女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王母国的后世影子。



## 关于古史

### 对疑古派“层累说”的质疑与辨析



一说到西王母和西王母古国的是否存在,必然会牵扯到对中国上古史的判断;因为在散见于中国古籍的许多史料里,都约略提到了西王母曾与黄帝、尧帝、舜帝,甚至大禹见过面的事实。那么,如果黄帝、尧帝、舜帝、大禹存在,则西王母也必然存在,反之则不然。

但是,就“五四”运动前后迄于现今的学术界情况来看,对上古史仍存在着完全相悖的两种看法,特别是以胡适、郭沫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几乎完全推翻了古书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当然,他们也运用了一些考证的方法,如文物考证、文字训诂辨析、唯物主义推论等等。他们否定三皇五帝存在的论断有一定的市场,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孰是孰非,在我看来,还得继续争论下去。而且,是不应该轻易就形成一种定论的,如果那样,反而有害。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其言之有据的疑古论曾风靡一时,至今附会其说的亦大有人在。可以说他是一个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客观而论,顾先生的疑古说有他一定的道理,且在做史学方法上有独到之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治学方法,但是其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

顾先生认为:中国的古史是造出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也就是说,夏代以前的上古史,包括大禹、五帝、三皇,都是后世学者人为地编造出来的,所以不足为信。

顾先生以他熟读史籍、治学宏富、独立思考、立论大胆的姿态,提出了以下几点依据,来支撑他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的古史”的结论:

1.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物是大禹,到孔子时才出现了尧舜,迄于



战国时又冒出了黄帝、神农,到秦时出现了三皇,到汉朝时冒出了盘古。

2.许多史料综合证明了“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在古史问题上,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却可以知道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应该承认,就一般的认识层面来看,顾先生的以上论据是能够成立的。我的意思是说,就中国古籍中提供的文字史料来看,顾先生的说法大抵不谬。但是,问题在于“层累地造成了中国的古史”的现象,在我看来却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对于上古史,我们今天的学者们专家们更有理由再把它往前推,再往明白地梳理,再往理性的确定,而不是相反。这样说好像是故意要跟顾先生抬杠,其实恰恰是在尊重顾先生。因为现在的人们所掌握的实证考古学、民族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遗传基因学以及文物考证的技术与手段已大大地进步了、细化





了,这和过去的学者们更多的依靠有限的古籍来论证历史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古人一直在五千年前三皇五帝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那么,现代人却是要把漫长的一万年左右的人类历史搞清楚。因为地下陆续出土的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六七千年前,甚至八九千年以前,许多文明的遗址里,已有了城邦的雏形,而城邦的出现,无疑是国家形式的明证。所以说,中国的古史还得向前推,正所谓“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真是要让顾先生感慨并重新审视的现象了。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时代越往后,古史会越长。今后的历史考古实践将会证明,上古史的许多方面将会因不断补充的新材料、新资料、新方法而获得更长时空的延伸。就像一个人,当他活得越老,便越是有理由有办法有时间弄清楚他的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生命状况一样。

我这样说似乎有把上古三皇五帝等世系人物的是否存在硬要与其相应时代的文化遗存(如新石器、城邦等)混淆起来之嫌。而就许多专家互为歧见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即有人认为文化遗址的存在只能证明当时文明水平的程度,并不能证明当时某一传说性代表人物的存在。其实,就我的观点看来,这中间会有差异或疑问,但其本质上却是互为表里的,当然需要甄别、鉴定与分析,但不宜偏执一端,各不相让。

我们知道,在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的事迹。而在《夏本纪》中,则开篇就记载了大禹的事迹。《史记》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权威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太史公司马迁,应该说是他的时代对于古史最有发言权的史家,他当然下了极大的功夫把散见于《左传》、《国语》、《尚书》、《山海经》以及《孟子》、《论语》中的有关史料作了甄别与整理,方能写出《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因为这些上古史除了与某些古籍有牵连外,有相当一部分必然会流传在民间,变成了传说。传说是代代承传的,父传子、子传孙,一传十、十传百,累以千万,继以百代,其间势必会有夸大、附会或者歪曲,但就人情世理的逻辑而言,谁也不会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当作自己的祖宗来崇拜,来标榜、来张扬的。从中国民间自古迄今的民族风俗来观察,祖宗崇拜是一以贯之的传统,祖宗崇拜达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宗神崇拜,所谓宗神,也就是某一民族最早的祖先。现今中国汉族许多大家族中亦然





保留着家谱与神主,家谱是用文字对氏族繁衍根系支系的记录,而神主却是累代嫡系长者的画像,供奉神主也就是供奉氏族的祖先,这就是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也就是崇拜华夏族共同祖先的明证。

近几年有些学者,不去从民间民俗的角度去研究上古史,而专以所谓的文字训诂进行推衍和诠释,结果呢,疑古说被具体化了,大禹被说成了只是一条“虫”,因禹字的中间确实夹着一个“虫”字。黄帝呢,因有一个“黄”字,便和黄河黄土连在了一起,有的说黄帝只不过是黄土高原上某个黄土堆,而黄帝陵的确是一个黄土丘;有的干脆说黄帝只不过是黄河里的一个皮筏子。这种种看似新说的臆测性判断,实在是距离疑古派最初认为黄帝和大禹都是华夏族早期的宗神走得更远更没有着落了。

考虑到黄帝大禹均是远古的人物,其时文字尚未发明,历史更多地会依靠传闻口播,正因为是传说性质,难免纷纭不定。但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到了司马迁那儿,采百家之言,纳百代之声,经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方能有《五帝本纪》、《夏本纪》问世。我们可以怀疑在黄帝、大禹的事迹中有被夸大附会的成分,比如说黄帝时就有了指南车等,但却很难有理由怀疑黄帝、大禹的事实存在。说是儒家依靠自己的理想把尧舜美化为圣君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没有理由认为尧舜完全是杜撰的人物。至于古籍中说到黄帝母亲在野外看见打雷闪电而孕,大禹母亲在巨石上看见巨人脚印而孕,那只能证明当时尚存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而并不能说明黄帝、大禹只是神话人物。事实上,远古的昆仑神话中有神话的成分,亦有历史的成分。说盘古是神话人物,大家不会有异议,但要说黄帝、大禹是神话人物,大约是不会得到多数人认同的。

我还是一句反复说过的观点:在五帝大禹是否存在问题上,我们宁肯相信太史公的《史记》,而不可轻易相信后世所谓的疑古论。至于说到西王母,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里确有如下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好一个“乐之忘归”啊,西王母魅力若何?

## 《山海经》辨

《山海经》是最早的文化人类学。黄帝、西王母疑义诠释



翻检中国古籍,最让人难以破解的当首推《山海经》,其中的山川地理,轮廓模糊含混,方位距离也歧义横生,让人难以确指。而那些异物怪兽、神人神址、奇俗奇事、方物怪闻,更是让人头疼——这也正是这部上古奇书让百代生疑,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因。比起《诗》《书》《礼》《乐》《易》来,《山海经》似乎成了真正的“天书”,似乎出于外星人之手。其实,正是由于这部书逃脱了孔子及后世儒家学派的整理增删,才较好地保留了其本来的面目,使我们后来人可以一睹上古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民俗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原汁原味的真品。正因为它所记述的社会万象让我们奇怪不解,才显出它的真实与珍贵——因为我们在解读它时,时空秩序已完全改变。语境的丧失必然导致语义的费解,这就是《山海经》的秘密所在和价值所系。

《山海经》因其未被儒家规范化而陡显其活文物风貌,它当然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解读它,即是在解读真正的上古历史,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民俗的、生存状态的、文化方式的立体状态,当是任何一部上古史籍都无法比拟的。

让人称奇的是,正是在这一部书里,数次说到西王母,也数次说到黄帝,还有其他一百多位人物。

过去,曾有人考证此书始于战国,补充完成于秦汉,或说始于周,流变于春秋战国。但要细细考察起来,其成因肯定还得往前推——因为那些近似于天方夜谭式的上古生活画面,是后来人无论如何编造不出来的。它大约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至少它所叙述的事实如此。举例来说:“丈夫国”、“女子国”、“三首国”、“双头国”、“小人国”、“大人



国”、“三毛国”、“周绕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而“交胫国”、“灌头国”、“厌火国”、“羽民国”、“一臂国”、“反舌国”、“黑齿国”、“结匈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照字面去解释，照我们已惯常使用的理解方式去推衍，那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思议，或是杜撰的神话传说。但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运用至今还遗留在少数民族部落中图腾崇拜、符号崇拜、宗教文化，以及动物崇拜、性器崇拜等习俗观念去理解，一切便会显得自然而符合实际。比如说，“结匈国”很可能是这个部落的人有纹胸的习俗。而“一臂国”有可能是这个部落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符号图腾。至于“丈夫国”当指男性掌权的部落。“女子国”则亦然。

必须明白，在人类漫长的原始社会，部落以氏族为主体，生存以环境为本，故山川、动植物与人的观念密切相连，会随时打上不自觉的文化烙印。所以说，文化人类学从活生生的少数民族部落文化入手，其对于华夏族早期的历史将是最佳的破解参照系。

再来看“人鱼”“天马”“鼓兽”“麒麟”“龙蛭”“寓鸟”“飞鼠”等，这些在现代人看似怪物的东西，很可能是当时尚大量存在的丛林山野中真实的动物。现代科学研究已证明，在人类文明进化的五千年当中，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已灭绝。所以我们看《山海经》上描述的这些动物，因在现实中找不到，便疑其为怪物。俗语说少见多怪，当指此种状况是也。近两年在辽宁发现的恐龙鸟动物化石，不是证明了《山海经》中“龙鸟”的记述之言不虚吗？而此前人们都以为它奇怪不可解。

史书上说周穆王西征时，曾得“四白虎四白狼”，那么现今的动物园里何曾可见？所以说《山海经》里诸怪物实在是上古时代地球动物的资料宝库。我甚至认为一些传说中的鬼怪大约都有其原型动物的依据。

应当说，《山海经》作为文化人类学著作，偏重纪实，而非理论，偏重所见所闻，而非理性判断，这 and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有明显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他的思想观念，其印记必然表现为各种风俗习惯，包括服饰头饰等，这也就是《山海经》里说到西王母时强调其“虎齿、豹尾、蓬发、戴胜而善啸”——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虎豹图腾崇拜与衣饰特征了。





在《山海经·海内西经》篇中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在这里，帝指黄帝，昆仑乃指昆仑山东段的巴颜喀拉山，河即黄河，积石山乃黄河在现今青海循化县的积石山峡谷。应该说，其记载与现在的青海地区完全吻合。《穆天子传》中说，穆王登昆仑，观黄帝之宫。现今的昆仑山一线确有黄帝曾在此建宫殿的民间传说。可以设想，远古时代的昆仑山，尚处在逐渐抬升的过程，海拔既没有现在这样高，植被亦比现在丰茂。以古人的高山崇拜思想，又以古人以为登高山可达天界的观念，黄帝在他君临九州后，登此高山巡游，并建一宫阙作为纪念，当是可能的。再者，此山乃黄河之所出，具神圣意义，黄帝既得天下，登此山，观河源，上天界，显威仪，当是自然而且荣耀的事了。

后世有许多关于昆仑有玉宫、瑶池、悬圃、閼苑的说法，并说西王母居于此，其中的附会成份当与把黄帝与西王母神话后升天的传说有关，那是一种祖先崇拜到极致以后的理想幻境，自有其民族心理的演变意义。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黄帝作为华夏族人文始祖的最初原型的存在，也不能否定西王母作为古羌人母系时代女王原型的存在。这两个人，一个是父系祖宗的代表，一个是母系祖宗的代表，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源头标志，其被后代神化并推崇备至当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

解读《山海经》，有必要检索一下历代学者对其性质的判断，并能从中看出因受制于当时王朝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山海经》的整体内容常被分割、肢解或歪曲了。亦可以看出由于中华文明的人文化程度发展太早熟，而导致对这一上古时代的原始记录表现出来的陌生感、隔膜感与困惑感。

汉代刘歆认为该书：“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这是把《山海经》作为地理方志之类。

东汉刘秀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认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著《山海经》。皆



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其判断与刘歆同，但点明了其成书于大禹时代。

自此以降，各类说法便纷然列陈：《宋史》将其列为术数类；明朝的胡应麟称其为神怪类；清纪晓岚放言其为“小说之最古者”；清末张之洞认为其当为历史书籍；鲁迅言其为“古之巫书”；袁珂干脆把它看作“神话之渊府”；而当代学者启良则大胆判断其应为“文化人类学著作”。

我以为，启良先生的判断是对此前一切判断的综合定位，以研究手段的进步与视角的多元发展来看，其为文化人类学著作最具概括性。

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略》中曾认为：“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又说：“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只可以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在这里，鲁迅是把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了比较，得出了以上结论。但如果细细考察起来，则外国特别是古希腊的神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世俗化、人情化、人格化的倾向，故其更象小说。而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山海经》中的诸多神怪描写，似乎更具原始风貌性，时空确定性和民俗文化性，所以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篇幅的长短、情节的繁简，而在于全方位的社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含量。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在研究印第安人文化时，发现其根底在中国，而神秘消失的“玛雅文明”也是由远古中国人东渡带去的。在《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中，美国学者经实地勘察，认定现今的北美洲、中美洲的许多山水系列，均可与《山海经》中海外经所示相对应。由此作者放言：《山海经》应是中国古人对整个地球的地理勘测记录，并有许多怪兽的记载亦吻合当地。这一研究发现真是石破天惊，让全世界震动。看来，《山海经》的研究破译当是揭开中国、乃至世界的远古史的一把钥匙。让我们拭目以待。



## 圣母偶像

### 瑶池、瑶台、王母庙。西王母的人文神格光被四方

我们认定西王母的原型出自昆仑山下青海湖畔的古羌人女首领,但我们毫不否认西王母在名声远播之后的五千年间,四面八方都因为敬仰她而附会了为数不少的瑶池、瑶台和王母宫或娘娘庙。这一切附会都只能解释为一种博大恢弘的文化现象。

在新疆天山,在甘肃平凉崆峒山,在陕西礼泉,在山东泰山,在四川岷山、峨嵋山,甚至远到中亚、西亚、东南亚,到处都有称为瑶池、瑶台、醴泉、娘娘庙、王母祠的所在,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西王母的传说有关。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覆盖之广阔,神格之宏大。

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铜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铜像特别引人注目,其造型端庄、柔美、慈惠,在众多的出土文物,如纵目人铜像、金杖、鸟头铜像中,这一尊女性铜像是惟一的,显得弥足珍贵,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应当说,三星堆文化遗址代表的是古蜀国蚕丛时代,其国王当为男性。然而,以古蜀国如此发达的文明,却要供奉这样一尊女性铜像,可







见其非同小可。多数学者认为青铜女像即是西王母。西王母属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国,显然是由氏羌人建立,应属西王母的后世子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独独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据考证,古蜀国约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国当在5000年前,史书上有古羌人曾南迁的资料,这证明古蜀国与西王母国有渊源关系,而西王母当然属于他们的始祖和祖神。这也就是这一尊女性铜像被隆重祭祀或供奉的理由所在。

中国史书上曾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这种以中原王朝为正宗,以汉族为正宗来区别四方少数民族的说法,很让后来的许多与少数民族沾亲带故的人不是滋味,以为那是含有蔑视意味的字眼。特别是到了满族人入关后建立了大清朝,这种夷夏之辩几乎酿成了数次杀人的大祸。康熙皇帝聪明,尽量不做政治层面的夏夷之争,而是在大规模推进汉化政策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搜罗人才,并委以职衔,让其为清王朝效力。当然他也杀了一些不合作或者是有诽谤嫌疑的人,但总的来讲,他有胸襟气度,以文治武功的事实促进了汉满的文化融合。但他的儿子雍正则气量小了些,骨子里老有一种“夷人”的自卑感,总觉得汉族知识分子在偷笑他或嘲弄他,于是便大造文字狱。连汉人的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来翻书”都不放过,认定其意旨在贬损大清,将作者治罪。为了平息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民族情结,他竟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在其中自称“夷人”。但又称为中原人做了好事,为什么华人还要瞧不起他,一片委屈情绪,溢于言表。其实,雍正,包括他的父亲康熙都是没有真正弄懂“夷”字含义的人。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也是没有真正弄懂夷戎蛮狄含义的人。一些人可能懂,但故意不说,以显示华夏族的正宗正统与不可替代性。事实上,就华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份看,华指早期定居于中原地区并进入农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从中国西部,包括今甘肃、青海地区逐步东进到中原地区,并从事农耕的羌人。此前称羌,意牧羊人,到中原后,称为戎,意为弃牧从耕的人。如此看来,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应从中原四围所居地的民族生产方式加以解释才具本来意义。现今有许多古文字学者经缜密的文字训诂与字义辨析,得出了如下具说服力的意见:东夷,指居于中国沿海,包括东北地区,自古



以来就靠捕鱼或狩猎为生的族群。西戎,指居于中原西邻由牧羊过渡到农耕的族群。南蛮,指居于中原南部,包括今湖广滇黔地区,自古以密林为家,与虫蛇烟障为伍的族群。北狄,即指居于中原北邻草原上靠狩猎以肉食为生的族群。就此看来,夷戎蛮狄只是一种区别中原与四邻生活族群的形象化说法,并不含有任何蔑视或歧视的意味。只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发育成熟较早,而四邻各部族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战争的、和平的)融入中原文明当中,才发生了对夷戎蛮狄用语的误解。

历史资料证明了炎帝出自西羌,黄帝亦与羌戎有族源联系。而西王母国的长期存在,表明了华夏文明脱胎于羌戎文明,双方的融合才构成了真正的华夏文明。用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包容达观的眼光来看:华夏族因其不纯种,才具备了海纳百川的气象与杂交文明的辉煌。

西王母被华夏各族尊为共同的圣母,自有其族源寻根与文化认同的弘大根据。因为她是与黄帝时代中原文明并峙的西土牧业文明的代表,又因为其部落王国的母系氏族特征延续时间较长,如此,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父系象征,西王母则作为华夏文明人文始祖的母系象征,两种象征构成了华夏文化认同的史前景观。愈到后世,这种认同便愈变得神圣与博大。于是,不但陕西桥山有黄帝衣冠冢,即黄帝陵。河北的涿鹿之野亦有黄帝陵,其他附会的地方亦为数不少。而西王母呢,因《山海经》上说她居昆仑,有瑶池、瑶台、阆苑、千里城等,便也有了四面八方的各种附会。

事实上,只要我们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并与文史传说对照甄别一番,便会发现,瑶池的初始所指必定会是一个很阔大,很著名,且方位很醒目的所在。首先是昆仑,其为天下之中枢,高峻可通天界,是黄河之所出,此昆仑非现今的青海昆仑山中段莫属。而昆仑山与祁连山所夹峙的广大地区,古时水草丰茂,牛羊遍地,且各种方物珍宝应有尽有,现今的柴达木盆地就被称为“聚宝盆”。而盆地的北沿有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古称西海。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上说:“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玉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以西周王朝的数万大军到了青海高原,惟一道路畅达且视野开阔并能陈列军旅的只有环湖草原,也就是青海湖边。所以说,天子





觞西王母于瑶池上，也就是在青海湖边与西王母举行了隆重的会面仪式。在现代人的文字概念中，“池”似乎是一个很小的水洼，如游泳池、汤池、老池等，当指范围极小的水之所在。但是古文中的“池”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其范围当在海与湖之间。我们看历史地图集，其中的《大清全图》上，称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为“巴尔喀什池”。事实上，巴尔喀什湖比青海湖大约4倍，尚且被称为池，那青海湖在古文中被称为池当是很自然的了。所以说，西王母瑶池当指青海湖该是没有疑义的了。当然，西王母古国内仍有其他许多小的淡水湖或咸水湖，若称为瑶池也不无道理，叫叫也无妨，但要就真实背景和初始具象认定，瑶池当指青海湖为宜。我们可以设想，《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作者在其大著中既要点明西王母所居地的方位，当绝不会随便把一块巴掌大的水洼作为所指，因为其书的主要读者对象在广大的中原地区，以其遥远的地理阻隔，怎么能够理喻西陲之地的一个小小水塘为“瑶池”呢，这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

再说到青海地区的西王母祠，本书其他章节曾提到天峻县关角吉日沟内的西王母石室，石室门前草地开阔且平坦。近10年来不断有人从草地上翻拣或挖掘出残损的瓦当。据长期生活于该地区的曹景清先生考察，其间的瓦当质坚如石，且造型精美。在其红色带铭瓦当上，制有篆书“长乐万亿”4字；而在青色瓦当上，则制有“长乐未央”4字。又经查勘瓦当散落范围，推测其当时的建筑面积当为前后约80米，左右约66米，纵横面积当在8亩以上。辗转问讯当地老人，说是从祖辈传下来，那块地方先前就是一座祠，是祭祀西王母的。那么，这座祠建于何时？又毁于何时？以近代该地区偏远荒凉极少有人光顾来猜度，古时为什么要在那样一块地方建设工程浩大的西王母祠？

若以瓦当上“长乐万亿”“长乐未央”字样推断，则这祠当是建在汉代，汉代王莽时期“羌献其鱼盐之地，仙海，西王母石室，石釜”等。“汉遂设西海郡”。既设了西海郡，现今的青海湖西北海晏三角城则在解放后挖掘出汉代“西海郡虎符石匮”，其与史籍记载吻合，当是汉朝王莽时所立。我们知道，汉代未央宫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其宫殿瓦当上均有“长乐未央”字样，是一种京阙皇权的标志。那么，王莽既设西海郡，在西王母石室





前用极高规格建一大祠,以祭祀羌人远祖西王母,并示以认同并安抚羌人之意,当是适宜得当的。

据《晋书·张骏传》载:“永和元年,酒泉太守马及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寺,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看来,从汉代一直到两晋时,祭祀西王母成了一种定规。以酒泉南山(指方位)昆仑体恰为天峻而言,那么,西王母石室前的西王母寺或祠当是肯定存在的了。我疑心晋张骏此次立西王母寺只是在汉代基础上重修,并非新立,因为其残存瓦当上的“长乐未央”即是明证。

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5月,我曾有幸第三次亲到天峻关角吉日沟西王母石室前,经在石室前空地上反复采掘考察,始确信曹景清先生提供的材料可靠。遗憾的是,这一座古时所立的西王母寺,今天已变成了当地牧民的草库伦了,成了掩埋在荒草下的真正废墟了。思之颇怆然。

古书《西王母传》上说:“王母所居宫阙,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过去人们一直以为这纯属神话想象,但据《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2002年第一期上所载曹景清的文章《西海之山考察记》披露:他曾两次在当地牧民的导引下,前往天峻峰前草原中部考察,从拣到的文物如板瓦、筒瓦、大小方砖、大条砖上看到了精美绝伦的图案纹饰,又经查勘已不明显的废址,发现了至少有三座等距离间隔的古宫殿遗存,而每殿均是宏大的建筑。而据陪他的藏族小伙子说,如此遍布瓦当残片的建筑群遗址,一直间歇过渡到天峻峰的石峡深处,要步行观察至少需要一天的工夫。

如此看来,西王母的“千里城”并非杜撰或神话。可以想见,5000年前天峻山前的这一方土地,当是西王母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那肯定是一段现在怎么估计都难以想象其辉煌的史前文明。只是时代太为久远,这一切都被漫长的岁月荒草湮灭了,只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憧憬、惋惜与惆怅。当然了,在一种惋惜之余,更能激发我们考古的热情并坚定研究她的信心。我们相信,西王母和轩辕黄帝一样,代表的是一璧双面的华夏东西两个史前文明——这文明的成熟程度任我们怎样估量都不会过高。我们期待着全面的地下考古的证实。

## 图腾时代

### 西王母的自然图腾崇拜及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当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生物技术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滚滚大潮接踵而至的时候,欲望的大潮更加迅猛地吞噬着日见褪色的地球,价值观、生命观在逐步发生变化。虽然我们有些人不时地嚷嚷着要保持固有特色,但深入人心的仍然是物欲化的时尚。似乎是上帝在故意跟地球人类开着玩笑,当我们有些人一古脑儿地崇尚着西方时尚文化的时候,竟有许多西方人却在向着中国的古老文化顶礼膜拜,希望从中寻找到能够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良方。

这应了一句俗话:缺什么的就找什么。

说起中国的古文化,那实在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并非几句话就能概括得了。若分门别类地检索一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即中国的方块字、中医中药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工夫等等。那么,再往前推呢,当然应该包括昆仑神话和史前文明。近几十年来,西方许多著名学者从《山海经》里发现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大量信息,甚至有人断言,完全弄懂了《山海经》,几乎可以改变整个地球文明史。因为美洲的玛雅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甚至欧洲的古希腊文明,极有可能都与我国远古时代的伏羲、黄帝、共工、大禹、西王母所代表的文明散射有关。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有许多史前文明的研究专著作根据。在美国出版的《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的作者近于疯狂地推崇《山海经》,他说:“对于4000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他认为《山海经》是4000年以前中国人描述的世界地理,而并非过去人们认为的只表述了华夏地域的部分。

说到中国的方块字,被称为象形、会意、指事等六书。应该说,在上古



文明的起源当中,象形字是各文明古国都发明的一种符号系统。奇怪的是,历经五六千载,惟有中国的方块字成系统保留了下来,至今仍作为信息与交流的主要载体,支撑着13亿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方式,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上一个世纪初,清末民初之际,由于国运衰微,列强侵袭,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为“东亚病夫”。一些文化人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里寻找病根,于是便以为方块字是祸根之基,理由是方块字难写难记难传播,字数又多,阻碍了多数人对它的学习与运用。一些外国自大狂们也讥笑汉字仍停留在文字形式的原始阶段。当时在中国,胡适发起了“白话文运动”,鲁迅也坦言中文将最终要“拉丁化”。应该说,当时的这些举动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最主要的占上风观点却是把方块字等同于落后、保守、僵化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代名词。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实践显然已推翻了这些论断。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当代毕昇们完成了中国汉字输入电脑及其运作程序,激光照排的现代印刷业便一夜间取代了传统的铅字排印,报刊书籍的印刷现代化让汉字与现代文明同步接轨,这不但让中国人振奋也让外国人吃惊。同时,人们发现汉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化信息,许多疑难的历史问题常常可以通过文字训诂与文字解义得到解释与回答,这在其他专以表音的文字符号里是做不到的。况且,在与外文对译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同样一段意思,用中文比用外文更简捷更干净利索。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普及,许多外国人也逐渐迷上了中文和中国文化。在电视节目上频频露面并被誉为“中国通”的加拿大人大山的相声表演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实,就中国的方块字是否会最终消失这一点而言,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明言:消灭了方块字,也就意味着要消灭《史记》、唐诗宋词和《红楼梦》,这怎么可能呢?时间证明了文字只是一种符号方式,它与几千年来相应民族文化积累血肉相连,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况且,中国的方块字还大有走向世界,再创汉文化圈新辉煌的巨大潜力与优势。一句话,中国人大可以为汉字的无穷魅力而骄傲。

说到中医中药学的价值,其来自自然,师从自然,以天人合一思想注重修性养本的优点已逐步为世界所认识。特别是当西医西药的抗生素副作用,电疗化疗治疗癌症副作用以及对许多疑难杂症束手无策的时候,







◇  
图  
腾  
时  
代





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中医中药。西医已意识到了他们把具体分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推向了极端弊害。而中医的整体治疗思想、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的医学原则,以及天人合一的药物运用,都让他们大受启发。在对传统医学的认同上,毛泽东可以说是最富洞见保持清醒的现代中华第一人,他说过:“中医中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毛泽东的睿智判断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把握,这位集哲学家、书法家、诗人、军事理论家,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家为一身的伟人,表面上是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运用了外来文化,但在具体操作中却把它们中国化了,这一切都印证在他的煌煌四卷雄文之中。相比之下,鲁迅本来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大约由于他在少年时目睹了他老病的父亲被庸医所误,便连带的对中医中药表示了怀疑。鲁迅的怀疑与中国当时的国势颓败,中医中药处于低潮时的窘况有关,是可以理解的。建国以后中国曾派出了大量医务人员赴亚非拉,甚至西方国家进行诊疗活动,其针灸术、推拿术,以及中草药的显著疗效均为外国人称奇,他们似乎逐渐地看清楚了一个神奇得不可思议的东方古国。而在当下,中医中药的绿色、环保、天人合一等价值正与世界潮流完全合拍。开发中医药宝库,并使之产业现代化已是必然的选择。时间将表明,中医中药学将会为全人类造福。

说到中国的哲学,有代表性的当属《易经》、《道德经》、《论语》。在“五四”运动前后,当许多人哀叹中国国运末路的时候,一些学者也连带怀疑起了其真价值。现在,当东方古国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过去一直瞧不起中国的西方人却在谈中国哲学,大谈伏羲、老子、孔子、庄子等。仔细推敲起来,原来是西方人的物欲困惑、暴力困惑、生态困惑以及伦理道德困惑在中国找到了理论导引。再细考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似乎与老子的相对思想有渊源关系;外国人发明的计算机的二进制也的确是在中国的周易里获得了方法;而医治西方的暴力、家庭解体等弊端,也似乎可以从孔子那里得到启示。这一切突然使中国人觉得,文革期间诅咒孔子实在是太过分了,而妄言老子的哲学是颓废的唯心主义更是可笑可悲。

至于说到中国的戏曲,特别是京剧,其唱腔、其脸谱、其表演程式,以及象征性的舞台道具等,均让西方人叫绝,堪称中国国粹。其他地方戏曲





呢,均有其深厚的地域历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积淀,是一笔文化财富,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地球人类已全面进入了网络时代,各种新技术的角逐你追我赶,异彩纷呈。伴随着人类生活的舒适化程度日进一日的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资源锐减、污染加剧、怪病流行、跨国犯罪,更有热核威胁、恐怖主义、人口爆炸、贪欲横行,人与自然的矛盾找不到合理的谐调,世界末日的忧虑并非耸人听闻。一句话,现代人类最解决不好的就是自身的价值观、宇宙观,人类面临精神危机,何去何从,其实答案就在中国的远古文化当中。

中国古代人的畏天命、天人合一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自然崇拜、山水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等等思想,过去总是被狭隘地理解为迷信自然、迷信天命、迷信命运,其实它显然具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的积极层面。也许是现代高科技已严重地扭曲了自然,割裂了自然,甚至毁坏了自然的缘故,这一点我们现在就看得格外明白。

人本来就是大自然长期演进的产物,虽然人类由于自身的智力渐次成了自然界的精灵,但说到底人类决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所以说,人类首先得善待自然,才能最终善待自身——这已成了全球明智人类的共识。由此检索一下中国的远古文化,便会得到彻底的启迪:

首先,中国古代崇拜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都是人的需求与自然相守的对象。燧人氏解决的是用火的问题;有巢氏解决的是居住安身的问题;神农氏解决的是农业即吃穿的问题。应该说,古人的这三种崇拜在强调人的创造性与自然的整体一致性方面都保持了合理的尺度,获取而不是掠夺,利用而不是毁坏。

紧随其后的便是畏天命,即不与自然为敌;天人合一,即与自然相恒相守,命运与共;自然崇拜,即爱护、敬畏自然界的恩赐,也就是尊崇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动物崇拜,即视其他生命为朋友、为邻居、为人类应相望相辅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即西王母与轩辕黄帝时代遍布华夏大地的虎崇拜、蛇崇拜、马崇拜、牛崇拜,以及渐后发生的龙崇拜、水崇拜、五谷崇拜等等,莫不是在演绎着一种合情合理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到了今天,当我们只能



在公园铁笼子看到猛虎这一色彩斑斓、威风生风的兽中之王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怀念起那个“虎豹为群,鸟鹄与处”的西王母时代。

中国在远古就产生了“帝”的观念,如三皇五帝,其本意即人王,即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当时人文精神的代表。这与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不同,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第一指神,第二指外星人。这也就是中国人只崇拜祖宗而西方人崇拜上帝的文化区别。当然,中国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像伏羲、神农、黄帝、西王母这样的造福于天下的人文代表。而那些在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的奴隶主头子、封建暴君、独夫民贼等,则在被诅咒之列。

中国古人不乏聪明,中国古文化中潜藏着巨大的智慧,中国文明有生生不息的再生能力。

作为现代人,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摒弃她糟粕的部分,趋利避害,与时俱进,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更加理性的新文化、新精神,创造出与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相称的新的的人文景观。



## 女神时代

西王母是多元文化载体,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东方美神

检索中国的经史书、文学书、哲学书,甚至野史稗闻、街谈巷议等等,便会发现,西王母的故事从古到今,绵绵不绝。似乎有一条悠长不绝的红线,把这位远古女王的纷纭传说珍珠般地串联起来。而且,这传说竟像滚雪球似的,愈传愈宏大,愈传愈夸张,愈传愈神奇美丽。可以说,西王母从人王到女神再到女仙的多元塑造过程,融进了中国民间世代代的美好向往与憧憬,融进了华夏民族心理的丰厚积淀与理想塑造。就这一特殊的人文景观而言,只有后世三国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可以与之相比。当然了,诸葛亮作为男性理想人物的代表,成了鞠躬尽瘁、大智大慧的同义标志。而西王母则作为女性理想人物的代表,成为真善美惠、东方女神的同义标志。可以说,在中国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这两个人物是从未受到过非议的特殊形象,很能代表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价值观、生命观与审美观。

首先,西王母是作为和平女神、人文母祖而存在的。在《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古籍中,西王母作为西王母国的女王,国运昌明、善待邻邦、主持正义、母仪天下。轩辕黄帝在与蚩尤大战时,蚩尤突然兴风作雨,使黄帝军队迷失方向,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西王母派去手下战神九天玄女,其实也就是高级军事顾问,向困境中的黄帝献上了军事地图和《阴符经》,黄帝终于转败为胜,打败了蚩尤。这传说表面看似有神话色彩,但历史上羌戎文明的先进和西王母与轩辕黄帝的友好关系却是事实,完全有可能结成了联盟,击败了蚩尤。

而在《穆天子传》一书中,西王母确实以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来自东邻西周天子穆王的拜会。其姿其容,其威其仪,竟至于让穆王“乐之忘





归”。

其次,西王母是作为诸神之首、神话支点而存在的。在《山海经》中,西王母多次出现,且神格广大,让人神往。而在后世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西王母成了天界的王母娘娘。她的蟠桃盛会,让各路神仙顶礼而至,以为荣耀。

再次,西王母是健美之神,万世仿效。《山海经》上说到西王母蓬发戴胜,这打扮极富女性魅力,成了后世许多少数民族妇女最钟情的扮相,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就是在现代大都市里,披肩摇曳的长发亦是许多少女的时髦追求。而古籍中多次说到西王母“三十若许,天姿掩霭”,则充分证明了西王母自然健美的本色。

西王母亦是歌舞女神,善啸娱人。古籍中有西王母“善啸”也就是善于唱歌的记载。而楚辞中亦有“羌声色兮娱人”的说法。作为游牧民族的女性代表,西王母之邦的歌舞艺术当然很发达,其艺术传之于夏商周各代,当是不争的事实。在汉代的许多建筑物、画像砖及壁画中,留有大量的千姿百态的西王母舞姿形象,其妙其美让人神往。西王母显然在古代就被尊为歌舞女神了。

毫无疑问,西王母还被民间尊为生命之神,认为崇拜西王母就可以





祛灾除害,还可以得福得子。《山海经》说到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她掌握着上天对生命的派生,并能祛病除灾,这种说法源于古代的巫的文化,是当时的普遍观念。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神格神力,后世到处建立的王母庙、娘娘庙等,就成了许多善良人群乞福乞子的神圣之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乞福乞子是合情合理的,代表了一种人性渴望,是不宜用封建迷信来解释的。

当然了,在随后的数千年民俗文化演变中,西王母被逐渐塑造成了月神形象,这在许多画像砖石、壁画、年画以及手工编制器物中均有生动而众多的反映。日为阳,月为阴,阳刚阴柔,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和谐状态。同时月亮作为美丽、平和、柔情、娇美的载体,当然受到了自古迄今的文化人的赞赏与讴歌。天才诗人李白的众多诗篇中,以月为咏叹对象,而带有月字的就有近百篇之多。最有名的便有:“少时不识月,呼作大玉盘。”“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脍炙人口的佳句,百代传诵,常盛不衰。

很显然,把西王母奉为月神,当是民间推崇这位女性人文始祖的终极定位,也是对女性世界理想境界的最好诠释。这与西方人崇拜断臂维纳斯或自由女神像,构成了东西两方不同的人文景观价值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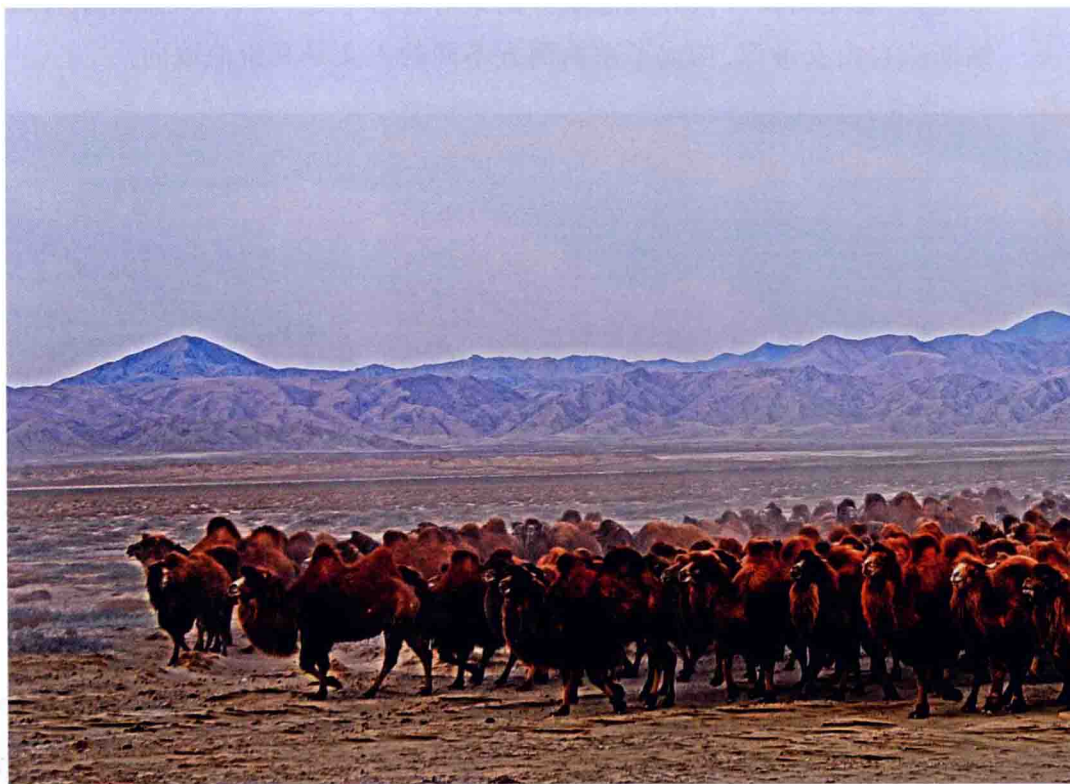
## 生殖崇拜

### 生殖岩画,生殖舞蹈,西王母时代古风犹存

上古羌戎部落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其文化遗迹集中在天峻、刚察两县境内的岩画上。那么,在现实的民间民俗遗风中,是否还可以找到某些活生生的载体呢?

当然,我毕竟不是藏传佛教研究者,因而也无法完全弄懂那些画塑中深藏的奥旨。但我确信,就人类史前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性崇拜而言,这些画塑所表现的主题,无疑者其相同或相近的一面。

然而,岩画也罢,唐卡彩塑也罢,毕竟都是些凝固化了的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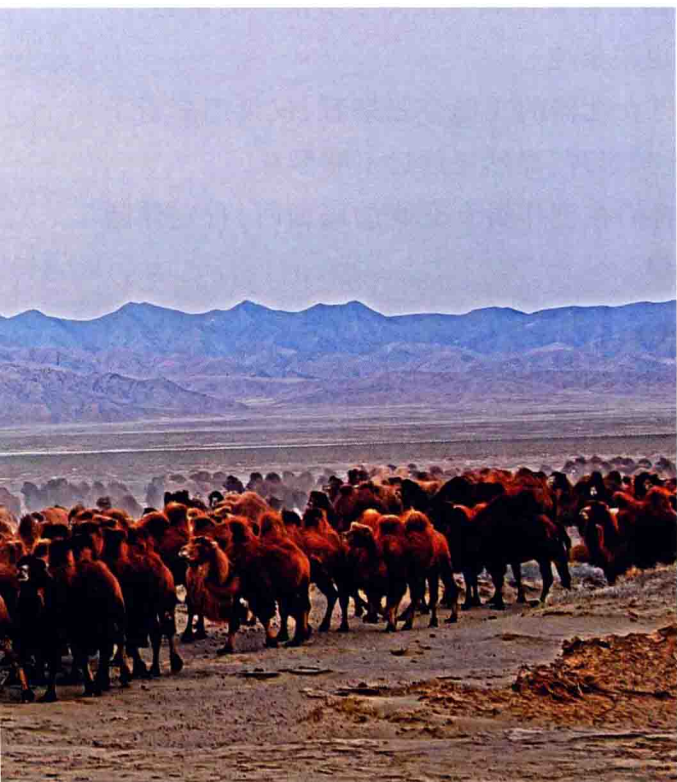




虽然我知道古羌人与现代青海的世居民族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联系,这些文化遗存也肯定透露着古羌人的性崇拜意识,但说到底它们的具象彻底性受到了阻隔。我相信民间文化中会有活的东西存在。

终于,我又一次踏上途程,在隆务河中游一带的村落里漫游。我相信,这一方曾经保存了古羌人跳“於菟”即跳老虎舞蹈的地方,极有可能也保留着性崇拜的古风。经验告诉我,越是封闭性强的偏狭之地,越有可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古风遗存,在那里,从古代到现代,民俗的演进迟缓且稳定,就像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根根梢梢都记录着前天、昨天和今天。

果然,我在浪加亚日村看到了活生生的一幕。在这个被称为“六月六”的民俗活动中,一种弥漫着喜剧气息的求子祈福舞蹈表演,即情即景地把我们带到了上古时代。舞蹈在村落宽阔处进行,围观者兴高采烈,男男女女一街两行,时有笑声闹声响起。但见一英俊茁壮男子,左手把定一木雕龙女裸体,右手握持一男性木雕性具,扭摆过市,且行且舞。当此时,围观者狂呼乱叫,表演者神采飞扬,全场聚焦处便是那木雕龙女和阳具。木雕造型逼真且夸张,其引发联想的魅力不言而喻。



此时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二三人,挤撞窥望中探头探脑,合村皆知她们系婚后多年仍未得子的主儿,便乐得让他们挤到前场求子。那舞蹈者似有灵悟之气,扭头一瞥间便握定木雕阳具,边急跨几步跳到妇人面前,全场大笑大乐,那妇人却满脸喜色。因为按照风俗,这叫作受冲得子,不孕妇女的心病大约要在这一仪式之后消除了。

求子舞蹈结束后,当地



朋友带我去了该村山神庙,刚刚表演使用完毕的木雕龙女和男器已被安放在庙内供台上。经允许,我仔细就近观察了那两件器物。木雕阳具约有20公分长,粗约5公分,其势凛然。木雕龙女为蹲式姿态,高约30公分。均用上等木料制作,表面光洁铮亮。寺院住持介绍说,每年的六月六民俗活动,都要由专人把持表演,其特殊的表演场面,在其他地方大约极少能看到了。

听朋友介绍说,在同一地区的玛什当村,保留了另一种祖辈传下的“神鼓舞”,也是一种生殖祈子的民俗文化遗存。

无疑,这种带有巫术特点的性崇拜舞蹈,和前面叙述的浪加亚日村的性崇拜舞蹈异曲而同工。他们都集中表现了性的神秘力量,弘扬了一种亘古不灭的生命再造精神。作为该地域羌人古文化的顺理成章的延续遗风,它使我们现代人在捕捉远古先民的主流观念时,不得不把生殖本体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种通行的看法是,生殖崇拜岩画或舞蹈遗存,主要是表现了古代先民对性的神秘敬畏,同时反映了对生育的渴望。因为在那样一种禽兽多于人类的时代,生殖繁衍的昌盛也就代表着人类丁多根稠的希望,所以,生殖崇拜的目的性很明确,也很单纯。

但是,从若干岩画描写的男女性器的飞扬夸张来看,仅仅用多祈子孙、繁衍后代这一目标来对应生殖崇拜,显然还远远不够尽意。

我猜想,那些古岩画的作者们在创作男女交媾的画面时,肯定伴随着某种情感的愉悦或发泄的恣肆。

同样,性崇拜舞蹈能够从上古时代留传至今,代代相袭的仪式能调动全部落或全村的人们参加,其愉悦感和娱乐性当是最表层的诱因。试设想,一件毫无乐趣的事体,怎么能调动起如此热情呢?

当然,堂而皇之的理由仍然是:祈求生殖繁衍后代,壮大人类。

但这无疑只是问题的表层,其深层的意义,说到底是一种精神需求,即满足对心灵的抚慰——这种抚慰是求得肉体与精神平衡的基本支撑点之一。

当然了,这种精神缺失与精神平衡的交替过程,也正是企图表现渴望艺术的过程,表现与渴望的结果,便是生殖岩画、彩塑和民间舞蹈的出





现。

后世社会生活中所谓的“为道为义”“为国家为民族”等响亮堂皇的动力说,若对应在上面这些生殖岩画与生殖舞蹈面前,是很难说得通顺并解释得恰且的。看来,艺术的起源,大约还是与人自身的生命骚动有关。





## “於菟”寻根

### 民间流传的跳虎舞，是西王母时代虎崇拜的影子

以西王母为代表的西羌诸民族，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的长达 2000 年的岁月中，创造了中国古籍中公认的灿烂的羌戎文化——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远古文明的主创民族——羌族在现今的青海地区还能找到其族裔么？或者换一句话说，这个以崇拜猛虎为图腾的民族在现今的青海民间还能否找到其文化遗存的蛛丝马迹？我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动物的进化演变史可以在地层化石中得到确证一样，某个民族的文化印记亦可在其绵延流变的民族民俗文化的生活中去获得诠释民间民俗文化中埋藏着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远古活化石。而至今留传在青海一些农村的跳“於菟”，恰恰传递了几千年以前的古羌人崇虎信息。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对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独有建树的刘凯先生，他说，我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你先看看。另外，你还可以到同仁、民和等地实地考察一番。亲眼看到的总比听到的要直观生动，亦可生发许多联想。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赶在农历十一月二十日去了跳“於菟”现场，地点在同仁县的土族聚居村年都乎村。

年都乎村位于黄河小支流的隆务河中游，北望湟水、大通河，这恰恰是先秦古籍中被称为“三河间”的地方，即是西王母国的前廷地带。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杂居的周围环境为“於菟”舞蹈的保留至今提供了保障。

於菟，音 wū tú，系古汉语，意为老虎。跳“於菟”也就是摹仿老虎动作，并纹以老虎假面的一种舞蹈形式，其沿自古风的脉络遗痕当不言而喻。据该村当事人介绍，这个村庄作为有着完整土城墙的聚居堡子，至少



已存在了五六百年,而五六百年前村子居民的来龙去脉,他们却说不大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这个村子的跳“於菟”,是从村子形成时就留传至今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每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为“黑日”,妖魔鬼怪纷纷作乱,而跳“於菟”就是要驱逐魔怪,保佑太平——虎图腾的威力如此之神,便只能从古羌人的意识中寻找渊源了。

十一月二十日晨,山村四野里阴霾锁定,阴风阵阵,仿佛真有妖怪瘟魔降灾人间。八时半许,经反复精选的8名汉子聚拢在村旁的山神庙大院中,四周是透着各种表情的围观者,那眼神里透着虔诚、期盼或惶怵。这时,8名“於菟”人选俱裸身露体,只在中间挂一短裤。其时,便有专人在他们的脸上、颈上、四肢上涂上虎斑豹纹,皆逼真且夸张。其头发被粘连捆扎成尖硬扭曲形,恰似猛虎狂怒状,未叫啸而势峭拔,让人生畏。此时,有一头戴佛冠,手执皮鼓的神秘长者,吩咐8名“於菟”各双手握持棘条(皆由经文纸裹定),次第进到庙内向山神祈祷,以求得到真神法力。其时天寒地冻,围观者中不乏瑟瑟抖动者,“於菟”们却要挺拔自若,以示神助。庙官不失时地捧出烈性白酒,度其量猛灌众“於菟”。其用意,一为驱寒保温,二为微醺入境。经法师念咒语,山神的意志便转化为“於菟”的意志。8个神虎被带到庙前广场,围绕桑台,狂舞不止,其威其势,震慑四野。正舞时,忽然几声爆响,随着锣鼓声有节奏地响起,“於菟”们便翩然曼舞,踢踏摇摆处,尽显古朴豪放之风。其动作采用垫步吸腿,忽起忽伏,推移着力,尽摹虎步——这种拟兽舞的原始表达方式使人很容易忘却身处的现实时代。

8只凶猛的“於菟”中,2只为大虎,6只为小虎,在锣鼓伴舞中,虎势汹汹地冲出神庙,下山路直扑村中。其时法师引路,村民尾随,好不闹腾激奋。“於菟”进村,威气逼人。两只大虎伴着法师锣鼓,只在街巷中巡望震慑,其职责是防止妖魔从各家各户中悄然逃遁。此前各家各户供桌上已备足了馍饼、果品及酒肉,单待那6只小虎跨墙入室,前来享用。此时只见小虎们挨家挨户去折腾,它们用棘条串上馍饼,用牙齿叼上肉块,纵横四邻,家家必到。当它们满街胜利果食归还街口时,乡民们便人人面露喜色,大家自信已祛灾得福了。当小虎们把得来的食品按规矩献给两只大虎时,全场的气氛便达到了高潮。



“於菟”舞蹈一直折腾到下午5时,随着又一声鸣枪的绝响,神虎“於菟”终于要遵循神旨,重返世俗人间了。此时群虎大步疾奔,在群众的尾随中直扑村外小河边,砸开河上冰层,撩起冰冷的河水冲洗全身,其意为涤尽驱魔时沾染的妖气魔氛,又洗去纹身的斑迹。如此这般,“於菟”在本年的活动便宣告结束,只待来年重返人间再展绝技了。

我们知道,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羌人应是最早的居民,他们理所当然地给这一方高地留下过最深刻的文化印记。虽然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西羌文化的黄金时期逐渐结束,但其文化之根系的符合逻辑的延伸,依然会在相继入居这块土地的吐谷浑、蒙古族、藏族、土族以及汉族人的生活中得到保留和生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河湟谷地中仍能看到跳“於菟”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历史古籍和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曾经给中国史前文化有过巨大影响的西羌各民族,历史上大约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迁徙。这些迁徙活动,客观上造成了亚洲腹地各民族的大融合大促进,也在客观上传播了当时居于先进地位的羌戎文化。这些文化包括了最为世界所知的昆仑神话,其中的西王母不仅升格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东方女神,而且也受到了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等许多地区人民的崇拜和钦敬。西王母,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文化人类学的丰富内涵,也许将带动一个世界性的专门学问——西王母学。

既然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是由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不管是处于历史演进链条中哪一阶段的先进民族,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都应该受到尊敬和研究。人类舞台上不断上演的话剧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但相继登场的不同角色都注定是各有各的价值,或者换一句话说,各民族的不同贡献说到底是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就我所涉猎的资料,西羌在历史上的大迁徙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次,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大迁徙。当时的流动方向分为向东向西两股。向东的以炎黄两大部落为主,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认为“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者陈,又徙鲁。”这句话把炎帝部落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姜从羌,是公认的古文字常识,而这个显然脱胎于羌人的炎帝,东迁到山东半岛以后,最终成





就了他作为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伟业；另一支西迁者据《汉书·西域传》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若羌。若羌国王号去胡来王。更往西有‘西夜国’……西夜与胡异，其各类羌，氏行国……”这些记述清楚地表明了，现今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一些世居民族，其族源的最初成份无论如何是会和西羌诸族难以分割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早在 40 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就详尽地点明了西羌西迁时所走过的这一条交通路线。

第二次的西羌诸族大迁徙，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下迄秦汉之际。这一时期的中原王朝，特别是秦国的崛起，给汉文化圈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强大注入了巨大活力，而这种强大又必然导致开疆裂土的国内战争。先是，秦献公兵临谓首，灭狄戎以巩固后方。接下来，便是两汉时期拉锯式的羌汉之争。以至到了东汉的赵充国羌地屯田，羌戎诸部落终于难以据守故地，相继向云、贵、川、藏等西南方向迁徙。这个迁徙是渐进的，阶梯式的前进。接下来便是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的逐渐融合。可以明确地认定，后来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土家族等西南诸少数民族，都与迁徙而来的古羌人有着或远或近的族缘关系。另一方面，留在青海的羌族人，因内附中原王朝而逐渐地融合到了汉族之中——其实，汉族本来就是一个不纯粹的民族。



第三次羌戎大迁徙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为匈奴、鲜卑、氐、羯以及羌等少数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现机会,他们相继内迁,立国建政,拥兵割据,乱纷纷你方唱罢他登场。在吸纳中排斥,在排斥中融合,从而使华夏大地上的种系优势得到了一次空前的互补互扬,也从一定意义把羌戎文化的精气播散到华夏大地的大部分角落。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伏羲的八卦哲理的普遍被接受,大禹“学于西王母国”的治水经验的代代继承和昆仑神话的广泛传播,这一切都对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羌人崇拜虎图腾,羌人当然不会想到,几千年之后的华夏大地,对猛虎的保护竟成为各民族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历史就是昨天的话,那么,昨天与今天与明天的对话话题之一,就是古羌人的虎崇拜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启示和教益——一个失去了猛虎的世界,将是一个失去了自然雄魄的世界!而崇拜虎豹或其他珍稀野生动物,也就是珍视自然界经过无数万年生物进化所造就的顶尖精品。而现代人的所有一切技术手段,包括克隆技术与转基因技术,在这些生动无比的动物面前,都不过是一些可怜可笑的小伎俩而已。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今的河湟地区甚至青海湖周遭,跳“於菟”舞蹈的民族还有不少,只是其叫法各异,仪式程序也不尽相同。年都乎作为一种跳“於菟”典型,其文化民俗学的价值便更具特殊性。刘凯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为“古羌人崇虎图腾意识的活化石”,显然是一种卓具慧眼的理性表达。

土族是青海的独有民族,其先祖无疑与古羌人血缘有合。如此看来,青海地区在汉文化与羌戎文化的吸纳中,保留了数个或更多个跳“於菟”舞蹈的古老村社,自然而然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事情了。“於菟”系古汉语,且系古楚地方言,它能在没有文字传统的土族村落中保留至今,倒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字对西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一定的情况下会起到佑护或提升的作用——一切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或地域文化观都是不可取的,真正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提携的超现实力量。

## 以诗证史

### 西王母是东方美神，环绕她的诗句古今不绝



◇  
以诗证史

中国的文化史表明，昆仑神话以其瑰丽多姿组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异风景，而西王母的演变定位则印证了中国人迥异于西方的审美观念和对于真善美慧的永恒渴望。从先秦时代一直到元明清，无数讴歌西王母的诗词歌赋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别具神韵的历史。

中国的后世的历史中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女王或女皇，如吕后、武则天 and 慈禧太后。但吕后和慈禧更多的表现了权欲与阴毒；武则天比较有作为，但她的变态式的惟我独尊却只是对男权社会的极端反叛，在留下功绩的同时也留下了对美善的戕残。独有西王母，以女性的美善与威仪集于一身，女神般的光辉普照东方，千百年来受人景仰和崇敬。

她才是彻底意义上的东方美神。

且看屈原《九歌·东居》中的诗句吧：

羌声色兮娱人

观者参兮忘归

既是羌声，自然是从西王母国传来的音乐，这音乐何其动人，以至于让观赏的楚国君臣子民忘记了回家，可见羌声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受，这感受经大诗人屈原说出，立即便成了一种文化品位的定格。

在《庄子·积水》中有一段话，不妨也可以当作诗来读：

咸池九韶之乐，传之洞庭之野，

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去，

兔闻之而不入，人闻之相与。

这几句正好与屈原的诗词相印证。

所谓咸池，如果与《山海经》对照，恰在西王母所在地——今日的青





海湖、茶卡盐池一带。而西王母的“善啸”，不恰恰证明她其实是一位羌声的歌唱家吗？

我们知道，殷商取夏而代之，自然也就承继了夏代的乐舞歌音，经过加工改造提升后，这乐改称为韶。周武王伐纣后，商人一部分南迁至荆楚之地，韶乐亦随之在荆楚粤地流传，百代不衰，这才发生了屈原所看到的群观群乐而忘返的现象。另一方面，昌盛于中原的周王朝也袭衍了韵乐，使其表现力更为宏大成熟，以至于春秋时代的孔子竟至于“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然而，真正的韶乐之祖却是西王母之邦。

事情又回到了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互会面的彼此唱和上，那是在环湖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一段千古佳话，请看，西王母以邦国礼仪善待周穆王，且深情地唱道：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周天子毕竟是国事在身，因江淮一带发生内乱，他急于回返以平乱，然而他到底难舍西王母的衷情一片，于是回唱道：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大约是被感动了，抑或是要用所居之邦的特殊人文自然环境感染周天子，抑或是自矜，于是她又吟唱道：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鸟鹄与处。

嘉命不迁，我惟帝女。

彼何世民，又将生子。

吹笙鼓簧，中心翱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如果从诗的形式角度看，四言诗的成形发展源于周代，蔓延于春秋时代。孔子删定的诗三百首，大抵可以反映那一时代的社会面貌。我们虽



无法确信这三段歌谣真出自西王母与周穆王之手,但那内容、情调、格式所传达的信息,却无疑是可以相信的。

在后世的诗人中,一代天才曹子建吟唱出美妙佳句:

驱风游四海,  
西过王母庐。

而李白更是风流浪漫,极尽想象之羽翼,在他的笔下,西王母与周穆王的显贵之地瑶池瑶台更成了爱情至上的象征,且看他脍炙人口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晚于李白的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有感于人间的真情至诚,借用典故,吟成《瑶池》一诗,对周穆王发出了千古诘问: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在这里,李商隐看到了帝王女王的国色天香之幸,却看不到他们由于身份的局限而无法达到的那样一种爱的自由境界。当然,就世俗社会而言,彻底意义上的爱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这也正是人们在讴歌爱情时常希望能升天成仙的理由所在。

细加梳理,我们便会发现,华夏的一部诗歌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羌族文化也就是西王母文化的影响,其波及之广,溢渗之深,在唐代几乎达到了极致。据东瀛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教授细加计算,一部《全唐诗》中内容涉及西王母、昆仑山、羌笛的诗竟达120余处。最为广泛流传的名句,至今让人读来感慨万千。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羌笛”何也？当然是自古传下来的源自西王母国的乐器。西王母集歌舞吟唱为一身，其文化之贡献，堪称中华文化之祖。当然，唐时的自然状貌，对于西王母之邦的中国西部来说，显然已不能和周穆王时代之前同日而语了。

有意思的是，《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自己吟唱的《白云歌》，竟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一些并不名世的诗人，且看这位曾亲自到过青海湾——远古西王母之邦的唐代佚名诗人的大作：

遥望白云出海湾，  
变成万状须臾间。  
忽散飞鸟超不及，  
唯祇清风随往还。  
生复灭兮灭复生，  
将欲凝兮旋已征。  
因悟悠悠寄寰宇，  
何须扰扰徇功名。  
灭复生兮生复灭，  
左之盈兮右复缺。  
从来举事皆尔为，  
何不含情自怡悦……

这首充满了灵性与悟性的诗篇，据作者自己的题注讲，是在他作为唐军的随行诗人，与吐蕃军作战时被俘后所作。当时，诗人从敦煌被押送至临羌，在路途中当他经过青海湖畔时，飘荡在海湾上空变幻不定的白云，很自然地使他吟唱起西王母的《白云歌》来。联想到远古的故事，感叹宇宙的渺茫，此情此景，思絮飞动，于是，他便乘兴写下了这首诗。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却是在敦煌藏书中发现的，原文为吐蕃文，现藏于法国的巴黎国立图书馆。从已掌握的情况看，这位佚名诗人由于被俘后长期生活在吐蕃军中，所以非常熟谙吐蕃文字，他用两种文字写诗，其中的文化讯息便别具意味。

明清以降，西王母的文化渗透已波及到小说、戏剧、绘画等诸多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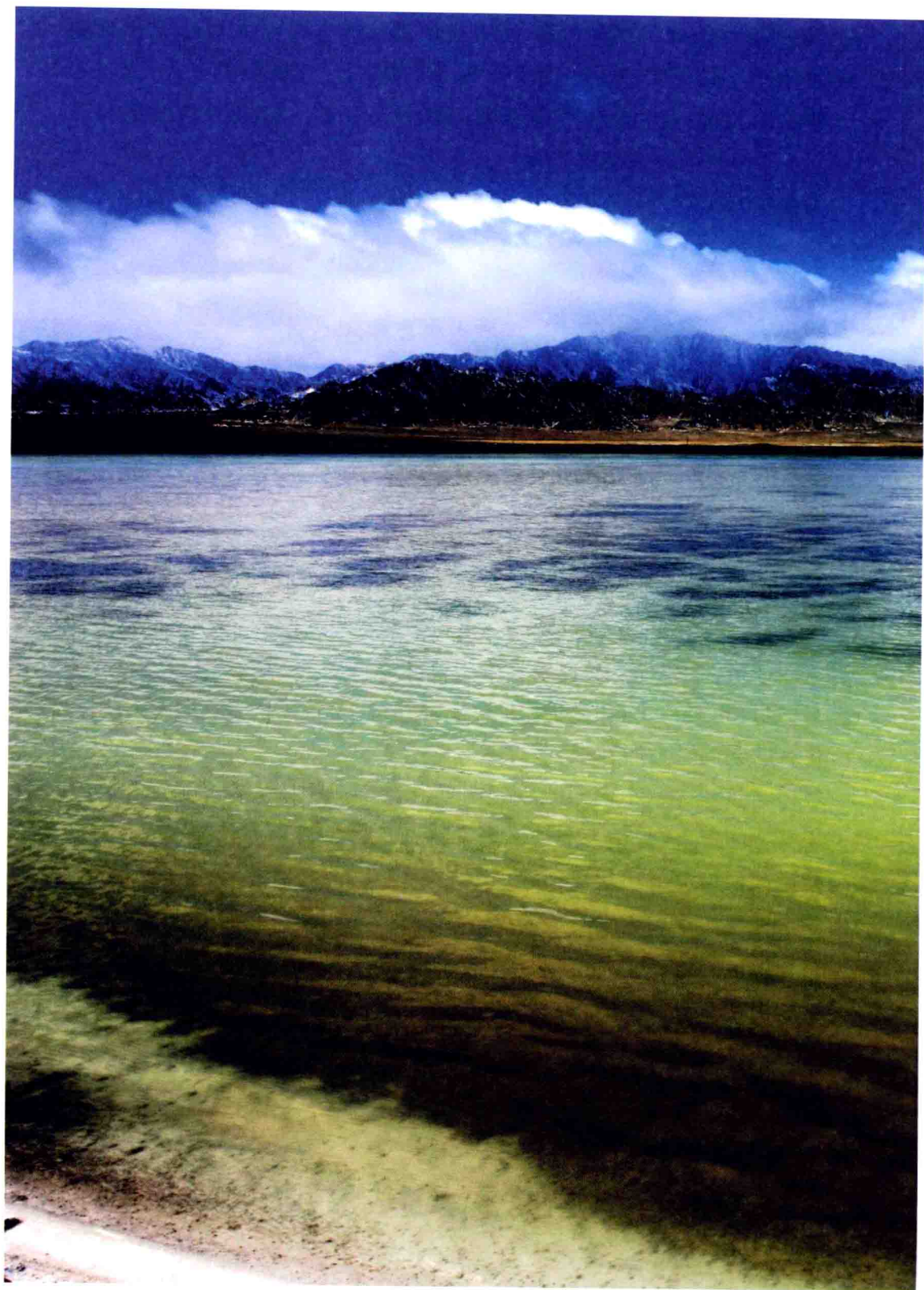
域。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更是把西王母推举到至高无上的“王母娘娘”的位置，在这种定位中，西王母亦人亦神亦仙，至诚至美至威。其东方美神的形象可以说已是家喻户晓，倾播天下了，但她的居处仍在瑶池——即今日的青海湖畔。

且看明代诗人蒋石卿的咏西王母诗作：

吾闻青海外，  
赤水西流沙。  
神人生鸟翼，  
蓬首乱如麻。  
出入乘两龙，  
左右臂双蛇。  
中有不死药，  
奇丽更芬葩。

诗毕竟是诗，其中想象夸张奇诡且浪漫，几与神话的意象吻合。我们知道，明代是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现实主义巨著的时代，然而王母的神格仙风余韵，却似乎只有用诗的形式去主观主义地表述更为恰且，这也许正是西王母作为东方女神，同时作为诗歌的经久不衰的题材所具有的共同魅力所在吧！

以诗证史，我们应该说，西王母实在是构成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最为奇特的现象，她作为女神光耀千秋，而武则天虽为女皇至美却乏善，她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民族心理中上升到女神的地位。另外，西方人崇尚美与性感而中国人崇尚美善统一的文化价值分野，在西王母的光被东方引领世俗的现象中，也自然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 鸟兽人师

动物岩画,飞扬传神,依稀窥见西王母时代的动物崇拜



◇  
鸟  
兽  
人  
师

最初的西王母生活在 5000 年以前,这年代似乎距现在太遥远了,但仔细一想,5000 年对于 200 万年的人类历史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人类对于地球而言呢,恐怕只能是一瞬间的一瞬间了。所以说,西王母时代只是人类的昨天。以今天比照昨天,以昨天警鉴今天,总该让我们有许多的反省与自知吧!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时代并以百兽的灵长自居以后,这个星球便发生了许多为人类所未能预料的巨大变化,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生了许多极其危险的变化。

首先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被切割、包围、分化和剿杀,热带雨林急剧减少,生物物种急剧减少,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沙漠化空前加快,工业污染有增无减,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可以说,凡是人类的文明涉足到那里,哪里的生态资源就遭到毁灭式的掠夺。一种人类欲望的阶梯式扩张怪圈,已经愈来愈转化成为一个绞索套牢在人类的颈项,而掌握这绞索绳头一方的,却是无言的大自然。

所谓“圣者无言,小鬼狰狞”——用这句话来回赠人类,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

人类不是有自以为自豪的高科技手段吗?

人类不是已经正在克隆动物吗?

人类还试图登上火星,寻找新的栖息地吗?

但事实已经证明,高科技无法制造生态系统,而克隆动物也不等于制造动物,至于能否在宇宙空间找到一个类似于地球的生命场,仍然只是一个未知数。





我看,地球人还是回归地球,善待地球为上策。

于是,我自然想到了西王母和西王母时代——应该说,那是一个地球生态处于最佳状态的黄金时代,所谓“虎豹为群,鸟鹄与处”,所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那实实在在的就是一幅人与大自然特别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命相守图。

试放飞一下想象的翅膀:蓝天澄碧如洗,湖光映照白云,环湖大草原上,野羚家畜相混漫游,山陵深处森林蓊郁,其间虎豹出没,野鹿奔窜,遍地野花,争鲜斗艳。在泥土芳香氤氲处,有牧女婉转吟唱,有狩猎汉子持梭奔跃,有采摘野菜野果者倚筐朗笑。远处有赤色骏马悠然荡来——不正是西王母正在巡视她的如诗如画的邦国疆域吗?

天苍苍,野茫茫,鸟飞处,林海漾,兽奔处,草低昂,共天地,万物祥,此方吟,彼方唱,即情即景,惟忘时光。

也许会有诘问:这不是要让人类回归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吗?

我说,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另一种理性层次的反省认同。

试问,西王母时代的山水崇拜、动物崇拜、灵草崇拜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现今的地球不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些而显得满目疮痍了吗?

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走近西王母国,去体察一番那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吧!

据我多次对有关资料的研究并深入实地考察,可以确信,当年西王母国的疆域大致包括现今的昆仑山以北,绵延至祁连山以南的广阔地带,其中的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无疑是最为富庶的中枢区域。而被史书中称为小昆仑的现今大通山、托来山则名副其实属于万宝山。就目前西部大开发中青海省的经济潜力重心而言,西王母国所辖治的这一区域恰恰与青海省的开发重点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当年西王母立国的战略眼光绝非寻常。

我试图走进西王母国的疆域,就时空而言,空间上容易达到,而时间上却晚了三五千年。就历史的真实情境而言,时空原本就是不可分的统一体,谁能够说他旅游了现今的西安就等于领略了唐时的长安城呢?

好在,西王母国的存在并不就是一座容易变成废墟的古城,它是山川河湖的自然存在,是岩洞石窟的自然存在,是林木鸟兽的生生不息的



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走进西王母成为了一种接近真实的可能。

在祁连山深处的岩壁上,我看到了不少或清晰可辨或斑驳变形的岩画,其内容多为男女交媾,生殖具展示,个别有太阳月亮的轮廓。这些明显地表现了生殖崇拜的原始岩画,与内蒙古阴山一线的原始岩画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其生殖崇拜的共同内容为研究一万年前后的原始社会提供了文化佐证。那么,西王母时代呢?西王母时代的“鸟兽与处”的文化特征能否在深藏的岩壁上找到蛛丝马迹么?

我又一次走进了被史书称为小昆仑之一的天峻山。

天峻山峭立于青海湖西岸偏北的方位,历来被考古学家所重视,它的“天峻八景”被认为是西王母故乡的圣迹。其八景虽由现代人命名,却隐约透露了西王母时代的所居地地貌特征。一曰“绿野画屏”,以众多栩栩如生的动物岩画得名;二曰“经院宝塔”,因一座石刻经院而名世;三曰“奇天秀景”,因其峰挺拔幽美,登之可东望青海湖,北眺布哈河而为人称道;四曰“仙山圣洞”,是自古就传说的西王母石室,石室前曾建有西王母祠;五曰“西海河冠”,系指青海湖周边八条河流中流量最大的布哈河;六曰“丹城绿苑”,因其峭壁红岩恰似城堡,其山顶上野生动物竞相奔逐而得名;七曰“龙凤仙居”,因其间有洞,酷似女阴而受人敬畏;八曰“冰峰鹰翅”,即疏勒南山意译的对位。因其是一座冰川且姿态五光十色而得名。

流连了天峻八景,我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到散布于两处的岩画上,因为考古研究已经认定,这些珍贵的动物岩画大约产生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正是西王母国在中原王朝西陲一隅的活跃时期,或者说,正是那个让后世史学家或文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周穆王与西王母会面的时期——多么让人神往的一幕啊!

先说卢山岩画吧,它的位置在现今天峻县布哈河谷的江河乡,正是青海湖最大的源流布哈河流经的地方,可以想见,当年那些游牧族艺术家们是怀着怎样一种虔敬与高尚的心情贴伏在这些岩壁前作画的。我注意到,在这总共 270 幅个体群画中,分别表现了动物形象、狩猎场面、战争角度和生殖崇拜等内容。这些镌刻在 30 块花岗岩上的图形,组成了一幅全方位的史前文明生活场景。其视点的多样,布局的宏阔,立意的深





邃,表达的夸张均让我惊诧不已。那些静态的牛和鹿,分明是一曲对于动物美态的赞歌;而那些被夸张变形了的牛和鹿的小头、大角以及舞动着的尾巴,那些被打凿得精细无比的鹿角枝杈,似乎都在讴歌着一种生命的野性力量,其审美的力度震撼人心。而在四幅狩猎画中,竟分别表达了单人猎、围猎、车猎等方式,特别是车猎的图形,不得不让人惊服 3000 年前古羌人在制造这方面所能达到的辉煌——它也许是对于该时代周穆王乘八骏之车巡西王母国的另一种诠释。而表现战争场面的两幅岩画,仅只是两人站立对射,腰悬箭囊,两矢相连——无疑,那只是一种规模极小的部落战争的投影。藉此,我们可以认定,西王母时代是以和平立国为原则的,像后世中原战国时代那样的相互攻伐对于西王母之邦大约是不存在的。至于生殖画仅具一幅,男侧体女正身,奇的却是夸张了性具,一种对于生殖的天生的敬畏和无拘无束的表达观念,让我们这些后来人禁不住要深思和探究。性的主题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全部流程,它使我们确信,对人的本体的关注和追问,也许应该是任何艺术都无须回避的永恒主题之一。

再说鲁茫沟岩画吧,它位于天峻县天棚乡鲁茫沟内约 4 公里的东山根。在三块三至九平方米的大石块上,分别镌刻着 78 个动物图形,其中有牛、马、山羊、野猪、狐狸、驴、老虎、骆驼、野狗、猓狽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同科的动物,当时是活生生的群居于昆仑山中,且此消彼长,彼长此消,遵从着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一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而现今,我们还能在中国版图上的任何一处看到这些生趣盎然的场景么?

怀着一种对于动物岩画的特别兴趣,我索性走出天峻县,在同属环湖地区并与天峻县相邻的刚察县境内又去察看了两处岩画,我觉得我是在履行着一个现代人对于远古人类动物崇拜的一种认同职责。

在位于刚察县吉尔孟乡西北 20 余公里的哈龙沟口,两处间隔的岩画群上,分别刻有牦牛、豹子、羊、虎、鹿、骆驼等图形,其线条粗放,可以看出作画者那样一种任意随心的达观心态。

在东距青海湖 8 公里,海拔 3600 米的刚察县南舍布其沟口,一块高宽 10 余平米的千枝岩上,模糊可辨有动物形象 40 余个,其内容亦为动物或狩猎。其中最让人关注与别处不同的,是一幅气韵奔放的单骑射猎





野牦牛的图形,猎手气态飞扬,奔马劲蹄飞跃,长袍箭袋,各得其妙,猎手引弓处,野牦牛惊恐逃窜——这是一幅我所看到的最难忘的狩猎图,我似乎听到了那传自 3000 年前的马嘶人喊牛叫的充满着生命血性的声音——那可是我们的先祖曾经拥有过的生活特写镜头啊!

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看到关于飞鸟的岩画,或许暂时还未发现。我纳闷的是,古羌人是因为不射鸟类而忽视了羽族呢抑或是敬畏那样一种能飞翔的灵类而停凿割爱呢,总之,对于那样一种“鸟兽与处”的生存状态,岩画的表现上似乎是故意地缺了一块。这倒好,一个需要后来者研究的课题,倒是一种悬念,来吊吊我们的胃口也好。

许多古今资料表明,西王母时代对动物的崇拜不但表现在岩画中、诗赋中,还表现在他们的服饰妆具上。特别是在举行重大的典礼仪式时,在举行巫术活动或是征战动员时,更是把动物的化妆面具——佩戴整齐,其威其势其震慑的力量,直接外化成了一种礼仪文化。

我们知道,西王母作为部落女酋长或女王,她的装具服饰是虎头豹尾,那么,作为她的部属呢,自然因职务的高下和男女的差别各有其具。我们不妨列出一个表格来展示一下这种特殊的职位序列,或者叫做官衔序列:

1.熊	1.鹰
2.狼	2.隼
3.犬	3.鸟
4.豺	4.燕
5.狐	5.雀
6.獾	6.鹊

以上猛兽妆具为男性职衔,鸟类妆具为女性职衔。惟独西王母乃王者,虽为女性但那妆具却是至高无上的虎头豹尾——威威乎一代女王,让臣民望之而生敬畏,让敌人望之而肝胆生寒。

当然了,那些猛兽以下的其它温顺动物,比如马、牛、羊、驼、鹿等,因其不具备仪式中或战斗中的威慑作用,其妆具并不列为职衔表示。但民间的庆典活动,普通民众的求其装而试用的情况,据推测大约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从至今仍留传在河湟谷地、环湖地区的村社活动中,

无疑都会得到确证。

鸟为人师,兽为人师,动物崇拜——应该说,这是西王母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亦是普遍的文化观念。虽然,这种动物崇拜带有朴素的实用观点,甚至还杂有某种神秘意味,但那种天地人兽神五极合一的集体与意识,却真切的要比后来人类一代又一代的想把猛兽猛禽斩杀干净好得多,也人道得多。

现在的人类,以百兽的灵长自居的人类,当无数的动物鸟类变成濒危物种或灭绝物种的时候,一种孤独的伤痛便接踵而生——人类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存在只是大自然—动植物—生物链这个不容割裂的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毁灭其他生物物种也就是在毁灭人类自身。岂只是在毁灭现在,实际上也是在毁灭着未来。就说现代高科技前沿的动物克隆、转基因研究,包括仿生学、遗传学,哪一样能够离开大自然所创造的千姿百态的动物植物。而可怕的是,那些极尽神姿的各种动物植物,有相当一部分在我们人类还不甚认识它们的时候就永远地灭绝了——就像灭绝了一个个远古神话一样让人怅惘和痛悔。

我常常惊叹那些美丽的动物,马的矫健潇洒,虎豹的威猛咆哮,大熊猫的憨态可人,鹿的温顺机警;而对于人类有时候表现出的猥琐卑微、怯懦自私、疯狂贪婪和刁钻无耻感到自愧和愤怒。

“虎豹为群,鸟鹄与处”的时代可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理应也能够从西王母时代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不言而喻,那时的动物崇拜必然导致草木崇拜和山水崇拜,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美好的观念和品格仍能从现今的藏族人那里得到印证,他们的敬神山敬神水敬神鸟,难道不是对于我们最好的启示和教益吗?

## 女王之山

古籍中所谓西王母之山、石室、昆仑柱，有迹可寻



听说位于现今青海境内祁连山南脉的夏格日山颇有些神秘的自然与人文的遗存，我便决意去实地考察一番。据长期居于当地的人讲，其山势巍峨壮观，势若泰岱。山腰多洞窟，山顶有铜柱，山基有玉石，似乎与传说中的西王母石室有瓜葛。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特选择在7月中旬去了那里。我以为，7月中作为高原上的黄金季节，是会对这一次考察带来美好的记忆的。

运气果然不错，在由海北州所在地西海镇向最后目的地出发时，巧遇了一位民族学院女教师，是藏族，名叫卓玛措。她也对探究夏格日山兴味如炽。一阵简短交流后，我们竟成了结伴而行的“同志”。

汽车在宽畅起伏的山道上奔驰，视野里地碧天蓝，山坡上旷野里羊群悠悠一片。卓玛措长睫毛一眨提醒我说：“这一片草原就是40年代王洛宾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所在。”我也提醒她说：“3000年以前，有一位部落女王，大约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治理着她的部落王国。”

卓玛措朗声笑了：“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她的嘴角凹出一条线，似在讥讽着我的无处不在的历史情结。

我也笑了，对她说：“我的意思是，当年的王洛宾能在这方土地上捕捉到那首歌的绝妙旋律，只能解释为一种神谕或暗示。而真正的音乐精品都是灵感与神谕的结果。”

卓玛措认为我说得太玄了，她用最被公认的事实纠正我说：“当时的情况是，王洛宾结识了金银滩千户的女儿，她美丽动人，并颇具一些藏女的野性，让王洛宾着迷。两个人在分手之际，《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就酝酿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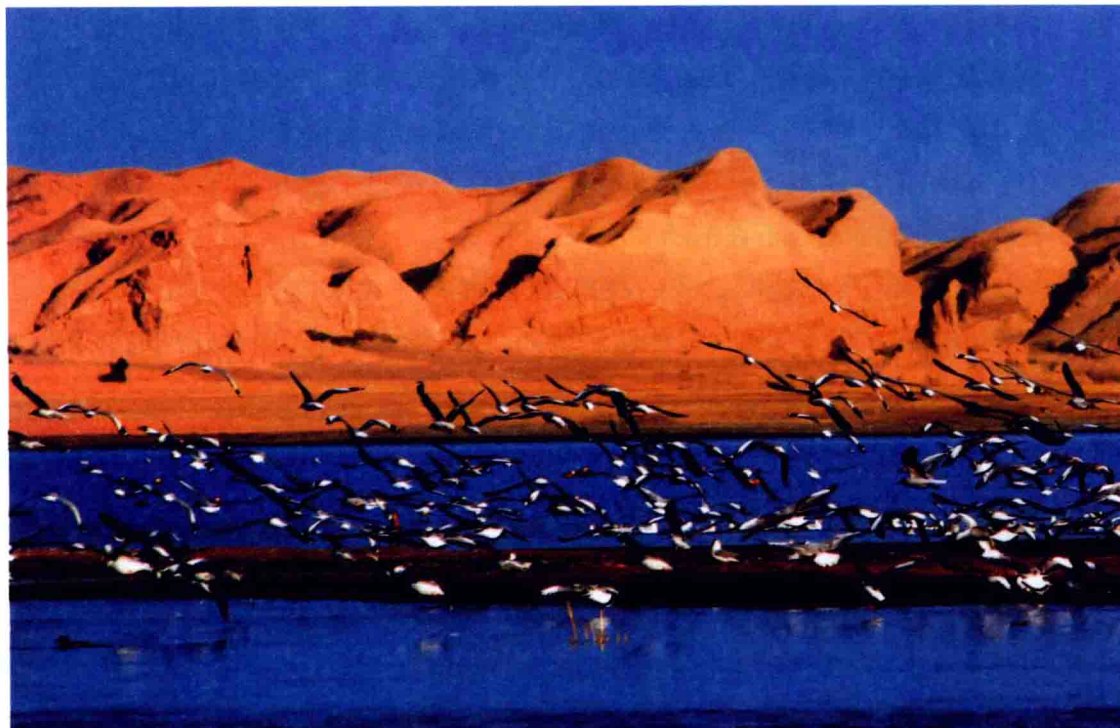
我承认卓玛措的事实依据,但又提醒她说:“你不觉得那位部落千户的女儿让王洛宾着迷,是因为她的美善野性的神韵里依附着西王母的影子吗?就艺术灵感的永恒动力源而言,美的吸引和对美的歌唱肯定会无往而不胜。”

卓玛措眨动着她的长睫毛,似在沉思。

我说:“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西王母。我敢肯定地说,上古时代的西王母原型,只能是人而不是神。她是一位集歌唱、舞蹈、巫术为一身的绝代美女,当然,她还具有特别智慧与管理才能。不然,就无法解释部落民众会拥戴她做女王——应该说,她的时代属于母系氏族时代,其政治特征表现为原始的民主制度。”

中午时刻,我们来到了夏格日山下。经查地图,此山位于海晏县与刚察县交界之处。

在平荡丰腴、芳草连天碧的环湖大草原之上,陡地兀立起这么一座雄浑如天然宫阙般的巨大山峦,真使人疑心那实在是神力的着意安排。举目眺望,但见山巅雪堆冰聚,银光内耀,奇石怒耸,若笋若盖。细看时,半山腰往上全是白石峥嵘,连壁接嶂。山腰往下处,奇草野棘丛丛点染,时有鸟飞兽奔。而山麓漫坡地带,草绿花艳,柔绵落毯。突然间我就想起了古籍中对小昆仑的记载:“此山万物尽有。”





卓玛措告诉我,夏格日山应系藏语转借,其意为“白帽子山。”我想,此山上半截白石连壁,下半截绿黛相间,端的奇异。若是在更远处眺望山巅,不是晶莹如玉吗?我又想起古籍中又别称小昆仑为“王山”者,看来当是恰且有所指了。

环湖一带的诸多山名,从古迄今多有变化。那么,此夏格日山在以前的叫法中当有别名。我查阅了《西宁府新志》,其中说:“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谓昆仑,夷曰闷摩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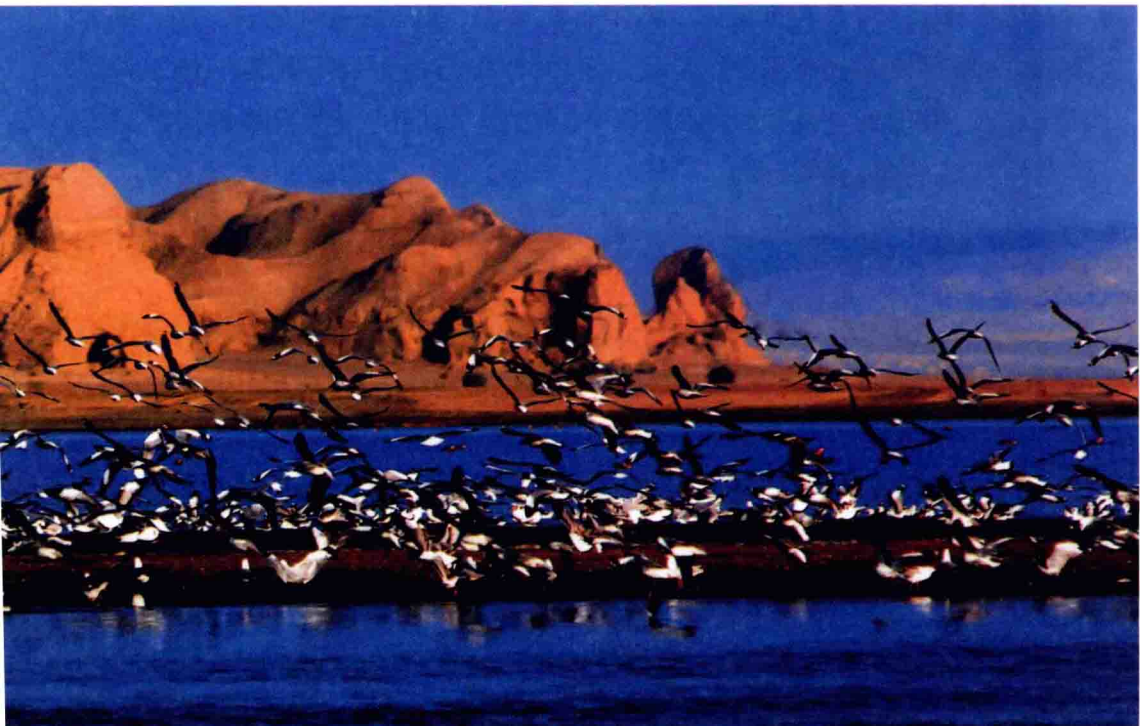
若按《穆天子传》的说法,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边会面唱和之后,“天子遂驱升于龠山,乃纪其迹于龠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我请教卓玛措,她认为,闷摩黎山当系吐蕃语,意思是“国王驻足的地方。”而龠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也弄不明白。

我想,既然此山意为“白帽子山”,且系“国王驻足的地方”,那么,从史实与传说互考来看,至少不能说它是空穴来风吧。

我决意寻一路径登山细看,卓玛措也乐意陪同。此时遇到一位牧羊长者,鬓发全白,他劝阻我们说,夏季里山上常会打雷下冰雹,要小心慢上,若遇冰雹暴雨,就躲到山洞里去,山洞不少,就看你们的胆量了。

好在天公作美,艳阳碧空如洗。我们且行且看,腿脚虽累心绪却佳。







爬到半山。果然见花岗岩石迭压交错处,时有天然洞窟错落其间。我们选择洞口较大的石窟——一看去,并信口开河地为洞穴起名,有磷峋兼崎岖者,便叫它“妖魔宫”;有神秘莫测其深难度者,就叫它“迷魂阙”;有洞口互串秀石飞檐者,我们就叫它“藏娇阁”;有壁岩渗水作响者,我们就叫它“仙人窟”。最让人神思联翩的是一处宽大敞亮的洞中,其壁规正光滑,明显有磨损旧痕,环身看去,豁豁然浑似殿宇。再细察四处角落,依稀可见兽骨、残灰、石渣等——这不明摆着是人类居住过的遗迹吗?是近世人迹?还是古代人迹?我们难以确辨,但却产生了更多的联想。此前我曾翻阅过一些资料,50年代地质队员们在此山勘察煤矿时,确曾细查过许多洞窟,他们并向有关文物部门建言,认为研究那些石洞,或许可以揭开青海古史的秘密。

如果如古籍中所言,西王母“穴处”,那么,这些石洞中的敞亮宽正者,当是理想的居所。我们推测,在西王母所辖之地,类似的石窟肯定还有不少,以一位部落女王之尊,她的石室居所当有多处,这是合情也合理的。

经一番努力,几回攀援,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巅。白晃晃乱石间,猛扎扎扑出几只鹰鹫,尖喙如钩,鼓翅腾跃,盘旋了几圈后便飞远了。我们诧异中迂回至最高处,却见一浑圆光洁之石柱,态若武士,顶天而立。其径一人抱之不及,两人合抱叠臂。试用石块敲击,铿铿锵锵有金属之声。细细看去,那石柱圆规有度,恐非天然,但又似乎与山顶巨石浑为一体。拉开距离看,山顶处一柱顶天,四围里空冥浩荡不见底,一种肃穆神圣之感倏然间就溢满我们的灵魂。

再次用石丸抛砸那石柱,弹响处余韵缭绕,似天籁和鸣,真让人惊诧不已。

查晋人张华著《昆仑铜柱铭》,其中云:“昆仑铜柱,其大如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

其文绮丽夸张,但一对照此石柱,当作何解释?

下得山来,请教了几位藏族长者,说到山顶石柱之事,他们称其为“镇山石柱”。细问此石柱系天然而成,或人工而作,系何人何时缘何而立,俱不能对。只说那是古物,神圣且高贵,偶有上山瞻仰者,却不敢轻易





敲击,疑为神迹也。我们说是已敲击过了,其声韵若铜鸣,他们便惊异莫名,随即念一句六字真言“俺嘛呢叭咪哄……”

卓玛措笑着对我说:“这些石窟石柱再配上六字真言,其神秘性就成了不解之谜了。”

翌日晨,我们又乘兴去大山北口牙壑。因为听说那里藏有大量玉石矿苗,依山势时有矿苗露出,我们半信半疑。

到了埡豁一隅,该处已有专人保护了,经说明身份,出示证件,特许我们观察一回。果然看到了或连片或间隔散聚的玉石矿苗,那些表露的部分或洁白无瑕,或深红似丹,或碧翠似染,或黄如秋菊。奇的却是那些五颜六色集于一体的矿苗,斑斓瑰丽、秀雅娱人,让人疑心那是粉朵奇花晶莹堆聚而成。联想到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西王母向尧、舜、穆王等中原帝王献玉环玉琨的记载,端地就相信此山此地非西王母国莫属了。

乘车返回时,我们特别向西北方向绕行,目的是想在更开阔的视野里眺望这里的大环境。举目看去,两条河流在远处交相摆动,一条是哈尔盖河,静穆如白练舞地,向南蜿蜒注入青海湖。另一条是黑水,恰似游龙,急湍湍奔向北面。两河一湖,滋润出一片广袤肥腴草原,此处正是环湖地区的北部胸腹。细一想,山上有林有洞有宝,草原有牛羊骏马珍禽异兽,宜牧宜猎天赐宝地。再扩大视野去看,由此地北循黑水河谷,可度祁连以出河西走廊,南有青海湖,作后院屏障,东向亥日登山口,直抵湟水两岸,西越直亥滩草原,可拥怀柴达木盆地。宜守宜攻宜开拓,左右逢源且自如,无怪乎当年的西王母部落会立国于此地,其战略眼光当属一流。只是时代太为久远,其地面遗存很难觅其踪了。又加之她们诚守“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传统,其埋藏于地下的遗存怕也是微乎其微了——这也是为什么西王母之邦虽略见于古籍却见疑于后人的重要原因吧。

返回途中过一山梁弯道时,山梁平坦处恰有一艳装藏女,着藏袍,黑底花边,缀满金银玉器饰物,颈上亦挂珠串,蓬发迎风,飘甩俏丽。许是她正恋着心上人,一声声正唱得旁若无人。那嗓音高亢且婉转,恰似风过林木,又像水激深潭。卓玛措说那是在唱“拉伊”即藏族民歌。这使我想起《山海经》里说到西王母“蓬发,戴胜,善嘯。”看来,以古鉴今,以今证古,那“善嘯”的最好解释便是善于歌唱了。

## 复活远古

西王母时代的裸浴群舞、巫术庆典、围猎放生，皆师从自然

昆仑文化特别是西王母研究如此具有魅力，以至于在我接触了部分这方面的资料以后，竟被她深深地迷住了。我仿佛找到了一个远古知音，急切地想与她接近、对话和沟通。我甚至相信，这种现代与远古的对话，将几乎覆盖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涉及的全部或大部分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分明地看到，每当我们现代人在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自鸣得意的时候，那一位远古的女王就会在历史长河的彼岸窃窃发笑，那笑容神秘且含蓄，像一则难以解读的古代寓言。

我很想读懂这则寓言，于是就泡进古籍堆里，像一个真正的书虫那样去啃食那些发黄的古卷，去在浩如烟海的史书或其他杂书中去搜寻西王母的影子。我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情，但因为迷恋其中，却并没有枯燥的感觉。相反地，我的兴趣和心智被全面激活了。想象的野马纵横狂奔，几乎要把我驮向那种心驰万仞、魂游八极的自由之境了。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的古籍中对西王母的状况写纷繁不定，甚至大相径庭。而许多现代学者对西王母的研究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对于古今的诸多资料，不走进它不行，但真的走进了，却又像真的陷进了诸葛亮的八卦阵，千回百转，迷途纵横，使人难以走出。谁要是想体味一下如堕五里雾中的感觉吧，最佳的选择便是这一个西王母研究了。我常常想，古代和现代的许多学者，大约都是一些善于设计谜语的高手，他们对于一个事物设计了许多谜壳，引得后来人百思千解而得不到谜底。于是，这个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谜语谜底便成了永恒的大难题大学问，而西王母的研究无疑是这种大学问中的经典之一。

有时候我想，西王母话题被搅成了难以理清头绪的“混沌”状，而“混





沌”这个词的最初含义,不正是人们对天地初开之前宇宙的一种认识吗?而“混沌”,大约也是人们对初始的“昆仑”的认识。对于这么一个混沌的世界,混沌的历史,见仁见智原是正常的事情,姑且把一切相左的看法或观点都当作一种学问吧,无须分什么谁正谁误。就像舞台上的戏剧人物,本没有什么正角反角之分,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尽情地表演着自己,他们都自以为是“神圣”的,只有傻乎乎的在台下观看者才硬把他们分为正角或反角。其实这种分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迎合一种浅层意义上的价值表述和归类,与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悖。

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史上的诸多争论,从古迄今,哲学大师们可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流派的追随者或继承者都自认为是真理的代表,而把对方贬为谬误的渊藪。于是乎,唇枪舌剑,你讨我伐,并彼此都声明惟自己一方拥有全部真理。但局外人却看得明白,他们各自的哲学理论也昭示得明白,谁也没有完全对,谁也没有完全错,对的部分仍有错的因素,错的部分也不乏对的潜质,也就是说,其对错的基本点都和一定的时空相联系。这情形真正是应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叫“瞎子摸象”,当瞎子摸到大象的鼻子时他认定大象就是一条大绳,当摸到腿时他又认定大象是一根柱子,再摸到侧背时他又断定大象应该是一堵墙。我们能说瞎子的每一次判断没有合理的成份吗?但我们能说瞎子的每一次判断都是对的吗?看来,这则寓言所表现的真理判断观似乎比一切哲学流派都更具包容性。

那么,西王母话题终究是一个哲学命题呢,还是一则寓言表述?而区区如我辈,能否有能力在这个千古谜语难题前找到立足点呢?我想试试看。

好在,我毕竟有了浪迹青海 30 年的生活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我的心魂与这块高地上每一处古代遗迹都有了感应,并且,这种感应随着阅历的加深和知识的积累而上升为深邃的理性。我明白,几千年前的那个西王母国已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细胞中了。而这一点,恰好是许多只从古纸堆中去搜寻西王母时代的学者们所难以做到的。

古纸堆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述虽然驳杂纷繁,但有一个基本的线索却是清晰的,那就是:西王母属西荒之国,居流沙之濒,咸池之畔,其地有盐





池、西海、石室,且其国名与人名原为一体,并代代相传。我们知道,周穆王时曾两次西征或西巡,那周朝以前的夏商两代呢,难道能说广大的昆仑祁连地区无人居住?环湖与河湟地区的大量彩陶,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三千到五千年期间,该地域的西羌文明已发育到相当成熟的程度。遗憾的是,以中原王朝为正宗的中国古代史书只是点滴地说到了西王母,且闪烁其辞,时有怪异费解处,这也就造成了历史与神话杂糅的特殊景观。可以肯定的是,古今涉及西王母的研究者很少有人真正走近这片土地,这样,从文献到文献,一种望文生义的思维怪圈便束缚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那种雾里看花的印象永远都只能是朦胧复朦胧,光怪且无定的。

终于,我确信了西王母国的真实存在。

终于,我企图用文字复活那一段历史。

我设想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去描述,并确定了书名,列出了章回标题,连详尽的人物设计与情节推进也构思好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满脑子都奔涌着那部小说虚构的故事。

说是虚构,其实也并非凭空编造——应该说,一切的情节都可能是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因为我相信,所谓历史,其实至少有三层含义:一个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一个是被写进史书中的历史;一个是被后人争论不休的历史。这三个历史不会完全重叠,但这三个历史的相互印证却能构成一个立体的真实。

我所设计的历史小说权可看作我心目中的那一段历史,倘有人表示异议或非议,我都欣然以对,并怀着敬意听取他的批评。

这部构思中的历史小说的名称为《西王母和她的部落王国》,副题为《女神时代》。

其文分为九章,一是考虑九作为中国人观念中的最大单数具有无限的意味。二是联想到屈原曾用《九章》的标题作过一首极著名的诗,其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值得借用。三是因为我掌握的素材和想象力也就这么多了。我的设想是西王母国的女王虽是代代相袭,但最著名的却无疑是创国时的第一代(大约与黄帝同时期)和瑶池边幸会穆天子的那一位。那么,为了小说情节相对集中的需要,本书的故事主人公就只能是后者了。况且,先秦时代就已流传的《穆天子传》实在是最佳的参照蓝本了。



我对主人公的定位原则是：还神于人。

我索性由自己对该书的内容提要作了概括，现不妨抄录于此，以明确地表述我写该书的主旨企图。内容提要如下：

西方美神维纳斯只是一个断臂雕塑。而东方美神西王母的最初原型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她立国于古昆仑之丘，西海湖畔，其部落女王的尊号也就是她的部落国家的名字。由于时代的久远和传说的纷纭，她真善美慧的形象愈到后世便愈包裹在奇诡的神话之中，让人只可仰视而无缘亲睹。本书基于大量的资料研究以及对西王母国古遗迹的实地考察，近距离地状写了西王母和她的时代，还神于人，雅俗共赏。期冀东方美神以她永恒的魅力，匡正迷乱矫情的世风，回归率真纯净的人性。

我想，这个提要已准确地传达了我写该书时的主观心绪。是否会让读者有兴趣，我就难以预料了。

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为片断的历史陈迹补充血





肉,使僵硬的支离破碎的历史获得某种程度的复活,所以,好的历史小说传递给读者的,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画面组接史或心理流程史。

为了简洁起见,我不妨把那部《西王母和她的部落王国》共九章的主要内容情节复述如下,但愿这种复述也能变成我对西王母研究的有机组成方式。

### 第一章《与兽共舞》

环湖大草原上,夏格日山下。身裹兽皮衣,头戴各种动物面具的人群在纵情扭动舞蹈。人群以精悍的男女青年为主体,有比较明显的编队,各编队间有一定的距离——那是区分各部落的形式。根据部落的封号不同,其编队所戴面具分别为熊、鹰、牛、羊、狐、鸟等。群舞开始后,遍地踢踏声,远山却穆然。俯瞰草原上百兽齐舞,百鸟飞动,引得四围密林间的鸟兽也偷窥伫望——那些真正的鸟兽当然不明白,一场大规模的围猎之网已悄然布定。

一声号令,全场肃然。这时,观礼台上出现了头戴虎首面具,身披有豹尾服饰的西王母。她缓步若舞,口念咒语。转步流动间,那姿态的柔美起伏让全场惊服不已——绝大多数的部落臣民当然不清楚,新的女王还未正式登位但已遵从卧病在石室的老女王的安排,以特具的女王服饰来主持这一届的夏季围猎仪式了。

仪式毕,围猎正式启动。山林间,山垭口,部落男女怀着对女王青春永驻的敬意,各执其责分路缩小包围圈。那些被围困的羚羊、羚牛、熊、狼、野猪、野鹿、野驴、野马等动物,纷纷落网就擒。部落臣民放生了那些怀孕或未长大的母子,然后再把一个个猎物带回部落——在当时人与兽的自然制衡机制中,这种一年一度的围猎恰好维持了生态的平衡,然而,这一切却是听命于一种原始宗教的神秘安排。接下来,便是部落臣民们正常放牧生活的正常运转。由于节制了野生动物的蚕食牧场并遏制了食肉动物的偷袭,美丽富庶的环湖大草原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 第二章《智退犬戎》

中原王朝周天子要西征西巡的消息传到西陲,西王母国上下欣然。而居于西王母国东南方向比邻的犬戎国却惊恐不安——这个以犬为崇





拜图腾的国家劫掠成性,常常偷袭抢夺周王朝边地居民为能事。得知周穆王欲联合西王母东西夹击犬戎国,犬戎国国王树敦决计抢在周穆王未发兵越境之前就先灭掉西王母国。正是这种草微黄时节,树敦的数千精兵已偷袭到西王母国西海西岸的布哈河下游——犬戎侵略者见此地竟无人设防,便兴高采烈地在布哈河边扎营造饭,准备吃饱睡足,第二天早晨直扑西王母主寨。然而翌日晨时,犬戎军队中十有七八腹泻不止。连举犬旗的首卒也直不起腰。方此时军心浮动,远方雾濛处却闻虎啸豹奔。树敦不敢久留,遂撤军东还。

原来是西王母派人在布哈河上游将数百捆大黄草浆注入河中,大黄促泻,致树敦不战自败。这一次智退犬戎,让西王母之邦神威远播。

### 第三章《部落盛典》

新女王正式登位。此前,已悄然离去的老女王按羌族传统,火化后燔其灰于江河山野;此仪式真情只有新女王和几位亲近臣僚知晓。

新女王着虎首豹尾服饰,在熊、豺、狐、鹰、鹊等职衔大臣簇拥下登坛亮相。先祭天地,后再祭虎豹图腾,坛上坛下万民皆肃然。

新女王喝过一碗乳浆之后,翩然起舞,舞到恰好处,倏然卸去面具服饰,露出粉面明眸秀发真容,全场欢呼如雷,女王复又虎首豹尾,全场又穆然肃然。

庆典节目轮番演出:马舞、豹舞、鸟舞、狐舞,各部落各显绝技。

女王赐各部落首领盛宴。

### 第四章:《裸浴狂欢》

这是草长莺飞、牛羊肥壮、野果飘香的日子。

清澈见底的河湾处,流溪旁,青年男女分别集体裸浴,女青年们居上游处,男青年们居下游处,相距百步之远。互相边洗边唱,四野里歌声此起彼伏,多为情歌。这是羌族最为重要的节日,为已长大成人的男女提供寻找意中人的机会。河曲高地祭坛上,有表示爱神保佑的红飘带迎风拂动。时有在对歌中相悦携手的恋人来飘带下婚誓。

西王母骑马巡游。男女青年向女王致敬。

### 第五章:受理流民

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灾民遍地,流离失所。中原周王朝派使者来西



王母之邦。西王母慷慨献上牛羊数万头,并各种名贵中药材,派人随中原使者送往周都镐京。

不少流徙到西王母之邦的中原臣民,均受到西王母的妥善安置。其中偶有在典礼仪式上见到虎首豹尾服饰的西王母者,返回中原后便极力渲染西王母半人半神半兽的特异形象。

### 第六章:彩陶时代

由于和平立国,长期安定,加之天公作美,牧草肥壮,西王母之邦人口激增,疆域向东延展,并逐步拓展农耕。为了定居和农业人口的生活需要,西王母在各地居民自发造窖制陶的基础上,特设五处规模更大的官窖,并以制造更为精美的彩绘陶器而扬威天下。

西王母手捧刚刚烧制完成的五人组舞纹彩陶,连连赞叹。并派使者专程去中原王朝献彩陶,以换取南方丝绸织物。

### 第七章:碧池幸会

周穆王西征破犬戎国后,满怀得意驾临西王母之邦。在青海湖边二人相会,风雅唱和,两情相悦。出于国格礼仪,双方均守持有度。



一随行文人记述了穆王与西王母的会面情形——无意间这些简洁笔录成就了《穆天子传》的雏形。

### 第八章：东临昭宫

镐京城城门楼巍峨高耸，一派盛朝气象。只是那一颗悬在半空木笼的叛逆徐偃王的血肉模糊的头颅，颇显出一种不和谐的气氛。

昭宫里，穆王面带倦容，浮躁不安，他还未能从刚刚平定淮南之乱的惊恐中恢复过来。

忽近臣奏报：西王母将来朝，穆王一时大喜过望，命令臣下备宴，并命令撤下城楼上悬空的徐偃王头颅。

西王母容颜如初，丰姿威仪，与周天子相会于昭宫。周王室群臣惊异于西王母的天姿掩霁，不禁窃窃议论。

穆天子与西王母对饮“西凤酒”，畅叙各自的国事心事。笙歌曼舞中，大宴一直开到天亮。

### 第九章：女神佑国

西王母返回故邦，带回大量珍宝、器皿、粮食、丝织物。她把这些周朝赠物赏赐给各部落臣民，恩泽被处，万众感戴。

西王母乘兴巡游西海、盐池、神山。所到之处，臣民皆举家膜拜。更有献乳浆牛羊者，不绝于路——西王母的神格已渐渐形成。

有使者从中原带回竹简书名为《山海经》，西王母在石室中默读，当读到“有人戴胜，蓬发善啸，虎首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时不禁哑然窃笑。

西王母命人在石室前建一祠，以纪念两千多年前的开国女王。

民间的陶艺、砖艺上，西王母成为月神，被雕刻成夸张而柔曼的形象。

万民皆附西王母。





## 正史歪读

正史所谓东夷西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西王母备受冷落

歪读正史,既可知微,亦可旁证昆仑文化的要义。

一部二十五史,可谓典籍浩繁,洋洋大观,表面上轰轰烈烈,改朝换代,你方唱罢他登场,好不热闹,读起来却使人如走古墓道一样的郁闷和窒息。且不说它的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王者讳,单就从它的整个构架脉络来看,它实实在在只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族史,附加一袭忠孝节义的诠释史,还有奸邪佞臣的弄权史。此外,还有什么呢?

从夏商周一直到元明清,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到底留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以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启示呢?

当然,我们也曾以非常革命的现代历史观大声讴歌过陈胜、吴广、黄巢以及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等历次农民起义,以为那就是历史本可以变得辉煌的力量。仔细地想想看,他们真正的成功了又会怎样?无非是用一顶新王冠代替旧王冠,用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然后,便是以制造顺民为本的儒家文化的变本加厉的运用,便是封建时代的忠臣孝子的重新演义,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极尽一种东方式的怪圈表演,如此而已!难怪鲁迅会以一种极度的激愤写道:我翻历史一查,每一篇都写着仁义道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两个字:“吃人”!

说一部中国的古代文明史和服务于他的正统儒家文化是吃人的,虽然不无偏激,但却并不为过。一套二十五史写得明明白白。历史就是历史,本也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倒是对历史的误读、误解,或是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办法对封建幽灵的借尸还魂。

当一部又一部所谓的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充斥我们的现代荧屏的时候,当一批又一批帝王将相、忠臣孝子用一种最直观逼真的影像变



为我们的文化参照物的时候,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乾隆帝等等历史人物以一种接踵而来的频率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现代人的神经的时候,我实在怀疑这种表面上的复活“历史”究竟有什么文化意义?抑或有什么历史文化的意义?更不说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历史观将会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误读。

史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么完整的编年表,也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无疑这些也是必要和重要的。但史书最重要的价值肯定应在于它引导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走向、价值趋向和历史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套二十五史,独有司马迁的《史记》做得最好,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精神可以说做到了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在一部以编年表,帝王世系为经,各种历史人物为纬的煌煌大著《史记》里,司马迁既写了三皇五帝、秦汉帝王,也写了陈胜吴广、刺客商贾,连神医扁鹊也不放过。他把组成历史的各种力量较为客观地记述下来,造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合力”的演进观,读来每每让人击节赞叹,不胜服膺。

司马迁的幸运不仅在于他的饱览史书,遍访山河,更在于他的命运苦难,大劫不死!一个惨遭不幸的痛苦灵魂注定是要抗争的,这种不屈的灵魂才能造就天才的灵感和智慧的目光,他能洞穿一切历史的幽微之处,在繁复错杂的历史陈迹里捕捉到最能启人心智的场面,并从这种场面中抓住真理的闪光。更为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时代,孔子的儒家学说并







未形成后来的思想大一统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还都有它们存在的一席之地。而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大动荡时代烟云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代史家的立言氛围无疑是运作在了最佳状态。于是饱蘸激情,铺排历史,渗透智慧,观照哲理,太史公神思纵横,铁笔镂定,一部煌煌信史便点燃着他的生命之火终于大功告成,留给了中华民族一份足可向整个世界夸耀的珍贵遗产。

太史公最顶尖的贡献倒不在于他给我们留下了秦灭六国的文武韬略、波澜壮阔的楚汉风云,而在于他的独具绝响的刺客列传。一幕荆轲刺秦王恰恰像是沉沉历史暗夜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重压之下的人性反抗的理性之光。在那样一种秦军所向披靡、六国分崩离析的非常时代,荆轲竟以弥天大勇,单刀相向,直逼秦王嬴政——这位胜利者同时也是强权者的咽喉,其勇毅果敢、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壮举豪气,无疑是震惊天地、激荡人心的卓绝瞬间。是的,面对强权暴政、面对邪恶的黑暗势力、面对屈辱的重压,处在弱者地位的一方能毫无惧色而拼死一搏,就像闪电一样使天地颤栗——这也许就是伟大的司马迁所要告诉我们这些后来人的雷鸣般的警示。

一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是以血腥的屠杀和强权的重压为前提的,而立于这种代代不息的争斗游戏前台的总是那些自称为天子的历代君王,他们威威然坐于朝堂之上,既要接受当朝百官的跪拜,更要接受举国上下万众百姓的跪拜——这种跪拜既是肉体的臣服亦是精神的臣服。

中国古代史中最沉重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那些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也大都变成了真正的古董。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苛求古人应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但我们有理由提醒我们的现代人,必须运用一种全新的现代历史观念去看待历史、把握历史、怀疑历史和诠释历史。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昆仑文化的中断。

无疑,先秦时代辉煌的昆仑文化突然衰落,是由于汉代以来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造成的。儒家文化中的上下尊卑忠孝节义思想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一步一步推向了极端,其历史的惰性阻力使任何真正的进步力





量都无法突破其保守的硬壳，封建的统治秩序虽然被一次次的打破，到头来仍只是改朝换代的回归与重复。相反地，表现了强烈的改天换地思想，集创世、创造、开拓精神为一体的昆仑文化色彩逐渐地在历史的沉重底色中隐去了，像盘古那样的造世英雄再也无法登上现实的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一代代跪拜在窃国帝王脚下的愚忠将相。历史的惰力循环往复两千余年，以致于民主自由连同资本主义的机制难以在中国良性滋生，最终导致了中华古国的末世沉沦，导致了西方列强的虎狼入侵。一部正史，演绎的是儒家文化的不可救药的衰朽没落。

好在，那沉重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好在，昆仑文化的基因仍顽强地存在于民族精神的延续中，而对于它的重新认识与开发，无疑会对中华民族的人文重构具有特别的意义。

歪读正史，又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便是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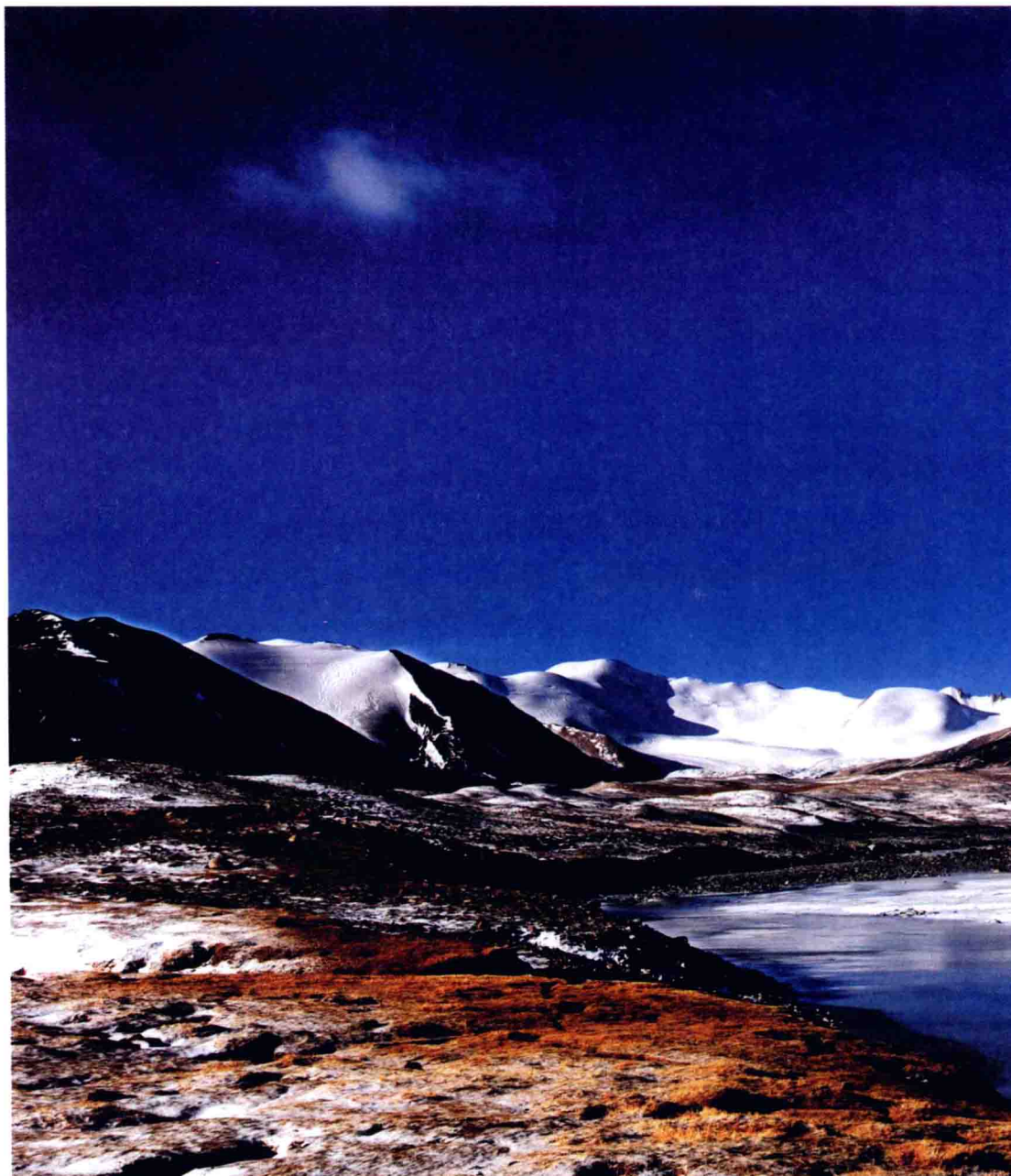
在中国的历史名人中，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像孔子那样，一会儿被捧之于天，一会儿又被贬之于地。捧他的人说他是圣人、至圣先师，是仁者智者，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贬他的人说他是伪君子、逆潮流而动者，是奴隶制时代的代言人，所谓“历代统治阶级的敲门砖”，等等。真可谓是标签满天飞，帽子满天飞，褒贬对立，毁誉两极，究竟谁是谁非，却似乎愈说愈糊涂，终于搅成了一锅粥。

其实，孔子究竟怎样，本有他的一部《论语》作证。只是时代太为久远，加之历代各种不同用意者的层层注释和涂抹，其身上的油彩便层层堆积，愈积愈厚，以至于他的本来面目反不甚清晰了。说白了，便是历代的或尊孔或批孔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孔子及其《论语》了。如果孔子真有灵魂存在，他是会跳起来辩驳或澄清的，然而他是彻底做不到了，于是，便只好任由后人的捧杀或骂杀了，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室衰微没落，诸侯国互相征伐，春秋五霸各领风骚，周天子却只能龟缩一隅。残酷的战争游戏频繁上演，被绑在战车上为王驱使的只能是千千万万的奴隶。烽烟四起、生灵涂炭、礼崩乐坏，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争夺就像一场无法无天的混战，谁也无法裁判更无法推举出一个真正的霸主统一乱局，便只有任由战争的法则此消彼长、



优胜劣汰。那时候,善于投机喜好功名的聪明人纷纷投向各路掌权者,以出谋献策或建功立业为目标。而孔子也想这样做,他的周游列国也充满着寻求明主以济世的目的,然而他所呈上的大计不是攻城夺地之策,更不是奖励耕战之略,而是最不符合时宜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让大家放弃战争,放弃膨胀各自的势力,所谓归仁以周,重新恢复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原来秩序。孔子忘记了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利使人疯狂这样一种现实,所以他的复礼的主张便无人采纳,终其一生,他看到周围的现状仍然





是战乱的无休无止,于是便只好愤然叹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然而孔子毕竟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无法实现并没有击垮他的意志,他静思默想,重新审视自己,终于在纷繁无定的世事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最为明智的定位,那就是:聚徒讲学,潜心教育,传授文化。历史证明,他的这一步是走对了,一部语录体的《论语》终于使他名垂千古了。

如果不带偏见的细细品读,我们便会承认,这一部中国历史上被无数次印刷发行过的书籍实实在在地表明了孔子其实只是一位智者和哲







人,而这部书则只是这位哲人对社会人生的忧思录、悲悯录,是一部心灵史或理想集——它反映了一代哲人的全部思考和忧世情怀。当年的称霸者为王侯者转眼间成了粪土草泥,而孔子的一部《论语》却像浩浩江河,从历史的昨天一直流到今天,大约只要人类存在,它就还要继续地流传下去——这就是孔子的价值,所谓哲人不死,文化永存!

孔子在生前四处碰壁,倒霉透顶,死后却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献上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会祭起尊孔读经这一面大旗,其目的无非是要造成君臣父子那样一套稳固的封建秩序。值得深思的是,封建社会愈到后期,尊孔读经便愈是变本加厉,宋朝时更到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极端程度。而累朝累代对《论语》的注释也渗透了各自时代的统治需要。如此积累下去,《论语》的原旨意就大大地变形扭曲,终于失却本色,变成了可以被任意解读的精神魔方了。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孔子是常常被当作敲门砖的,他是被统治者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孔子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后来的人们所看到的那样。

无疑,孔子最为崇拜的理想社会是周王朝的大一统,他多次说过“吾从周”,并赞颂周朝的礼乐制度为“郁郁乎文哉?”而对周王室衰微之际的诸侯国并立称雄表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在当时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要求孔子具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人的斥责孔子是在维护奴隶制而反对封建制就显得有些牵强了。如果说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专为维护奴隶制的,那何以解释他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者全盘接受了呢?甚至,他的思想还被蒋家王朝大力地推行过。看来,对孔子及其《论语》的评价和认识还是要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为好,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对待,冷静地加以分析、鉴别、合理地扬弃,才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不是一个孔子的崇拜者,但我也不是一个孔子的诅咒者。应该说,我对孔子的最初认识是在“批林批孔”的年代,那时候,糊里糊涂地半懂不懂地或是根本就一窍不通地咒骂孔子成了一种时髦。更有意思的是,以工农兵大学生名义编写出版的一本《论语批注》从头到尾,极尽了曲解咒骂的“文革”之风。多少年后,当我再翻出这本书再读时,不禁时有哑然



失笑的感觉。对照孔子的《论语》原文与批注的批判短文,你会感到一种滑稽透顶的对峙格局,也就是一个默默无言的远古哲人与几个泼妇骂街者的滑稽对峙。

也就是从这一本供批判用的书上,我总算较为完整地细读了几篇《论语》的原文,说实话,对他的篇幅不小的伦理说教我提不起兴趣,那显然都是一些非常过时的东西,与现代社会毫不沾边。而对于他的另外一些关于人生人性人格的充满哲理的思考,我却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佩服。我相信,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只要他是潜心学问与理性,不望文生义去曲解误读,而是采取如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抽象继承法”,那是一定会与我有同感的。

当孔子站在百草丰茂的河边,看着水流东去永不复返的情境时,他一定是想到了古往今来的万千故事,想到宇宙人生的诸多玄奥,甚至,他一定会想到人生的短暂,感慨生命的飘渺和无奈,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愁绪。于是,他默思良久,凝神若许,骤然间冒出了一句格言道:“逝者如斯夫!”

是的,逝者如斯夫——就5个字,却说尽了古往今来万千哲人的共同感受,足封千代之口。难怪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词中会全文引用,借以壮其辞色。能说一代伟人毛泽东能轻易地引用别的诗人诗入词么?毛词的引用至少表现了某种相同的感受和认同,那是不言而喻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妙极了!

孔子的这一句格言给人联想的空间更大、意境更深邃。你能说它仅仅是在传达一种回归自然的情绪吗?不是的,至少不仅仅是。孔子是一位入世者,他的思想充满了对人生社会的全面关注,他曾痛斥过社会的混乱与不洁,他曾痛感人心的自私不古,他推崇王道指斥霸道,然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一切。他毕竟只是一位哲人而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所以,他在寻求治世良方时便常有书生意气,而在寻求人性人格的完善高尚方面却充满着灵性与智慧。他的这8个字的表述既是自勉自励,也是诲人示人。对于任何一个处在群体性和谐与个体性自由的矛盾交合点的自由灵魂来说,这种警示与自警真是太美妙了,以至于中国历代文人骚客或书法家们,甚至包括一些大政治家大军





事家们都乐于在自己的居室或办公室里挂上这8个字的条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是8个字！

做到这8个字，那实在是太难了，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8个字或至少多数人做到，那这个世界也真是会变得太好了！然而，这种境界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但正因为它只是一种高理想、高境界，才显示出了它的珍贵。看看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凶残与贪婪，看看周围人性恶的搏杀与争夺，我们不能不悲愤人类社会的如此不洁不义！但是，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人毕竟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性深处的动物性基因恐怕永远难以剔除干净，私欲和争夺的本性将伴随人的终生，大约还会代代相传。但是，用这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之光观照一下、警示一下、审视一下、制约一下，不是一种很好的理性慰藉吗？观照一下总比不观照好，精神文明里加上这一条，人性丑恶的一面总会有所抑制吧！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无庸赘述，它说尽了人生立身的要旨要义，说尽了人与动物的理性差异。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句比较特别,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好人用之则益世,恶人用之则害世。利弊参半。

“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一句就更有意思,有一种调皮的味道,且大大地打了圣人的折扣。特别是前半句,反映了孔子对女性的歧视,政治性大于它的思辩性。而后半句却极有趣,表现了孔子对女性性格心理的微妙把握,显得高明机智狡黠,还有一丝调侃的意味。据此,可以证明孔子是和一些美妙动人、有魅力的女性打过交道的——孔子自己证明他并非不好女色。

站在今天的时代制高点上来审视孔子,我们便会发现,这位文化先师的真正局限恰恰在于他的文化视野的局限,大概由于我们和他的时空距离隔离太远吧,这一点便看得格外清楚。

首先,孔子的局限在于他的民族观念的局限。他的学说是典型的汉民族为正宗的学说,这就把当时处于西羌之地的昆仑文化排除在他的文化研究之外,结果导致了由他删定的典籍中绝灭了昆仑神话的影子。

第二,孔子的局限强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轻视甚至歧视上。这一点直接导致了他对西王母的听而不闻和闻而不究。一个在他的时代从遥远的昆仑山向中原大地辐射着真善美慧光彩的人物,竟没能在他的谈吐话语中留下一丝信息——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孤陋寡闻,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世俗偏见更为彻底。

第三,孔子的局限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生产劳动的鄙视上。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演进力量将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积累,而鄙视劳动必然导致鄙视劳动人民,这样,他的重在建构伦理秩序的学说便成了沙基上的楼阁,其倾颓其坍塌迟早会发生便成了必然。

歪读正史,正史歪读——这没有什么不好,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歪读状态中,我们才会发现点什么或觉悟点什么。

谁教我们生为现代人呢?



## 王母遗韵

历史,既是时空存在,更是精神遗韵

西王母和她的部落王国,似乎早已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逝了。在遥远的上古废墟的那一边,曾经发生过的诸多美丽故事,在极尽其花丛般的艳灼芬芳之后,凋落的季风便催促她们匆匆离去。但是,那些奇绝的花魂却留下了,留在了华夏历史的方块字里,留在中国的山川大地上,留在民族心理的软盘上,留在永远不灭的昆仑文化中。所以,作为华夏子孙的后来人,当我们为拥有这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自吟的时候,我们可以既向昨天同时也向未来宣告:历史,既是时空的存在;历史,更是精神的流韵。

多少个世纪以来,西王母的故事就在我们祖辈们的口碑中流传着。西王母的精魂清丽而澄澈,像十五的圆月朗照人间。每当风雨如磐,每当雷电交加,一切难熬的历史岁月里,善良的人们总会仰望浩茫的夜空,希冀着那一轮明月对心灵的慰藉。苦难中的呼唤,失落时的依恋,残缺时的向往,构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向善向真向美向崇高的灵魂走向。而西王母,正是在这一代又一代的神往与虚构中,逐渐地被塑造成为了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成为了臻于极境的东方女神。

西王母情结也就是昆仑神话的情结,西王母情灵是昆仑文化的灵魂和羽翼。她腾空飞翔,穿越宇内,灵动数千年而光彩依旧,熠熠生辉。她既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也是一种至真至纯的理想。她是一种企求,也是一种忠告。她是抗拒黑暗的檄文;她是向往光明的宣言;她是对于恶的诅咒,她是对于善的呼吁;她是对于炎凉世态的质疑;她是对于不合理秩序的挑战。她似乎带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但她却是永恒的、璀璨的人道之光,是告别残缺追求完善的人性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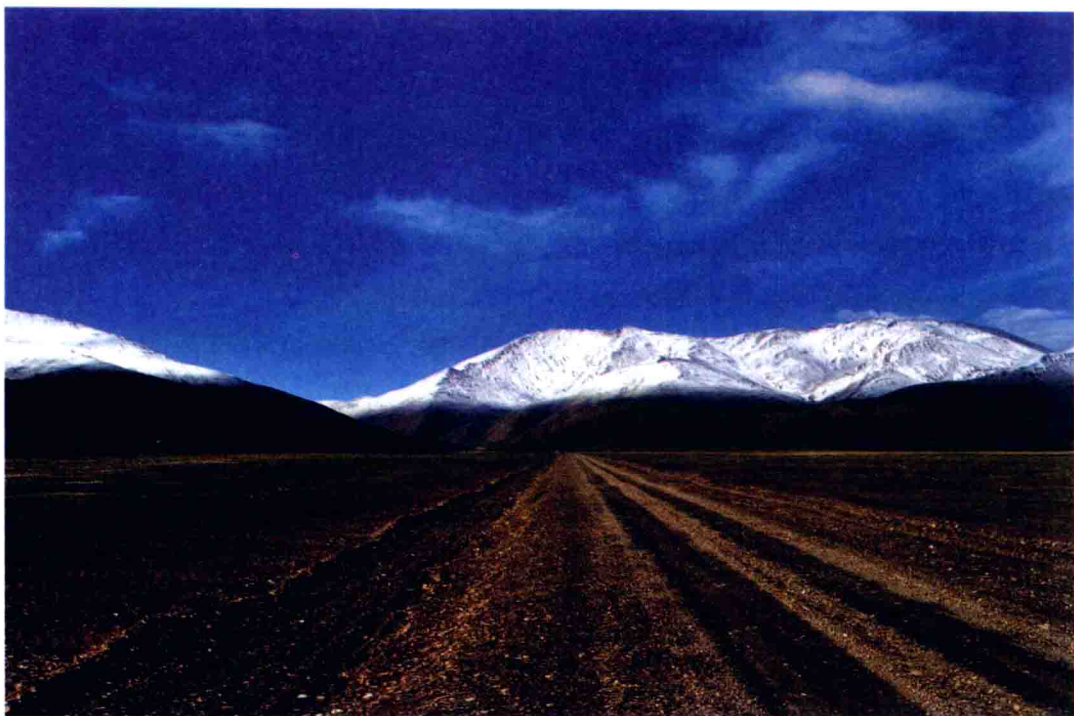
西王母既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西王母也是虚幻的神话载体,正是这种真实与虚构的结合,才构成了大写的人性伦理坐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坐标,我们才可以检索我们的过去,也可能校正我们的未来。而西王母的永恒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就人类数千年所走过的文明历程来看,就人性的完善历程中的挣扎与搏斗来看,西王母和她的时代至少会对我们有如下的启迪:

尊崇女性与善解女性——这是衡量任何时代结构是否合理的天然尺度。我们并不讳言母系氏族社会是一种初级意义上的社会形式,它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伦理认同为基础。但是,当我们检索一下奴隶制时代妇女的为奴为婢,封建时代的妇女的为妃为妾为妓,资本时代的妇女的为娼为花瓶为摆设,这一切所谓的男性霸权造就了多少暴君、地霸财霸和色魔,更有礼教帮凶、女性缠足和人伦遭残。人类的一半在血腥与罪恶的淫威下代代呻吟。与此成正比的是男性世界一部分人的疯狂纵欲与大部分人的性爱残缺。这一切构成了人性演进中的扭曲和反动,标帜着男权社会的罪恶与耻辱。一切背离母性意愿的时代注定是非人的时代,不管它贴着怎样的标签标榜着怎样的主义。因为它戕害或不公正地对待了作为人类母亲的社会另一半,它扭曲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平衡,玷污了人性的尊严与崇高,它理所当然地应受到诅咒与讨伐。我们确信,对女性的尊崇就是对母亲们的尊崇,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尊崇,任何一种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结构形式都在应该诅咒之列。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不仁不义不公不平不人道,究其根源,也大都是这种人性不公正的派生物或伴随物。

和平立国与善待彼此——这是人类社会在数千年的相互交恶困境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伦理概念,也是人类社会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最终将取得其共识的终极真理。就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看,西王母之邦和黄帝、尧帝、舜帝、禹帝等都保持着友好交往的传统。她的时代拒绝杀伐,拒绝邪恶,拒绝不义。她以母性的慈爱与博爱善待自己的部族,也同样善待与她相邻的友邦。她的国民意识中有一种与天地共生的集体共生观念,自然山水共生观念,她把自己一方和别的一方置于平等的对应线上,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的理想社会结构带着与生俱





来的人之初性本善色彩,带着万物与我共处的泛爱色彩,这种泛爱基于一种母性的关怀与包容,基于一种初本意义上的博大无私与相守。也正是由于如此,她的芳名也就是她的部落国家的芳名才能够历几千载而不朽,经沧桑变化而更新。并被以愈来愈理想化的包装而昭播天下,为人敬仰。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弱肉强食游戏里,她和她的部落国家是惟一的和平与友善的坐标。一切的所谓武功韬略,一切的所谓吞并征服,一切的所谓古代与现在的战争游戏,在她的博大包容面前都黯然失色。

歌舞之圣母,艺术之源头——应该说,这是人类和人性向善向美向聪慧的普遍形式。因为人类最初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性基因的削弱或剔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歌舞艺术既是人类进化的天性,亦是人类净化灵魂的方式。西王母善啸善舞,蓬发戴胜,且工诗善吟,她的艺术追求泛化为她的治世理念,一种风雅平和的世风便应运而生。当我们在观赏那一个发掘自她的故土的文物彩陶盆时,那五女联臂而舞的美妙场面,准确地向我们传递了她的时代的人文精神信息。扭摆的肢体,柔曼的态趣,优雅的舞势,纯朴的意境,仿佛把我们带入一种极乐极境,我们明白,人的进化多么需要艺术,而歌舞则是人性摆脱动物性的必由之路。相



伴随的,便是歌唱,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与天籁共鸣的声音。那或悠扬婉转或高亢激越的心灵的律动,不是最好的灵魂与天地谐和交响吗?这种交响既是净化,更是提升,是对美善的靠近和对恶丑的远遁。我们相信,这就是西王母其所以被尊为歌舞圣母的原因。

与自然相谐的生死观念和泛宗教意识——这应该是人类迄今为止必须认识到的最重要的生存发展哲学。我们知道,西王母之邦信守山水崇拜、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她以虎豹为图腾,“鸟兽与处”又“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她们视花草鸟兽为生存之本,视自己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她们向自然界进行合理的索取,同时又把自己最终交付自然界。生存时,爱山爱水爱动物植物,死后将自己烧成灰烬,播撒山野大地,去滋养自然,何等无私无邪。这和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强权者们生时挥霍无度死后又要厚葬浪费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反差。在西王母的时代里,我们看到的是基于认同自然的泛宗教意识,与天地共生共融意识,而在后世,我们看到的都是毫无节制的掠夺自然和剿杀自然。原本完美和谐的地球被人的贪欲攫取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屠夫式思维正在把人类引向害人必害己的毁灭之路。无疑地,这也是对西王母时代生存哲学的反动。

痛定思痛,我们现代人类有必要在诸多困境中寻求西王母时代的启示。

现代文明已进化到电子网络时代,各种技术手段如雨后春笋,杂蔓丛生。电脑先进到可以把全球人在一瞬间操纵在尺屏之上,把握在手机之间。伴随着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是贪欲和邪恶的爆炸。网上黑客会乘虚而入,让病毒扫荡千家万户,制造导弹可以在万余公里之外毁掉你的和平梦乡。而伴随着技术、贸易全球一体化的,是犯罪的全球化和集团化,是同一病毒蔓延肆虐的全球化。更有大气污染,江河海洋污染,地球生态破坏失衡等等。人类在进化的征途上并非步步胜算,今不如昔的例子随处可见。既然我们承认历史既是时间的延展,亦是空间的序列,那我们就有必要随时检索历史、检索现实,趋利避害,审视自身。重新选择是可能的,亡羊补牢还不算太晚——而这也正是那位在遥远的历史源头向我们慈眉而笑的西王圣母对我们的殷殷昭示呢!

## 仰望昆仑

昆仑是神话、历史、地理的三位一体，贯通古今

仰望昆仑，就是仰望中华版图的脊梁；仰望昆仑，就是仰望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昆仑不仅仅是一条山脉的存在，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曾经产生过以昆仑山为地域载体的昆仑神话。

文化学术界公认，昆仑神话体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最初源头。昆仑神话是原始文化，是初民哲学，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观念和愿望。在这里，地理意义上的昆仑，神话意义上的昆仑和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昆仑，三位一体，互为渗透，内蕴博大，贯通古今。

无疑，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它西起新疆南部、连接西藏北部，向东绵延到青海东部，全长 2500 余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

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它的大跨度高海拔，它的雪山冰川，它的险境魔幻，它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于是，一切神话故事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柴达木盆地北沿和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以及湖西北的祁连余脉，无疑是昆仑神话借以发生和衍化的中枢地带，在许多专家的研究材料和传说性的遗迹里，这里都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区域。

在远古土著先民的想象中，昆仑山是作为男神而存在，西海，即青海湖是作为女神而存在，昆仑为阳，西海为阴，阴阳结合，天地归一。于是，对昆仑和西海的顶礼膜拜就成了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原始的宗教意







识。后来,当中原文化逐渐进入青藏高原,原始的男神女神观念便衍化成新的神话传说,昆仑山被说成是轩辕黄帝的九重宫阙,而西海则被说成是西王圣母的聚仙瑶池——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了。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山海经》,是一部被正统儒家文化视为荒诞不经的怪异之书,孔子囿于现实政治伦理的狭隘视野,明确地把“怪、力、乱、神”一类作品排除在文化研究之外。其实,正是在这部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古代奇书中,才保存了上古时代许多美丽的神话和怪异的传闻。同时,它还是一部集地理、历史、民俗、生物、矿山和医药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在《山海经》里,第一次出现了西王母和昆仑山的记载,第一次出现了黄帝战蚩尤、升驾于昆仑之宫的传说;第一次出现了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优美故事。在随后出现的先秦古籍《淮南子》、《穆天子传》里,这种以昆仑为地域载体的神话传说便愈加系统化和具象化了。

在昆仑神话体系里,包括了许许多多广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女娲造人和炼石补天以及黄帝创世、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造父驭车、穆王西游、蟠桃盛会等。其中影响最大,并值得认真研究的当数西王母。西王圣母和轩辕黄帝构成了昆仑神话的轴心。

生活在春秋末期战乱年代的孔子,删定诗书,整理典籍,拟制礼仪,聚众讲学,成就了一代文化大师的千秋伟业。但他所看重的只是《诗经》、《易经》、《春秋》一类的“无邪”之书,而恰恰把《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视为“不雅驯”的异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要竭力烧掉的却是孔子要尽力保存的部分,而《山海经》以及其他地理医药农书之类,却无疑均在保护之列。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强烈的主观色彩,便是他的基本特征。它想象奇特,立意诡谲,真假杂糅,光怪陆离。它排斥逻辑和逻辑求证,崇尚荒诞和荒诞辐射。然而,神话的永恒魅力和永久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和现实。

遗憾的是,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西汉时代的司马迁,从东汉的王



充,再到清朝的纪晓岚,他们都拘泥于儒家的治学风范,从而无法给予神话以应有的学术定位。他们不明白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自有其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向和定位价值。这样,神话作为一种区别于一般文史知识的专门学问,只是到了近代才趋于明确化和规范化了。

事实上,在古希腊的文明中,丰富绚丽的神话传说既造就了许多绘画大师和雕塑大师,也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演变。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昆仑神话体系,无疑影响了中国包括中亚、东亚、东南亚的汉文化圈。这个有别于正统儒家文化的昆仑神话体系,塑造了中国人文化心理中浪漫飘逸放达和幽默风趣的部分。

昆仑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创造神话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互铺垫,互为反衬又相映生辉,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把自然人格化,又用夸张的人格力量征服自然,创造世界的神奇想象力。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某些真实的轨迹。

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中,盘古天王作为中国式的创世神,他一出世就被“混沌不分”的宇宙包围着,于是,他依靠自己的神力坚定顽强地站立起来,毫不妥协,毫不松懈,年复一年,终于使天地分开,乾坤清朗。最后他又抡起大斧,左劈右砍,一直到宇宙廓清日月悬空为止。盘古的传说,表现了远古先民对宇宙形成的主观认识,从人类用思维之剑去探索创世奥秘这个意义来说,它的出现无疑是对蒙昧时代的伟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黄帝创世的故事,在昆仑神话的演变中渐渐地混为一体,融为一统。盘古是想象和虚拟的人物,而轩辕黄帝却是中国人公认的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这种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杂糅的现象,至少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萌芽。

在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和女娲炼石补天这两个互为依存的故事里,透露了远古先民对中华版图西高东低这样一种地貌特征的认识。传说共工和颛顼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为争夺天下展开厮杀,结果共工战败。一怒之下便以头颅猛撞昆仑,硬是把昆仑山撞出一个大大的缺口,造成了黄河万里决昆仑浩浩荡荡直奔东南的场面。于是“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随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寻根溯源,我们便会发现,共工在这里代表了人格化的黄河之水,他



也就是中国后世民间祭祀的水神。而女娲补天的传说,无疑表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同时,对于天地的大胆改造,则无疑显示了古人对抵御自然灾害的期冀与盼望。

而在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黄土依恋与黄河情结。感觉到古代先民对生殖的崇拜以及对繁衍后代的期望——因为那是一个生存与繁衍都十分艰难的时代。同时,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只能是母系氏族时代——因为女娲作为女神造人,是把男性的参予排除在外的。

在羿杀凶兽和羿射九日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位智勇超群、为民除害的英雄。在那样一个荆莽遍地、凶兽为虐、烈日炎炎似火的环境里,羿的大智大勇和敢作敢为无疑表现了人类最初的生存意识和存在欲望,而生存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不但要在地上杀尽吃人的凶兽,还要在天上射落多余的九个太阳,难怪后羿作为创世时代的英雄人物,千百年来竟一代又一代地复活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如果说,昆仑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是和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的创造神话则是和开拓与交往连系在一起。在这里,神力的超常是基于人为的基础,瑰丽的想象是基于创造的动力,神与人的差别渐渐地缩小了。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嫦娥其所以能腾飞上月,却是因为她无意间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她丈夫后羿的仙药。然而,真的升上月亮之后,她却丧失了原有的幸福。所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蓝天夜夜心”。无边的寂寞使她既怀念人间更怀念丈夫,思凡与怀俗,使神从感情上还原为人了。

至于“穆王命造父驭车,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西王母,乐之忘返”的故事,则更加具有了人间的气息。周穆王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西巡昆仑也确有其事。那么,他在昆仑山瑶池边会见的西王母,究竟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呢?

在《山海经》里,西王母是一个人面人形,却又虎头豹尾的神人。而在《穆天子传》里,她却又还原为一位雍容华贵、风雅唱和的一代女王。这种角色与形象的转换,至少表现了西王母不同寻常的神秘和魅力。





西王母是昆仑山的主神,她既能主宰人间祸福,又操有长生不老之药,她“蓬发、戴胜、善啸”——俨然一位女王兼歌后舞后的三栖角色。其实,正是从历史古籍的不同记载中,我们恰恰可以窥见到西王母时代的诸多信息,也可以撩起西王母神秘的面纱。

在昆仑神话中,传说与史实杂糅,虚拟人物与真实人物混淆,是一种非常特殊又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常常让人困惑不解却又欲罢不能。于是,走近西王母,还神于人就成了每一位昆仑文化造访者的强烈心愿。

其实,只要我们从远古原始部落都具有图腾崇拜这一现象出发,就不难剥离笼罩在西王母身上的种种神秘道具。《山海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既然其状如人,为什么又会虎齿豹尾呢?很明显,在一个盛行女巫除害的母系社会里,虎齿豹尾的服饰道具当然最具有威慑的神力。这种虎齿豹尾的图腾崇拜,恰恰反映了西王母时代的文化特征。

我们说西王母的原形是人而不是神,但我们却毫不否认被神话以后的西王母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神话所具有的想象、夸张与变形,才赋予了西王母这位罕见的昆仑女神以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古代中国人,由于受到交通工具、测量仪器和科学视野的局限,他们对昆仑山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大范围的,从而富于想象的色彩。其实,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界定,昆仑的博大、神魅与永恒,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中国人世代代的崇拜与向往。

可以肯定的是,从青海湖周围一直到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了现今青海省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昆仑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祥地。而诞生在这一神秘地域的声名远播的人物西王母,则无疑地奠定了昆仑神话的人文基础。

远古青海地区,气候温润,草木丰茂,鸟兽翔集,风光独异。当内地因为江河泛滥、洪水肆虐而危害民众时,这里却独处高地而能长享清平。

如果说,三千年前周穆王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西王母,表明了中原农业文明与西部牧业文明的第一次碰撞的话,那么,那一段原本真实的历史则更多的为神话传说所涂抹。事实上,深藏在昆仑山中的这一方小小



的海子并不就是真正的瑶池——真正的瑶池大约更像是烟波浩淼的青海湖。因为在中国古文字里,池与湖的概念是相融相近的。

而西王母,这位三千年前羌族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女性代表,正是在这碧草连天、牛羊成群的地方与乘马西来的穆天子进行了那一次让后人猜想不已的历史性会面。而与这一次历史性会面相对应的文化背景,便是河湟地区斑斓的彩陶文明。考古发掘已证明,在这段历史期间和以前,河湟地区的彩陶流成了河。让人们感到回味无穷的是,在一些最为珍贵的彩陶绘画里,明显的有着西王母时代虎头豹尾服饰的影子。

如果上溯更远,我们便会发现,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其文化之根和发展之路也都和西王圣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轩辕黄帝与蚩尤决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西王母的鼎力相助,轩辕黄帝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了。远古时代的真切画面被时空的渺茫和传说的想象弄成了斑斓迷离的神话。于是,王母瑶池、蟠桃盛会;天上人间,玉皇大帝——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就这样完成了!毫无疑问,在中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穆王子传》以及《西游记》里,这种神话体系得到了最为具象的全面展示。

无疑,西王母和轩辕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西王母既是一个女王又是一个部落国家的名字。由于她的代代相传的缘故,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轩辕黄帝到尧帝舜帝到周穆王等中原帝王都与西王母有幸会面的史实。

民间传说认为,五千年前初始的西王母最终衍化成王母娘娘的传说。而轩辕黄帝则演义成为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昆仑神话以他们为轴心,昆仑山则成了真正的“帝之下都”众神之府,成为了中国的奥林匹斯山。

## 残篇缀语

### 昆仑与西王母学将掀起文化风暴

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什么时候，我萌生了写这么一部书的念头？这样一部集文史哲为一体，兼具多元文化品格的书，在经过我的几度跋涉几度伏案之后，竟把它完成了。当我在挥去疲惫洗却风尘之后，一个人静下来仔细审定原稿时，这个突然间降生的精神婴儿带给我的是一种莫名的震撼：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是会做出一些开始时不曾料到的事情的。这部书，大大地加固了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支点，也提升了我自己的文化人格坐标。它使我确信：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其实是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代替的生命精神的扩张。而就人的终极属性而言，精神的站位等高线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鲁迅先生在介绍先秦古籍《山海经》时说：“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鲁迅先生独具文胆并行文辣烈，但在涉及历史或传说时却出言谨慎，他把风行于中国民间几千年的昆仑山与西王母的故事称为“故实”，为后人研究这道命题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鲁迅毕竟是鲁迅，他虽从来不以历史学家自居，但在其诸多文章中却常有对历史问题的真知灼见。比如说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他就认定秦始皇只是烧掉了六国的史书之类，而其他诸如农工医药地理志怪之类，则均在保护之列。并且六国的史书只是不让民间收藏，作为国家图书机构仍是要保留的。鲁迅认为，由于秦二世而亡，其历史由汉朝来写，挨骂的时候便必然居多，其实秦始皇是颇近冤枉的。二战时纳粹头子希特勒仇视驱逐外国人并屠杀犹太人，一些人便拿希特勒比附秦始皇，认为是一类。鲁迅严辞实据以驳，例举了秦始皇重用客卿，不为子孙设王封候等史实，澄清了是非，严肃了视听，校正了偏颇。用同样的眼光来悟察鲁迅对昆仑







山与西王母的判断,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

昆仑山与西王母,首先是一个文化命题,其次是一个历史命题,然后是一个哲学命题。这个命题看似古老,事实上却是常说常新。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实;不仅仅是存在,还有超越;不仅仅是过去,还有未来。特别是西王母的形象,她无疑承载了人类与罪恶诀别向美善趋近永恒渴望。

回首为了实地考察而走过的每一道山梁,每一处山洞,还有那古墓群遗址、新旧石器遗址、古岩画遗址,以及古战场、古城墙、古寺庙等,我的记忆回音壁上便响起那风声雨声,响起那鸟叫虫鸣,响起那浑沌苍茫的天籁和音。是啊!生为现代人,却又要远赴历史深处,与远古对话,向天地叩问,并果敢前行而乐此不疲,如果不是听命于一种前定的安排,就无法得到恰且的解释了。而前定是什么呢?便是昆仑山那古奥深邃的意境,便是西王母那若真若幻的牵引。应该说,我是先熏染了许多民间传闻,再动心于许多传说中的古迹,然后才陷进了许多相关的古籍史料研究——



这一切行动轨迹都近乎自然随意,没有任何人为的勉强。就像古琴注定由知音的妙手弹奏那样,那琴弦上注定要流泻出远古的妙音。

我相信,昆仑山与西王母会成为一门学问,一门涵盖面极广极深却又不会让人生厌的学问,而且这门学问将具有世界性。因为,就人类掌握先进技术的扩张程度和人类道德精神的沦丧程度而言,西王母将是一面警鉴的镜子。

在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联系上,儒学是一门学问,敦煌学是一门学问,藏学是一门学问。相比而言,我相信昆仑山与西王母学将后来居上。

藏学集一个独特民族的存在方式、生存观念与历史为一体,它被包裹在黄教经文的全方位渗透中,所以它将永远具备神秘性。

敦煌学呢,敦煌学集断代历史、佛教经典、壁画彩塑、民俗演变为一体,专业指向庞杂而具体。因此,它的研究最终只能是有关专家和有关学者的事情,一般人充其量只是观光一番凑凑热闹而已。

儒学,它曾统治中华历史两千余年。

而昆仑与西王母学呢,它关注天地人的自在状态,关注自然界的初始状态,它关注率真的人性和向善向美的力量。它与欺诈虚伪决裂,它和贪婪自私相悖;它崇尚和平、公正,诅咒不义。它像清风朗月一样抚慰大地,抚慰人类伤痕累累的心灵。它以真善美慧威召人类,拯救人性,它具有超越时空的净化力量,它具备原始宗教般的真朴与虔诚。对于我们这个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人类自身问题的地球人来说,西王母的目光将永远悲悯而深情,而平民化的色彩将使她和芸芸众生有着永久的亲和力。

河出昆仑行







## 昆仑龙脉地

昆仑文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体系,它既是神话、地理、历史的三位一体,又是华夏文化的最初源头,历经五六千年而经久不衰,阅尽沧桑变化而愈加璀璨。它以其博大浑厚、气象宏伟而独具魅力。而其厚德载物的特性几乎涉及到从古迄今的所有最重要的哲学命题。正是由于此种海纳百川般的包容性,才使得每一个试图走近它的研究者感到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诱惑。在我看来,要解读好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就必须从解读先秦古籍《山海经》入手,因为《山海经》一书明确记载了许多史前神话与诸多掌故,并对大昆仑的地理范围做出了相当详尽的叙述。正是在对今古地理范围的相互印证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为什么昆仑文化包括昆仑神话一定会产生在这一高峻、雄浑而又地域广大的土地之上?为什么远古时代的高山崇拜思想以及尊天祭地思想能够一代一代地在华夏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之久?为什么炎黄二帝以及西王母和大禹的故事都离不开昆仑山的传说?为什么共工怒触不周山造成的“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与华夏地理西高东低的情形如此吻合?一句话,古籍和古人传说中的昆仑山,必定是一个与我们的华夏民族在生发、起源、演变和壮大过程中息息相关的地域所在。而掌握和认知了这一前提,也就掌握和认知了昆仑文化的载体和内涵。

如果从现代地理的山脉走向以及其支脉的逻辑延伸来看,大昆仑西起帕米尔高原,从新疆南部向东延伸至西藏北部,跨越青海全境,再向东连接积石山、岷山与秦岭——这是它的主脉。在这个主脉的主体部分,即现今被称为东昆仑的巴颜喀拉山,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禹贡》上说:“河出昆仑”,当为确凿的记载。而长江的源头则在大昆仑主脉南支的唐古拉山各拉丹东冰川下面。其南支脉由唐古拉山向东南延伸,连接起现今的横断山脉,一直延伸至南岭。而大昆仑的北支脉呢,则包括现今青海北缘的祁连山脉,再向东北延伸至六盘山,连接起贺兰山、阴山等山脉。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一纵横华夏大地的大昆仑山系,便会发现,它恰









◇ 昆仑龙脉地



像是从青藏高原伸向东方大地上的一只巨人的五指,牢牢地掌控着神州大地的筋骨与命脉。而南北间分流向东的长江与黄河,则是浇灌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浩浩源流。

如果对照《山海经》所载昆仑地域,其所指显然也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山系所在,而非某一座孤立的山峰可以代替。《山海经》上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又说:“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而在这昆仑之墟周围,又有不周山、玉山、日月山,还有西海、流沙、赤水、黑水、弱水、炎火之山等等。如此大的范围,如此丰富的地理环境,恰恰印证了其于现今大昆仑地理走向的基本轮廓。很显然,《山海经》是最早表述昆仑之墟为实在的地域,而后世许多学者猜谜式地把昆仑说成是某种虚幻的所在,从根本溯源上讲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山海经》是最早出现昆仑记载的古籍,其原意显然指地域而言,而非其他。后世的许多诸如“葫芦”、“浑黑”、“母腹”之猜测,实在是距离昆仑的初始义愈去愈远,或风马牛不相及,几乎变成了某种玄学。倒是“浑黑”一说似乎与昆仑山有着某种表层的联系,因为以实证考察的眼光来看,东昆仑主峰的巴颜喀拉山表面呈黑青色,浑莽莽横卧天地之间。加之其上常有乌云笼罩,其混沌浑黑的印象让人观之由然,这也许就是有人常把昆仑与混沌联系起来的缘由。

地下考古和文化史的研究证明,炎黄文明发源于现今的青藏高原的东部,即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这里处在黄河、大夏河、湟水、大通河以及渭水的交汇地带,高山草甸与黄土河谷分梯级向东延伸,小盆地与小平原成连环状铺向东南。由于河道的落差由西向东渐次下降,故各种自然界的大洪水很难在这里形成灾难。倒是因为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平原无遮无拦,便常常会发生洪水使河水改道或淤积泥沙让河水泛滥的景象。地理考古的研究表明,在距今一万一千年前、距今八千年左右、距今六千年前和四千年左右,华夏大地曾发生过四次灾难性的大洪水,其成因与地震、暴雨和冰川融化均有关系。而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民间盛传不衰,大约是那个时代留在华夏人心目中难以抹去的记忆的反映。试想想看,在黄河中下游连年洪水滔天,甚至几十年几百年都处在洪水威胁的漫长时段里,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不正可以使留居于此地的人群长享清平么?



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华夏文明是一步一步由西向东渐次发展壮大的。

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青藏高原东部实乃昆仑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史前发祥地。

如此,我们更可以理解,以史前传到后世累朝累代的高山崇拜、昆仑崇拜思想,其最初当源于人类的躲避洪水的需要,然后才是与上天的沟通需要。而昆仑崇拜演绎成后世的泛昆仑崇拜,也就说明了三山五岳的崇拜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鄂博崇拜,其根源的出发点都渗透在昆仑文化当中。

昆仑文化内涵丰富,蔚为大观。它的哲学指向宏阔而又具体。略加梳理,我们便会承认,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启示大约有如下部分:

1.华夏文明即炎黄文明的起源或生发演变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天文地理条件的过程,具有朴素意义的天人合一观。

2.对昆仑神话的解读,也就是对于华夏初民时代人文精神的解读,在这里,创造精神与尊重自然界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3.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与自然界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故尊重自然是先决条件。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泛神观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4.真理观,即人文坐标的定位应适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共荣,索取必须回报。

5.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故保护好江河就是保护华夏文明的延续。

6.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合理互动,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故大昆仑的生态再造势在必行。

7.人性和人格的完善必须依法天道。而恣意妄为和私欲膨胀的罪恶本质就在于它违背人道、蔑视天道。人性的完善其实是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完善。

8.用天人合一、泛神观念来观照生与死,一切人为的恐惧便不复存在。生命永远是生动的,生活永远是美丽的,并不存在死亡。

9.华夏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百族融合,表现的是一种人文生态优势。它必将相互激荡,彼此壮大演进,从而生生不息。

当我无数次地走遍青藏高原,走遍黄土高原,走过黄河两岸、长江





两岸,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踏着先祖的足迹,追寻着炎黄文明的脚印,当我一次又一次叩向华夏文明的源头,一次又一次地仰望莽昆仑的身影,叩向昆仑文化的真谛与要义时,我都会从心灵深处生发出深挚的感动,并引发长久的激动与感念。伟大的炎黄先祖从遥远的文明源头走来,踏着荆莽,踏着洪荒,蹈过大洪水与大劫难,创造着文明与文化,为华夏大地矗起一座座照耀着后世子孙的人文灯塔。中华大地因祖先们的开拓而前程似锦,黄土地下因为有无数文明的堆积而丰富动人,现实因历史的激励而生机勃勃。一种不可抑制的理性认同激荡起不可遏止的豪情,于是我便乘兴写了一首《念奴娇》词,题名为《圣山》,姑抄录如下,以与诸位读者共勉。

### 圣 山

仰望昆仑,  
须敬畏,  
史前神话存根。  
黄河长江走南北,  
且看双龙腾身。  
炎黄东进,  
禹定九州,  
聚百代风云。  
五千春秋,  
锦绣传奇无垠  
洞穿上古遗俗,  
高山崇拜,  
缘天地混沌。  
多少英雄治洪水,  
惊涛变害为津,  
沧海桑田,  
江河不废,  
赖有华夏魂。  
再塑昆仑,  
无限江山有神。



## 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

对于黄河,我们究竟知道多少?

对于长江,我们究竟知道多少?

而对于华夏文明的演进史,对于华夏文明的演进与大河的演变关系,我们究竟又能知道多少呢?

地下考古的大量文物以及考古遗址的分布范围证明,华夏文明在早期的发生、演进和发展显然与中华大地上的几条著名的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对应关系。在中国的南方,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古滇国的青铜文明,足以让世人震惊。在中国的北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以及古渤海国遗址的发现,同样让人为之称奇清醒。而纵贯黄河流域五六千年,甚至更为久远的伏羲文明、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无疑向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真切可见的,上古先民在黄河两岸生存生活并创造建设着的动态场景。这些文化演进的过程环环相扣,阶梯式推进,一步步地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铜石并用到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文明的脚步坚定而从容,从未中断。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活生生的,真实可触的历史,在中国的古籍中看不见了,在被钦定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里毫无记载。这就提醒了我们,要读历史,特别是要读上古历史,决不能只在故纸堆里兜圈子,在已经发明的方块字里耗工夫。即使是在殷墟挖掘出的甲骨文里,华夏文明的记录仍只是那个时代的横切面而已。后世的许多学者因为上古史只见诸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便怀疑中国的历史只有三千年或四千年,而完全无视地下考古不断发现的新遗址新文物所提供的讯息,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代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断言“中国的历史从商开始”,因为有甲骨文可以佐证。而“夏代只是商代的影子”。而大禹呢,“只是一条虫”。至于再往前的五帝三皇,在他看来,全是神话传说,虚无飘渺。这种武断虚无的史前历史观,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形成了巨大的占压倒性的话语霸权,以致于使许多后来的学



人们奉为玉律,不敢跨越。其实,就神话学的定位、历史学的定位,人类学的定位、民族学的定位甚或人种学的定位来看,其确立概念到分类梳理到研究走向的基本背景,都与西方,主要是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甚或殖民主义嚣张时期的学术氛围有关。而这种背景主导下的话语霸权决定了他们非要把一个以欧洲文明为主轴的研究分类定位硬要机械地套用到地球的其他地方,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大加怀疑的。我们认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决不能仅仅用神话来解释,用难以确指的传说来解释。恰恰相反,历史的神话化只能说明对那个远古时代缺乏明晰的梳理,而所谓神话的历史化恰恰是我们所要追索、研判并努力证明的。因为横向与纵向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古籍中的诸多所谓神话,如昆仑山炎帝、黄帝、大禹,甚至伏羲等,其本意皆是由某一标志性人物代表一个时代,是不够明确的历史实在,而非杜撰的神话。这和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神话完全属主观的演绎根本就是两回事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硬要把西方人定位的神话学指向套用到中国的史前传说,其载体与结论便完全错位,甚至大谬不然。曾有人妄言中国西部地区的马家窑彩陶文化可能来源于两河流域。理由是两河流域的陶文化可能更早一些,但此种揣测很快就因为遍布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而破灭,因为黑陶文化的独特性与大规模的城堡相伴随,具王国形态。目前,由各学科专家联合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了三代编年表。而“五帝”“三皇”时代的多学科联合研究也还在稳步有序地进行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对考古新发掘的全方位研究,随着对古地理、古气象以及古生物演进,包括大河流变与华夏文明对应关系的全方位综合研究取得成果后,五四运动后形成的所谓“中国古史观”将会受到全面的颠覆,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期至少将上推一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由西方殖民主义观点散布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或“南来说”必将铁定为“笑柄”。

问题又回到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的主题层面上。我们认识到,华夏文明的考古遗址散射到从北到南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但考虑到黄河流域的文明有地下文物与地上王朝世系的互为表里印证,故其说服力与权威性当更为重要。缘于此,本文的重点也将会放在华夏文明与黄河同行这一层面上。而这里所表述的华夏文明与大河同



行,既指历史的演进走向,亦指文明与大河的共荣关系。这也就是说一部华夏文明史与一条黄河流程史,其动态的互动过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停止过。历史,决不是僵死的过去;黄河,也并非不变的巨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显示,黄河在过去几千年的岁月,曾有过 1575 次的改道或泛滥。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年时间,黄河就会有一次或大或小的改道。而华夏文明的每一次阶段性更新,甚或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分明与黄河流域的地理变迁或气象变迁有关。许多证据表明:华夏文明与黄河变迁同始共生、密不可分。而人群的活动说到底应在其所处的大环境背景中才能有用武之地。华夏文明的起源、生发和演变,因了黄河流域的特殊地理和气象制约,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她独具的风貌和特质。很显然,她不会混同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文明。

古地理学、古地质学、古气象学以及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表明,黄河流域在上古时代属亚热带气候,湿度很大。且青藏高原的海拔也要比现在低许多,植被的丰茂与现在完全不同。而黄土高原呢,则遍布针叶林和阔叶林,在森林带与森林带的过渡地段,则由水草密布的草原连接,其适合于人类生存的条件堪称优越。而黄河象、桔子树这些现在只能到长江流域去寻找的动植物,上古时代却分时段地遍布黄河两岸。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夏文明的主要源头,会发生在黄河流域,而炎黄文明的脚步,是沿着黄河,一步一步由西向东发展演进起来的。

我们说,黄河是一条巨大的生命,她从古到今奔流不息,穿越时空从文明的源头走来。她既是一个耄耋长者,又是一个稚气永存的孩童。她既深沉浑厚,又永远鲜活可爱。她是一位智者,是一部史书,是一部挥洒不尽的抒情诗长卷。她永远激情澎湃,也饱含着深邃哲思。她让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去探索解读,却是永远解读不完而难以完全渗透。因为,她是活的、灵动的、有生命力的,对她的感悟将会没有终点。

黄河的流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华夏文明的起源、演进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我们说,研究和探索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才具有了真理意义上的人文坐标,才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坐标。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了他有三个愿



望：一是能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可以传世的书，其中要真实的记下自己的缺点。二是希望能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畅游一番。三是要带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亲自骑马走一遍黄河上下。毛泽东的一生波澜壮阔，其经历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可他却对能亲自骑马考察一遍黄河情有独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动容并玩味不尽的英雄之念头。毛泽东的想法未能实现，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那么，毛泽东想去完整地走一遍黄河上下，他老人家是希望达到一种什么目标呢？或许，他是想用他那壮美的诗句，一抒胸廓中未了的豪情。或许，他是想从历史与科考的交叉角度，来体认一下华夏文明的演进脉络。但毕竟，毛泽东的晚年心愿成了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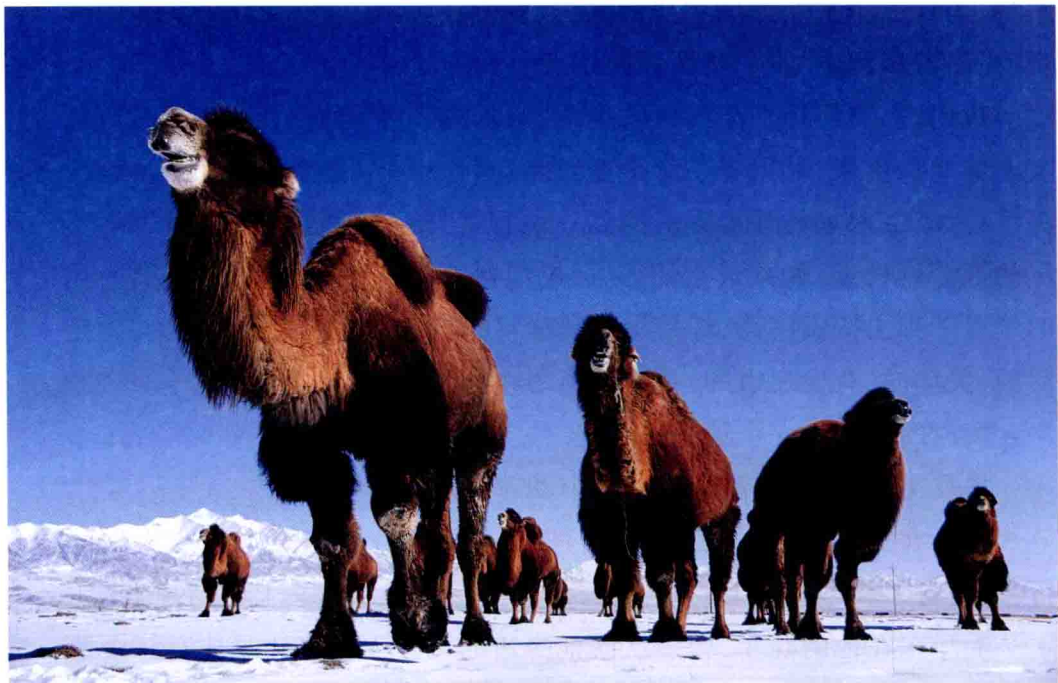
好在，后来者的探索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好在，历史与科考的理性目标，正激励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挺进。

与大河同行——这既是探求的起点，也是永远不会有尽头的终点。缘于此，我们的探求才有永恒的意义。缘于此，我们才可赋予李太白的浪漫诗句以全新的意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这诗句既是想象，更是哲思。

让我们与大河同行。追寻那想象与哲思的统一。





## 华夏文明顺天地之运

一部华夏上古文明史,既表现了华夏祖先们斩荆莽、开天地的奋斗历程与开拓进取的坚韧性,也表现了他们识天文、求地利的认知历程与天地同在的适应性。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天人合一思想在华夏文明的积累中逐步形成的必然性和指导意义。

在先秦古籍中多次涉及到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实际上所表述的都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这些历史阶段以生产力水平或群体性的生存状态为标志,其时段都相对较为漫长。“有巢氏”在人类祖先生存于广茂的森林时段中逐步学会了垒巢筑窝,以躲避猛兽的袭击与伤害;“燧人氏”在漫长的生存进程中学会了击燧石取火的本领,从而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氏”时代无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天文地理知识,从而能够相对地在群体迁徙活动中适应环境,明辨时空秩序;而“神农氏”时代呢,人类祖先显然已经完成了以采集农业到种植农业的过渡。直到这个时段,群体性的定居才成为可能。而群体定居必然导致生产的分工,于是,玉器陶器出现了,房屋出现了,城池出现了,大氏族部落甚至部落联盟出现了——华夏文明的曙光开始呈现在古大陆昆仑山以东的广大地域。很显然,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到“伏羲氏”再到“神农氏”,这个过程至少演进了二百万年左右。有意思的是,这个演进过程,愈到后一个时段,其进程的速度便愈益加快。更有意思的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地下考古,从“元谋人”到“蓝田人”再到“北京人”再到“大荔人”。从“河姆渡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龙山文化”,其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及文明程度竟与中国古籍中的判断定位完全吻合。我们不禁要惊叹,中国古代的先哲们用“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充满感性与标志性的文字所表述的华夏上古史,竟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理性判断。而更让我们惊叹和认定的是,华夏祖先的人种演进与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完全是适应于华夏大地上的独特产物——这个文





明既不同于古希腊文明、古希伯莱文明,也不同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她是地地道道、无可置疑的“这一个”,即土生土长的,从古到今从未中断的华夏文明。

我们说,人类是大自然演进的结果,同时也必须明白,人类,包括人类文明,也永远只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中间虽有区别,但却无法分割。从华夏文明的演进过程来看,我们显然可以断定,其与大自然的相适应性应该是一个从古到今的人文坐标。据王大有先生在其发表于《博览群书》杂志 2001 年第二期上的文章认定:“考古年表上所明显显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阶段性,均与古代同期的洪水天灾相始终。因此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类型的更替,是由于上古洪水和海洋进退引起,并同时引发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也就是天灾导致了王族更迭、居民迁出迁入的变换。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上古民族迁徙,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往复进行,文化遗址俱在丘、墟、堆、墩、坝阶地上,找到了一个合于生存环境生存时空的合理的历史的解释的前提。”这很让人受到启发。王大有先生把古星象、古气候、海洋水文曲线以及洪水周期性记录与上古人文史重合起来进行全方位判断,其所得出的结论便更具有说服力。如此,我们便可以解释:古籍中片断记述的三皇五帝,其实质都是某时代的带有人文再造功绩的标志性人物。而这些标志性人物,既指某位真实的人物,更泛指某一时段人文精神相对稳定的时代。

古地质学、古地理学、古气象学的综合研究表明:地球的冰期与暖期大约每三万年左右转换一次,而海平面的涨落或进退也相应发生一次。这些留给古人记忆的“沧桑之变”不但在古籍中可以考察到,在地球五大洲的海岸线进退中也可以得到明证。而大洪水的发生,也明白地具有某种周期性规律。就华夏大地上的地质与气象研究表明:在距今 10~7 万年期间,地球变暖,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迅速抬升。此时期的黄海西岸海岸线,竟直逼现今苏北平原的南通至盐城再到连云港一线,而由这一线朝东的部分,则完全被海水吞没。这一科学的结论,是在对相关地点有孔虫化石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距今 7~4 万年期间,全球性气候逐渐变冷,霜冻期延长、冰盖扩大、冰川南移、大洋与大海水位下降。据地质科考证明,



此时的冰盖范围已延至陕西的秦岭和山西的太行山一线,成了真正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在距今4~3万年期间,地质史称为晚更新世中期,气候变暖、冰川后退、海洋回潮,此时的黄海与东海海域迅速扩大,当时的苏北平原与山东半岛的相当一部分被海水淹没,华夏古大陆的东沿部分到处都是汪洋一片。而在距今3~1.2万年期间,为地球最近的一次冰期,冰川延长、冰盖扩大、海平面逐渐下降了100米以上。此时的黄海完全干涸,以至于变成了荒芜的平原,荒草萋萋,以至于有猛犸象、披毛犀在此间出没。当时的华夏大陆向东扩展连绵,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

间隔延续7万年的大冰期在距今约1.2万年时逐渐结束,地球转暖,黄海海面上升50米,华夏古大陆渐次呈现出生机与活力,此时正好处在中国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很显然,大自然的变迁周期正处于适合于人类繁衍发展的良好时段,华夏文明的早期孕育阶段出现了。

大约在距今1.1万年时期,华夏古大陆境内洪水爆发,洪水入海不畅,在东西南北各个山脉与丘陵间的盆地上形成为数众多的内海、湖泊。当时居于平原上的先民们纷纷逃向山岭丘塬地带。这样,对人居环境的理性要求出现了,对气象、天象、洪水的对应关系的思考成为必须。时代要求在随后的时段里逐渐催生出了伏羲文明。距今9200年左右,全球洪水泛滥。距今8500~5500年期间,第三次大洪水在华夏境内爆发,此洪水在黄河、长江中游地区肆虐成灾,各地流民溯江河而上,沿山岭丘塬往西寻找生存地,故昆仑山系一直到秦岭一线成为最安全的地带。相应地,伏羲文明因发源于古昆仑山,又逐渐向东发展,在现今的甘肃天水一带形成了全盛期。而昆仑神话的最早酝酿与产生,大约也与那个时代先民们斗洪水、求生存、观天象、祈平安的生存状态有关。可以肯定的是,伏羲文明的民族载体主要为氐、羌族——他们长期居于秦岭以西,昆仑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海拔相对较高,洪水水患相对较少,加之当时的西部植被丰茂,自然环境优越,所以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创造出中国史前文明中最占统治地位的羌戎文明。而在后伏羲时代,大约在距今6000年至5500年期间,羌戎文明脱胎而为伏羲文明的全盛期。有证据表明,从羌戎文明到伏羲文明,由西部羌戎族构成主体,不断融合其他小部族,逐渐形成了华夏族中被称为夏的一部分。而华则指原居于中原的先民。后来相继而





起的炎帝、黄帝、大禹、夏、周等族群，其主体都是羌戎——伏羲部族的衍生与扩大。惟有殷商族群，大约是在东夷族群中找到根源的。当然，尧、舜部族也可能是殷商的先祖。如此联系起来看，华夏文明的主体部分是脱胎于羌戎文明即伏羲文明，其立论应是可以肯定的。

古籍中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包羲即伏羲。这个“神农氏”当为炎帝部落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支，或可认为是炎帝部落的前身。其活动时期当为距今 5500 年至 5000 年左右，此时段中，垦殖农业已相当发达，黄河中下游的部落密布、人口众多。而由西向东迁徙，或由南向北迁徙的各部族人数亦在不断扩大。对土地，特别是对中原地区的占领成了东夷人、西戎人和苗黎人的共同需求，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部落大战即将上演——这就是在史书中非常醒目的炎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与蚩尤的“阪泉大战”和“涿鹿之战”。在这里，蚩尤、炎帝、黄帝当指三个不同的部落，亦为三个不同的、互有交错的时代。应该说，蚩尤在前，炎帝居中，黄帝在后。其间的拉锯战、僵持战大约持续间歇了数百年之久。最后则以黄帝部落为胜利者，其他部落的大部分融入黄帝部落，黄帝成为公认的部落联盟首领——这个被后世传颂的黄帝当为那个最终的统一者。

一个非常重要但常常被读史的人们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大约就是在距今 5000 年左右，一直到现在，整个地球的海平面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华夏大地上，炎黄文明的脚步开始大踏步挺进，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辉煌相继上演。其大背景的原因当在地球大环境的适度性中去加以寻找。也就是说，是地球母亲在她温暖期的最适度时期，赐予了我们华夏文明健康成长的外部条件。基于此，华夏文明的自创能动性才具有了自我发挥的前提。所以说，当我们在研究华夏史前文明的时候，决不可孤立地把人群的活动看作是惟一的动力，须知人群的活动与创造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相应制约或相应推动。所以说，只有那些把握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找到了天人合一坐标点的族群，才可能顺天地之运而创造文明。而华夏文明的最早生发形成，其理由也还在于此。

缘于此，我们当敬畏大自然才对。





##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对于中国古籍中多次浓墨重彩所记述的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该做出怎样明晰的梳理与判断呢？

我们姑且先引述《史记·五帝本纪》的有关部分：“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及修德振兵、治五气、芒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同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而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崩，葬桥山。”

如果仔细推敲，再参照其他古籍记载，并对地下考古遗址的对应年代及文化类型进行分析，再对当时时代的古气候、古地理变迁进行综合性对位判断，我们便可明白：所谓蚩尤，乃代表东夷三苗九黎族团。所谓炎帝，乃代表烈山氏神农族团。所谓黄帝，乃代表轩辕氏族团。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地域，既有先后时序，亦有彼此交错。应该说，蚩尤族团是最早居于中原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族，生活方式主要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冶铁发达。而炎帝族团是沿着渭水、黄河从西向东一路迁徙而至中原的西部羌戎集团，由于在种植业园艺方面发达较早，被尊为神农氏。因其族群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族群的壮大亦是必然，故在东进中原时先与蚩尤的东夷三苗九黎族团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时段肯定相当长。因炎帝族团与后起于渭水的轩辕族团同为羌戎分支，故以兄弟相称。经炎黄联手，将蚩尤族团驱逐出中原。但胜利后的炎黄两族团又发生战争，结果是后起的轩辕族获胜，轩辕代神农而成为中原主人。后来蚩尤族团体整多年后前来复仇，却被已经融合成炎黄联盟的联军打败。于是三族团共尊轩辕氏为黄帝，始为天子。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统一天下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所以说,把蚩尤、炎帝、黄帝分别看作是三个具体的人肯定是说不通的,而将他们分别作为三个不同的氏族集团来看则合乎实际。从对应地下文物考古的情形来看,则蚩尤代表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炎帝代表仰韶文化。黄帝因是后起之雄,则代表了前两类文化的融合。从相互印证的时段来看,则明确无误地表明,蚩尤在前,炎帝居中,黄帝在后。三大族团的先后角逐,争斗持续了千年之久。当然,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那个葬在桥山的黄帝,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亦是一位大一统后公认的人文代表。而他的公孙氏或轩辕氏族团先代,肯定是繁衍、发展壮大数百年之久,才最后由这个被公推为黄帝的人统一了天下。这情形有些类似于秦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秦始皇——由于名震天下,武功赫赫,世人倒大多忘记了从他的先祖秦穆公算起,秦用了 500 年的奋斗,才把统一六国的桂冠戴到了秦王嬴政的头上。而黄帝的最终被尊为华夏之祖,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在他的时代文治武功及德政的集大成者。

如果我们来观照一下当时时代的古气象、古地理变迁,就会更加明白当时世事沧桑巨变的大背景原因了。

在距今约 7000 年左右,黄河下游山东半岛至连云港一线因海平面上升而变为大洋中孤岛。这是由于气温上升,上游冰川融化以及月亮对地球的引力综合作用所引起的状况。当时居于今华北及东部沿海一线的东夷太昊——少昊族团因各部落被洪水湖泊分割,自然形成了九夷部落。待随后的数百年间海水退去后,九夷部落遂又逐渐发展联合成为三苗九黎族团。很显然,这个东夷族团当时已创造了相当高的文明,他们在渔猎、造舟、营建城池以及冶金术方面均有建树。并且,他们对天文星象的观察也颇具成就。现在连云港郊区的巨石山上,有东夷人留下的既像太阳又像人脸的岩画,其意义非比寻常,是当时图腾崇拜的经典表述。更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竟能在硕大光滑的巨石上,雕刻排列出北斗七星的图案,表明当时他们族团设有专门的天象研究机构,且对天文知识的运用也达到相当程度。而按照《山海经》的记载说少昊国在东方大海中,可以明确印证今连云港一线朝北包括山东半岛俱被孤悬在大海之中的事实。而这个东夷太昊、少昊部落的后裔,即就是后来大海退去以后联东夷





九黎部落而起的蚩尤。很显然,蚩尤族团在炎帝族团由西向东发展的期间,曾雄踞于现今的中原华北及东部沿海一线,并且创造了史前灿烂的东夷文明或称鸟夷文明。

那么,此时的炎帝族群呢,他们正从渭水、黄河两岸一步步东进,种植五谷,繁衍扩大族群,制彩陶,营房屋,驯化牲畜,传播农耕。一直到族群扩大进入中原后,便与此地的蚩尤族团发生了冲突。这个被称为炎帝神农氏以及后起的轩辕氏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遍布黄河上中下游各地,其文明当属地下考古挖掘出的仰韶文化。从文化的覆盖范围来看,炎黄两族团的人口及农业生产水平当居蚩尤族团之上。而蚩尤族团因为冶金术领先,其所制造的红铜戈矛曾给炎黄以重大打击。而炎黄联手,加之又以各诸侯征师以助,炎黄联盟终于打败了蚩尤族团,占据了中原。

一个必须引起深思的问题是:炎黄族团先后由西向东,沿黄河东进,他们代表着居高临下开拓进取的锐气,更代表着从相对差的环境向相对好的大环境转移前进的进取力量,其动力当是势在必夺、舍我其谁?这也可以看出炎黄文明沿黄河东进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更广阔的东部平原自是垦殖农业更大的用武之地。而农业文明相较于渔猎文明,其先进生产力的力量自是不可阻挡的。

至此,我们应着重探讨一下炎黄文明脱胎于羌戎文明的脉络及演变过程。明白了这个过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华夏文明主要是由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发展起来的大缘由。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青藏高原进行普查时,足迹涉至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在可可西里的三个地点采集到10余件打制石器,分别有精致尖锐的石核、锋刃的石片等旧石器时代的工具。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黄河上游的共和县曲沟地区,又采集到一大批与可可西里发现的石器相类似的原始人遗物。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找到了一批上百件的旧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古人类研究所在同一地点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古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并相继找到了各类石器112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雕刻器、刮削器、尖





状器和砍砸器累计 41 件。据碳 14 测定和地层对比测算,其存在年代大约距今三万年。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在距今三万年前,甚至可以上溯到八九万年以前,青藏高原是适合于古人类生存的地区。当时的狩猎活动广泛而普遍,草原与灌木丛林中栖息奔跑着数量众多的羚羊、羚牛、野驴、野马、野狐、兔子、鹿群等大量野生动物,这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的食源。而遍布高原上星罗棋布的众多淡水湖、河流小溪等,则为原始人提供着丰富的食用水。就海拔而言,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当在两千米左右,植被丰茂,气候湿润,且视野开阔,特别适合于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活动于二三万年到十万年前的高原古人类,大约是从岷山、横断山脉一带的原始森林区逐渐向西迁徙到达青藏腹地的,因为大森林中的蛇类、毒蜥类爬行动物以及以毒障之气对古人类的威胁,以及古人类对宽广的视野的需求必然导致古人类的大迁徙。而青藏高原的坦荡开阔与生物多样性则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如此,古人类的足迹必然要光顾这一片高大陆了。因为,生存需求导致生活区域的扩大与开拓,这是铁定的法则。



1993年,考古人员在格尔木市以南130公里处的东昆仑山中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层及四层炭屑,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经人工加工的贝壳装饰物和一批细石器,在同一剖面的炭屑层中,还发现了鹿科动物的牙齿化石。据测定,这些遗物距今约一万年。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地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在其中一处出土文物1489件,其中细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石器中最具价值的是一套用于加工谷物的研磨器,略成长方形椭圆状,凹槽平滑,与用于实施研磨的石块成对应关系——这表明当时的采集农业已经出现,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到狩猎与农业并重的时代。此处遗存当在5000年左右,恰是传说中的西王母时代,亦是炎黄两族团东进的时代。此时代在青海的柳湾地区,“彩陶流成了河”,是一大无与伦比的辉煌。

齐家文化类型的代表性发现,是在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的青铜镜,其制作精良,光可鉴人,是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铜镜,距今3000年。其出土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很显然,铜镜的使用表明了贵族的产生与阶级的分化,也表明了古人审美的深化与提升,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而在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发掘出铜制的刀、斧、钺、镞和木制的车毂以及毛布,其工艺相当成熟——这些产生于2700年前的遗物,据专家考定,属古羌人的遗存,其与当时正雄踞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的青铜文明可以媲美。这说明,从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发祥并衍生于青藏腹地的西部羌戎文明一直处于华夏文明的领先地位。大昆仑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最早的高大陆以躲避洪水,更为他们提供了狩猎与采集农业的生存环境。后来,随着高原的逐渐升高,文明的脚步便渐次向东转移,古羌人的一大部分随着炎黄二族团沿黄河一线走向中原,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炎黄文明。

## 大洪水下的文明再生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只系治水患的事迹曾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至今,在河南的三门峡遗有“禹王台”,在浙江的会稽山遗有“大禹陵”,因史书曾记载大禹“浮于积石,止于龙门”,故在今日的黄河上游青海循化县的积石山仍建有“大禹庙”,其间的香火年年不绝,可见民间对其作为治水英雄的深信不疑和万代景仰。作为一位四千年前的治水英雄,大禹时期的全国性治水是距我们现代人最近的一次,所以在民族心理的刻印便最为深刻而清新。事实上,在大禹之前,华夏大地上曾发生过另三次更大的洪水:距今 5500~5200 年间出现的大洪水,其治水英雄当为共工。距今 6000~5600 年间出现的大洪水后造就了神农氏。距今 8500 年期间出现的大洪水后造成了伏羲文明的逐步形成。所以说,古书中说到的三皇五帝,大都是每一次华夏文明在遭遇大洪水或大灾难后人文复苏时期横空出世的救世英雄——是一个个历史横断面上的标志性人物或族团代表。而如此解释上古史,才比较接近于事实与历史的真相。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所谓“古史辩派”,囿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地下文化考古的发现尚在起步阶段,便武断地认为三皇五帝只是神话人物,从而否定史前文明的存在,其治学方法和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大背景上讲,当时的中国势衰力微,西方列强挟炮舰之利推行其强势文化,故一大批相当有才气的中国学人如胡适,如顾颉刚等便也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表现出妄自菲薄的心态。这是造成现代历史学研究上出现疑古派的根源所在。其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用所谓的文字训诂方法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现在看来,其说法不仅荒谬,而且可悲。疑古派的另一个说法是“中国历史自殷商始”,其理由是商朝有甲骨文可以作证。而夏朝呢,至少截止目前仍未挖掘出有器物 and 文字共存的文物,于是,夏朝的存在便也成了问题。这种凡是我没有看见的(包括文字、器物或城堡)就一概否定的怀疑论,实在有些井底之





蛙的味道。因为我们知道,地下考古可以用物证来证明上古史,但考古也需要运气。碰巧挖着了是一回事,碰得不巧挖不着却是常有的事。考古史已经证明,地下深埋的文物,十之八九是难以有幸挖到的,挖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如果因为我看不到就一概不承认,那就必然会产生闭目塞听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史前史的片断记载或表述,《尚书》、《山海经》、《国语》、《左传》、《竹书纪年》、《淮南子》等,如果把里面的信息联系起来,中国的历史就不但有夏商周,有五帝,有三皇,还有更往前的燧人氏与有巢氏。当然,五帝三皇以上的历史没有纪年,没有世系表,所以显得散乱或错位。但这恰是我们现在的学人们要认真去研究去梳理的事情。几年前,由国家重点社科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完成,夏朝的历史纪年上限已经确定,那就是,夏禹立国应在公元前 2070 年。这一结论有历史文献、考古文物、星象及气象学的综合互证作基点,所以是推不倒的。而且我们也应该知道,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测年,其上古的部分也是采用了星象学与气象学方面的参照成果,方得以成形的。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综合各学科技术手段互相印证之后,中国的上古史至少可以确定到六七千年以前。

从现在已经掌握的古气候、古地理、古星象以及古文献记载的大量综合信息证明,在大禹时代包括他的父亲鲧的时代,华夏境内的大洪水至少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时黄河、长江甚至辽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均遭大洪水漫漫,其原因当由大暴雨、大海涨、大地震等综合因素所致。其时海平面提升,江河下注不畅,又有海水上溯倒灌,故华夏大地的山谷泽沟内大水聚泊,内海形成,汪洋洪波,举目可见。人民失居,登高巢树,其困境卒难想象。而鲧治水,率众围堵洪流,垒坝筑堤,却是顾此失彼,终归失败。大约在禹接替父亲治水时,海平面已在逐渐下降,海水倒灌的现象业已停止。故禹能随山伐木,登高观水势而凿山疏流,努力奋斗 13 年,终将洪水导入大海。于是,人民感念其功德盖世,拥戴其为大禹王,这便是夏朝的开始。

大禹治水时代的故事似乎只能在故纸堆中去寻觅,在传说中去体味了,而那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只能用想象来捕捉了。幸运的是,1999 年在黄河上游,现今的青海民和县喇家村,考古队发现了一个距今



四千余年前的史前遗址,其几间半地下坑式的房屋里,竟完整地保留着16具在突发的大洪水中遇难的先民遗骨。其中一老一小、老者抱小的遗骨,老者弯腿倚地屈上体,怀中的婴孩挥臂紧拽母胸,母子二人几作贴面状。这一幅在突袭的大洪水面前无助无奈而顷刻间丧命的场景,竟神奇地被定格下来,让我们这些四千年后的人们猛一看到时,不禁惊骇万般而思之动容。以身佑子,共赴非命——这一人性中最基本最原始的主题,在此刻中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哭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的地命的悲鸣!

喇家村遗址位于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端,其北面不远处是黄河上游有名的支流湟水,其西面则有大通河,这一区域恰是古籍中多处提到的“三河间”,是远古先民们休养生息的黄金地带。而喇家村遗址恰好位于这个叫做民和官亭盆地的位置,其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就是发掘出三万余件彩陶的柳湾遗址。方圆数百里,气温适度,冬暖夏凉,青山带水,林木葱郁,实在算得是一方风水宝地。从考古角度讲,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一带曾发掘出跨度达二千年的远古文物。远的如彩陶,属仰韶文化,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前。近的有大型玉璧玉刀、巨磬,代表了四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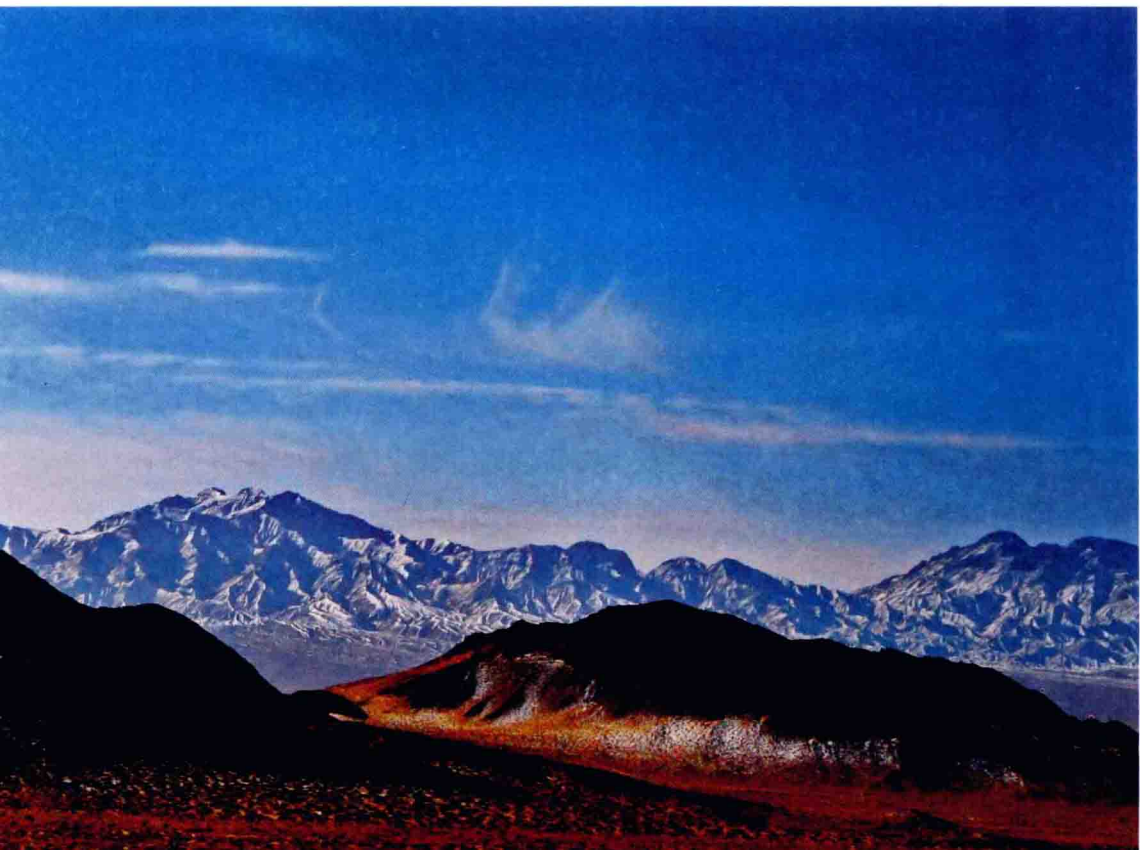




前的齐家文化——说明了这一方土地上曾诞生过史前的方国或小王国。然而,考古队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史前的大洪水夺去了数十条人命的大悲剧场景竟然能被像电影里特写镜头那样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这次发掘中,相继出现了一些玉器,显示了极高的工艺,使考古队兴奋不已。不觉中已到二千年,突然就有了令人意外的重大发现:在三座半地穴式的房址内,均发现了情状类似的作挣扎状的意外死亡古人遗骸。其姿其状其态,让人惊愕、疑惑并陷入深思。

在第4号房址内,14具人骨成一组或单个呈不规则状散布在居住面。有倒地横卧而亡者,有侧卧仰首而亡者,有匍匐在地似作爬行状而亡者,有相拥抓靠对方而亡者。最惨状者当属在屋子中心灶址处,一成年人双腿欲迈成弓步向前状,双手举过头顶似在作支撑状或呼天状,其死亡时仍在加力,故身体未完全着地,他大概是一位在死亡前完全清醒的人,或是这房屋里的主人,在向其他人或上天呼叫着,或是祈祷着。然而,一切都没有用,死亡来得急促而又迅猛!在房子的西南方位有5人聚拢一处而死,其中分明有一位长者,其状为双臂抬起作护卫状,他显然是在竭







尽全力护卫身下的其他4人。5人或侧或仆或坐或倚,全有挣扎状。而尤其让人灵魂为之颤抖的是东墙壁下的一对母与子,母亲半跪地后背倚墙,右手撑地,左臂弯曲紧搂一婴孩,婴孩紧抱母亲腰部,脸颊贴母胸,而其母则伏首贴在婴孩头顶,其旁侧散乱着几只陶罐。此情此景,虽已封存四千余年,睹之仍让人怆然悚然!

这一发掘过程真让考古队员们心魄震动。一连串问题炸响在他们的心中:是洪水之祸?是大地震之祸?是人为之祸?似乎一下子难以确指。

在与4号房址相邻不到3米的房址中,又发现一对母与子的惨状。在东墙边,母亲双手抱持一婴儿,婴儿亦双手紧搂母亲。母亲双膝跪地,臀坐脚跟,颈颌前伸,脸颊向上,似在呼天抢地,悲号求救。天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然而,灾难似乎势不可挡,母与子相拥而死于非命!

检测结果认定:3号和4号房址内共有死者16人,确认男性为3人,其中一长者约40岁,另二人不满18岁。单以4号房址内的死者而论,14人中有9人为未成年者,其年龄段分别不等。试想想看,这么多儿童婴儿聚在一屋,且有大人守护,显然是要躲避什么?不幸的是,天灾突降,大祸忽至,这半地穴式的房居转瞬间变作坟场!

考古队的报告中如此写道:喇家村遗址的这次发掘发现了很难见到的史前时期一次大灾难的现场,让我们看到了四千多年前黄河长者以身佑子的深情,此情此景,摄人心魄!在3号4号房址的旁侧,仍有大批未发掘的房址。可以想象,其间的悲状惨状将会更加让人目不忍睹。观者的第一感觉是,大洪水灾难!却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是某种宗教仪式致死?

需要仔细判断现场,再仔细观察审视一下4号房址吧:房子西北角5人相拥一处。东南角5人相拥在一处,显然有一壮年在拼力护卫着身下的孩子。靠西壁是一母亲佑子的场景。而在房子中心位置火灶部,分明是一个小伙子双手擎举,他是想托举起即将塌下的屋顶吗?在房子门口边,那个中年汉子挺身阻挡,他是要阻住汹涌而进的洪水吗?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大洪水齐腰而进,迅速升高,人既无处躲,也无法逃。转瞬间,全场溺命。

从北京大学请来的环境考古专家夏正楷教授经全面考察认定:当时黄河泛滥,洪峰汹涌,又加大雨如注,地震又发,故灾难突然,致此惨状。



因为在几座房址内都充填有大量棕红色黏土层,并夹有纹纹沙带——这显然是黄河泛滥的产物。扩而大之,经调查周围盆地黄河二阶台地,均有同样的棕红色黏土层分布,其时黄河大泛滥已成定论。夏教授将喇家村的这次发掘遗址定性为“东方的庞贝”。或许,此处大批的遗址还有完全发掘的时候,其时,一场史前洪水大劫难的场景将会扩大十倍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那将何其惊心动魄!

试想想看,这个居于黄河上游官亭盆地的小村落尚且如此,那么,当时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平原盆地上的人们,该是如何躲避突发的大洪水呢。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貌,完全可以想见四千年前的那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大洪水,曾给华夏大地造成了何等的灾难与浩劫?而大难中必有大勇,大劫后必有大仁,一代治水大英雄大禹就在此时临危受命,率众力搏,历经十三年,终成大业,为再造华夏,立起丰碑。且看《上山海经表》中,东汉刘秀是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的:“《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伐木,定高山大川。益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其事质名有信。”

如此看来,大禹时代不光是动员全国民众大规模治水导河,还对九州以内包括海外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考察范围包括地理山川、动植物矿藏,以及风土人俗,甚至涉及到历史与人文各个方面,方完成《山海经》一书。那么,当时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对地球(重点是九州之内)地理有了相当的认识。如此看来,《山海经》实在应该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集地理山川物象矿山民俗以及历史掌故为一体,算得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通史。至于后人疑其怪异难懂,只能说明上古时空与今人时空已完全不同,而今人仍以现在的眼光推今及古,故如堕五里雾中,岂不谬哉?





## 黄河流域的演变与王朝更迭

翻检一下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过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王都都城的设立与地址的选择，几乎都于相应的河流有关。河流当然代表其周围地域的肥沃程度和安全程度，故王城城址一般选择在黄河支流的范围。夏、商、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莫不如此。这几乎可以算做是一个规律。而北宋王朝呢，竟把都城汴京选在黄河岸边，结果呢，洪水频发、几度被淹。更加之靖康之变，金人围城，北宋王朝灭亡了。其都城在随后不久便被泛滥的黄河淹没，没了踪影。种种史实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阶级斗争是其内因，而地理的变迁演变则是外因，这中间会因具体的情况有所偏重，但外因与内因的互动作用却是显然存在的。另一方面，各王朝在其创建的初期到中后期，其都城的迁移也是频繁发生的，而这种发生，也肯定与河流及其流域的变迁或发展有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中国古代文明演变转移的另一种规律。

中国早期的几个重要王朝都城都选择在黄土高原，这至少说明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是肥美富饶，且适合于人类的繁衍生息的。其时的黄土高原，植被丰茂，森林成片，且河流众多。再加之黄土疏松，容易垦殖，所以就成为农业的试验地与推广地。在中国古史中传为佳话的农艺专家后稷，其农业的栽培技艺试验地就在今天的陕西关中杨凌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四千年后的今天，杨凌仍然是新中国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高新技术农业开发区，这也说明了关中地区有一种历久不衰的农业实验优势。而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几个王朝——周、秦、汉、唐，其都城都选在关中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了。

周人原居豳，即现今陕西省西北部与甘肃省庆阳县相距不远的彬县。其周遭环境在周代时森林葳蕤、土地膏腴，故周人的生存有了极佳的依托。现存《诗经》三百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述周人先祖在豳地时生活的，其诗统称为“豳风”，其当时的情景可见一斑。但是，周人的祖先古





公旦父还是选择了率族南下,其原因是邠地毕竟狭小,难以壮大与开拓。再则,居于北地的戎狄常施侵扰,亦造成了其迁徙向南的决心。《诗经》上说:“古公旦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个岐下,就是现今关中宝鸡市以东岐山县与扶风县之间的地区,这里正是史书中浓墨重彩说到的“周原”,《诗经》中便有“周原膴膴”的句子,可见其富饶优越。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旦父在周原上发展生产,聚合族群,卓有建树,德望四播。而他又筑城廓、修宫室、营宗庙,逐步完成了周人前期的国家雏形,号令关内。然而到了文王的前期,周人却弃此地向东发展,把新的都城筑向 100 公里以外的沔水岸边。这里位于关中平原最宽阔的部分,视野开阔,良田千里,而不像周原地区,虽也肥腴,但南北间一望皆可见山,委实窄狭。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王当时虽为殷商之“西岐”方国,但已决心要乘时东下,借机翦商而一统天下。

很显然,丰镐后来作为西周的都城,其地理优势与战略意义自在周原之上。周人从丰镐出发,雄视东方,又联盟其他诸侯,一举灭了殷商。于是,抚殷旧臣,聚殷百工,分封诸侯。而天下既定,丰镐京城规模亦必然扩大。其时的手工业作坊涵盖诸多领域,玉器加工、青铜铸造、养蚕绩麻、织布酿酒、加工裘皮、琢器刻字等等,自是呈一时之盛。特别是青铜铸造技术,可以冠百代之首。从地下考古发掘证明,周代青铜器不但数量最多,且技艺亦最精,至今仍传世的毛公鼎便是明证。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周人弃周原而迁都丰镐,一为避开渭水主流泛滥之地,二为向东走向广阔掌控关中中心,三为向东灭商创造条件。就这三条而言,周人的选择是英明的。因为当时的渭水水势宏大,曾几度成为黄河的主干道,逢大涝洪水,必然暴涨。而沔水则是从终南山向北注入渭河的一个支流,水量适当,再加之其地为关中腹心地带,良田千里,锦绣万垌,故迁都于此地,实为上策。后来的西周在此经营 400 百余载基业,掌控天下无虞,可谓风水天佑,王气自在也!

至于春秋时代的秦国,其最初始的领地当在秦中,即今渭水上游甘肃的天水市以西陇山。按说,此地西控陇右,东扼关中,南通巴蜀,北抵河套,可成大业。但秦人毕竟雄心勃勃,不忍偏安一隅,故从秦孝公之前,就一步步地东进关中,次第前行。先迁雍,再至凤翔,又迁泾阳、栎阳,最后

到了古都咸阳,即现今的咸阳市东北方向。秦人的迁徙途径虽与周人不完全相同,但其由渭水沿岸一直向东,跳跃了300余公里方最后落脚古咸阳塬,不能不说其志向远大,且眼光独具。查当时的咸阳城,居渭水北岸十里外的塬上,其原广大肥美,向北向西向东俱可发展,而又能尽享渭水之利,却无渭水泛滥受淹之虞,实为立都之福地。而后来的商鞅变法,穆公称霸,一直到秦嬴政东灭六国,无一不与其立都咸阳的牢靠根据地有关。

“帝都自古说长安”,秦末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刘邦又见机起事。秦亡,而楚汉相争,结果是刘邦得天下。“汉承秦制”,不但在礼制层面继续了秦的大一统极权统治,且将国都仍选在关中。因秦咸阳城被项羽一把火烧毁,汉长安城便在渭水以南的最宽阔平原上修建,其未央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长安城则更是逐年扩大。到了汉武帝时期便有了内城、外城之分,更有东市西市之别,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市。据《汉书》载,汉初全国人口约五千万,到武帝后期,大约翻了一番。其时的长安城,人口少说也有七八十万。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汉时的长安城,大致在现今的西安市市区一线,它南倚终南山,北距渭水十余公里,西望太白山,东眺骊山胜景,稳妥坐定八百里秦川,成就了西汉王朝二百年基业。其时的关中地区,阡陌纵横,水网匀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加之四塞有关,固若金汤,故能在掌控全国二百年的岁月里,创造出“大汉雄风”,让当时的东方长安城与欧洲的罗马城同领风骚,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而建树于艺术领域的成就,从汉阳陵陪葬坑中出土的数千尊陶俑便略见一斑。其人物造型逼真生动,各具情态,且自信从容,亦透露出西汉时代国人的良好精神状态。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汉武帝茂陵下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其抽象神似的简洁与雄浑,实在让所谓的现代艺术大为羞惭。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西汉长安城雄踞关中的二百年间,也是渭水相对安澜的时段,故水害不再,水利大兴。虽关中人口激增,但因为“八水绕长安”故土地与人口用水当不成问题。这八水分别为泾水、渭水、沮水、漆水、泮水、产水、霸水、泔水。八水中,三条为东西向,另五条为南北向。可谓河网交错,田畴纵横,天府之国,极长安城之盛。



东晋之后,北中国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五胡十六国之乱,然后是南北朝分治局面。待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历二世又由唐取代。隋唐皆建都长安,特别是大唐帝国,立基业 260 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顶峰。其时唐长安城人口已逾百万,关中的供应不足,便开通了由东南涉渭水西上的漕运。大凡皇家所用,民间所需的稻米丝绸器物等等,无不是经由渭水西上,当时的渭水畅流可谓其盛。一句话,大唐王朝是立都于长安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最可向世界夸耀的“大唐气象”,其时的“丝绸之路”,连结起东西方文明交汇,而唐的开放政策最终造成大唐盛世,故当时的长安城也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了。据史书记载,此时的“八水绕长安”景象当为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唐亡后,政治中心东迁,到北宋,竟把都城选在汴京——即今日之开封,恰临黄河南岸,其履险境而不自知,终遭数次水淹,更因金人压迫,其皇祚多舛,便可想而知了。

据史书记载,汴京城即现今的开封,在长达 2500 多年的时光里,屡建屡毁,屡建屡淹,一为兵焚,二为水淹,其祸大都缘自黄河改道泛滥。从金代明昌五年,即 1194 年至 1949 年的 750 余年间,黄河在开封境内决溢 338 次,致使该城 15 次受淹,数次被夷为平地。经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数年发掘,证实了开封地下的“城摞城”达 6 层之多。挖掘依次证实:清代的城址距地面 3 米深,明城址距离地面 5 米深,元汴梁城 6 米深,金汴梁城 6 米多深,北宋东京城 8 米深,唐汴梁城 10 米深左右。除战国时魏国的大梁城略偏西北方向外,其余 6 座城池,中轴线几无变化,故形成今天考古发现的“城摞城”地下奇观。

看来,都城选址之与王朝存在长久与否,其间的关系是大有学问可作研究了。呜呼!







## 河首之“谜”

万里黄河，源头何在？

“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如是说。

“河出昆仑”——《禹贡》如是说。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海经》如此记载。

李白写的是诗句，想象夸张崎岖，自不必当真。而《禹贡》、《山海经》俱认定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按说此问题已经解决，但由于秦汉以后对昆仑山的地理方位问题一直有不同的求索，故两千年来聚讼不断，难得一致。更加之《山海经》中说昆仑山有西王母，后世有许多学人便疑心这昆仑山乃神话的所在，因为在他们看来，西王母是神话，则昆仑山也是神话，故“河出昆仑”便不是实指，而是虚妄之言。

但是，黄河毕竟流经华夏的北方大地，其水浩荡可见，其势慑人可感，要说其源头无踪影可寻，或溯源只在虚幻间，这于情于理都无法说通。于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便把穷尽河源作为一件国之大事，派专使去上游勘察。其结果却是颇为牵强，让人难以据信。

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载有当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向汉武帝奏明的河源状况：“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底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我们知道，张骞的出使西域，当在今新疆境内，故他所看到的盐泽，即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罗布泊。罗布泊迟于1975年左右已基本干涸，但在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其水域面积至少有现今的半个青海湖大小。张骞说是他看见黄河出自盐泽之南，而盐泽又潜行地下，这说法既表明他只是道听途说，又表明他所考察的方位距真正的河源尚远。应该说，真正的河源在今青海境内的东昆仑巴颜喀拉山，其方位在罗布泊东南方向，距离至少逾1000公里以上。但张骞没有把话说死，他明确指出：“其南则河源出焉。”其南何地何至，他未再求其



真。这大约与他未能亲赴东昆仑实地勘察有关,亦与他忙于西域外交事务无法抽身有关。但他将河源说到盐泽——即罗布泊以南,其方位应大致不差,但又很不准确。然汉武帝并未采纳张骞的说法,在令图工做地图时,仍按《禹贡》的说法将河源定在昆仑山。但此后的黄河源“潜源说”,竟也让后世的求索者陷入了混乱。

大唐时,先由送文成公主进吐蕃的李道宗路经河源时作了考察,因他看见如星斗般落地的众多湖泊,又听人说河源由此间出没,便认定河源出自星宿海。后来,刘元鼎为唐蕃会盟使出使吐蕃,曾穷河源而溯星宿海以上,逾一紫黑大山,吐蕃名之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山的中峰。应该说,寻河源于此,已是相当到位了。只是缘于巴颜喀拉是主峰,其西尚有各姿各雅峰,而其地南北各有一小河,流程却都不短,故黄河的正源便难以确认。

元朝时都实奉命考察河源,其时整个青藏高原已纳入元帝国版图,故准确绘制河源之地当为地理行政之要务。在此次考察后由宣慰司撰写的《河源志》中,有如下表述:“河源……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灿若列星……译音星宿也。群流奔凑,汇二巨泽。”







很显然,这里说到了星宿海,又说到了扎陵湖与鄂陵湖,这与现实地理完全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时期的《河源附录》中有如下记载:“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这里所认定的河源流向为“东北流百余里”,其方位方向与流程均记载有据,且与真正的河源卡日曲河的走向一致,而另外两条上游小河的走向则完全不同。这记载至少反映了元时的勘测已基本接近了河源的真实。

河首溯源,终于在 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考察中得到确认:星宿海以西有两条小河,靠北的一条叫做约古宗列曲,意为锅样盆地河,靠南的一条河叫做卡日曲,意为铜色河,两河均流经数百里而入星宿海。但细考之,则约古宗列曲流量较小,类似季节河,而卡日曲流量大且流程远,且源头有泉眼,以源头当选长度流量最大者为原则,故卡日曲应为黄河正源。如此,从卡日曲计程一直到黄河之尾山东东营入海口,黄河长度应为 5464 公里,改写了误传的 4800 余公里,而黄河的源头之山峰应为各姿各雅峰,并非历代误传的噶达素齐老峰。此一最终结论,为历经二千年的黄河溯源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河首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去了。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再次细读《山海经》时,便不能不感到惊讶,其记





载黄河的方位与出昆仑后入禹所导积石之山，竟和现实的考察完全吻合。据此，我们可以大胆认定，大禹时代的治河当为完全的史实，并非传说。而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大约是已经到过真正的河首了，否则，《山海经》的记载便无从谈起。如此，谁如果还要怀疑“河出昆仑”为神话之传说，便是在妄诽古人，或自欺欺人了。

今读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明史》(启良著)一书，其中在论及大禹治水事迹时，曾有如下说法：“禹所治之水不是自然灾害的洪水，而是男女关系方面的‘淫水’。确切说，禹治水，是治理当时人类的婚姻状况，由不知其父只知其母的血缘家族转为一夫一妻制，由母系制转为父系制。”为了论证他的“淫水说”，启良先生还抬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并肯定了顾氏所考证的“禹是一条虫”说法。

这真是如鲁迅所言：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说了我反倒糊涂了！既然已认定了“禹是一条虫”，那他的或治洪水或治淫水便均不可成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者，大禹时代人类尚处于初民时代，“礼”的观念尚未确立，对男女之事视为与饮食一般寻常，禹既要治此“淫水”，民间传说大可按事实真相表述，何必硬要把治“淫水”说成治洪水呢？有这个必要吗？

恕我直言，中国古史中传说的大禹治水，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在民间更是家喻户晓。而地质史的知识也告诉我们，约在4000年前、6000年前中国境内确曾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洪水。而禹的治水，是当时民众生存的头等大事，因事成功就，故民众自然拥戴大禹，且世代为仰。这本是铁定的历史，却要在疑古派那里成了问题，由此而上，则五帝三皇均成为神话。其实，神话学是近代由西方引进的一个学术分支，而在中国的传统学问来看，传说时代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其编年表未能形成，疑古派便疑其真实性，这是缺乏可信的根据的。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民族历史的虚无主义，而且与地下考古的不断发现与民俗学的新成果完全不符。就所谓的神话人物来说，大禹也算一个，但只要我们看一看民间的“妈祖崇拜”、“关公崇拜”，就明白他们原是真人却因民众崇拜而变成了神，故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包括大禹崇拜，皆与此相同。





## 黄河文明荟萃古都长安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虽源于从大昆仑龙脉发源的长江黄河两条大河，但就其政治的中枢而言，确实是以黄河流域为根基最深，时代延续最久。中国古代最为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其国都无一例外地居于黄河流域。而古代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城虽曾为“六朝古都”，但基本上是在古代中国南北分治时的产物，其为南朝，虽繁华一时，却无法君临古代中国的全境。此种现象暗藏着古代中国民族与政治结构的命定式深层原因，自有其规律性可循。而就北方的黄河流域而言，在众多古都如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都城星座中，最能让历史成为坐标而又能让世界注目的，无疑当首推古都长安了。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这样说：看最近的中国历史去深圳，看百年中国历史去上海，看五百年中国历史去北京，而要看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就不能不去现在的西安，即古代的长安城了——长安城曾是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共历时十几个世纪之久。而在这十三个王朝之中，周、秦、汉、唐尤为辉煌，可以说是将中国的古代文化推向了巅峰。

古代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平原亦称渭河平原，渭河自西向东流过八百里秦川后到潼关注入黄河，把一片沃野膏腴之地留在了身后，故渭河当为关中平原的母亲河。渭河亦为黄河最大的支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最早最多的便是黄河与渭河，可见其与华夏早期文明的发祥关系之密切。

其所以周、秦、汉、唐等全盛王朝都要将都城选在长安，与其山水形胜、四塞为关的“金城千里”有关。关中的南面，秦岭逶迤连绵，像一道长龙。而它的北侧则由陇山、岐山、梁山、黄龙山、尧山、将军山、药王山、九崇山、五峰山等山系组成，南北群山夹峙，中间沃野千里，渭水缓缓流经东西，其他八条小河又纵横其境，委实一块风水宝地，可谓天造地设。可能有许多人都未曾注意，关中南面的秦岭，即是大昆仑山脉向东延伸的部分。大昆仑的主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新疆南境，走过西藏北





部,延伸至青海全境,此地兀立起东昆仑主峰——巴颜喀拉山,再延伸至阿尼玛卿山,再向东延伸为岷山,岷山向东便是逶迤千里的大秦岭。大秦岭不但是古都长安的南部天然屏障,亦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地理气候分界线。而如此一条大昆仑龙脉的向东延伸部分,秦岭千年以来佑护着它脚下的古都长安,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古文化中地理学与风水学的深层奥妙。

扩而大之,则古长安所依托的关中大地,乃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厚厚的黄土地层下,埋藏着一部由人类起源到旧石器、新石器,再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全部历史。其文化遗存之丰富完备,堪称华夏之最。一百二十万年前的“蓝田人”,三十万年前“大荔人”,六千年前的“半坡人”、“姜寨人”,古中华人类的祖先们一代代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进化、创造。在半坡博物馆里,劳动生活的人群古朴而自然,正如





《击壤歌》中所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为饮，稼穡以食。帝力与我何有哉？”此场景发生在六千年前，大约比炎黄二帝时代还要早。后来，历经夏、商、周、秦、汉，社会各阶层争斗的烽烟便一直在这片大地上间歇式燃烧。压迫造成了分工，而分工促进了文明。至今，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层中，时不时地还会挖掘出秦砖汉瓦。而名震天下的秦始皇兵马俑，其最初的发现者也竟是一位大字不识的老农夫。

地下考古的研究证明，我们对古代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常常会低估或小看，事实上，古文明中的许多精华部分，文化或科技成果，大部分被埋没或失传了。我们知道，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普遍使用于 4600~5800 年以前，而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则广泛使用于 4000~4600 年前，而此时的红铜文化也已成熟。至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则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秦时的铁器合金终于让后人明白：为什么秦灭六国竟像秋风扫落叶

一般无可阻挡。而秦统一全国后所设立的御路直道，其功能竟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由咸阳到北部边境上郡，即今天的榆林，驿马传信只需要一天一夜。种种地下的信息表明，古代中国的发达程度，常常要比我们所能猜测到的更为先进。

古长安城以汉、唐两朝最为壮丽繁华。

西汉初年，宰相萧何大修都城，其址选定在渭水以南，龙首原以北的宽阔平原上。环绕着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等宫殿群，高大雄伟的城墙成方形矗立。城内有八条笔直纵横的大街，160 个里巷，城外有 9 个里巷。就繁华程度和人口密集程度而言，当时居于欧洲大陆的罗马城方可与之媲美。

盛唐长安城位于龙首原以南，少







陵原以北的渭河二、三级阶地上,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全城有 12 个城门,城内如棋盘式对称布局,东西 14 条大街,南北 11 条大街,其中轴线上的南北向大街为朱雀大街,两边分为东市和西市。

唐代长安城的总面积为 81.3 平方公里,是汉代长安城的 2.4 倍,是现在西安旧城的八倍。由于由此向西便是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故当时长安城内常年居住着 5 万多外国人或少数民族。估计当时的长安约有 100 万人口,这对于还没有高层建筑的古代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与古代长安的宏伟壮观相比,与秦砖汉瓦一直影响中国 2000 年的硬件辉煌相比,则汉赋、唐诗这些文化软件的顶极成就更为恢弘与长久,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塑造可谓功德浩荡。尤其是一部洋洋 50 万言的《史记》,载史三千年,无韵之离骚,其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可谓是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司马迁这个伟大的名字,将与中华民族的典籍文化相始终。至于李白、杜甫两位唐代大诗人,其气象如汪洋,其文彩耀日月,留给后人的是汲取不完的精神营养与思想光华。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古长安城再辉煌,却难逃战火的毁灭和岁月的剥食,而《史记》和唐诗,却能够历沧桑而弥足珍贵,经风雨而更显丰采,其文其质其华,已构成了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结构的最重要部分。至今,我们已无法亲睹汉唐长安城,也无法让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复活,但我们却能从《史记》中,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篇中,去领略那个时代的风貌,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与那个时代进行精神的沟通与对话。正是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说:一切都会过去,只有文化永存!汉唐皆成历史,而司马迁、李白、杜甫却永远不朽!

汉代因诞生了司马迁而不朽,唐代因诞生了李白、杜甫而不朽,古长安城也因为孕育了这些以“立言”昭功于后世的文化伟人而骄傲。如果再往前推到西周时代,我们还应该记住另一位可以称为儒学祖师爷的周公。周公制周礼,定天下,其政治伦理道德的基本构架,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坐标。到了孔子时,礼崩乐坏、诸侯蜂起、天下大乱,孔子才感叹:“吾从周,郁郁乎文哉”!孔子的一整套儒家学说,说到底即是对周礼的恢复、弘扬与发展。故我们说,儒学的名声在孔子,而慎终追远,其根基却在他的祖师周公那里。而周公时代的都城镐京,无疑便是后来的汉唐长安城的雏形或发端。





综而论之,古代长安既是华夏文明的标志性丰碑,更是中华文化的荟萃圣地,中华历史因她而昭之于世,熠熠生辉。若套用一句眼下时髦的话来说,古都长安——历时十几个世纪之久的长安,便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传递给全世界的一张最响亮、也最具权威的烫金名片!

长安立于关中,关中皇天厚土。昔日的长安城延续到今日的西安城虽已褪色,但掩埋在黄土地下的一部五千年文明史却是历久弥新,更显光亮。如果说,到了今日的广州,每一个孩童都能向你兜售一番发财生意经的话,那么你到了今日的关中大地,几乎每一个老农夫都能向你讲述一部中国的古代史,从周文王周武王,再到秦始皇、汉武帝,从唐太宗的昭陵再到武则天的乾陵,其间的根根梢梢枝叶小杈,他似乎都有一本明细账,且谈兴如炽,其间的土话里还常常夹杂着许多古汉语——这真让人惊讶于这片最古老的土层里,恐怕每一粒砂泥都凝聚着一段古老的故事。而关中人从古代一直唱到今天的秦腔,其历代所累积的剧本所能涉及到的历史内容,竟能让一部二十四史也包容不下。好了!这就是关中,这就是古都长安的永恒文化魅力所在。权且用一首词作结吧:

### 渔家傲·关中

紫气犹绕王气缺,  
黄土高坡为谁设?  
周秦汉唐浑如昨。  
往事多,  
自有半坡从头说。  
古陶出泥叙前波,  
兵俑列阵战未歇,  
女皇犹自卧地阙。  
未了却,  
农夫讲史信有辙。



## 生态变化与黄河变奏

我们知道,在中国先秦时期,黄河是被称为“河”的,那一时期,“河”专指黄河,而其他水如渭水、洛水等便只称为“洛”或“渭”。这样,“河”专指黄河,并不与其他水流相混淆。大约是在战国末期,特别是在秦汉以后,“河”便逐渐与黄字连在了一起,称为黄河,大约到这时,黄河里的泥沙逐渐多了起来,河水开始变浑,故名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秦汉以前上溯至炎黄二帝时代,黄河的水流并不算混浊呢?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两千至五千年时期的黄河,其水流的澄清程度以及水量与流域内的植被良好程度,一定要比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要好得多,或者说,黄河当时就是第二条长江。

地质史及气象史的研究表明: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或上溯至史前时代,其气候温度非常类似于现今的长江流域,是一种亚热带气候。那时候,大象、大熊猫等动物广泛活动于黄河流域,而桔树、杉树等树种,也与黄河流域沾过边。至于像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河流湖泊密布、水网水系发达的景象,在黄河流域也曾长时期的存在,甚至还曾延续到宋代。那时候,黄河中下游的湖泊群如满天星斗落地,让今天的人们难以逆料,如山东西南部的巨野泽、荷泽,太行山东沿的大陆泽,河北中部的白洋淀等,其时都是水波浩淼的大湖泊所在。而小一点的湖泊群更是如繁星一般,洒满了当时的黄河两岸、泗淮之间。可以说,现今的中原一带凡是比较低洼的地方,那时候便俱为小湖泊,其水网密布蔚为大观,实难以让今天的人们相信。尤其一提的当属巨野泽,巨野泽即延至宋时被称为“梁山泊”的地方,其时水面已大幅度萎缩,而在先秦时期,巨野泽与南方的洞庭湖互为伯仲,不相上下,史籍中便有“南洞庭,北巨野”的说法,可见其势之一斑。而如今,巨野泽已淤为平地,相邻的荷泽也只剩下一个空名,但南方的洞庭湖依然存在,但其水域面积却是与古代无法相比了。

至于黄河中上游,那时候由黄河溢流所形成的湖泊也可谓星罗棋



布,如现在青海境内的扎陵湖、鄂陵湖(古称柏海)、青海湖(古称西海),甘肃与内蒙交界处的居延海,陕西的风陵渡,河南的三门峡一带低洼地,古时候便都是大湖泊的所在。如果绘一张秦汉以前黄河流域水网图出来,今日的人们一定会大惊小怪,莫名其异的。

时空与物象,历史与山川,气象与地貌,从古到今其实都在变化。而黄河的流量、色彩、缓急节律也在不断的变奏当中。一切都处在动态当中,一切都历经风雨沧桑,只是相对于人生的短暂而言,大自然的变化过程要迟缓和长久,故人的直观感受便常常显得迟钝。这样,人世的社会历史书和自然变迁的史书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史书是漫长时空里的坐标显示,是人类活动的参照系。离开了历史的坐标参照,人类便会因无知、盲目或浮躁而迷乱走失,干出许多愚昧或浅薄的傻事来。比如1949年以后持续至“文革”期间长江流域许多地方大搞所谓的“填湖造田”、“围湖垦殖”等,便是在摘除地球的肾,消灭生态的平衡器。而毁林造田、毁渔造林等举动,更是愚昧狂妄。其时的“以粮为纲”完全无视农林渔牧副的全面生态互动规律,让全国各地照搬“大寨梯田”模式,其后果已为20年后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田还湖”所代替,一借一还,让华夏大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代价似乎更高,大约在某些方面已无法弥补了。人们终于明白,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山水林农也是一个整体,只能协调适应,不能强行改造;只能天人一体,不能人与自然对立。所以,自那以后“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愚昧口号便被现今的“科学发展观”、“生态第一”等明智的口号取代了。这是真正的世界观进步,是人类准确找到人在自然界正确位置的重要一步,其意义要比发射一颗飞船到太空探秘重要得多,也宏伟得多。因为,这一思维观念的改变将关系到人类与地球母亲的和谐相处乃至共生共荣,而注目并向外空间发展,其目的也应该是与外空间和谐相处,而并非征服或毁坏!

问题又回到黄河水系的古今变奏上。由于气候干燥,降雨量递减,黄河流域的干旱已呈逐年上升之势。更由于黄土高原治理的滞后,水土流失的难以制止,而青藏高原也在发生沙化、植被破坏等因素,故黄河的水流流量在明显减少,且流入的泥沙量居高不下,致使下游的“悬河”愈悬愈高,让人担忧。最可担忧的,当为人口爆炸、工业用水增加以及城市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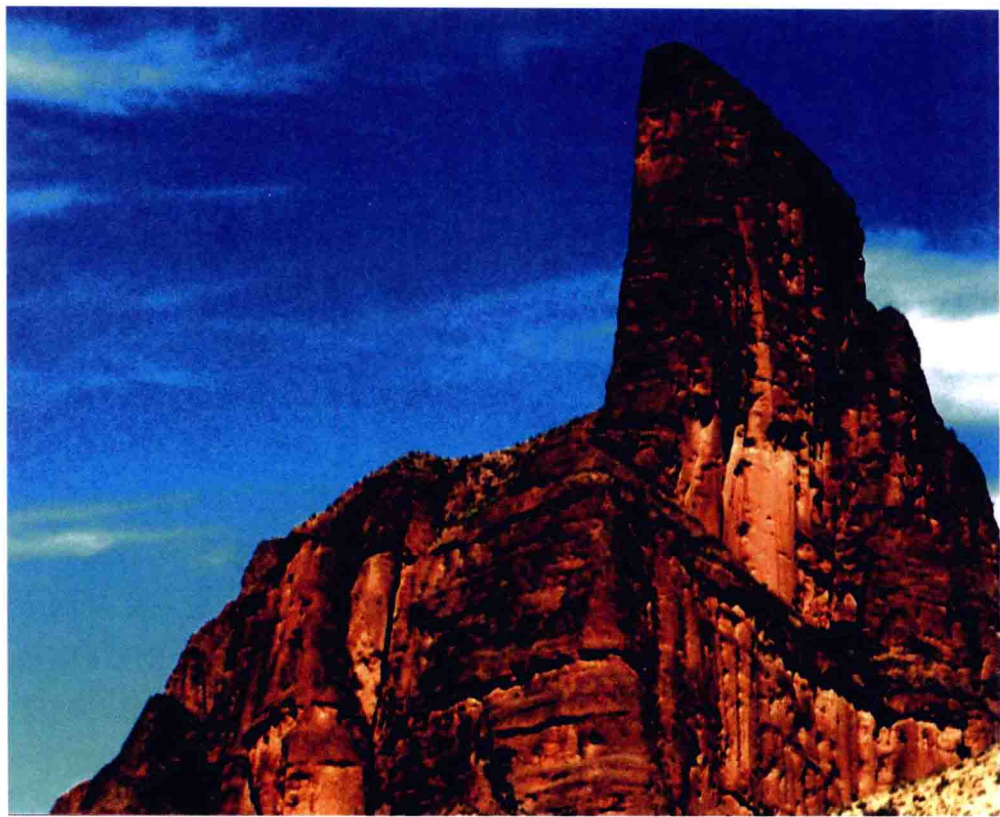




水的紧张所造成的“水荒”、“水缺”、“水贵”等现实问题。黄河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断流”现象,一直延续了近十年,后来虽由于上下游电站水库的调节而缓解,但“断流”的深层问题并未解决,黄河流域的缺水将严重影响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黄河乃北方命脉,一旦持续断水,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上游河源地区,冰川的后退实由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目前能做到的便是“三江源”的环境保护工程,即退牧还草、恢复植被等。中下游呢,则要恢复旧有的湿地与湖泊,不可能完全恢复,但能恢复的则要坚决恢复,不可犹豫。至于黄土高原的治理,则必须在全方位的退耕还林还草的基础上,进行小流域淤坝、还湖等有效措施,集少成多,积小成大,由点到面,连成一体。此项工程关乎黄河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没有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则无法奏效。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观点,即决不能让长江再成为第二个黄河!反过来说,倒是要竭尽全力把黄河恢复成第二个长江!要让华夏大地上一南一北两条巨龙万年齐飞,羽翼丰满,光彩永在。

长江与黄河的关系恰似亲弟兄,因为它们处于同一母体身上,黄河源在大昆仑的北麓,长江源在大昆仑南支脉唐古拉山的冰川下,一北一南,相距甚近。如果因为源头地区的破坏而导致黄河水流萎缩的话,那么,长江的水量萎缩也终会发生。应该说,上游植被的破坏在干旱年代会形成下游缺水,而在雨涝年代则会造成下游洪水,这一旱一涝导致的后果,最终都要由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代价。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导致几处管涌,几处小溃堤,其灾难性的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痛定思痛,检查病根,人们才发现上游的岷山、金沙江一带毁林毁草、乱垦乱植乃祸根之源。扩而大之,整个的长江上游地区,即从三峡往西一直到江源的数千公里地区,其两岸纵深植被的破坏俱让人触目惊心。嘉陵江、岷江、金沙江所处的大范围山系深处,无数的树木被砍伐了,成片的原始林被毁坏了,某些浅山坡地或台地上庄稼地代替了原有的自然植被,这样,洪水大雨骤然狂泻,漫山遍野泥沙俱下,三面汇聚,一线流注,全都倾入长江河道。奈何此,中下游再遭暴雨袭击,能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么?长江大水教训了人们,国家便决定在上游地区封山育林,退耕还草,这办法当然管用,只是必须以法监管,常抓不懈,有法必



依,违法必究。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可麻痹大意,致使前功尽弃。长江的水流现在也变得浑浊了,这很像两千年前的黄河,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据说泥沙量在逐年增加,若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它必然就变成了第二条黄河,这情景想象起来倒真是让人感到害怕。如不悬崖勒马,采取果断措施并施以综合治理,则其后果实难逆料。

可以说,黄河流域变迁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有资料与研究表明,黄土高原的植被及生态系统是在三千多年以来的自然冲刷与人为的破坏当中被毁掉的,而尤以人群的盲目垦殖和战争的毁坏为主。周秦时代,周原、董志原等一大批古时存在的大片黄土平原,因人口的增加和政府行为的垦荒种植,已逐渐被切割破坏。而到了汉唐时期,这种政府行为的盲目垦殖和军事性质的屯垦就没有中断过。到了东汉时代,因接收了大批来自西部羌戎地的羌人居住,便划拨了陇东、陇西、上郡即现在的陕北榆林一线的大片土地让其居住,结果是,盲目垦荒,滥伐森林,又一次让黄土高原大出血,水土流失明显加剧。若说到战





争的破坏,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而痛心疾首。秦末大乱,项羽入关,一把火烧了咸阳宫与阿房宫。刘邦立汉,萧何大修长安城,其宫殿所用原木木材,俱来自渭北塬上的天然森林,其滥采乱伐的景象可想而知。越过东汉到汉末大乱,董卓为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又一把火烧了洛阳宫殿群,又连带将整个洛阳城付之一炬。其时的惨状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白骨盈于野,千里无鸡鸣。”再经三国分治,战火一烧近百年。好不容易到了西晋统一,再又到东晋,然后便是五胡乱华与五代十国。其时的北中国地方政权割据,战火连日不绝,各路土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其时居于关中的有前秦后秦政权;居于山西的有北魏、东魏、西魏政权;居于甘肃河西的有北凉政权;居于青海湟水的有南凉政权;而居于河北的则有后燕后赵政权;山东的北齐政权等。据史书透露的情形,在此长达数百年的分治混战期间,黄土高原上的森林因兵燹战火、宫室营建而十毁有七,黄河也因水土大面积流失而愈显浑浊了。后虽相继出现了隋唐北宋等大一统局面,仍是建设少,毁坏多。黄土高原屡遭切割,毁坏与滥垦,从此便旧日生态不再,水土流失每况愈下,伤痕累累而苟延残喘了。黄河呢,水流滞缓而浑浊加重,于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干脆出现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上,古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北转移了。其所付出的代价便是:黄土高原的支离破碎与黄河流域的全方位大出血。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而又义愤填膺!

古代中国的大分裂怪圈实为黄河流域生态大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一切野心家和政治小丑乱臣贼子们则应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故我们看历史书,不能只看王朝更迭,胜者王侯败者贼,更应该看其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对于大自然的破坏,对黄河母亲的玷污,由此而判断其历史地位,或真或伪,或荣或辱,让历史作证,让黄河作证。

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杜甫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白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愿我们能善待历史,也善待现实。但愿长江能永葆青春活力!但愿黄河能恢复再造,变成第二个长江,而决不能让长江变成第二个黄河!



## 星宿海——柏海——西海

黄河在华夏民族衍生演变的早期,即距今四千多年前,其流量实为华夏境内的第一大河,这是有许多历史地理的变迁数据可为佐证的。那时的鲧、禹几代人治洪水,其主要地缘当在黄河流域,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时的黄河流量流程以及黄河泛滥改道的情形,今人是难以逆料的。现今的人们大约知道黄河在中下游常常泛滥改道的情况,如甘肃与内蒙交界处的居延海,今山东西南的菏泽,现在或为沙碛荒滩或为农田万顷,但其在历史上都曾为大泽或巨湖,实际上都是黄河在泛滥改道时的通道,或是黄河曾下过的一个蛋,也是黄河曾无数次改道的明证。这是黄河中下游的情形。而实际上,黄河自巴颜喀拉山的各姿各雅发源东流后,其在青海境内的改道就发生过多,其改道变化之巨大,让今人几乎不可思议。本文标题其所以为《星宿海——柏海——西海》,就是要说清楚,历史上的黄河,曾经把西海,即现在的青海湖作为通道的。而今,黄河仍从星宿海、柏海穿过,却把青海湖甩在了一边——这大约也是青海湖的水位在逐年下降的原因吧!

星宿海,顾名思义,乃一片湖泊群或水洼相连的沼泽地,从高处看去,恰像夜空中的满天星星坠落于此地,故名之。星宿海的地名古今无异,大约在唐朝时出使吐蕃护送文成公主的李道宗路经河源时就称其为星宿海,一直流传至今。细考察之,星宿海乃是一个东西走向约二百平方公里的椭圆形沼泽湖泊群,也是从源头流来的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交汇的地方。黄河源头南北分为两条源头河,靠南的一条叫卡日曲,即铜色河的意思。靠北的一条叫约古宗列曲,意为锅样盆地河。据考察认定,卡日曲这正源,约古宗列曲为辅源,两支源头均由西向东流过约 200 公里时,方注入星宿海,故星宿海便形成了如星斗落地般的湖泊群景观。很显然,星宿海是黄河源头向东流注的一片面积不小的洼地,故其形成的原因当缘于黄河。试想,假设黄河不流经此地,那星宿海的水源就无法补充,它



或许早就变成一大片干涸的草滩了。所以说,星宿海其所以为海,只能说明它其实是黄河在上游所下的一个蛋,也是第一个蛋。这个蛋,大约在古代更大、甚至会大出两三倍,那时候的情状,今人是无法想象的,就现在仍然沿用的“星宿海”这名字,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

应该说,对于黄河源头的考察,星宿海是一个最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所在。从唐一直到元、明、清,历代中原王朝都把穷尽河源、弄清华夏母亲河的所在作为一件大事来考察,这不仅是一种地理溯源的需要,也是华夏民族向心力的要求。试想想看,一个泱泱大国,一个由黄河哺育了数千年的伟大民族,连自己的母亲河都若明若暗,那将是何等的缺乏人文根由?据史书记载,唐代李世民派大臣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时,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穷尽河源”并绘出地图。当时,李道宗是将星宿海作为河源所出而报告给李世民的。如果就当时的国运实情来看,将河源定于星宿海,其大致应为不差了。

元朝时,都实作为勘舆专使,曾到过现今被称为巴颜喀拉山的主峰寻找河源。巴颜即为蒙语富饶的意思,而喀拉意为黑的意思,则巴颜喀拉意为富饶且黑色的山。对照此处山峰,四周群山均为浑黑状。清朝康熙时宫廷侍卫拉锡奉命探察河源,登塔拉高山观星宿海之源,在其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周围群山,蒙古名库尔滚,即昆仑也。”今查昆仑一词当源自阿尔泰语系,意为黑色的山脉。对照《禹贡》所言“河出昆仑”,可以说,从古到今对昆仑的释义已明确解决,而对黄河源头的勘察也印证了“河出昆仑”的正确,因为巴颜喀拉山作为昆仑主峰,其支脉各姿各雅山及黄河源头卡日曲,星宿海当然都包含其中,这当然没有歧义了。

现在该说到柏海了,这是唐时的旧名,史书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万余骑到柏海迎娶文成公主。这柏海即现今的鄂陵湖和扎陵湖,两湖东西相距不到 10 公里,西边的叫做扎陵湖,东边的叫做鄂陵湖,其中鄂陵湖较扎陵湖的颜色要深一些,这显然说明鄂陵湖的水位要更深一些。现在,这两湖成为姊妹湖,但在唐代以前,这双湖显然是连成一片的,故才可称为柏海。那时候的柏海,其面积大约是现在的两倍,甚至更大,这从两湖周遭的断崖地层分析中就可得出结论。现在,两湖相加,其水面面积尚不到 1000 平方公里,那么在唐代以前,柏海至少有 2000 平方公里的





水域。当年文成公主路过这里时,曾被浩渺的美丽湖面及湖边碧绿无垠的大草原所吸引,发出过赞叹声。而今,当我多次路经这里时看到的却是日渐萎缩的湖面,以及湖滨上沙尘与绿地争夺地盘的情景。很显然,青藏腹地的日见干旱,气候变暖导致了降水不足,再加之黄河源头的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流量减少,自然就导致了两湖目前的窘况。

黄河从西面的星宿海向东流去,水程不到 70 公里就从西南角注入扎陵湖,再从西南角注入鄂陵湖,最后却是从鄂陵湖的最北角流出,逶迤向东,然后又东南拐去,直奔六十余公里外的黄河上游第一县——青海玛多县去了。如此看来,是黄河的活水连起了这双湖,也是黄河之水哺育了这双湖,或者我们竟可以很明确地说,古之所谓柏海——即现今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其实是黄河在上游地区所下的又一个蛋——姊妹蛋。

说到青海湖,国人都很熟知,因它是我国境内最大的咸水湖,面积大约 4000 平方公里,古称鲜海或西海。但是,若说到青海湖在远古时代曾是黄河的通道这一点,大约就没有几个知道了。据地质调查证明,大约在





距今 13 万年左右,青藏高原持续抬升,而青海湖地区亦处在抬升带上,这样,青海湖东岸的日月山便逐渐隆起。结果呢,使日月山垭口的黄河出口河道变成东高西低的状况,形成了后来的倒淌河——即从日月山雪山下向西流去的一条河。这条河因其反常的流向让人觉着奇怪,岂不知它曾为黄河流经青海湖后又夺路流出的通道。当时的黄河,大约是从现今的龙羊峡一线向北,到恰卜恰后再到江西沟入湖,此处为青海湖的正南方向。而黄河出口处的倒淌河则在湖的东隅一角。后来黄河改道后,便由龙羊峡一线直接向东了,其距青海湖的直线距离当在 100 公里以上。

在黄河流经青海湖的漫长岁月里,青海湖的面积一定非常大,那种烟波淼淼或大浪滔天的情景几乎难以想象。即就是从华夏文明演化成长的这五千年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从古籍中知道一些关于西海的信息,知道那一片西部的大海曾与古羌人、鲜卑人、蒙古人和藏族人都有过休戚与共的命运连接。古羌氏族时代的西王母传说,其瑶池即是西海。试想想看,她的部落国家拥有这一富庶广大的环湖草原,其国力及名望能不远



◇ 星宿海

—— 柏海

—— 西海

播四方吗？

总括而言,黄河在其上游地区的历史变迁是巨大的,持续不断的。而星宿海、柏海、西海等高原湖泊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河的流变与演进。一句话,黄河并非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样子,它处在大地质、大气候变化过程当中,或涨或落、或肥或瘦,其命运都与其子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需要用科学态度和赤子之心关注母亲河,研究母亲河,并永葆母亲河青春常在,清流万里,永滋华夏大地。





## 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黄河是一条巨龙。它盘绕飞动，一头冲向山东半岛营口市的海湾，而尾巴却在东昆仑的各姿各雅山下的河谷里摇摆——那儿名叫卡日曲，是由五眼泉水汇成的黄河正源。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全长 5464 公里，而各姿各雅山的海拔为 4830 公尺，也就是说，黄河是从将近 5 公里高的昆仑之巅一路向东奔流，挟雷带霆，倾泻而下，穿山越障，无可阻挡！在纵横了整个北中国之后，汇入大海。难怪诗仙李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无疑，黄河是一条巨大的生命体。

它热情奔放而又深沉平静，有时候也会狂傲不驯。它具备全方位的性格，在不同时空背景上会展示它不同的性格侧面。

曾有朋友问我：如果从飞机上俯瞰整个黄河，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说：你会看见一条银龙从西部的崇山峻岭中钻进又钻出，九曲回环，逶迤向东向北，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绕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后，突然掉头向南，穿过南北走向著名的晋陕峡谷，又猛然转弯向东，冲出中原，一头向渤海湾冲去！一句话，它是舞动的，曲折向前的，虽千绕百回却绝不回头！

朋友说：如此说来，黄河倒更像一个巨人，历尽沧桑。

我说：读懂了黄河，就读懂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

朋友说：这太沉重了。太累！

我说：正因为沉重，才有纵深感。而纵深感才是生命体验的华彩部分。为什么要拒绝呢？

朋友不语。稍后又问我：如果不可能从头到尾游一遍黄河上下，那么，挑 3 个点，横断面，该选哪几段？

我说：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朋友说：游览壶口瀑布，再游览黄河入海口，这都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交通方便。可要去一趟黄河源头，路途实在遥远，再说，大概公路也不通吧？

我说：从古到今，能一览黄河源头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真正有幸勘察到黄河正源卡日曲的科学家，则更是凤毛麟角了。说了你可能不信，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元、明、清，一千多年来，历代经朝廷派员勘察，竟一直未能穷尽河源，或者是到了河源，却无法判定三条源头小河中哪一个属正源。三条小河，由南向北，分别叫做约古宗列曲、扎曲、卡日曲，都有相当的长度。

朋友问：那最后确定卡日曲为正源，理由何在？

我说：按地理学上对测定河流源头的原则，以流程最远且流量最大者为准。当然，最好是源头的水在干旱季节也不断流为最重要。而卡日曲的源头因有五眼泉水常年不断流，故被定为正源便更具权威性。

朋友问：这么说，你去过卡日曲？

我说：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我都去过。并且因为我长期工作在青海，又因为电视工作的需要，我去卡日曲已不止一次了。

朋友很惊羨，神色飞扬，希望能听到更多的细节。是的，能亲临黄河的全程，当然是人生的莫大幸运。

而能亲睹黄河巨龙的龙头、龙尾、心脏部分，也不失为人生的一大幸事。

如果说，黄河龙头在入海口，龙尾在卡日曲，那么，它强大搏动的的心脏就是壶口瀑布了。把这三部分联系起来看，你会被震撼，被激励，被感动。你甚至会深深地敬畏、崇拜，也许会激动得热泪长流。

我忘不了在黄河入海口看到的那一幕。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时光，我站在一个视野最宽阔的制高点上，眼前是一片片无遮无拦的天地。

河面由西向东北方向铺开、再铺开，成为一个愈铺愈广阔的巨大的扇面。由于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水浑浊而呈土黄色，在斜阳下涌动着，似乎是悄无声息但又毫不迟疑地涌动着，像熔岩一般充满着质感与力度——在这浑黄的大扇面流体色块与那湛蓝的大海碰撞的一刹间，我听



见了天地间一声声酣畅淋漓的轰鸣！这轰鸣持续不歇——那是滚滚黄河投入大海怀抱时无限幸福的喘息！

一边是湛蓝湛蓝的海水。

一边是浑黄浑黄的黄河。

突然就碰撞了，在慢慢地融汇、融合。大海以接纳滚滚不断的黄河水而显得博大宏阔。

融进大海，便逐渐地还原水的本色。黄河以投向母亲的怀抱而纵其游龙的天性。

那一刻，我因感动而沉思良久。

“黄河入海流”——这是一次伟大的回归；同时也是它在天地间周而复始运势的开始。

有人说，黄河下泻大海每年带来了上亿吨的泥沙，这都是上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中华大地上的大血管破裂，只要看一看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你就会明白这伤口何其严重？我说，这话只对了一半，同时又错了一半。就看看我脚下的这块生机盎然的黄河三角洲吧，它每年都在以 30 万亩的速度在增加。而且，就在黄三角的后面，那广袤数千里的华北大平原，不正是滚滚黄河在近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冲积而成的么？有弊才有利。利弊相较，黄河对华夏大地的贡献仍然是第一位的——这大约也可以叫做大河辩证法吧。

顺着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走去，我看到面积达 20 多万亩的人工刺槐林，这里真是一座硕大无比的绿色的海，生命之歌的海。而作为全球十九大湿地之一的黄三角湿地，既有壮观斑斓的由赤碱蓬构成的“红海滩”，也有一望无垠、品质优良的“芦苇荡”，其间百草丛生，万鸟翔集，金雕、黑鹳、鸿雁、丹顶鹤，各类鸟群竟达 170 种，连同各类动植物共达 1528 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旅游期间，让人心旌摇曳又收获良多。我想，有这样一块生机无限并且逐年都在扩大的黄三角地带，人们对黄河泥沙的认识大约可以平衡了吧。

当然，对于居住在晋陕峡谷东西两边沟壑间的人们来说，黄三角的富庶美景真会让他们嫉妒并眼红。但是且慢，只要一说到六百里峡谷出口地的壶口时，大家都禁不住要癫狂骄傲起来：“壶口！壶口瀑布！那可是



“十万里黄河的心脏啊！”

此话不错。

我有幸在夏日里由北向南走过晋陕峡谷，那实在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记忆：

滚滚黄河被夹持在数米宽或数丈宽的峡谷中间，由于比仄陡峭，河水便一年年地向下切割，两边的陡崖便愈加峥嵘险峻，而这环境更衬托出河水在深涧下的咆哮奔腾，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有时候，河面宽阔起来，那激流便显得稍为平静一些，但这种平静是表象的、虚假的。只要你驻足观看，就会发现那河面仿佛金属般变成了块状，朝向太阳泛着金属般的光泽，一块块地冲撞着，推挤着，争先恐后地向前涌动，随着地势的起伏挤压变形，轰轰烈烈地一路撞去！充满力度充满质感饱含激情。突然，壶口到了，激流因猛一展开又猛一收缩而跌下壶状半绕的悬崖！那悬





崖下高高低低、错错落落，激流便跌落成无数个或高或低的瀑布群，高下呼应，错落鸣吼，搅起满壑雷霆，声震十里，轰鸣不绝。

有人说，这是黄河在发泄愤怒！

愤怒的黄河，怒吼的黄河——这不正是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那一曲《黄河大合唱》的主旋律吗？

对了，只有在壶口，只有亲睹一次壶口瀑布，你才会理解什么叫黄河？你才会理解什么叫民族魂魄。我甚至敢这样说，一个没有感受过壶口瀑布的人，其生命血液里一定会缺失某种特殊的激情元素。我甚至还可以断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如果未到过壶口，他是一定写不出《黄河大合唱》那样的旋律的。

听专家说，壶口的半圆形环崖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时光里，竟因河水冲刷后退了近百米之多。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黄河那不动声色而又有声有色的韧性伟力——这韧性伟力才是黄河不变的本色。

在观看了黄河入海口的壮观景色又亲睹了壶口瀑布之后，新世纪开始第一年的夏天，我终于有机会第三次来到了巴颜喀拉山。由山口下的便道西行，我们的越野车在高低不平的河谷间向各姿各雅挺进。河谷里草细石多，便道忽上忽下，忽高忽低，越野车变成了一跳一跳的旱獭。好在同行者大都有一种兴奋感，颠簸之苦便也在说笑声中溜走了。从车窗里看远处的雪线脊线，忽近忽远，似乎是在与我们捉着迷藏。大约跑了七八个小时，卡日曲终于在夕阳下向我们展示了她神秘的真身：这里是各姿各雅山的北麓，山坡愈靠河谷愈显缓慢肥腴、细密的草甸随着河谷起伏，四野里弥漫着青草与湿地的气息。远远地，一条蛇一样的小河在夕阳下发亮。顺着河谷的起伏，小河便蜿蜒如飘带。摄像师大喊停车！我们便抓紧下车，架机拍照。其时光线正好，一行人忙活地酣畅兴奋。我急忙跑到那河边观察，目视那河宽约有3米许，水清可鉴人。再伸手试那水深，约在30~50厘米之间。心理突然就有了一种朝圣般的满足——这是黄河母亲的圣泉啊！

第二天归途中，我忽然诗兴大发，一路哼来，竟哼出数句歪诗，聊作纪念。现不妨抄录如下：



## 水调歌头·河首

思追黄河象，  
心系古龙石。  
千里驱驰难觅，  
河首藏若迷。  
忽远忽近雪线，  
忽上忽下山脊，  
车行旱獭移。  
巴颜喀拉险，  
各姿各雅奇。

坡自弯，  
水自曲，  
求何易！  
千呼万唤始见，  
河首卡日曲。  
天静云阔草细，  
脐泉如蛇奔逐，  
天籁大音稀。  
且驾河曲马，  
狂追大河去！

现在，“三江源”地区已成为国家级生态保护区。除了黄河源，还包括长江源、澜沧江源，总保护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保护项目，将确保大昆仑的生态再造与永恒圣洁，也会让具有“中华水塔”之誉的“三江源”地区永远天蓝地碧，水清草绿。

我又一次遥遥地听见卡日曲河轻唱着流下雪线，像银蛇一样地舞过草地，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流淌——永远地流淌——







◇ 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 再塑昆仑

莽莽昆仑,如巨龙般延伸于中国苍茫雄浑的西部版图。它不但孕育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更支撑了华夏文明五千年的精神脊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象征,更是一种民族伟力的图腾。

如果说,长城作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图腾,至今还以强大的磁力,凝聚着祖国大陆与海外华夏子孙的向心力的话,那么,昆仑则作为古老的自然图腾,成为连结中原与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最牢固的精神纽带。它既是山水的脊梁,更是文化的脊梁。

宏伟的气势辐射,瑰丽的神话想象,借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山水人格化。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人合一,包容时空——这就是伟大昆仑文化的真髓精义!

万水之源,千山之祖,百川归海,百族一统,——这就是伟大昆仑文化的磅礴内涵。

昆仑山,包括唐古拉山,一直作为黄河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其实,正是这雄踞于中国西部数千里的雪山冰川,才造就了中国东部少有的肥田沃土,平原绿洲。对于莽莽昆仑来说,那些点缀在东部版图上的平原沃野只不过是一块块小小的庭院。

古代中国人,由于受到交通工具、测量仪器和科学视野的局限,他们对昆仑山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大范围的,从而富于想象的色彩。其实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界定,才赋予了莽莽昆仑以更为丰富的内涵魅力。在这里,地理意义上的昆仑、神话意义上的昆仑和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昆仑三位一体,互为渗透,内蕴博大,贯通古今。

可以肯定的是,从青海湖周围一直到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了现青海省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昆仑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祥地。而诞生在这一神秘地域的声名远播的人物——西王母,则无疑地奠定了昆仑神话的人文基础。





远古青海地区,气候温润、草木丰茂、鸟兽翔集、风光独异。当内地因为江河泛滥、洪水肆虐而危害众生时,这里却因独处高地而能长享清平。

昆仑何其雄伟,昆仑文化何其神魅,它穿越时空,连接过去与未来。惟其如此,它才在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心上,留下了永远不灭的崇拜与向往。

如果说,三千多年前周穆王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西王母,表明了中原农业文明与西部牧业文明的第一次碰撞的话,那么,那一段原本真实的历史则更多地为神话传说所涂抹。事实上,深藏在昆仑山中的这一方小小的海子并不就是真正的瑶池——真正的瑶池大约更像是烟波浩淼的青海湖。

而西王母,这位三千年前羌族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女性代表,正是在这碧草连天、牛羊成群的地方与乘马东来的穆天子进行了那一次让后人猜想不已的历史性会面。而与这一次历史性会面相对应的文化背景,便是河湟地区斑斓的彩陶文明。考古发掘已证明,在这段历史期间和以前,河湟地区的彩陶流成了河。让人们感到回味无穷的是,在一些最为珍贵的彩陶绘画里,明显有着西王母时代虎头豹尾服饰的影子。

如果上溯更远,我们便会发现,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辕皇帝,其文化之根和发展之路也都和西王圣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轩辕皇帝与蚩尤决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西王母的鼎力相助,轩辕皇帝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了。远古时代的真切画面被时空的渺茫和传说的想象弄成了斑斓迷离的神话。于是,王母瑶池、蟠桃盛会、天上人间、玉皇大帝——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就这样形成了!毫无疑问,在中国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西游记》里,这种神话体系得到了最为具象的展示。

无疑,西王母和轩辕皇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西王母既是一个女王又是一个部落国家的名字,由于她的代代相传的缘故,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轩辕皇帝到周穆王到汉武帝等中原帝王都与西王母有幸会面的史实。

民间传说认为,五千年前初始的西王母最终衍化成王母娘娘的传



说。而轩辕皇帝则演义成为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昆仑神话则以他们为轴心逐渐形成了,而且愈到后世,便愈发展得更为完备和充满魅力。

应该说,中国人不乏想象力,中国的典籍中,也不乏永存魅力的神话。但是,在漫长的牧业文化与农耕文明的进程中,这种征服自然力的企盼却难以得到事实上的兑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当那位傲立东方的伟人吟唱出这一句震古铄今的诗句时,他当然也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为这一昆仑神话与现实存在的对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发展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那位不尚空谈的老人用这两句话重新唤醒他的祖国时,昆仑文化便也翻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延伸的,而无疑只有中国西部的真正崛起,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真正腾飞。发生在昆仑山下的一切变化,不但向世界传递着中国阔步前进的强大讯息,更透视了昆仑文化的复苏与重构。

在这里,山水有灵,荒凉有价,文化有声,人生有色!崛起在亘古荒原上的昆仑新城格尔木,以它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向中国,也向世界弹奏着一曲美妙的立体交响!

如果说,毗邻港澳的深圳,仅用 10 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而一跃变成拥有巨大资产的现代化大都市的话,那么,这其中的秘密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说,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与港澳资金优势结合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一个远离内地发达地区,既不沿边又不沿海的戈壁新城来说,它的 10 年发展史,旧貌换新颜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现代神话了。

不言而喻,神话的创造需要想象力,而神话的现实兑现却需要创造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完美结合,既造就了一代昆仑新人,更重构了一代昆仑文化!

如果说,昆仑人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曾形成了引以为豪的高原精神、昆仑精神,形成了流汗加流血的奉献精神的话,那么,当市场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时,他们便及时调整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



度。观念的根本转变引来的是行为的根本转变,是经济的强化发展。一切的思想僵化必须打破,衡量进步的标准只有八个字,那就是:综合效益,全面发展!

讯息、技术、资金、人才、价值、效益——这一切对于他们原本并不太熟悉的运作字眼,如今已化作他们行为方式,注入他们的血液之中,激荡起他们创造的热情,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效益。

昆仑城不同于内地沿海发达地区。它既缺少海运空运网,更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网。但它恰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辖区面积,拥有国内最多的矿藏分布,拥有世界最大的盐湖资源,拥有海拔最高的石油炼塔,拥有储量可观的昆仑美玉,拥有人均世界第一的水资源,拥有最大面积的宜耕农业荒地。而钾、镁、碘、铷、钨等矿产储量皆居国内之首。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居全国第四位。各类资源的潜在价值约在 20 万个亿左右。

更为重要的是,昆仑城辖区内的格尔木河和那棱格勒河水,将会规划建设起 12 座以上的国内最密集的梯级电站,而长江黄河两条大河的上游水源,更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滚滚财源。

昆仑人觉醒了!昆仑人看准了西部资源与东部资金的接轨。昆仑人更看准了西部资源与国际资金技术的接轨。外引内联,借鸡下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战略思想的明确定位,引发的是战术求胜的全方位辐射!

曾经有一位西方的水利专家,当他站在黄河边上,看滚滚浊流拍岩东去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黄河里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啊!”另有一位西方的水电专家,当他考察了长江的全程后,也不禁发出了另外一种惊叹:“长江无疑是世界上罕见的黄金水道!”

昆仑人有足够的理由自豪:因为他们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源头。这里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源,更是包容历史的文化之源。李白曾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千古佳句,而杜甫更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豪迈绝唱!

远在四五千年前,华夏大地上就出现过大禹那样百折不挠虽九死而不悔的治水英雄。在那个洪荒年代,生产力近似原始状态的情况下,大禹更是凭着他的勇毅和智慧,带领千万民众平息了危害华夏大地数百年的





洪水之害。传说大禹曾到过黄河上游,现今昆仑山余脉的积古峡谷。大禹的壮举,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意志力的最早证明,也是昆仑文化磅礴内涵的最早证明——有意思的是大禹也是昆仑神话中的法力无穷的著名人物。

大禹精神早已化入中华民族的文化魂魄之中,而无疑现今的昆仑人更有理由证明他们才是大禹的传人:因为昆仑人所面对的白手起家的创业环境与大禹当年的创业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时代已不可逆转地跨向了 21 世纪。

如果说,大禹治水是在给横流无定的红河理出一条确定的河道的话,那么,现今的昆仑人却是在给黄河长江两条桀骜不驯的巨龙锁上龙头,让它们遵从人的意志,去造福华夏大地的南北两岸。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黄金地段的充分利用,将会为黄河中上游的防洪、灌溉、防凌、旅游、环保等综合功能提供无限广阔的前景。

直岗拉卡水电站、公伯峡水电站、积石峡水电站、尼那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等 13 座大型梯级电站的相继开发,其水力资源





蕴藏量高达 4700 万千瓦,年发电量至少在 410 亿千瓦时以上。

——昆仑文化、黄河母亲的伟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地焕发出它应有的青春活力,它潜在的力量一旦被现实呼唤出来,一切远古的瑰丽神话幻象便化作了立体的真实图景!

源源不断的强大电流从江河上游的梯级电站里输出,以它无私的光明照亮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江河源头的昆仑冰川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它庄严地存在、以及存在的庄严与辉煌。

地球上很少有像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更少有如此长度的大河流程全部属于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中国却拥有了,因为中国拥有了地球的脊梁——那就是横天而卧的伟大昆仑!那就是连接远古与未来的伟大昆仑文化!

我是昆仑,我是冰山,  
我是黄河长江的故乡。  
山海易位,风雨沧桑,  
说不尽远古辉煌。  
左臂是河,右膀是江,  
我拥抱华夏之邦。  
我是再造的神话,我是奔腾的希望。  
把梦幻变成现实,  
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可以说,华夏文明的一切演变痕迹都可以在昆仑的底色中找到根据,而民族精神的唤醒与勃发,无不与昆仑的伟大存在相呼应。在昆仑文化的底色中,我们看到的是天人合一的雄浑与苍劲,看到的是气象万千的达观与神魅。而现当代的许多艺术家,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艺术的美感与创作的冲动。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扫阴柔落魄之气,一扫沉闷僵化之风,精神再造的光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瞩目,催人奋发。

在昆仑文化的再塑中,昆仑人追求的是一种全方位、立体性的文化精神,他们把艺术看作是一种软件的建设,而把建设看作是一种硬件的艺术。而这种软件与硬件的完美结合,就构成了昆仑文化具有现代意义的再造——它当然也是古老神话文化的必然延伸。

中国历史上曾有“昆仑安，则西陲安；青海安，则西藏安”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对昆仑文化内涵辐射的又一种富于现实意义的诠释。今天，经过昆仑人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与创造，横跨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和输油管线以及兰西拉光缆的开通已无可替代地在地球最高处留下重重的印记——它恰像昆仑伸出的两条坚强臂膀，把西藏雪域牢牢地拥抱在伟大祖国的胸前。

昆仑既是登山探险者的圣地，也是创业开拓者的战场，昆仑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昆仑文化自古迄今的延续中，特别是建国后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历程中，有多少昆仑的伟人前仆后继，拓荒奋斗。他们中既有老一辈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也有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秦文贵同志；有被誉为新一代“血祭唐古拉”的英雄张鼎全烈士，更有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而献身的“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等。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和业绩，表明了他们才是大禹的真正传人，正是他们，赋予了亘古昆仑以不灭的魂魄，而亘古的昆仑则赋予他们以凛凛的身架。

无疑，昆仑山脉柴达木盆地作为中国西部的资源宝地，以它俯瞰世界的眼光，同时也让世界对它仰视。目光远大的投资者义无反顾地走向这里，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收获是效益、市场和昆仑文化。他们把自己融入昆仑的博大精魂，同时又使这种精魂得到新的升华。

“务实求强，多元发展，诚朴取信，勤智可托”——昆仑人具有不断求新的改革精神，而昆仑文化则具有无限辽阔的包容性。他们深深明白：昆仑文化既有神话文化的积淀，开拓文化的传统，更有一种和平文化的从容气度。它既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精神，更追求一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汇合。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多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伟大诗人和政治家毛泽东在 60 年前写下的神圣预言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不谋而合。而昆仑人将以自己的智慧与创造，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这个昆仑文化的终极目标！完成这个远古神话与现代科学的辉煌对接。完成伟大昆仑文化的再造与重塑！

——昆仑永恒，文化不灭！

触摸大昆仑







## 神域魔境

### 青藏雪域,西王母故地



无疑,青藏高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神秘恐怖的。它的大跨度高海拔,它的雪山佛塔,它的险境魔幻,它的缺氧威胁,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谈虎色变。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于是,一切神话才具备了前提。光怪陆离原是人类想象所辐射的碎片,然而一经恐惧与神秘结合,便衍生出无数的神话故事。神话是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但在青藏高原的特殊文化系统里,却常常变成了人对自然力的臣服与膜拜。或许这一切原本无可厚非,只是更加加深了这雪域高原的神秘难测。

在远古的土著居民的想象里,昆仑山是作为男神而存在,西海(青海湖)则作为女神而存在,昆仑为阳,西海为阴,阴阳结合,天地归一。于是,对昆仑和西海的顶礼膜拜就成了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后来,当中原文化逐渐进入青藏高原,原始的男神女神观念便衍化成新的神话传说,昆仑山被说成是玉皇大帝的九重宫阙,而西海则被说成是王母娘娘的瑶池。并由此派生出天地十八层,派生出各路天神地鬼,天兵天将和阎王司命。总之,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对应于天宫地府上下尊卑森严排列的神话体系就这样形成了,它就是至今还影响着我们民族心理的昆仑神话体系。在古典小说《西游记》里,这种博大的神话体系得到了最完整的具象展示。

但是,藏民族毕竟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神话想象的民族,当他们逐渐取代羌族而在现在的青藏高原站稳脚跟以后,他们就很顽强地用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给这块高地涂上他们特有的宗教色彩。在这种宗教色彩的覆盖之下,昆仑山(包括念青唐古拉山)不但是众山之王,而且是众神之王,是山之至尊,亦是神之至尊。这样,四面八方的山都要向它匍匐,向它

膜拜。而生活在这广大土地之上的山之子民,则只能永远地匍匐在众神即众山脚下。众山给他们提供了水草和牛羊,这即是神的恩赐,因此,对于神山的任何得罪都将招致惩罚。无疑这是事实上的泛神意识,也是最原始的宇宙精神。时至今日,人类所拥有的全部现代科学知识需要彻底揭开一切远古神话和宗教神话的裙裾,而对于把它的几乎所有大山都命名为各路大神的这方雪域世界,科学的界定和综合分析已变得刻不容缓了。

沧桑变化,山海易位,自然界演变的漫长和巨大使人难以想象,但人类毕竟可以借助现有的技术和知识追溯或透视远古的渺茫图景。不管青藏高原是从它原位的古海中站立起来也罢,或者是从遥远的大洋中漂移过来也罢,总之是自从地球上隆起了这块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之后,地球的其他部分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它原有的面貌。就像卓然崛起的一个强大家族必然要改变他所统领的地域民风一样,青藏高原无疑成了认识或审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科学制高点。科学研究和人类的综合经验已经证明,当青藏高原在地球上逐渐抬起它高昂的头,相关效应出现了:亚洲季风形成;西域砾岩、玉门砾岩开始堆积;黄土被季风由西北戈壁大漠中吹起,堆积在荒漠草原地带的外围,于是造就了黄土高原。与此同时,赤道高空空气激流的形成,从夏天的青藏高原气候中获得动力,西行到北非沉淀,促成了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如此看来,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存在,对于地球的冷暖温热,对于地貌地床的形成,对于动物植物的繁衍,对于地球生态的林林总总,都构成了巨大的实际影响。它既是一个独特的地质、地理单元,又是整个地球的脉搏。而无疑作为全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一制高点,也就成了最具深刻意义的地球生命场了。

青藏高原接近 200 万平方公里的庞大躯体上,至今仅有 1000 余万的人口。在一块块被凛凛的雪山擎起的雪线草甸上,构成了一个个人类难以涉足的“无人区”,可可西里、三江源等,恰恰因为命定的原因而成为野生动物群的最后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青藏高原实在是人类的文明触角和野蛮触角都最少涉及的地方。于是,珍贵的野生动物群的最后疆界终于坚守了,这实在也真是一种自然和人类的最后幸运。

中央电视台在 1993 年 3 月 21 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据测,





青藏高原的大气和自然保护属良性状态。未发现酸雨现象,其他的工业污染程度也远远低于内地地区。

每一个生活在这块高地的人们有理由感到自豪。

每一个生息在这块净土的并不谙人语的野性家族也有理由感到幸运。

人们总会想当然地把阳光、蓝天、白云这些现代人视为最可宝贵的自然恩赐和大海联系起来,其实,博大雄阔的青藏高原是蓝天白云和阳光最美好的地区。格尔木、拉萨,都是当之无愧的日光城,也是世界上两座海拔最高的城市。其吸引世界上各种肤色人群的热切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形成正比的是,在这一方八倍大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土地上,在它的极具特色的高山裸岩带、高山灌丛带、针叶林木带、次生灌丛带、草甸草泽带,生活繁衍着大批大批的野生动物群。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有兽类 150 余种,鸟类 500 余种。被国家列为一类保护动物的有 20 余种,被世界野生动物组织列为濒危物种的至少有 5 种。更为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性家族因为和人类“侵入”远隔着高山沼泽的屏障,它们便更多地保持了它们作为自然之子的野性面貌。

在唐古拉山下的原始草甸上,我曾亲眼看见过一群和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并头狂奔竞赛的野驴(俗称野马,属一类保护动物)。时值夏天,四野碧草如茵,远处朝霞湖光。这群野驴大约是第一次看见汽车,一种特有的野性与好奇诱使它们用劲健的四蹄和人类创造的汽车轮胎比试高低。我们的司机小黎仿佛要和那群天之骄子赌气,借着草甸平滩开足了马力,在剧烈颠簸中的我们一齐瞪大发狂的眼睛,窗门外近在两三米之畔的野驴四蹄腾跃如飞,那一个个巨大的富有弹性肌肉感的侧体给我们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与想象。好呀!真正的天驹神马,真正的天之骄子!它们的桀骜不驯和野性结构让一切人类豢养的马匹相形见绌。那是大自然原有的野性精灵,那是不受羁绊的自由驰骋和任性挥洒,那是集雷电飓风于一体的力量与速度,神情与天韵。记得当时我们车上的 4 个伙伴都惊叹极了!惬意极了!我们都莫名奇妙地欢呼着、嚎叫着,似乎要把我们被天马蹄足蹬腾起来的激情掷向窗外。突然,狂颠碰撞的越野车戛然刹住,紧急收束使车体发出一种短促沉重的嘶叫。同时,使得一直与汽车并行狂



奔的野驴们倏然间闪到了车头的前面,它们放慢了速度,侧斜了身子朝向我们的车窗张望。这时候,我看到了从那匹灰黑硕健的领头野驴的眨动着的双眼里闪射出来的得意惬意舒意纵意的神色,它还异常骄傲地摆转了一下它的漂亮的头颈,把目光定定地落在我们的身上,那意思仿佛是在对我们说:“认输了吧?我们是天驹哩!”

那一次和野驴群的不期而遇和心照不宣的赛跑成了我们几个人日后的一种骄傲和谈资。无福见到过野驴的人们禁不住都要流露深深的羡慕和长长的惊叹。是啊,迄今为止人们在电影上看惯了的一切所谓英俊善驰的欧洲马或亚洲马、澳洲马和美洲马,它们都更多地融和着人类征服的印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骑手们的俘虏,因而也就只是人的某种工具和意志力的延伸。这和那些一直生活在大自然原始状貌环境里的野驴们比较起来,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真品和膺品的区别了。

如果说野驴的形象和状貌使人联想到作为人类伴侣的豢养马群的悲哀,那么,栖息奔跑在荒野岩林中的藏羚、岩羊、盘羊、原羚、普氏原羚等动物群则使人联想到作为家畜羊群的温驯和可怜。是的,家畜羊群虽说由于对人的依存而占据了肥美的草场,但它们却毫无疑问地付出了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它们的最终结局只是作为人类的盘中餐和身上裘。每每想到这一层,我就会用一种无限悲悯的眼光看着那些踟蹰在牧羊人的鞭子下的生灵;同时,又不得不对那些自由奔跑嬉戏在岩石高山上的野性羊群们投去宽慰的目光。我曾有过持枪钻进沙丘深处猎捕黄羊的经历。那时正是黄昏,当我从沙丘的顶端探头探脑地向山环里的湖泊窥望时,一大群排着横队的黄羊正一一站在湖边饮水。它们扬着柔韧的脖颈,左右张望几下才伸进湖里优美地喝水。那一群至少30只黄羊,密匝匝地就摆放在我枪口射程之内,当时还没有禁猎的红头文件,保护野生动物的提法至少在中国还不曾出现。当时我只需扣一下扳机,一梭子出去至少会有两三只黄羊毙命。可是,就在我即将动武的一刹那,一声尖厉的黄羊的叫声就在我侧旁不远处的山头上响起,转瞬间,那群正在喝水的黄羊便急促地旋转奔窜而去。一阵轻快的蹄声响过,黄羊们便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那时我才发现站在我身旁不远处山头上的那一只黄羊原是羊群布下的“监视哨”,它的那一声尖叫分明是一声确凿无疑的报警!然而,





“监视哨”在报完警之后也早已几窜几奔就闪出我的视野,像一股风一样不留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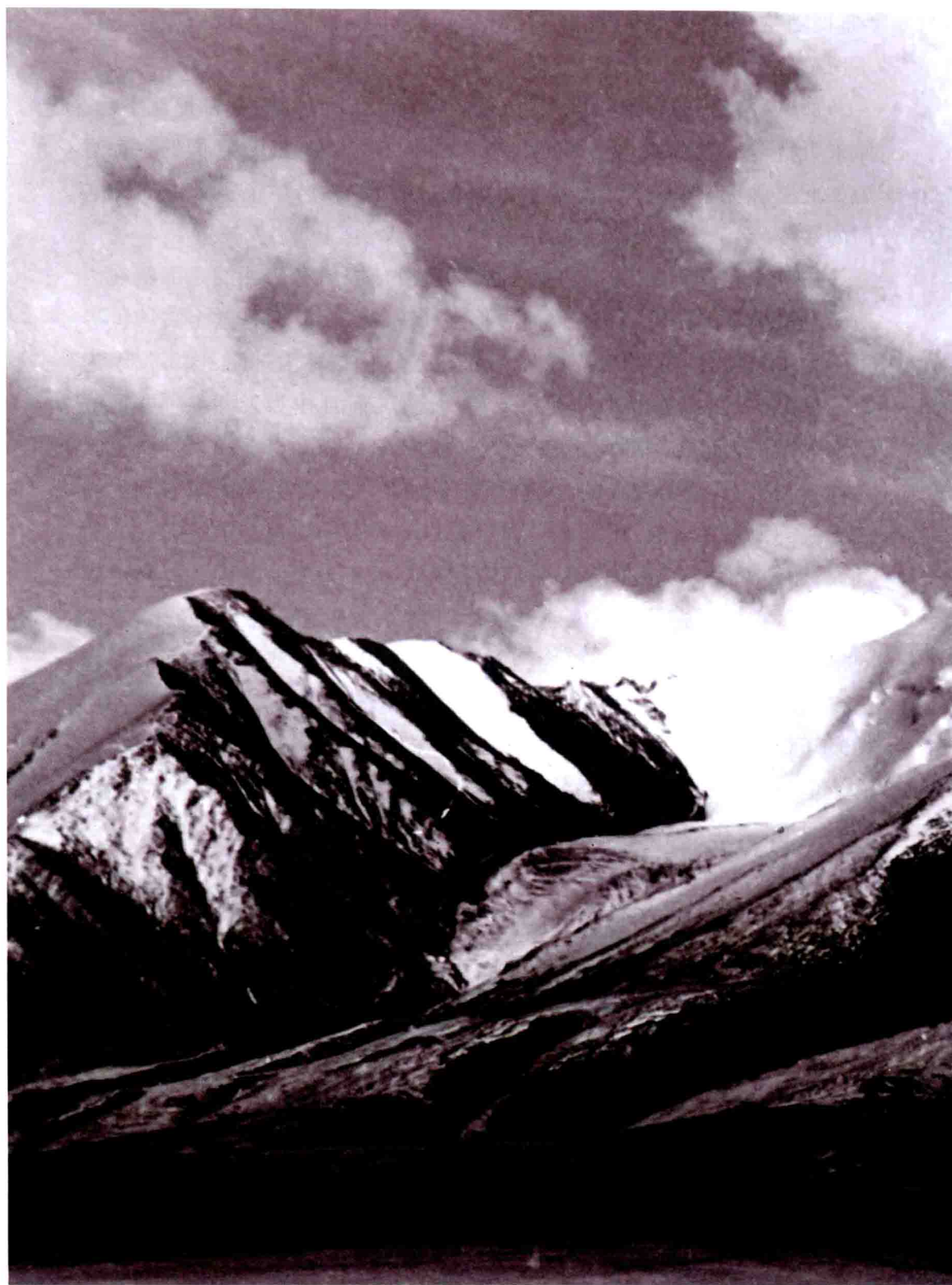
那一幕在我的印象里太深太重了。以至几十年过后我都惊诧不已,原来野性羊群竟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形式和自我保护意识,它们的生存意识如此坚强完善,禁不住使我生出深深的敬意,并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它们的兴趣。

在草原和蓝天的对应空间里,或悠游滑翔或勇猛俯冲的是那些在内地天空里根本无法看到的金雕、秃鹫、猎隼等,它们分明是这个雪域世界里的真正的强者。在当地人的宗教观念里,它们被称为神鹰,这不仅因为它们俯瞰大地,以搜寻各种动物死尸为己任,而且作为天葬——这种被藏族人民视为最神圣的死亡归天仪式的主宰,而受到尊重和崇拜。正因为这样,它们一般不避人的。我曾经许多次地在公路边,河滩里看到它们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用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扫视着走过它身边的行人,那种鄙睨一切的神态和它们击打在万里长天之上的雄姿一样地激荡人心。它们不光是要闪电般地猎食那些窜过地面的胆小的兔子、笨拙的旱獭、猥琐的灰鼠。一遇机会,它们还会向那些饥饿或跛腿的恶狼发起进攻。在疾飞搏斗中或啄掉狼的绿眼珠,或互相撕碎对方的骨头,那种勃勃大气和果敢劲儿完全不同于那些囚禁在公园铁笼中的它们的同类。在铁笼里,它们只是作为人类的真正的“俘虏”而存在,只是作为一种观赏品或活道具;在草原上山岗上,它们则回归为自然界猛士的本来面目。

与被奉为神鹰的金雕兀鹫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驰名世界的青海湖鸟岛上,奇迹般的栖息繁衍着十几万只性情温和的水鸟家族。

它们中有棕头鸥、斑头雁、鸬鹚鸟,更有天鹅、仙鹤等。每年一到春季,它们中的大部分便从印度洋、东南亚等地翩翩飞来,在岛上筑巢,产孵,培育后代,把一个不到0.6平方公里的半岛挤得密密麻麻。放眼望去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湖里游的,几乎都是鸟。各种鸟叫声此起彼伏,声扬数十里,热闹非凡。到了冬季,成百上千的天鹅又来到这里越冬,它们那玉洁的身体,端庄的姿态,给北国的湖泊带来了另一番情趣。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鸟岛在青藏高原不独青海湖一处,在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湖心里,类似的鸟岛至少还有3处。另外,藏北高原珍珠般晶莹滚动在绿







◇ 神域魔境



色草地上的众多湖泊里,到处都有各类水鸟聚集的美好家园。而在大雪线地域活动的藏雪鸡、高山雪鸡、雪鹑、环颈雉、雉鹑等,更是组成了全球独有的飞禽世界。

“青藏高原是大自然特有的动物资源宝库”,当坐在我面前的动物学专家王玉学无不自豪地向我们这样表述的时候,他的在青藏高原强烈紫外线照射下变得黑黑亮亮的脸庞更加放射出诱人的光彩。可以看出,王玉学对于自己把整整30个年头奉献给高原野生动物研究,是有一种深层的无愧无悔的感情。在他看来,自己生命的血肉连同灵魂连同自己的科研事业都已深深地根植于这块高原,密不可分。我带着一种信赖的神情请教他:“为什么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能特别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王玉学笑了,并慢慢地点燃一支烟,眼神凝视起来,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明亮的窗外,一直延伸到远处雪峰的那一面。也许,他想用想象的翅膀再一次地飞临到茫茫的雪域大地,俯瞰并透视那里的一切。他说:“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谜语性的地方,而研究这里的野生动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谜语或密码的破译,其价值当然不会仅仅限于动物学或动物保护本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藏高原是一个影响全球各种系统的特有生命场。现在有人推测说青藏高原有可能是地球人类的发祥地,因为远古的地球表面绝大部分为海水覆盖,而青藏高原分阶段的隆升造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迫使猿类改变生活习性,逐步向人类过渡。不管这种推测是否完美确凿,但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地球生命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制约却是毋庸置疑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倒不具备特别的意义,关键在于这里地域辽阔,植被层次复杂,野生动物种群特殊,且还有许多不为人类认识的神秘性。”

王玉学呷了一口茶,嘴角浮出一丝浅笑,继续说:“青藏高原从北到南由众多的著名大山托起,从祁连山、阿尔金山、布尔汗布达山、巴颜喀拉山、昆仑山、可可西里山,一直到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多层次的山脉和经纬度造成了多层次的地理小环境。而复杂多元的地貌地形如雪山、高原、丘陵、沼泽、滩地、湖泊、草甸、河谷、盆地等等无疑为各类野生动物栖身繁衍创造了天然场所。南面的印度洋热气流难以侵入,北面西面的沙漠气候又无法汹涌而来,这就为它形成了不少小气候区域。因此,





这里竟奇迹般地保存了海相沉积前期的古老型品种,如野牦牛、白唇鹿、藏马鸡、蓝马鸡等等。白唇鹿属珍稀动物,国内外只有莫斯科的一家博物馆藏有标本,那是沙俄时代从我国盗去的。可是在青藏高原上,白唇鹿是作为为数不少的群体而存在的,这实在是大自然特有的恩赐。而野牦牛——这些像山岗一样黝黑结实的一类保护动物,常常会结成千头一群的庞大集体漫游在青藏高原腹地可可西里一带。”

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优雅洁净的资料室里,我还获悉了这样一条珍闻: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奇波德博士爱鹤如命,且亲自饲养研究。在他宽大明亮的试验室里共养了14种鹤,但却偏偏缺少世界上发现最晚,又数量极少的黑颈鹤。他曾远度重洋去印度寻找,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如果这位洋博士有朝一日踏上中国的青藏高原,他一定会在数十只黑颈鹤的翩翩飞舞中大饱眼福,高喊一声“OK!”的。

没有比在青藏高原旅行更能让人感受到那么一种逼人肺腑的宗教气息了。如果从海藏通衢的青海西宁出发,再一直顺着文成公主入藏的古道徒步西行,你会被一个接一个的深藏在山岬的寺庙红墙吸引。那塔影佛光,那玛尼石堆,那五色经幡,迷迷离离,若此若彼,若梦若幻。你一路走去走在神山圣湖之畔,走在佛光普照之间,走在并不罕见的徒步朝圣拉萨的虔诚的牧人中间。看着他或她们那么一步一磕头地移向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于是,你的心灵被震撼、被幻化了,你觉得你似乎也变成了朝圣队伍中的一员,一种宗教感情充塞在你清静的胸廓,禁不住要为自己突然领悟什么而默然伫立,或激动得泪雨滂沱。如果你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那么你就会为那些路过的色调和构架都奇异的地方而莫名惊异,为那些引人联想的地名而费猜劳神。日月山、二郎洞、花石峡、公主庙、通天河、妖魔峰、天葬台……一路走去,那山也奇,石也怪,风带妖声,水响异音,你禁不住又要疑心当年唐僧取经走的就是这条道儿,而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确有其人。而伏案写下千古杰作《西游记》的吴承恩先生倒确实是先到这一路考察一番,才吸取了创作灵感。要不然他那降妖除怪他那奇风异俗咋就来的那么逼真传神?你这么联想着,便是觉着自己正在亲历一趟西游记的全程,有一种神圣惊险的驱驰和驱驰的惊险神圣。于是,你感到超脱、惬意、满足、美妙。可是,你又要禁不住为这一路上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野生灵而惊叹而称奇！那些野生灵或大或小或猛或柔或闪过山坡驰过漠野或冷不防从你脚上窜过，你稍一定神或略一沉思便发现那些小生灵都是这雪域高原上特有的珍禽异兽。有黄羊、盘羊、岩羊、羚羊、有旱獭、火狐、香麝、马鹿、白唇鹿；有石貂、猓狍、兔狲、野牦牛、野骆驼；有雪鸡、血雉、山鹑、雉鹑、鱼鸥；更有雪豹、黑熊、灰狼、野狐、兀鹫、金雕、猎隼、游隼。这些飞禽走兽接踵而来，不惊不扰，各归其道，却并不看见有牧人们举枪射猎，更不见旅店路口有人杀生叫卖。这时候，你会猛然间把这漫山遍野奔突觅食的野生动物群乐图和随处可觅的经幡寺院玛尼石联系起来，你突然想起佛教不杀生的训诫。这时候，那些手捻佛珠轻摇经轮口念六字真言的世居民族的虔诚的影子突然地在你的眼前高大了，神圣了，你会幡然感悟道：“这个崇尚佛教的民族原来是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真正的保护神啊！”你也许会为如此联想而激动得大叫：“啊！佛教！啊！藏民族！啊！雪域高原！啊！佛寺塔影！”

青藏高原是一块被藏传佛教覆盖了的土地。其寺院大都建在山顶或山脚，总之是在非常醒目的地方，以使信徒们远远地就能看见它，朝拜它。同时也是为了高扬佛陀之尊，以悲悯下世并为下世祝福。据说，在藏传佛教最为兴盛的年代里，每一道较大的山沟里都建有大小不等的寺院。如果有条件坐在飞机上低空飞行，那遍布山岬沟崖上的点点红寺定能让每一个亲睹者感慨万端。事实上，藏民族的崇佛精神也完全渗透到雄浑广袤的宇宙大自然当中，在他们看来，宇宙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神，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都是神。由此辐射开去植物五谷飞禽走兽也大都具备神的意味。这种初级宇宙宗教精神和实质上的泛神论，把一切抽象的宗教意识和神佛具象化了、直接化了。于是就有了代代相传的山水崇拜，有了对于神鹰兽的具体尊崇，就有了敬山敬水敬天敬地敬宇宙万物的无限辐射的宗教精神，就有了一种在五色经幡下永恒的祈祷和祝福，就有了事实上的天人合一的博爱精神。

不用说，从北到南，青藏高原上的几乎所有著名的大山都被封为神山。青海境内的阿尼玛卿山和藏北的念青唐古拉山是最受崇拜的两座神山。阿尼玛卿即神力无比、博大雄伟的意思，而念青即是藏语“大神”。每年每月，都会有远道而来的藏族牧民围着神山磕头祈祷。而对于神山上



窜出来的任何一只飞禽,他们都会视为神的化身,都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尤其是对于鹰鹫,藏族群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藏族人崇尚天葬,崇尚把死后的血肉尸骨返原为自然精灵的回归宿命精神,自然也就会把鹰鹫推崇为天葬的神圣之鸟。那么,一切对于神鸟的诅咒不恭或射杀残害无疑就成为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了。

在他们看来,杀生——特别是杀那些被视为神的生命,其罪过将会和杀人相提并论,甚或比杀人更有罪。这种观念扩而大之,就又延伸出神鱼不能吃,神兽不能猎,神山神湖不可践踏的一系列禁忌。于是,一种泛神博爱的宗教精神在事实上渗透到这个雪域民族的血液骨髓之中,渐渐支配了他们的灵魂与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物的效果。一位长期在藏区工作的宗教专家对我说:“藏民族的宗教意识构成了一种博大的共荣共生生命观,它和现代的人类生态观念不谋而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佛光塔影、生态平衡和野生动物的保护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

真是美妙的联想,英明的判断。我忽然对我曾多次用双脚丈量过的这片土地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慰藉。我忽然对那些正跳跃或觅食在这块高地上的羊呀兔呀麝呀鹿呀鹰呀鸥呀燕呀鹤呀等等一切野生灵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幸运感。好啊!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爬的,一切的生命生灵都按照天命的轮回繁衍生息代代演化吧!用不着担忧用不着害怕用不着顾忌一个个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各得其所吧!因为,你们俱在仁慈博爱宏大无限的佛光普照之下。因为,你们俱在古今永存的西王圣母的佑护之下。因为,从远古的西王母时代一直到今天,青藏高原始终遵循着一种天地人神合一的精神。





## “弱水”西流

### 古籍中昆仑“弱水”，即今倒淌河

那是一片洁净的，未被污染的土地。

墨绿的草原，幽蓝的天空，天和地是那样的靠近。悠忽间，从东面的日月山上涌来一脉河流，悠荡荡地，几弯几绕、几蹦几跳，便向西注入青海湖，溶进那巨大的，幽深的梦境。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倒淌河了，使人感到吃惊的，倒不在于她的清澈，而在于她的反常流向，以及关于她的美丽传说。《山海经》中说她涣散漫流，力不负芥，颇具神异使人神往。

有人说她是文成公主的眼泪变的——那思乡之情，竟能如此磅礴有趣，让人感叹。

有人说她是草原牧女富于野味的、任性的歌声促成的——那固执的力量，竟能如此超凡脱俗，令人生疑。

虽然，我一向不大相信这些杜撰的传说，但那河流究竟怎样？她为何会昂首西向？倒也常常挑逗着我的眷眷情思。

此刻，当汽车又一次驰过日月山顶，那7月里湿漉漉的空气携挟着湖畔特有的芳香向我袭来的时候，我那久已潜伏的情思又一次悠悠荡漾了。我瞪大着眼睛搜寻那脚下的草原，那被青草覆盖的岩缝，那被风儿荡动的云雾，那被云雾缠绕着的积雪的山峰。仿佛到处都有倒淌河神秘的源头，但到处都看不见她倩丽的影子。

我记起了第一次寻觅她的情形。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们几个新奇好动的伙伴走到了一个干涸的小河旁，有人指着她说：“这就是倒淌河。”我们举目望去，但见河道平缓、砾石疏落，这里那里有几簇枯草在寒风里抖动，几头牦牛从残留的冰渣上缓慢走过。一片萧瑟荒凉之气，冷



却了我们的游兴。

第二次路过,是在一个秋季,那时大雨刚过,漫山遍野,白茫茫、雾腾腾,凡有沟渠的地方,都有湍急的漩涡哗啦啦卷过。究竟哪一个是倒淌河,也就无从说起。确切地说,那些水流都不过是骤然暴发的山洪的脚步罢了。

眼下,我们的汽车又一次来到这里,停在了一个浅浅涌动的水流前。看来,这正是我前两次来过的地方。她缓缓地溢流着,仿佛怕惊动了野草幽幽的梦境。水底下,晃悠悠地排列着许多拳头般、桃核般大小的鹅卵石,玲珑珑、晶莹生津,煞是可爱。

正是这个流量并不恒定,近似于季节河的小溪,却以她独特向西的倔强性格、卓然自立于河流之林。在多少世纪人们的心上,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子。多少人追索她、寻觅她,神话般地传颂她,有些旅人甚至因不能一睹她的芳容而长久惋惜。

她是纤弱的、迟缓的,然而却是执着的、坚定的。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流向和归宿,坚定地开拓着自己的路径和前景。不随波逐流,不袭人旧轨,这正是她对我们最有价值的启迪,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对高原那么多的小河不大留意,而惟独对于她却是津津乐道的原因。

当然,从地质学的角度讲,她在大约十三万前只是作为青海湖向东输入黄河的河道。而后来日月山骤然隆起,她便首尾掉头倒流入湖了。但所有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那潺潺西流的水波里,映照着一个不同凡响的伟大灵魂。

啊!倒淌河……

你这在古籍中被传为神话的“弱水”哟!

《忆·禹贡》云:“弱水既西。”想不到古人最早的真实记录,却被后世演义成了神话。

谁叫你“众水皆东,此独西流”呢?



## 羽族王国

### 鸟岛奇观,乃西王母国留下的遗产

青海湖鸟岛是闻名中外的鸟类王国,在它仅有 0.6 平方公里的蝌蚪形岛屿上,竟栖息着 10 万只以上的各类水鸟。每年,它们中的大部分从印度洋、东南亚等地翩翩飞来,在岛上筑巢、育雏、生息,待到秋凉一到,它们又扶老携幼,飞向南方。这种不远万里的回归与往返,反映了这些候鸟对于它们远祖不忘故乡的生命习性的沿续,也从生物学角度证实了青藏高原作为古海升沉的历史。顽强的生命寻根如此神秘和幽微。当然就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种种猜测和联想。各种肤色的人都希望能有缘登上鸟岛,在那万鸟齐喧的世界里插上一对自由飞翔的翅膀,并一睹万鸟齐翔的美妙风景。

龙年 5 月下旬,我终于有机会和 3 位朋友去了一趟鸟岛。我们没有绕环湖公路走旱路,而是直接从湖东岸坐船而行,在水天一色中饱赏了一路的美丽风情。

船刚一离岸,碧汪汪的湖水就无边无际地向我们逼来。湖水那么嫩,那么绿,嫩绿得不由不使人想起那翡翠的溶液。

船轻盈地驶向湖心。这时,清风吹来了,淡淡地、柔柔地,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冲洗得清爽无比。我们被一种诗意融化了。

这时有同伴大呼看见了湟鱼,在船舷边悠忽间跃出水面,又迅疾地落下。这些青海湖独有的无鳞裸鲤,它们的轮番亮相是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吗?

果然,在远处水面有声音隐隐沉沉地响起,像庞大的水底乐队,鸣奏着奇异的音乐。我们奇怪地循声望去,视野里亮起了无数黝黑的小点。

黑点儿飞起来了,羽翼下掀起了串串浪花。“呵! 鸬鹚”,是谁在忘情





地大叫。鸬鹚竟也像娇羞怕人的小姐似的,远远地遁去了。

海鸥——这浪花上的精灵,岛上勇敢的侦察兵,却毫不怯生怕人。瞧它们三三两两地飞向我们,绕着船体长鸣,对着人影俯冲,它们是在欢迎客人的光临?还是在监视着“敌意”的行动?突然间,万鸟出水、群翼齐展、鸣声如雷、遮天蔽日。百里湖面如墨锻抖动,涛涛浪涌似巨龙翻身。这埋伏在水中的千万雄兵哟,谁是它一呼即起的将军?

疾速地转向,颠狂地旋舞,羽翼搏击风的节拍,谁是这群鸟齐振的指挥?

呵,不须问,何须问,这鸟类王国特有的欢迎仪式,莫不是对我们最崇高的礼遇?

猜对了,猜对了,瞧那些前飞后鸣的“主人”们,簇拥着我们登上小岛,在群鸟热情的叫声里,我们听到真诚的欢乐。

瞧吧,遍地的鸟蛋,遍地的幼鸟,遍地的生命,遍地的财富,一一接受我们的观瞻。

小巧的云雀,优雅的天鹅,彩色的斑头雁,高傲的黑颈鹤,一一接受我们的“检阅”。

我们俯下身去,细瞧那些鸟蛋,有的青似润玉,那是鸬鹚蛋;有的红似玛瑙,那是棕鸥蛋;有的白胜蚌珠,那是大雁蛋。诸蛋相杂,色彩纷呈,玲珑剔透,让人爱不忍触。我们在管理人员的同意下拣起了几颗,互相传递着、品评着、称赞着,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

忽然,同伴中有人捉住一只刚出壳的海鸥,激起我们深深的爱欲。我们高兴地摸它,吻它,并高高地举向空中。

显然,我们被误解了,老海鸥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到不测,于是,我们的头顶立时响起了老海鸥嘶哑的呼喊——那嘎哇嘎哇的叫声,分明是对于我们的“越轨”行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惊诧了,理解了,我们像做了错事似的把手轻轻一扬,小海鸥叫着抖入沙滩。那浅滩的湖面上,漂浮着一堆堆可爱的小绒球。

我们放还了小鸥,但老鸥的戒备并未解除。看空中,那漫天飞舞的鸟群,多么像凌厉的战斗机群,它们一会儿呼啸着越过我们的头顶,一会儿齐刷刷地散落沙滩,时起时飞,像是在做着战斗的演习。对于任何怀着敌



意的来者,它们似乎随时准备着以尖喙相啄,以铁翼相击。它们严正地守卫着自己的世界,守卫着生态秩序,守卫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欢愉。

管理人员热心地告诉我们,别看这些鸟儿并非人灵,但它们的文明程度却不容忽视。它们形成了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安居制度,伦理道德以及品格和情操,个性和共性。棕头鸥是机警敏捷的,它有着白肚、红嘴、棕头,它们以灵敏飞旋而得敬于鸟类,到了晚上却显得异常规







矩安详。而斑头雁呢,彩裙覆身,金冠盖顶,翅展霞光,以美丽温驯闻名遐尔。鸬鹚则墨翅庄重,最善鸣叫,是万鸟丛中殷勤的合唱队。有时,在它们雄浑整齐的合唱声中,偶尔加上几声云雀悦耳的单音,就更美妙可人了。

它们色彩不同,习性也各异,鸥和鸬鹚以食湟鱼为乐,而雁和天鹅却是喜食素食。无论食荤食素,它们俱各行其便,各得其乐。一般情况下决不会巧取豪夺,陷同类于饥寒冻饿,更不会相互讨伐,以残害同类而称王称霸。

鸥和鸬鹚常驻岛上,一年四季,守家守户,颇具农人之纯朴,老死故土而不离。而斑头雁是春来秋去,远涉重洋,遥遥避寒。它虽远行万里,却不失游子思乡之恋。到了来年,依旧回归故里,忠贞不二,让人感佩。总之,无论是客是主,决不相互排斥,而是和睦相处,如同一家。

入夜了,皓月当空,银晖融融。浪涌崖壁分外悦耳。我们站在高处望去,但见棕头鸥、斑头雁、鸬鹚鸟,三分天下地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一隅。而那些为数不多的云雀、黄鸭、天鹅等,则安详地散居在各个避静的角落。整







个岛上,万鸟齐栖,黑白万点,斑斑驳驳。没有纷扰,没有争斗,没有敌意的骚动。有的只是生命的愉悦和共处的和谐。此情此景,使人不胜艳羡,禁不住要为这些极富灵性、极有品格的鸟类而萌发油然的敬意了。

月亮被浮云掩映,岛上一片朦胧。我们缓步朝小鸟聚居处走去。刚到近前,就听到扑楞楞几声,宿鸟被惊飞几只。我们惶然地退了回来,心头升起了一层淡淡的负疚和懊悔……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岛上空旷地带流连徜徉时,看见了那么一块不算高的墨玉色石碑,碑上刻着:

谨立此碑深切怀念澳大利亚鸟类学专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罗宾·比格夫人。

青海省省长黄静波

1985年7月

此刻,正有无数的鸟儿在那墓碑四周翱翔着、歌唱着,它们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怀念着那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爱鸟专家。

1985年6月,澳大利亚的著名专家凯恩·比格博士应中国青海省省长黄静波之邀,携夫人罗宾女士来到中国。罗宾曾对全澳大利亚的鸟类分布作过开拓意义的普查,但她梦寐以求能到中国的青海湖鸟岛考察一番。可是就在6月29日的清晨她和丈夫在中国同志的陪同下乘车去青海湖途中不幸翻车遇难。当时天下雨打滑,汽车的后轮胎又意外爆裂,一场意外事故终于发生了。

爱鸟专家没能在活着时看上鸟岛一眼,但她的骨灰和墓碑却永久地保留在这一方热土之上。一个来自异国的美丽灵魂就这样用她的不绝的爱陪伴着10万只深情的鸟儿。

也许是为了安慰一颗拳拳之心和不灭的灵魂,也许是人类共有的对于鸟类保护和文明意识的深远辐射,青海省政府逐年加强了鸟岛的保护措施。除开挖了人工渠道以防止沦为半岛外,又拨巨款修筑观鸟棚,标本陈列室等。隔绝了参观者的骚扰,杜绝了人为的破坏。据说,全岛上的鸟儿已从刚刚成立保护区时的10万余只发展到现在的15万只之多。那万鸟翔集的壮观场面和中国人民越来越成熟的爱鸟举动也许正是对于那

一位异国灵魂的最好敬礼和永恒纪念。

由此我又联想到西王母时代用鸟类来为女官命名的故实，如“青鸟”、“白鹤”、“春鹊”、“游隼”等。很显然，上古时代的西王母国既拥有青海湖，更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鸟群，她们把女官名与鸟联为一体，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那时代鸟岛上的壮观景象，怕是今人难以想象了。

近又请教有关藏学家，青海湖在古代名为“赤秀诘莫”，意为万帐王母。现代藏语中青海湖读作“错温布”，专家认为这与“西王母”系一音之转。如此看来，青海湖地区属西王母故地，当是有相当的民族文化沿革的根据了。







## 巴 颜 喀 拉

昆仑，地首也，即黄河之所出

天是灰灰的，地是灰灰的，路也是灰灰的。我们的越野车就在这灰灰的穹窿里起伏着、蠕动着——轮子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在无边无沿的灰色的包围中，它仍只是在爬，缓缓地爬。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毫无生趣的灰色的调子已经围困了我们将近十多个小时，似乎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冲出去，车上的人都感到了一种灰色的渺茫，灰色的无聊，灰色的苦涩，灰色的……怎么说呢？我们的心境也变得和这灰色一样无望而失落了。

有人开始打瞌睡，却又半睡半醒的。偶尔顺着车窗望出去，前方仍只是那一眼不能穷尽的巨大的弧度——灰褐色的弧度。我们盯着那个弧度看，希望它能消逝掉。在汽车转弯的时候，弧度果然不见了，但一眨眼，它又在另外一处出现了——仍然是灰褐色的，徐徐缓缓地向天边延伸。仍然是那么一副漫不经心的，无边无沿的样子。我们懒得看它了，因为无聊。

没有悬崖，没有峭壁，没有突兀的奇峰，更没有倒挂的松枝，甚至看不见一块立于旷野的奇怪的石头。有的只是缓缓的漫坡，有的只是那灰色的弧度，一句话，我们看见的，感觉到的，触摸到的仅仅只是大地之腹，仅仅只是旷野之原，是缓缓隆起的那么一种质感很强的灰褐色的大地。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们的汽车停下来，戛然停下。同时我们听见司机大叫道：“下车了！下车了，到了巴颜喀拉山山顶了！”

几个人匆忙间就挤下车去。立在灰褐色的弧度上，却并没有看见有什么山，也没有什么峰，真的，我们顶多只是把那个灰色的弧度踩在脚下。我们疑心那个热心的司机只是在逗我们玩，想恶作剧地把我们刺激





一下。

可是,我们的身旁却兀然矗着一方石碑,其实是用两根石杆举着的一方石板,石板上写着“巴颜喀拉山,海拔 5082 米。”

那么说,我们已真的到了巴颜喀拉山了?我们真的已站到 5082 米的高度上了? 5082,那就是说,我们已经站在高于海拔 10 华里有余的山顶上了?可是,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山”呢?真的,我们连“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几个人互相瞅着嘻笑。

笑什么呢?是笑山不像山?还是笑我们傻了,糊涂了?明明站在山顶上了,却还要去找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渐渐地,我们忽然觉得胸闷,觉着了气憋,觉着了头晕,觉着了一种隐隐的不适。

司机说:高山反应!

于是,我们离开了那个弧度的顶端,顺着漫坡缓缓地驰向另一面。也就是说,我们下山了。

车子仍在缓缓地驱驰,几个人却都不说话了。说什么呢?嚷什么呢?也许此刻最需要的就是沉默,一种深思静想的沉默。

巴颜喀拉山——黄河之水源头——昆仑山中段,它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是磅礴的,陡峻的,高傲的,可是,此刻,当我们站在它的顶端时却就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呢?是它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我们的感觉出了偏差呢?

默然。

终于,我们会心地笑了,大彻大悟地笑了。那是我们远离了它之后的恍然大悟。

是的,没有悬崖峭壁,没有一见而起的惊叹,甚至让你感觉到它并不存在,然而,它却用真正的高度——用最权威的缺氧的威胁把你征服了,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征服;一种悄然而至的征服;一种教你心悦诚服的征服!

惟其大,却不显大;惟其高,却不显高。它恰是一个圣者,是一个哲人,是一个横空而卧的卧佛。它冷眼看着人的喧哗与浮嚣,以它特有的不



动声色充塞在天地之间。

问：如此莽莽昆仑，何用之有？

答曰：衬托人的渺小，展示时空的永恒；警示虚妄之人，勿自高自大；警示贪婪之人，尔终为粪土。

问游此大山，何感有之？

答曰：山体自大，魂魄自阔。人心自高，志趣自远。以山为鉴，人生岂不有为乎？有为与无为，山自知之。

看来，《禹贡》中说：“河出昆仑”，李白诗中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前者是就地理而言，后者是就哲理而言。而真正的昆仑含义呢，怕是这二者的伟大统一。

昆仑，地首也，即黄河之所出。

## 公主庙记

### 在雪域佛地,公主也变成了神

出西宁古城,沿湟水上溯而西。过药水峡湟源城,再经日月山,倒淌河,花石峡,黄河沿,一直向着玉树州首府结古镇而去。一路上山愈高,石愈怪,风愈妖,天地愈苍凉。到得州府,屈指算来已超过 800 公里,地势也由西宁的 2300 公尺上升到结古的 3700 公尺,一打听,走的恰是著名的唐蕃古道。虽说同行都是军旅同志,体格倒也劲健,却是胸发闷,头发晕,粗气喘,颇觉缺氧之威胁。遥想当年文成公主以 17 岁之芳龄,以皇室千金之躯,浴异域风尘,走混沌险境,阴晴变幻,日月交替,雨也来侵,雪也来袭,从长安到结古竟跋涉了半年有余。和我们现代人的汽车公路相比,其远嫁之旅,何其渺渺,其艰辛之状,何其顿顿。而其深明大义果决与慧诚,又何其让人钦佩!客观较之,文成倒不独是一公主,却应是一巾帼英雄也,此言信乎?

结古镇是藏族聚居地,城中多藏式楼阁,且造型别致,飞檐红墙、颇有古风。穿藏式大袍者往来于其间,悠悠哉!碌碌哉!四围山高且黑石怪异有红墙寺院层层叠叠。上得寺院,却竟于释迦牟尼众佛之间,觅得一女貌慧目之佛象,朝拜者络绎不绝,疑心她是菩萨,一细问方晓得是文成公主像。当地人呢称文成公主为汉族阿姐,历经一千余年,竟以香火代代供之,可见敬重之深诚。据当地人讲,城南二十公里外峡谷间,尚有一文成公主庙。经年累月,香火繁盛,我们便约好第二天专程去拜访。

出了结古城往南,公路便在深峡古道中蜿蜒。山顶石怪,如兽扑,如鬼伏;峡中风异如狼嚎,如鹤唳。正是初冬天气,枯草抖动崖畔,恰似古诗人头上之怒发。同行者不禁肃然悚然,疑心是进入魔幻之境。向导却谈笑风生,极言此处风景极佳。若在七八月间,草绿花红,峡谷泛碧,游人没有







不赞叹者。问其何叹,说是此处正夹在澜沧江与通天河之间,按纬度说当年文成公主涉荒漠、过雪山,一路看尽苍凉之色,一到这里,碧泉鲜草,眉宇顿适,便于深峡清溪间歇息下来,一住就是一月。而那后人修造的公主庙,正是文成当年扎帐处。

出得深峡,山环渐阔,清冷冷之气凜然逼来。喧哗作响声中见一河流绕谷而行,水清冽且呈黛色,河畔果然枯草如毯。驱车驶过桥去,车子竟在无路的河滩上颠簸前行。向导说,公主庙正藏在河对岸深峡中,距公路约有十余里,幽且秘,险且奇,许是当年为了安全,故选定其地,却让后人猜度不已。顺河边且行且看,到一河床浅平处,车子趟水而过,悠忽间就转进一窄仄的峡谷。但见崖畔巨石摇摇,轮下小溪潺潺,正恍惚似进得《西游记》中这妖魔国,猛抬头就见一红庙正翘耸在嶙峋山壁间。一股半神界半人间的混杂气氛,直让我们一行人嗟叹不已。

其时天已渐进黄昏,红墙庙宇肃然穆然,我们几人也悄然寂然,次第进得正殿,却见正中墙上文成慈颜慧目,悯察下界。两边列诸多佛像,皆作拱卫文成状。殿宇不算深广,却极庄丽,香客不算稠,却气氛持重。其时正有一藏族老妇,正全身俯伏在地,口里念念有词,偶尔抬头向文成像注视,目光虔敬无比,似在祈求赐福。我们感其信笃,询问间方知她从千里之外遥遥赶来,已将数千元积蓄花去大半,惊问其何为如此耳?答曰:文成乃真菩萨,可保佑她全家世代吉祥且香火不绝。彼坚信之态,令我们永生难忘。想起藏胞感念文成曾带稼穡、工艺、医药、建筑等造福藏区,始信其千真万确耳。

向导说庙后绝壁上有吐蕃人题刻字,我们去看时,果然不假。只是字迹已模糊,大意此处乃文成憩息处,是神圣之地。遥想千年风雨,此刻字竟被悉心保护,且建一庙,不觉感慨良久。

又由文成公主庙联想到西王母祠,明白了她们都曾为历史真人,因美善惠及后世,最后皆成为了神。



◇ 公主庙记





## 拥抱昆仑

### 从小昆仑到大昆仑，信步与神游

日月山，青藏高原东沿起点，当属小昆仑。

从西宁到日月山口，约有一百公里路程。路虽不长，却全是上坡。但见曲曲折折的峡谷中间，公路一会儿朝左，一会儿向右，迂回反复，变幻不定。驱车而上，一路上但闻水鸣潺潺，韵流空谷。看地图，那正是孕育了一大片富庶之乡的湟水河。

说来也怪，走不多远，夏日的雨雾竟渐渐地薄了、淡了。猛一回头，那北面的山尘上竟灼灼地映出几道阳光来，刺眼地亮。“呵，天放晴了！”

没到过青海的人，会以为那儿全是荒山秃岭。其实不然。且看峡谷两边峻峭的崖畔上，浓淡相宜地点缀着簇簇树影，杂以各色的野花野草，远远望去，宛如一幅色调明丽的“中国画”。怪不得听人说，著名画家关山月当年来青海时，曾一再地为这里的山色奇特而啧啧称道哩！

车厢里一时又活跃起来了，有人在比较着这里和内地山景的差异；有人在推测日月山是否和这里大异其趣；有人琢磨着回去以后要抹一幅水墨山景；有人算计着日月山还有多少路程。

说话间到了日月乡。这里依山傍水，房屋凭山势层层盖起，街前屋后，门首河边，一溜溜地长满了白杨。树木参天，荫影连屏。而前山后山，遥遥对峙，捧绿献翠，一片灵秀之气。公路旁有开饭馆，摆小摊的，白帆撑帐，清茶迎客，俨然一幅初夏风光。我们坐着喝了几杯茶，才知道这儿已到了日月山底。

车子继续沿坡开上，渐渐地升高，两边峡谷上的树影花草，也渐由浓密而变为稀疏，颜色由深绿而变为浅黄。闪过一个陡坡，忽地一阵冷风袭来，身子不觉一抖，再看那公路旁流过的湟水，也森森地溢着寒气，使人





觉得好像又退回到了初春。再仰首看那西南方向浑圆的山头,赤色如火,不覆绿被。而站在它旁边的那一座更高的山峰,则雪冠巍峨,森森逼人,彼此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此山原名赤岭,因文成公主路经此处摔碎日月镜,故得名日月山。

驰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但觉天风浩浩,长空渺渺,极目西望,水天相接处,山影浮沉,云霞神动。一种超脱、升腾的情绪渐次涌上心际,而一切琐屑的念头和世俗的纠缠便随之置诸脑后了。

日月山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连接地带,也是青海农业和牧业区的天然分界。山顶伫望,东西两边,景色迥异,各成格调:东边麦浪滚滚,碧涛涌动;西边雪峰逶迤,坚冰生寒。日光为金,月色为银,日月山同时具备了历史和地理的两层涵义。

当人们刚刚离开喧嚣的城市,一路风尘仆仆,不但时有颠簸的折磨,还会偶尔浮上意气的纷扰。可此刻一登上日月山顶,被切割的心境便浑然恢复成纯真的一体了。大自然以它的雄奇和壮阔纠正了人的骄纵和偏狭;以它的质朴和自然纠正了人的虚荣和嫉妒;又以它无与伦比的谦恭无言纠正了人的骄纵和浮躁。不是吗?你看那些一路上谈天说地,意气纵横的红男绿女们,哪里还有狂傲或自卑?而是在默默地用整个身心去感受自然,感受历史,感受那潜藏在历史深处而启人思索的画面。

当年的文成公主和亲,只是暂时缓和了唐朝与吐蕃的矛盾。不到30年,双方又以兵戎相见。史载唐大将薛仁贵曾从这里征西,在大非川被吐蕃军切断粮草,几乎全部遭俘。从此以后,日月山就竖起了两军对垒的界碑,这里一度的友好互市变成了相互交恶的沙场。

历史的烟云终于飘飘而逝了。不管是和亲或是战争,都没能最终解决民族争端。只有到了今天,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平等,才真正把日月山变成了一个纽带——一个能够连接历史和现实,城市和草原,以及真实和想象的牢固的纽带。这当然是当年的文成公主和薛仁贵都无法想到的。

今天,我们虽然走在文成公主当年的路上,却并不是步她早已逝去的后尘,她是跋涉异域,而今天,我们却是仍在国中。当年,她只是作为和亲的使者,而今天,我们却真正是青藏高原的开拓者。且看这屹立在山顶



上的“日月山”字碑的旁边,不还有一个更大的记功丰碑吗?那些工整的文字,永远录下了解放初期开拓西进的筑路勇士们的辉煌业绩。遥想当年,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奉命进藏的部队一面筑路,一面进军,那艰难之状,何其荡人情怀。而今天,这里已成了青藏公路的咽喉,东来西往的车队,满载着钢材、机械、皮毛和药材,喇叭声声高唱,轮飞万里不歇。它是世界上最高,也最壮观的公路运输线,把世界屋脊变成了荡荡坦途。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海拔 3752 米的山脊上的时候,心头不能不升起一股激越的豪情。城市和牧区的交往,汉藏民族的团结,田园牧歌的融汇,在这俯视的窗口里一一展现。可以想见,当那正在动工翻修的公主庙和日月亭竣工之后,这神奇古老的山口将会重放异彩,而为数更多的游人将在这里流连忘返、赋诗抒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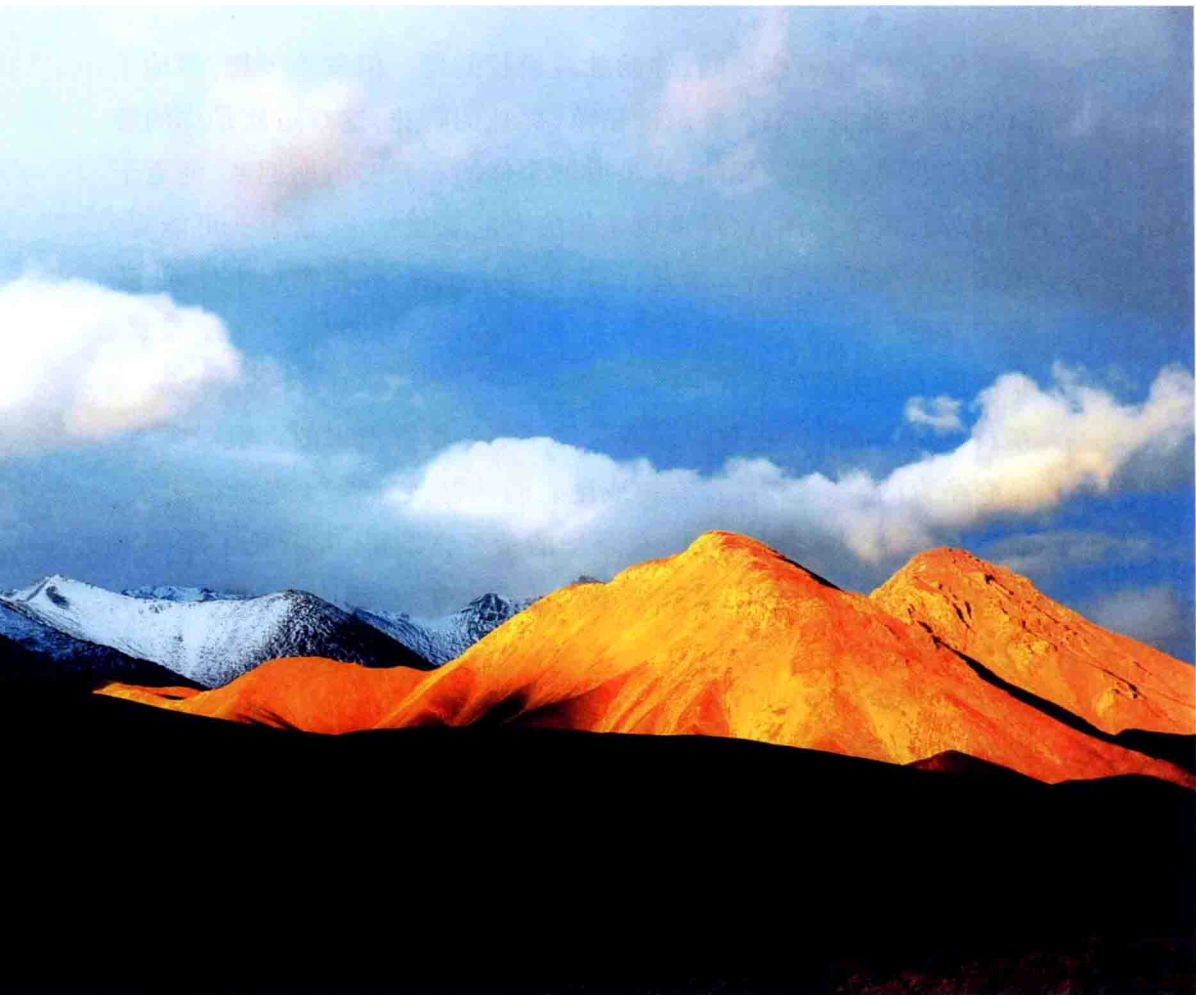


八百里瀚海柴达木南沿,丛山横空,应为大昆仑。

当我从小学课本里认识了你之后,我就臆想过你的轮廓。我苦恼,任何譬喻,都不足以传出你的神韵;任何神笔,都不能画出你的魅力。你,使赤子倾心,使学者仰慕,使战士动魄,使仇敌生畏!你触发诗人的灵感,你牵动婴儿的啼声。

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虚幻迷离,庐山的炫目奇叠,这一切的总和,该是你的身影。你是粗犷与优美的化合,你是刚健与柔静的交汇,你是爱与力的拥抱,你具有永久性的青春与古老的和谐……

我从遥远的黄河中游驰向你的怀抱。诗神的彩裙,拽着我的情思;想象的翅膀,驰骋着我的遐想:那金阳下奔腾欲飞的巨龙;那千山万壑间隆隆作响的林涛;那空谷幽涧里汨汨流淌的清泉;那山脚下望不到边的蔚







郁的草地；那说不上名字的奇珍异兽……呵，昆仑，你多么令人神往呵！我愿化作你怀中的小溪，那浇绿的野花，就是我献给你的颂歌。

枕着你的岩石，我来安家。借着你的溪流，我来漱洗。我寻觅每一片憩息的云影，我憧憬每一束初绽的小花，我祝福每一对追逐的野鹿。可是，整整过去三千六百天，我却竟不能了却那儿时的宿愿。我惊诧：写不出一首“昆仑颂”，绘不出一幅“春色图”，谱不出一曲“云锦歌”。我——青春的烂漫哪儿去了？天真的谐趣哪儿去了？无邪的灵感哪儿去了？难道缺氧的威胁竟使我的诗花枯萎？难道高寒的压迫竟使我的热情冷却？难道突然的禁锢竟使我的活力窒息？难道生活的沙漠包围了我，竟使我绿色的希望骤显荒芜？

我要大声呼喊：我不承认！因为在我的血管里，昆仑的溪流仍在哗哗流淌。

三千里危岩，十万座银峰，你的壮观给我鼓舞。但黄沙飞舞，赤地千里，你的荒凉又使我悲哀。稀疏的枯草，孤独的野花，这难道就是你的装束？流泉的悲鸣，飞鸟的孤啸，这难道就是你的心音？雪崩拥塞，河道干涸，沙丘移动，黄羊奔逐，这难道就是你应有的景象？不，这怎么可能呢？你应该比这个美好一万倍。于是，我在憧憬中沉思，我在默想中发问，我在愤怒中寻觅……

我走进了历史的幽巷——

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古墓里，我看见了那些挖掘出来的金银器皿，它们是昆仑孕育的宝藏，却并没有铸成昆仑的铁臂，它们被无耻地盗走了，伴随着王侯贵戚们的骨骸消蚀；在豪华的帝王宫殿里，我看见了那些采自昆仑山的无瑕美玉，它们没有被塑成母亲的尊颜，却成了权贵和僚属们淫逸的点缀……

我奔走在现实的山野——

我看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了，我看见成片的田园被荒芜了，我看见成片的草地和矿山被糟蹋了……

我看见了被洗劫后的一座又一座大山，麝被枪杀了，鹿被捕获了，虎豹被屠宰了，麝香鹿茸在刽子手们的锦囊里散发着幽香，虎皮豹衣炫耀着“造反派”的武功。



我看见在古代艺术家辛勤雕凿的山洞里,珍藏了千年的古籍被焚成一堆堆灰烬,而那些闻名中外的绘画和雕塑,竟被棍棒敲击得七零八落。

于是,我明白了,昆仑,你虽有凛凛金身,却为何掩饰不住疮痍满目;你有热情的歌喉,却为何流不出悦耳的泉声?我更明白了,廉价的歌颂,决不能解救昆仑母亲的苦痛,而天真的颂歌,甚至压不倒刽子手邪恶的笑声。

昆仑呵,我曾向往你怀抱中采不尽的灵芝,她,可以使我们人类的青春不老。但更使我神往的,是你怀抱中那奇绝的宝藏:金、银、铜、铁、锡、钾、镉、铀、镓,哪一种元素的储量,不足以使世界震惊!

昆仑呵,我明白了,你被冷落了五千年了,但你却时时害着热烈的相思,你惦挂着每一个忠贞的儿女,你为他们备下了巨大的财富。

那些只知道在柳荫花下虚掷光阴的,体会不到你的深情;那些偷窃你的珍宝,点缀自己无聊生涯的,得不到你的宽恕;而那些专事盗运、出卖你的财富的,应受到你无情的惩罚!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

你的深情,我们竟没有能及早理解;你的活力,我们竟没能及早发扬;你的被冷落、你的病态的不合时宜的衰老,不也有我们的一份罪过!

我骄傲,作为你的后裔,这是我的荣幸!

但我又自愧,作为你的儿子,我们并不中用!



## 迷失古林

### 大通河、湟水间，有古林，尚存西王母时代野趣

滨湟水有一公园，极具山水本色。冬夏时我常去独步，且喜在黄昏时分。问：有何景致？曰“冬听雪，夏看雨，雨雪浸润，天赐津液，胜似春兰秋菊，此中滋味，我独知之。”

那林子抱着湟水，野蔓蔓地构成一天然别趣，恰在公园中最远僻的一隅，游人便懒于涉踪。更因为缺少人工点缀，世俗男女便视为无景。那公园本极开阔，人工湖、谐趣园、游乐场、西湖桥、望湖阁、百花圃，到处都有精雕细琢之处，越发显得这滨河林子野性未改，也强化了痴男痴女们不去光顾它的理由。只是我却独独钟情于它，黄昏时常在枝影扶疏中徜徉，极少遇见人踪，却是听不尽的叶林絮语，流水喧哗，时间久了，我便给它取名：独步林。

夏日时节，林中有鸟鸣，有蝉唱，到黄昏时，却是格外静幽。树冠儿举向天空，恰似一丛丛绿浪，绿浪儿挤着绿浪，彼此便亲密地交流。有些许小风传递消息，四野里簇拥着的绿浪便一齐加入这私语的暗会。那些叶儿枝儿摇呀摇的，像情人的指尘，微妙而多情。那些散开的树杆俏俏婷婷，恰似情人的身姿，极尽各自的风韵，彼此做着无言的诱惑，却是没有如人类的嫉妒，一切都回归自然的无邪无伪。这时候，细雨无声地落下，万千枝叶一起承受着无言的爱抚。雨极细腻，也极温柔，慢慢地浸润，细细地渗透，给那些美丽的叶子添一颗两颗惊喜的泪珠儿。那是美丽的泪，饱含着与大自然神会的愉悦，却是这愉悦独独地属于它们自己，与阔林那一边烦嚣的人群尘埃远远地隔开，组成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此时再看那些树干儿，畅畅地，无彼此排挤之忧，无意外骚扰之患，悠悠然，幽幽然，生发出无限意趣，直感染得我也不再愿意走动，倒不妨与这树干儿对





应站着,成了被这霏霏细雨浸润洗礼的一员,委实地说,我真欲变成一棵树了。

冬雪时,林子里更是静极美极。虽没了绿叶,那雪花却结满树杈,满树举着琼枝玉叶,晶莹闪烁,胜过万树白梅。环身看去,雪仍在一片两片地飘落,仿佛是把仙宫里的问候带给大地。而那扶扶疏疏的玉色枝条,恰是天籁与地籁相交的美妙产儿,她既带来天上的仙韵,又带着大地的纯情,不媚俗,不染尘,冰清玉洁,非凡尘间能有。好呵,这一个个悟透了天地玄机的智者圣者,就静静地屹立在这冰雪宇宙之中。让纷飞的思絮和雪花一样扬扬洒洒,却最终凝成比冰湖更为深邃的思考。哦!我忽然感动了这冰雪玉树的沉默,默默地就与他为伍为友了,但愿他们能把我视为可以信赖可以交流的同类,岂不美哉妙哉!正所谓:天与地相交,始谐自然之趣;而人与天地相知,方成人生之趣也。

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儿女。生于斯,长于斯,无疑该与那绿水绿山为伴,与那清风朗月同在,吸芳馨之气,沐清流之浴,抱林木之郁郁,守秀草之萋萋,与共与欢,厮守亿年。可不知始于何时,大约是人类食了熟肉后脑力日渐发达之后,突然就要做天地万物的主宰了。于是乎,斩草伐木、烧山逐兽、毁林毁绿,杀生害命。直闹得千山不毛、万水黄汤、鸟兽稀少,危及自身,这才稍稍清醒,便大声疾呼要保护自然!只可惜觉悟得迟了,大自然已不那么轻信人类,草呀林呀水呀不那么容易再复归原貌了。于是,人这时才发现,地球上再难以找到好的去处了!那大城市中,森林般矗起的钢筋水泥的建筑,既是文明的聚居地,也是人类的活囚狱。那手臂般密举的工厂烟囱,白烟黑烟,漫空流过,既制造着财富,也酿造着病害。更有那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公路网,把浑茫苍郁的大自然切割得支离破碎。惊回首,人类“文明”每跨越一步,大自然的最后领域就减少一分。旷旷神州大地,尚能有几处大自然的残留家园呢?神农架、西双版纳、大小兴安岭……

奇的却是在这两千多米的青藏高原东北角,大通河边,竟有一片乔木灌木疯长横生,小河小溪潺潺奔流的原始林区。正是草鲜花飞的季节,莽撞撞地我就和朋友华君悠进了密林深处,于读山读水读林木秀草之间,竟痴痴地忘了归路。

其时天色渐晚，四山幽静，林中芳馥之气直沁心脾。不时有红花在绿海中招摇。二人只管悠悠然穿小径而去，互相指看那奇树奇花，直把黄昏当作了清晨。

于山麓临谷处，但见桦树群居，密密疏疏，相向成趣，且秀色可餐，竞显婀娜。微风起处，万千圆叶儿哗啦啦脆唱，似尽抒欢愉之情，端淑中带着些许羞娇。我道这桦林怎了？怕是初次见到生人，故有此状耳？华君说，桦树乃木族中秀女子也，群起而轻舞，本该入情入境，其美互知。我辈初识，少见多怪乎！我然其说，再细端详之，果见万千桦树，叶叶枝枝借着风势俯仰微妙，似作相戏相知状，其魅力自在自爱，悠悠哉自成其谐。猛然间就觉得我俩原不过是不速之客，实乃多余，便夺路绕过桦林而去，恍恍间就到得半山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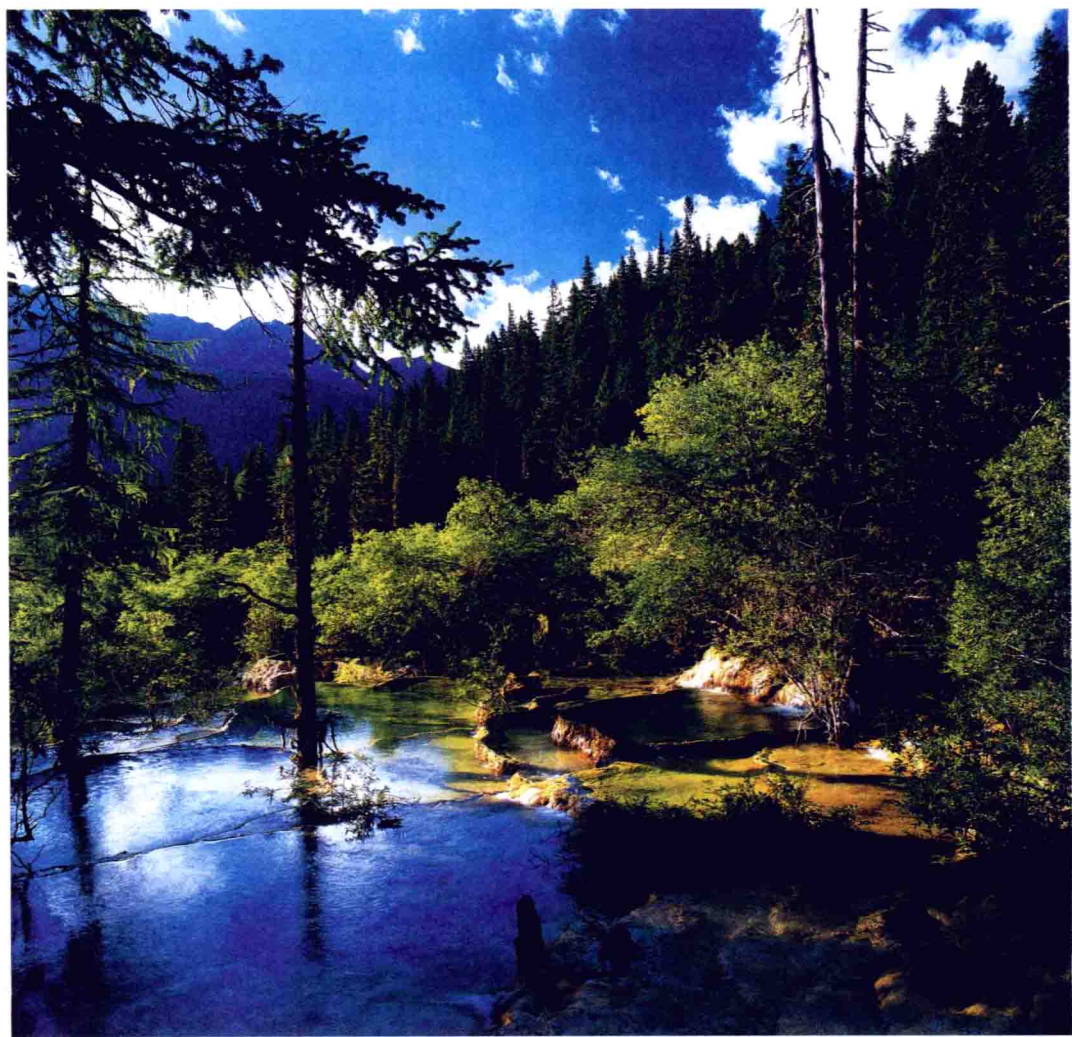
却是颜色深绿而透黛黑，且油汪汪泛着亮光，一簇一簇，一蓬一蓬，恰是数不清的黑伞举在空中，那挺拔韧劲的树干则成了这巨伞的撑杆了。我与华君俱奇这松树林的美妙造化，经推敲斟酌方坚信这黑伞树即是油松也！华君说，端的这刻有大雨滂沱，多好，一则可试试油松可实用否，二则在这无人处听雨，岂不独领天籁之趣？我说华君真会想象，真要遇大雨我们岂不淋漓而狼狈？说话间就又向着山顶攀去，满眼黛色树影便又换成翠绿色。

一株株云杉正站在山巅，颇像是一棵棵放大了的文竹，气质高雅，影像不俗，引得我们仰视默然，顿生敬意。却又怕那高大挺拔并不显傲气的圣者看出我俩的窘态卑态，便一时竟把头低了。奇的却是那树干，皮纹清晰而包裹严密，慧慧然竟透出智者的深密思维。想他既已识透吾辈的浅薄可怜，何不坦坦然表露出肠肠兜兜。这么想着便又举目仰望，那云杉依旧默然肃然，似长者的深沉，又如圣者的穆静，无居高临下之俨然，又不失大智大慧者之风范，那祥和穆然之态仿佛在暗嘱我们道：孩子们！你们既然归为自然之子了，生命的奥妙玄机你们也就悟透了！那就一切都顺其自然罢。

正不知我们在那君子林圣人树前默立了多久，却是暮色中一片浪瀑喧哗之音，二人眷眷中便拔脚追那小河而去，到得奇崖涧边，却只闻水声，不见波澜。于是就唐突间寻路下山去。又闻水声潺潺，循音而往，亦不



见有一溪一流,疑心那河原是山中暗流,专在岩洞嶙峋间鸣响,益发生出无限向往,下决心要亲掬一捧山泉尝尝,方不悔此行呢?仓促间又举步在奇崖奇树间奔突,不意间却是漫空落下大雨,由淅淅渐入簌簌,再响成哗哗。不多时,我和华君俱是全身湿透,背上森森有凉气也。再夺路欲急归时,恍恍然茫茫然就没了路径。此时夜空紧逼,风声又起,轰轰隆隆雷声大作,二人方知此乃天意留我,何不就在这幽幽林中暂避一夜?于是相携相扶,磕磕绊绊地就摸索到一雨微干之处,仰首看时,端的就是那伞柏。二人不禁大喜过望,相依相伴间便也添了些许暖意。彼此都道这路迷得也奇也痴,这林子亦野亦幽。这萧萧夜色呢,亦深亦迷。而我与华君二人呢,倒不妨且歌且卧罢。于是便与这原始圣地厮守一夜。是年七月下旬,正暑气蒸蒸时。







## 同此凉热

### 理性与良知结盟,全球看昆仑

80年代中期,一场持续五天五夜的大雪暴封冻了整个唐古拉。

银装素裹的美景变成了“千山鸟飞绝”的白色灾难。因觅不到草而冻馁的牛羊家畜随处可见。牧民们忧心如焚却无可奈何。断粮、断柴、断草、断炊,人与畜同时挣扎在死亡边缘。

最可怜的是那些野生动物群,在毫无生路的危急时刻它们竟三三两两地跑到牧民的帐篷边,用那么一种乞求的目光看着它们往日不敢靠近的人类。灾难降临了,它们首先想到需要人的保护和恩赐。可是,自身难保的牧民此时只能报之以惊诧和流泪。

家畜和野生动物群纷纷倒毙,满目惨象。

由省政府组织的几千人的救灾队伍向着茫茫雪海进发了。粮食、燃料、衣物,纷纷送到那翘首以盼的牧民们手中。

可是,那些野生动物群呢?那些用坚韧的生命力向着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美妙躯体的白唇鹿、野马、牦牛以及麝和豺狼呢?

此刻,这些以食草为生的动物的天使们正遭受着以食肉为生的饿狼的突袭和围食。和饿狼群结成同盟的,还有雪豹、熊和赤狐等,这些平时主要捕食兔子和旱獭的狰狞野兽,此刻恰是在生态系统紊乱失衡的状态下找到了攻击野马和牦牛的空档。

从直升飞机上的目击者提供的确切情报,使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恐怖的画面:在广袤银白的雪原上,至少有五成群狼四窜狂奔(少的有四五十只,多的有八九十只),它们突袭而过,将已经冻饿而死或奄奄一息的牦牛野马分而食之,然后又去狂追那些尚在挣扎慢行的野生动物。据说,在正常天候里,狼是不结群的,而在这种特殊情境下,它们便结成强大的



阵容以对付猎人或其他对手。狼群是可怕的,而饥饿的狼群就更可怕了。据一位有阅历的猎人说,狼群如果受到攻击,它们会前仆后继,首先将倒下的狼撕碎吃掉,然后再向袭击者发起疯狂的冲锋。它们或者咬断你的喉管,或者被你开枪打死,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决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担任抗雪救灾任务的某部队战士围歼了一股为数不少的狼群。战士们事先埋伏在山岗上,待狼群涌进山环,便举枪猛烈射击。结果,至少有三十多只恶狼被打死了。可是,就在战士们带着新的救灾任务向着雪原深处行进时,却发现了三三两两被饿狼啃尽了血肉的牦牛骨架,浸透了血渍的雪地狼藉一片。

饿狼群的肆虐是以雪灾的突降为前提的。野生动物的惊人丧失引起了国内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高度重视。美国动物学家博士乔治·夏勒和青海省的郭聚庭工程师和有关人员陪同下经过艰难跋涉赶到现场。他们乘汽车缓慢地行驶在青藏公路上。驰过纳赤台、五道梁、雁石坪、唐古拉山口,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商计着有效保护受灾的野生动物的对策。

公路两旁不断有野牦牛、野驴、马鹿等缓缓走动,它们驻足望着汽车,用哀哀叫声向人类表达苦难。有一只母牦牛的身后跟着两只小牦牛,紧紧依偎着,蜷缩着,用母子亲情抵御着凛凛寒气。但当两位动物学专家的汽车轻轻鸣叫时,那母子三头牦牛竟挣扎着站立起来,睁着无限温情的眼睛向着汽车致意。两位专家被感动了,他们停下车走出车门,一步步地走到雪窝里去抚摸那几只受难的野性家族。三头野牦牛温驯异常地卧倒在两位专家的身旁,一种人类与动物在特殊境况下的感情交流给这冰雪世界增添了巨大的温暖。当几个小伙子和两位专家从雪盖下拔出枯草塞到三头野牦牛的嘴里时,他们看到那只母牦牛的大大的眼眶里滚出几滴浑浊的泪水。两位专家感慨不已,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德国著名生物学专家奥·海因罗特说过的一句话:动物王国里的一些行为,其实是非常合乎人情的。

然而,愈往雪原深处走,两位专家便愈加感到灵魂深处的负疚和不安。他们先是看到有20多只野牦牛错落杂陈地死在一个山脊脊里,临危毙命前的挣扎情状依稀可见。又在一巨大的斜坡上看到至少有400只马



鹿的尸体,一具具都冻得硬如石雕。在那条被称为沱沱河的长江上游浅滩前,有一群疲惫不堪的石羊正在挣扎着登向一座小山包。小山包上有若许枯草露出雪盖,石羊们像看到生命的召唤一样地抢步而上。但它们毕竟已经疲惫不堪,趑趄趑趄中大多数滚落下来,一滚到雪窝里就再不能动弹。目睹此惨痛场面的夏勒和老郭立即对一只死羊做了解剖,结果发现石羊胃里只有若许泥土。饥饿像瘟神一样使唐古拉山的大批野性家族死于非命,两位专家只觉得心里在隐隐作痛。

郭聚庭忽然一反常态,疾言厉色地“责问”他的美国同行:“再不能等了!必须坚决设法抢救这些野生动物。你是名人,应该发电呼吁国际有关组织。我担心,再不采取措施,这座世界野生动物博物馆就要绝迹了!”

郭聚庭一方面督促他的美国朋友,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向北京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电:唐古拉山发生特大雪灾,野驴、野牦牛、藏羚羊成批饿死。速望拨款救助为盼。

十多天以后,10万元的专款通过有关渠道下发了。青海省野生动物资源办公室采取措施,拨派若干人员购买干草撒于雪野中动物集中的地方。无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野性家族因此而逃避了死亡。

夏勒博士为能准确掌握野生动物的死亡损失情况,以便及时向国际







动物协会申请援助,和郭聚庭一起向当时正在灾区指挥救灾的青海省省长宋瑞祥请示,参加了一支由向导、翻译、研究员以及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抢救小组。在远离青藏公路的茫茫雪原深处,他们把一个又一个濒危的野生动物从死亡的边缘解救出来。满头金发的洋博士和满头黑发的中国专家时而痛苦地老泪纵横,时而又欣慰得满脸笑容,他们和那散布在山山岭岭上的野生群体一起经受着喜怒哀乐的共鸣。

乔治·夏勒博士毕竟是有心人,就在他这次离开青海时,特地由个人捐款雕造了三座告诫人们要爱护野生动物的石碑。石碑分别竖立在那些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小径路口,显示了一种现代人类共通的博爱与良知。

几年之后,有关人员曾再赴唐古拉地区考察,就在那三块石碑近旁还有或吃草或饮水或嬉戏的各类野生动物群。一种共生共荣的祥和氛围不禁让人们生出深深的快慰。这大约也是身在大洋彼岸的乔治博士所期望看到的情境吧!

面积为 25 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乃至是整个地球上最具诱惑力的地方。这块世界上最大的高寒无人区同时也是高原野生动物群体保持了最原始状貌的地区。它的各拉丹冬雪峰、玉珠峰,它的太阳

湖、月亮湖、可可西里湖,它的马兰山、新青山以及神话般的冰川群犹如八卦易经和佛教密宗一样让人迷惑。

1990 年 5 月下旬至 8 月初,中国科学考察队中有两位动物专家冯祚建、何玉帮随队进入可可西里地区。在长达两个月的跋涉考察中,他们的眼前展现出一幅幅生趣盎然又千姿





百态的野生动物图画。那种原生状态下的野性家族的繁衍生息,那种毫无人类破坏痕迹的野性的和谐,那种野生群对人类茫然无知的憨态和赖样,足以让两位科学家如痴如醉地投入研究并编织出一串串永远讲不完的美丽故事。

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行进的第一天,当遥远的各拉丹冬雪峰在他们的视线中构成一种调皮的幻影时,他们却突然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大群藏原羚在荒原上结队疾奔。那些灰褐色的群体是刚刚喝足了水或刚刚吃足了草,或是出于一种人类尚不知情的动物群的竞赛,抑或是它们突然看见了考察队的汽车——这些它们从未见过的硕大动物引起它们的好奇,总之,它们排列几行长队直向考察队飞奔而来。两个动物专家从望远镜里估计,至少有 500 余只。

藏羚羊在荒原上的狂奔姿态是潇洒轻盈的,像鸟儿的飞翔,像水流的漂移,仿佛不是冲击向前而是比翼齐飞,这似乎很符合它们的食草不好斗的本性。衬托着巨大的暗灰色的荒原背景,藏羚羊的奔跑显得舒缓而又从容,让两位专家惊叹而又欣喜。他们很希望羚群能奔跑到车辆的近旁,好让考察队员们一饱眼福。可是,当汽车队里不知是谁轻轻地按了一声喇叭以表示对藏羚群的欢迎时,那群灰褐色的动物却忽地掉头而去了——它们生性胆小,受不得惊吓。汽车喇叭的轻鸣对于它们来说,不啻是听到狼的长啸或熊的怪吼。再说,它们从未见过汽车的影子,这种头角狰狞睁着两只大眼睛的钢铁动物不用说会对它们产生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威慑。

考察队的汽车又缓缓驶动了。懊恼万分的冯祚建“大骂”不该乘了这汽车来,要是徒步走,要是人少,那群 500 余头的藏羚的长队能不飞奔到他们的跟前么?说不定,藏羚会在他们这些爱野生动物如掌上明珠的专家怀里撒娇哩?不过两位专家还是抓紧机会远远地摄下了两张藏羚群的照片。他们说,那照片千金不卖!

黑夜降临了,考察队员们裹在简易帐篷里,旷远处似乎有狼在叫,却不敢近前。狼毕竟是怕人的。两位动物专家倒希望看到狼,他们要观察一下这儿狼和别处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一只孤独的狼在考察队前方的一个小山坡上出现了,在望



远镜里,它显得沉稳、保守甚至有些沮丧,耷拉着头,远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有一种凶残的高傲。后来,他们又遇到了几只孤行的狼,一见到人影就远遁而去,虽有狂奔之态,但也只是散兵游勇,成不了大群。考察队员们感到不过瘾,两位专家分析说,这儿的藏羚、野驴、野牦牛一般都成群成队,故狼很难得手,繁殖力亦下降,或是向其他地区转移了。总之,狼的不够凶猛至少反证了其它野生动物种群的强大。有一天的下午,考察队员李树德在一道短坡前与一只老狼不期而遇,那老狼浑体灰褐色,正蹲在坡坎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他立时吃了一惊,心便狂跳不止,想避开却又不敢动脚,怕老狼看出他的惊惧。于是,他硬着头皮一眨不眨地盯住狼,狼也不慌不忙地盯住了他。如此四目相视,约摸过了一刻钟左右,那狼却慢慢转过头,缓缓走开了,倒让他觉着奇怪。赶回去给两位动物专家说了,两位专家大笑,说:“那只狼肯定从未见到过人,它不了解对方,决不莽撞下手。你不跑,它以为你更厉害,所以就郁郁而去。下次可别再让它撞上了,说不准它会试探着攻击你的!你再用四目相视的办法肯定不行了,它不吃才怪?狼不吃人,这故事只能发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对不对?”说得其他考察队员一阵哈哈大笑,倒让李树德的脊背上渗出汗珠来。

在沿着那道平缓的山谷前行的三四天里,他们看到了180余头黄羊胆怯地奔逃的队形,也看到了300余只藏羚羊沿沟底刷刷刷驰过的场面。藏羚羊体大而长,英武雄壮,胆子也大。因此,当它们组成队伍疾跑时,那一种气势显得如同出征一般,而不像藏原羚那样像是在落荒而逃。可是,最让考察队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一群突然像滚滚的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压过来的野牦牛阵。那时正值日后斜照,西天霞光如金,突然就从那弧度很大的原野的那一面蜂拥过来了一大群野牦牛。用望远镜细看,少说也有800余只,这真让人不敢相信。倏忽间就听到隆隆如闷雷的声音,可以想见800野牛的3200个蹄足在荒原上踢踏奔跑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音响,那实在是1600双手在同时击打大地这面大鼓。激烈狂噪的节奏鼓荡起一片彩色的音符,排山倒海似的黑色躯体一齐在弧度很大的荒原上冲撞。那一刻,考察队员们简直要惊奇的发狂了,他们大声地吼着叫着,一起按响了喇叭向着野牦牛群致意。野牦牛群显然受到了





鼓励,纵意狂奔激撞而来,在距车队 150 公尺的地方,迟疑了一下便又向侧面方向冲撞而去。两位动物专家认为,野牦牛不直接撞人与车辆,是它们的一种合乎天性的理智行为。它们虽然也有凶悍的天性,但毕竟是食草动物,凶悍却并不凶残。很显然,它们也没有见到过人类,更没有见到过汽车队,好奇与本能的自我展示是它们结队在车队前表演的惟一动机。

此后不久,考察队中的小穆在扎好帐篷的低凹地对面的斜坡上却目睹了 3 只野牦牛正在吃草。那一刻,小穆刚刚从斜坡上向外探出头,那 3 只体格巨大健硕的黑色山岗便向他挪动而来。他说那野牦牛少说也有 1000 多斤,迈着缓慢但却有力的步伐,显出一副智者的从容风度,颇像三位正在踱步思考的哲人。小穆突然想到,它们的从容风度是和它们自身的强大相统一的,因为强大到无由自我炫耀的程度,便显出一种自在的从容。这也反证了那些貌似机警实则胆怯因而探头探脑的兔子,正因为它的弱小才表现得慌张,于是常常疑神疑鬼。他把这些颇有意思的风闻和联想说给两位动物专家时,两位专家竟颇为赞赏地向他伸出大姆指。



最让考察队员欣喜若狂的是在后来的几天中发现了十分罕见的盘羊群。盘羊俗称大头羊,它的头粗大而引人注目,它的角不仅大,而且形态特别,体格也大出黄羊一倍。因它的角整整在头上绕了两圈又向外上翘。以至于影响到它的嘴伸向地面啃草的接触度。但它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无疑是第一流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在青藏高原其他地区已经很难见到了。最多的也就两三个的偶然发现。所以当考察队员们突然间看到了那一群至少有五六十只的盘羊的时候,他们那高兴的劲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两位动物专家更是喜出望外。只是那群盘羊似乎对他们这队驾着钢铁怪物的不速之客保持了警觉,所以没有等到他们的汽车开到离盘羊群 200 米的地方,盘羊群就成散开队形悄然撤退了。

两个多月的考察,他们见到了堪称世界级珍品的野牦牛、白唇鹿、藏羚羊、盘头羊等,且都是以大群出现的,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另外,他们还多次看到狐狸、野兔、棕熊、旱獭以及沙鸡、雪鸡、黄鸭、斑头雁等。按最保守的估计,无人区可可西里大约有各类走兽 5 万余头,有各类飞禽 7 万余只,是 5000 公尺高海拔的堪称骄傲的“动物宝库”。







## 文化宏脉

### 昆仑文化,是与正统儒家文化的互补

在中国先秦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文化长廊里,有一个有目共睹的奇特现象,许多并未真正到过昆仑山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艺术家,却创作了大量的与昆仑山有关的文化作品。这些作品或诗词歌赋,或学术文章,或绘画音乐,脍炙人口,悦人耳目,辉煌灿烂,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道绚丽风景。

仰望昆仑,神往昆仑,诠释昆仑,既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精品,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一种有别于中国正统儒家文化的昆仑文化,将会在更为恢弘高尚的层面上提升我们民族的文化境界和精神品位。如果说,长城作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图腾,至今还以强大的磁力,凝聚着祖国大陆与海外华夏子孙的向心力的话,那么,昆仑则作为古老的自然图腾,成为连接中原与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最牢固的精神纽带。它既是山水的脊梁,更是文化的脊梁。

宏伟的气势辐射,瑰丽的神话想象,借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山水人格化,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人合一,包容时空——这就是伟大昆仑文化的真髓精义!

万水之源,千山之祖、百川归海、百族一统,凝聚天地正气,呼唤人间正义——这就是伟大昆仑文化的磅礴内涵。

莽莽昆仑,不但孕育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更支撑了华夏文明 5000 年的精神脊梁;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象征,更是一种民族伟力的图腾。

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危难关头,首先需要的精神支撑就是心驰昆仑,发泄愤怒——这种发泄变成了天地间的警世绝唱,变成了震古烁今的《离骚》、《天问》、





《九歌》、《九章》，与其说这是一代诗人的愤怒和诘问，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真理的追寻和叩问。

屈原所处的时代，七国并立，天下纷扰。秦楚争霸，各据南北，从内政外交军事实力上讲，秦楚两国各有优劣，势均力敌，都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然而不幸的是，博闻强记，能于治乱的屈原却遇上了一个刻薄善妒的同级官僚靳尚，再加一个知人不明却又心胸狭窄的楚怀王，于是，嫉妒与昏乱结盟，屈原的厄运就降临了——他被罢官放逐，失去了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

全部的原因就是因为靳尚在楚怀王面前造了一个谣，而怀王竟然相信了。屈原当然不服，然而正义与高洁最终被邪恶打败，有什么办法呢？一代浪漫主义大师只能在他的《离骚》中抒发怨愤，他写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么，屈原心驰神往的悬圃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它就是昆仑之巅，是一个“登之乃灵”的神仙所在。然而，这个所谓的“帝之下都”，其等级森严原和地上的王宫一样，在九重宫阙里，每一层都有开明兽把守，于是，屈原被阻挡在宫门之外，他又一次遭受了挫折。

穷尽天地，上下求索，屈原的神思遐想仍离不开昆仑山。他继续写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世污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在这里，屈原借用昆仑神话，痛斥了天上地下普遍存在的人性之恶，妒贤嫉能。我们不妨可以把这几句诗看作是屈原投向封建小人政治黑幕的一道宣战檄文——在这里，屈原所怒斥的丑恶现实已远远超出了封建政治的范畴，他对人性中的势力、嫉妒、谄上欺下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拷问和批判。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在屈原的《离骚》中，竟保存了比《山海经》、《淮南子》中更多的昆仑神话，以至于一些后世学者疑心《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可能来源于楚辞。实际的情况是，《山海经》的版本从古到今有很多变异，许多有价值的神话故事在流传中被忽视或被遗忘了。

屈原上下求索，心驰昆仑，他虚写对昆仑神话的诘问，实写对楚国政治的批判。当脱离了神话即人话的政治羁绊后，在真实自然的昆仑天风



中,他的郁闷梗塞的心境便为之一变:“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

通观整篇《离骚》,屈原从自己的身世志向说到楚国政治,借用昆仑这个载体,尽情抒发了一腔愤怒和一身豪气。特别是对于昆仑山的神往与依恋,构成了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华章丽句。他升昆仑,过不周,渡西海,舞九韶,奏九歌,会诸神,心情愉悦而豪迈——然而,神游到此他却戛然而止,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可爱的祖国,他必须回去,回到他的祖国和人民中间。他最终选择了抱石投江——一种与自己的祖国共存亡,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终极选择。屈原的死是对中国封建政治即小人政治的重锤一击!难怪郭沫若先生在他对屈原的评价中,发出了“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千古感叹。

一代智者贤者,一位旷世奇才的高洁之士屈原就这样成了黑暗政治的牺牲品。屈原死后不久,楚国也随之灭亡了,统一中国的最高权柄最后落到了秦始皇嬴政的手上,接下来便是“焚书坑儒”,便是“苛政猛于虎”和“秦二世而亡”,中国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完成了另一种让人扼腕而叹的选择。固然,历史的发展是基于各种力量制衡的合力的,是不以后人的感叹为转移的,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假如屈原遇到的不是昏庸的楚怀王,假如他能在另一位贤君的支持下施展才华,由楚国和楚文化统一中国,那么,中国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也许可以走上另一种政治清明,





文治畅达的道路。毛泽东所遗憾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场面或许可能避免，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面貌当然也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了！

然而，屈原到底是在政治上失败了，失败中的胜利却是他那煌煌若日月的辞赋文章，是他那警示千古的爱国之心和昆仑文化情结，是他那滋养中国一代又一代文化灵魂的操守和情怀。今天，当我们在朗诵他的《九歌》《九章》中的绝妙诗句时，仍不能不感受到一种沐天风，伴清流，上昆仑，小天下的酣畅与通达——“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大唐盛世是留在中国人记忆里的一段辉煌，至今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如纽约、巴黎、渥太华等地方，中国移民还保留着自称为大唐传人的“唐人街”。而大唐时代的文化也确实发展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崭新的高峰时期。今天，时光已流逝了一千余年，大唐盛世的遗迹在地面上的留存已稀少如凤毛麟角，但是，只要我们信手翻一翻《全唐诗》，那个时代的立体画面便会在字里行间一一展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文化的信息和魅力却是永存的——这也正是文化的伟大所在。特别是在盛唐时代李白杜甫的诗歌里，我们分明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丰腴晶亮的躯体，感受到那个时代或从容或急迫的生命呼吸。如果从历史的遗存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便会发现，那些高高屹立在盛唐中心位置的，不是帝王显宦，不是贵妃将军，而是一代诗仙李太白。正如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所表述的那样：“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李白无疑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富于浪漫精神的诗人，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他虽有经国治世之志，也曾一度有机会在朝廷做事，但最终的命运却和他的前辈屈原一样，因谗言而被间，遭诽谤而受辱。算是被辞退了。在这里，起破坏作用的是“后宫三千，专宠一人”的杨贵妃，外加一个不离皇帝左右的宫廷总管高力士。唐玄宗李隆基对李白还算客气，没有对他治罪，而是给了一大堆金银盘缠，打发了事。

以李白的志向志趣，才华和才能，他是有可能在更大的层面上为李隆基的唐王朝作点大事情的，因为他已敏锐地观察到唐王朝的种种危





机,感觉到了盛唐华檐下的诸多阴影。特别是对于地方藩镇势力的急剧膨胀,对于统治阶层的麻木不仁颇有微词。在一首赞颂杨贵妃的诗中,他竟然冒出这样两句:“借问汉宫谁当似,可怜飞燕倚新装。”这本来是一种委婉地劝告统治者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沉溺误国的忠义之言,可是,在习惯于阿谀奉承的封建统治者那里,感受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犯上”的恶意。于是,谗言和诽谤找到了突破口,李白的厄运也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李白是一个放言豁达,不拘小节的傲岸潇洒之士,既然在群小争宠的恶劣政治环境里无法舒意,他就云游天下,广交诗友,寄情山水,访道求仙——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浪漫主义的诗歌,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日益恶化的封建秩序作出了自己的挑战。他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

李白嘲笑孔子,嘲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金科玉律的儒家学说,他内心所崇尚的必然是自屈原以来的楚辞文化和昆仑文化,因为他访问的许多名山都与远古的神话有关,他的诗歌中也不乏昆仑山与黄河长江的名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在这里,诗句的豪迈和心境的激越是互为作用的,诗人似乎是找到了一种发泄的方式,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文化构建的方式——应该说,李白的成功和屈原的模式有相同之处,这也是处在那种时代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最佳选择,即用极致的文化人格来保护和升华极致的政治人格,李白应该说是做到了。

李白大约并没有完整的游历过昆仑山,但他却曾经成长生活在昆仑余脉岷山脚下,他对昆仑神话的向往升华与表述在他的一些名篇中得到了佐证。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几乎是用神来之笔,用更成熟于屈赋的文辞意境和节奏,酣畅淋漓地叙述了他上神山,摘星月,闻天歌,见仙人的奇妙过程,末了两句却是对现世政治的强烈愤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应该说,在与正统儒家文化的决绝中,李白比他的前辈屈原走得更远,更洒脱,也更为放达和美丽,因为在政治命运坎坷多舛的人生旅途上,他毕竟没有选择自杀!



在李白同时代的名人中，最能理解李白并能给予公正中肯的评价者，当数他的忘年挚友杜甫了。在一片诅咒李白狂傲不驯，不会隐忍做人的恶浊舆论中，杜甫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这里，杜甫发现并肯定了李白卓然不凡的个性价值，而封建统治秩序是扼杀个性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君臣父子，非礼勿言。

杜甫作为一代诗圣，他也曾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浴淳”的报国志向，但他直面现实，看到的却是“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黑暗。特别是他从李白的遭遇中，看到了直言放达之士必不为官场所容的现实。于是，他开始主动地步入下层，走向民间，用全身心关注体验着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哀乐，写出了针贬时弊而又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等诗篇，完成了一个有别于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晚年，当他贫病交加地站在长江上游的高岸上，抚今追昔，极目凝思，吟咏出的却是这样的诗句：“风急浪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样一种沉郁顿挫，幽微深广的意境里，我们不是又一次看到了屈原《离骚》的后世影子吗？

越过盛唐这个高峰，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是走着下坡路了，文化精神日见萎靡。北宋虽然出过一代文化大师苏东坡，他的豪放词派也曾领一代风骚，但那种豪放多是一种文弱化的人性挣扎，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绝妙好词，渗透的却是某种看透世事以后的无奈与虚空——宋朝是一个文弱的王朝，表现在诗歌中的情绪，也大抵只能如此了！昆仑文化和屈赋文化的磅礴瑰丽色彩，在这时已很难寻觅了。——这也是不能苛求于文化人的事情，只能从那个时代的整体萎靡中去寻找解释。

明清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特别是清朝的文化隔绝与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完全失去了同世界文化相融的机遇。日趋复杂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统治阶级只满足于一种表面上的大一统追求，这时，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搞得轰轰烈烈，而中国仍在这艘破旧的封建古船上作着可笑的修补。无怪一代思想家兼诗人的龚自珍会发



出这样的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里，龚自珍呼唤的是一种昆仑文化中盘古开天辟地的造世精神。

清末那一场牵动华夏神经的“百日维新”，在旧势力的代表西太后的干预下很快流产。为此而甘愿付出生命代价的一代英杰谭嗣同，引颈就屠时却能够从容地哈哈大笑，并吟唱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雄壮诗句。——在这样的生死关头，牵动这位仁人志士灵魂的，仍只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报国热情和昆仑文化情结。

历史的车轮终于推进到 20 世纪上半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终于迎来了她的又一位开天辟地的大英雄。1935 年 10 月，当毛泽东率领他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昆仑余脉的岷山时，这位集战略家和诗人为一身的伟人，便以他雄视千古的深邃目光，挥笔写下了卓然不群的念奴娇词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清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在这里，毛泽东既是在对昆仑山发问，更是在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问，伟大的发问像惊雷滚动，回荡在莽莽昆仑的千山万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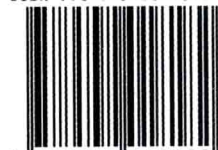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仅是在评判昆仑，而且是在指点世界了，伟人的胸襟和气度，把昆仑的意象点染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境界。在这里，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升华到一种政治与全球生态的美妙高度，使昆仑文化放射出最为灿烂的神韵光彩。





ISBN 978-7-5420-1818-2



9 787542 018182 >

定 价：56.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昆仑山与西王母

作者=李晓伟编著

页数=270

SS号=13677229

DX号=

出版日期=2012.11

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西王母故地

圣山有色

洞穿历史

咀嚼废墟

昆仑解谜

王母情结

女王考秘

炎黄溯源

西王母族属考

女王影子

关于古史

《山海经》辩

圣母偶像

图腾时代

女神时代

生殖崇拜

“於菟”寻根

以诗证史

鸟兽人师

女王之山

复活远古

正史歪读

王母遗韵

仰望昆仑

残篇缀语

河出昆仑行

昆仑龙脉地

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

华夏文明顺天地之运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大洪水下的文明再生

黄河流域的演变与王朝更迭

河首之“谜”



黄河文明荟萃古都长安

生态变化与黄河变奏

星宿海——柏海——西海

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再塑昆仑

触摸大昆仑

神域魔境

“弱水”西流

羽族王国

巴颜喀拉

公主庙记

拥抱昆仑

迷失古林

同此凉热

文化宏脉

封底